

季 诺 维 也 夫

论
共
产
国
际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078021

季诺维也夫

论 共 产 国 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200129636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钱月华

论 共 产 国 际

LUN GONGCHAN GUOJI

季 诺 维 也 夫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 大 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63,000 字
1988 年 12 月 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 001—2, 020

ISBN 7-01-000287-8/K · 130 定 价 9.70 元

DH92/29

出版说明

格·叶·季诺维也夫(1883—1936)曾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活动家。

季诺维也夫于1883年9月出生在乌克兰赫尔松省叶利萨维特格勒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就投身于革命活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迫害。1902年出国,先在柏林,后到巴黎,然后去伯尔尼。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时,季诺维也夫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季诺维也夫和一批同志返回俄国,参加彼得堡的党的工作,并被选入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列宁等六名布尔什维克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08—1917年间,季诺维也夫一直侨居国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党纷纷背叛,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一起逆流而上,同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第二国际的背叛行径,呼吁建立新的第三国际,并为此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代表党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被选入左派常务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季诺维也夫返回俄国。从到达俄国之日起,季诺维也夫就参加了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准备十月革命的工作。1917年10月,季诺维也夫当选为领导起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党

中央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发言和表决时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后又在《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布尔什维克准备武装起义是冒险行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一行为曾遭到列宁的痛斥，认为这是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196—199页）。但这一事件很快就为事变进程所消除。十月革命胜利后，季诺维也夫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党内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初，俄共（布）党内由于布列斯特和谈而发生分歧，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一起同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从这时起，共产国际的工作成为季诺维也夫的主要工作。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筹建过程中和建立后的初期阶段都起过重要作用。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直接领导了共产国际的一切重大理论和实践活动，参与了共产国际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并在历次代表大会、执委会会议上担任许多重要议题的报告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的许多重要决议、提纲都出自他的手笔。季诺维也夫还担任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主编，在《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真理报》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对共产国际的重大策略方针进行了阐述和释解。

1926年夏，联共（布）党内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同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在决议中谴责他们为反党的分裂主义者。同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

季诺维也夫在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7年中，在捍卫共

产国际的革命原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派”幼稚病,实现共产国际三大开始的策略转变和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坚持列宁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推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季诺维也夫在领导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制定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对待社会党人的态度等方面也表现出“左”的倾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季诺维也夫就共产国际有关问题所作的报告、讲话、发言和所写的文章、提纲、决议草案,对于研究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本文选收集了季诺维也夫在1915至1926年期间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执委会全会速记记录以及其他著述中的文章、报告、讲话、提纲等共33篇,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文选由宋洪训负责编选和译校。个别文章由郑异凡、王家华、刘庸安、何宏江、伊阳明翻译,大事记由张晋峰编写。

中共中央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1987年10月

目 录

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 及其思想面貌).....	1
(1915年10月)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	9
(1916年8月)	
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	15
(1916年6月)	
共产国际(提纲).....	32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年3月)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声明(代表俄国共产党).....	42
(1919年8月2日)	
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43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1919年8月5日)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	52
(1919年4月)	
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	60
(1919年11月)	
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及其任务).....	71
(1920年5月)	

共产国际今昔	98
(1920年7月)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114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0年7月29日)	
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33
(1920年9月1日)	
孟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	148
(1920年10月)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161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1年6月25日)	
共产国际的策略	198
(1921年8月)	
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	220
(1921年11月)	
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加入第二国际、第 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支持无政府 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提纲)	229
(1921年12月)	
再论统一战线的策略	239
(1921年12月)	
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45
(1922年1月22日)	
关于统一战线	254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简要报道)	
(1922年2月)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	260
(1922年4月)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	265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 报告	
(1922年11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摘录).....	277
(1923年6月12日)	
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300
(1923年12月)	
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	319
——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	
(1924年3月)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摘录)	341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4年6月19日)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 总结发言(摘录)	372
(1924年6月26日)	
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405
(1925年1月)	
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	412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1925年3月25日)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 的任务(摘录).....	461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总结	
(1925年4月)	

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	500
——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 (1925年9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提纲)	507
(1926年2月)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539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 的报告 (1926年2月20日)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	563
(1914年8月—1926年12月)	

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

(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及其思想面貌)

(1915年10月)

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是由意大利社会党正式发起的。筹备和召开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伯尔尼哨兵报》编辑罗·格里姆同志掌管。

第一个重大问题是，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在分发邀请书时应当遵循什么标准？是邀请一些能够彼此团结一致并打出战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旗帜的真正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是邀请凡在某种程度上不赞成正式政党的现时立场并决心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等等的所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意大利人的正式决定说：邀请那些仍然忠于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的原则，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等等的政党或政党的一部分人。但是，代表会议实际工作组织者的倾向是，尽可能扩大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而且不管怎样也要吸收德国“中派”的代表参加。在7月中，就召开代表会议一事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取消派组委会的代表（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党中央的代表（格·季诺维也夫）也参加了这次预备会议。这事发生在考茨基、哈阿兹和伯恩施坦发表著名的反对兼并和争取和平的宣言以后不久。这里，问题很快就弄清了，组织者的打算与其说是召开左派的代表会议，不如说是召开“中派”和左派某种混合的代表会议。

一位德国左派的著名女代表声明说，她主张同考茨基“派”合作。这位女社会党人在转述代表会议一位组织者的话时说，我们虽

然同考茨基及其拥护者在理论上有所分歧，但是我们指望在实践上促使他们向左转。组织者们无疑是主张邀请以哈阿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中派”的。甚至还认为有必要邀请象布兰亭、特鲁斯特拉等这样一些露骨的机会主义者。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关于邀请德国“中派”的问题由以《国际》和《光线》杂志的拥护者为代表的真正的左派来决定，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我们党中央还建议邀请真正的左派（荷兰的论坛派、代表斯堪的纳维亚的霍格伦、保加利亚的紧密派、《光线》杂志的拥护者、拉脱维亚社会党等等）参加第二次预备会议，但这一建议也被否决了。巴·阿克雪里罗得正式声明，假如哈阿兹、考茨基和他们的那一“派”不被邀请，那么对他阿克雪里罗得来说也就会发生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参加代表会议的问题。事情很清楚：方针是向右转，同“中派”结成联盟。我们只好对这一方针表示抗议，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来维护社会民主党真正革命派的权利。

在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的全部筹备工作无疑是朝着这个方向，即朝着与“中派”接近的方向进行的。然而，估计失算了！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很希望接近“中派”，糟糕的是，“中派”不希望接近代表会议的组织者……这从组织者在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考茨基、哈尔兹和伯恩斯坦曾竭力企图接近列诺得尔式的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不过由于这些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接近左的国际主义派。

这样一来，代表会议排除了只是表面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而实际上则是社会沙文主义奴仆的“考茨基派”的参加。左派想要逢迎“中派”的不稳定立场没有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中派”感到自己更接近于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不愿去迎合不稳定的左派。这就是时代的象征。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对“中派”的一切幻想必

然越来越烟消云散。考茨基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有利的。考茨基派使所有的人看清并促使极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逐渐走上不调和的坚定立场。这是坚定不移的和毫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路线迟早会在反对派分子中间取得胜利的保证。或者是跟随社会沙文主义，或者是跟随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但是，代表会议组织者想要接近“中派”的意向毕竟对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人员构成，首先是对于德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德国共有 10 名代表，其中坚定的国际主义的左派只有很少几名。德国代表团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三种不同的派别。以议员累德堡为首的是多数派（约五六人），他们代表那些动摇于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之间的左派分子。累德堡及其拥护者在国会中没有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而是弃了权。他们向代表会议申述的理由是：一大批议员投票反对拨款就意味着议会党团的分裂，而议会党团的分裂就意味着党的分裂。同时需要的只是忍耐，这样左派就会在党内占多数。卡尔·李卜克内西投票反对拨款并公开破坏纪律，这只是帮了右派的忙。他累德堡是不能接受投票反对拨款的义务的。这是一个只能由德国人自己在家里解决的问题。德国代表团多数派的立场就是这样。

另一派的代表大约两三人（符腾堡人和某些问题上还有个别人）。这些同志不满意在军事拨款投票上简单弃权的政策，他们接近于李卜克内西的立场。然而他们缺乏完备的理论来评价形势，他们没有决心同正式政党最终实行分裂，尽管后者将他们开除出党，他们也没有最终摆脱“经过考验的旧策略”的传统。

第三派的代表只有一人。只有这位同志毫无保留地支持李卜克内西的策略。只有他在谈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时使用了《国际》和《光线》杂志那样的口气（德国代表团多数派因此对这位

同志采取了极不应该的态度)。

结果是，德国代表团在代表会议上的表现要比我们根据报刊所通常以为的德国左派坏得无可比拟。德国代表团多数派使代表会议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国际派的代表会议不能提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最起码的要求——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累德堡断然声明，这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有时使我们觉得，累德堡及其朋友们似乎也是考茨基派。

根据累德堡及其朋友们来对整个德国左派作出判断是不公正的。在代表会议上宣读了德国左派的一位著名代表的信，这位代表(没有指名)反对累德堡，要求“对倒戈者作出无情判决”，坚持认为应当痛斥动摇者，并声明，只有在第二国际的“废墟”上才能建立起第三国际，等等。此外，在代表当中还公布了德国左派的另一位更著名的代表的私人信，这位代表声称他认为想要同考茨基—伯恩施坦接近的企图是极大的错误，“中派”调和派只能给左翼带来危害。

可能在国内，在各个组织里，在“基层”中德国左派的状况比在累德堡代表团的哈哈镜里反映出来的状况要好得多。但是，代表会议一事无疑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前的那种作用已经丧失殆尽了。以往的传统甚至束缚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分子，以至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新的国际的领导者。

法国只派了两名代表：工团主义者梅尔黑姆和社会党人布尔德朗。在这个人数不多的代表团里，也象一滴水一样，反映出了法国工人运动目前经历的过渡状况。工人阶级在法国比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压制。敌人占领着法国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事实使广大群众的意识受到压抑。不仅正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一一破产了。工人们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一切漂亮的革命许诺，战争爆发时关于武装反抗的一切漂亮言词，关于指导

行动的一切说法——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一句空话。盖得参加了内阁，爱尔威成了大叫大喊的沙文主义空谈家，茹奥则成了实际上的法国资产阶级代理人。

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反对派刚刚才开始形成，还处于酝酿过程中。法国工人运动的优秀分子正处在十字路口。巨大的变化过程即将开始。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及其杰出代表梅尔黑姆本身就反映了这个刚刚开始极其深刻的过程。他从工团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但他是在摸索前进，提心吊胆，瞻前顾后，还不愿倾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论”对于代表会议的许多代表来说简直是吓唬人的东西），还不愿谈论重新建立第三国际的事情。

意大利社会党派了四名代表。大家知道，这个党早在三年前——土意战争期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比索拉蒂及其同伙）成了沙文主义者。这一情况便于意大利社会党人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采取反沙文主义立场。尤其是他们有时间来细心观察社会沙文主义策略的有害后果，而他们的资产阶级则难以用“保卫祖国”的叫嚣来欺骗工人。

但是，不要认为整个意大利党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代表团的半数（四人中有两人）属于左翼改良派（左翼改良派在右派开除出党后仍然留在党内）。在左翼改良派中，和平主义的情绪很活跃，甚至还带有亲法兰西的色彩；不管怎样，他们不敢去反对机会主义，不敢建立没有并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第三国际。意大利人具有浓厚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感情，对事业的诚意和忠心，但远远没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经得起考验的路线。

巴尔干联盟派来了两名代表：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柯拉罗夫同志和罗马尼亚党的代表拉柯夫斯基同志。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保加利亚同目前成为普列汉诺夫的勤勉学生的保加利亚取消派（“宽广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紧密派”同

志在国内执行着一条卓越的战斗的路线，但在国际舞台上，他们还没有那样坚决。拉柯夫斯基在其新出版的小册子中对“保卫祖国”的思想作了让步，在代表会议上他声明自己是拥护重建旧的第二国际的，不愿向机会主义者宣布决战到底。

代表瑞典和挪威出席的是霍格伦同志和涅尔曼同志。他们有庞大的组织作后盾。在瑞典，左派拥有三家日报。霍格伦派在下院有 13 个议席。在有些问题上，该派甚至拥有 30 票。霍格伦派同机会主义者布兰亭进行了多年的富有成效的斗争。在挪威，青年组织是左派的支柱。瑞典人和挪威人通过了关于战争的详尽决议，其精神同我党中央的宣言一致，斯堪的纳维亚同志们是一致同意发表这个宣言的。

代表荷兰出席代表会议的只有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他在国内采取介于马克思主义者（“论坛派”：哥尔特、潘涅库克）和机会主义者（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之间的中间立场。

波兰派了 3 名代表：拉狄克（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瓦尔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拉品斯基（波兰社会党）。

代表瑞士的是格里姆、奈恩和普拉廷。

俄国的代表如下：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代表组委会的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代表《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象崩得一样被邀请的，因此还代表组委会）是托洛茨基；代表社会革命党的是博勃罗夫（代表中央）和加尔德宁（《生活报》编辑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文特尔同志。代表崩得的（只派了一名代表作为观察员）是克列曼斯基。

这样看来，代表会议按其人员构成来说是五花八门的。同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的有感性的社会主义者，有倾向于“中派”的分子，有还没有同和平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同志，有拥护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人，只是生活现在把他们推到了另一边，如此

等等。

从代表会议的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个大约七八人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时增加到 10 至 11 人。参加这个集团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拉脱维亚社会党代表，波兰社会党反对派代表，瑞典和挪威的代表和一名德国左派代表。代表会议的这个左派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它单独发表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只有这个左派维护了明确的和完备的纲领。在代表会议上，实际上在所有政治思想性质的问题上都在这个左派和累德堡派之间展开了决战。

在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许多决议是反对我们这个左派的。代表会议只是在我们号召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所走的道路上迈出了羞怯的和迟疑不决的第一步。首先，代表会议不愿通过关于危机的明确的决议，不愿向机会主义者宣布公开的决战，不愿打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或许是必然的。发展的速度虽然极其缓慢，但是毕竟在发展。就拿目前这次代表会议的成果同更加羞怯得多的社会党人妇女代表会议的成果相比较就可以看出。

生活对我们是有利的。事物的客观进程将会起到自己的作用。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们和“中派”先生们将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动摇不定的国际主义者证明我们所建议的毫不容情的策略是正确的。

就拿关于第三国际的问题来说吧！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多数派代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声明，他们不希望建立第三国际。《前进报》（意大利人的机关报）和《伯尔尼哨兵报》（格里姆的机关报）竭力企图证明，代表会议选出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根本不是为了取代旧的社会党国际局，而只应促进后者的恢复。但是，事态发展有其本身的逻辑。请看，正式的社会沙文主义党是怎样看待社会党国际

委员会的。

事变的客观进程、派别之间斗争的发展已经导致这样的局面，与代表会议组织者的愿望相反，他们和“中派”之间的联盟没有建立起来。事态发展的进程将导致这样的结局：与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愿望相反，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将成为新的第三国际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者将朝着这个方向耐心地进行工作，不作思想上的让步，但也不置身于实际运动之外。这样的时刻快到了，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将和我们一起高呼：

“沾染了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已经死亡。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5—46 号

译自《反潮流文集》俄文版 第 292—299 页。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

(1916年3月)

二月国际会议的任务是对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来五六个月期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总结。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向全世界工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读者将在这期《社会民主党人》^①上读到),并决定公开地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我们欢迎这两项决定,这是在成立第三国际的道路上、在摆脱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状态方面前进了一步。

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俄国工人们象谈论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样来更加详细地谈谈不久前召开的我们党中央代表团也参加的这次会议。当然,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不能论及所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问题,使我们了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的思想政治倾向。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会上选出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在一份正式报告中声明,一旦社会党国际局在海牙开始重新行使职能,它将立即解散。这是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动摇分子的一个让步。这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是没有正式决定的。

不过,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很快就感觉到,要比较顺利地进行工作,就要不怕单独地存在,就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机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发出一份通告信,要求成立由各国常驻代表参加的扩大的国际委员会。这是朝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

^①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译者注

建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不久前召开的会议就是第一次这样的（虽然不是完全正式的，因为不是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参加的）扩大会议。加速召开这次会议的外部动因是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不久前发表了无耻演说，他说什么国际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活力，并宣布即将在相互赦免的基础上恢复正式的国际联系。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不但没有向旧的国际局作出让步，相反地，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队伍来反对它。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它是不顾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中间派的动摇的。

不久前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人员大约相当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一半。思想派别的比例大致和齐美尔瓦尔德一样。不过纲领性的宣言更接近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所希望的。在这个宣言中没有纲领性的完整的東西，也没有明确而系统地对机会主义、考茨基主义作出评价。但是它指出工人阶级“革命干预”的必要性，提醒“战壕里联欢”的措施，号召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群众运动，谴责“工人们自愿参加为保卫国家服务的机关的任何行动”，要求“不管军事形势如何”投票反对拨款，并声明：“想要通过对妥协的机会主义领袖相互赦免的办法来恢复国际的任何企图……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说“在这次战争中，所谓保卫祖国无非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欺骗手段，目的是为了各国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总之，它是从在齐美尔瓦尔德迫使人们接受自己意志的累德堡的“泥潭”向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前进了一步。（宣言被一致通过。拉狄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发表声明，大意是：宣言虽然前进了一步，但他们认为不是所有部分都是令人满意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情况对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未来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德国代表在会上说，反对派在这期间散发了六十万份非法宣言，它举行了一系列出色的街头示威游行，群众

越来越多地转向反对派方面。但同是这位代表(累德堡的拥护者)跟李卜克内西断绝来往,攻击左派企图跟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行分裂。他说:“不能为两个上帝服务”。也就是说,不能留在旧的党内而同时又成立自己的党。据此他得出坚定不移的结论,无论如何应当留在旧的党内,但他没有发现那时他依然在为一个上帝服务,这个上帝就是谢德曼。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德国代表连听都不愿意听。对于他和他的派别来说,“统一”是断然的要求。

这样的言论在会上得到了热情的反应,尽管整个情况表明并非如此。

根据会议代表们搜集的情报可以明显地得出结论,胡斯曼及其拥护者的打算是:先同“中”派,即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实行“和解”。多数与会者意识到,或者说感觉到,这样只会造成对工人的又一次大欺骗。但同时,多数与会者不仅不坚决反对考茨基主义,而且鼓励这样一些人(例如奥地利的考茨基主义者),他们说什么:我们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如果……如果考茨基和哈阿兹……支持的话。

部分代表(以马尔托夫为首)希望会议不是前进一步,而是原地不动。他们不希望发表任何纲领性的政治宣言。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发出了告全世界工人的宣言草案,草案在会议第一天就发给了全体代表。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公开说,各国工人团体在无数的来信中要求它发表新的宣言。

“我们觉得,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必须前进一步。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的一切反应,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交往都无条件地要求我们这样做。”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主席就是这样说的。但马尔托夫及其同伙清楚地懂得,如果发表某种纲领性的宣言,那么由于整个政治形势,它必然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一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发表任何这样的宣言。为时尚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

是所有人都参加了会议。这样会把法国人推出去的。不要往前跑。群众不会理解我们。诸如此类的理由举了很多很多。结果决定，不发表宣言，而发表一个告齐美尔瓦尔德各组织的呼吁书（通告信），这是“中间”路线的代表拉柯夫斯基的建议。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两名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委员、德国人拉柯夫斯基、意大利人塞拉蒂和两名俄国人马尔托夫和季诺维也夫）来起草呼吁书。在委员会里，又重新展开了一场跟全体会议上同样的争论。然后，决定以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草案作为基础。没有其他的草案。根据我国代表的提议，加上了关于“相互赦免”、关于“不管军事形势如何投票反对拨款”的条款以及公开谴责“工人们自愿参加为保卫国家服务的机关的任何行动”。在最后一句中指的当然是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马尔托夫说，他本人反对这种参与，但是许多俄国参与者的理由并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对此塞拉蒂指出：“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塞拉蒂在意大利见识过本国的比索拉蒂先生们。他毫不怀疑他正击中了马尔托夫的痛处。

和解者们和外交家们的担心被证实了。呼吁书果真如此，它戳穿了考茨基主义者们的外交把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无疑是会议的少数派。人们对我们很不满。谴责不断地向我们袭来——实际上越是不得不按照我们的路线进行，谴责就越多。社会爱国主义者——玉德威尔得、胡斯曼、谢德曼、普列汉诺夫一再地帮了我们的忙。一旦人们坐下来起草呼吁书反对胡斯曼、桑巴和谢德曼，他们也就不得不或者使自己变得荒谬可笑，或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出左派所建议的东西。事物的逻辑是对我们有利的。

不过，不要用幻想来欺骗自己。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有许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这个联盟中有影响

的一些人更同情累德堡及其 20 人议员团，而不是同情李卜克内西；更同情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而不是同情我们。人们竭力回避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声明，我们否决组委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权利，但不否决组委会少数派参加的权利，因为组委会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机构，这时人们向我们进行了敌意的示威。（巴尔干的外交家拉柯夫斯基尤为卖力。）多数派援引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们声明得太晚了。但实际上事情出于两方面的原因：（1）国外的“组委会分子”经常欺骗一部分外国同志，硬说他们是国际主义者；（2）在齐美尔瓦尔德派中间有些人在政治上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很亲密；由于这些人始终是同意一切，跟随多数，是些随和的人，不按自己的路线行事，所以人们认为他们是些“合适的”同盟者，感到他们是同样的“考茨基主义者”。

战后第一次左派国际会议是 1915 年的妇女代表会议。我们的代表团第一次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决议草案。现在拿二月会议（1916 年）的呼吁书同这个草案相比较，你们可以看到，事变进程必然会把那些曾经谴责我们搞“布尔什维主义宗派”和犯有其他种种滔天大罪的人推到我们这方面来。

不过，我们毕竟还不能最终地说，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究竟会走向何处。

斯巴尔达库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党员）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他们是些什么人”的问题，即这 20 名在 1915 年 12 月投票反对拨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是些什么人。而他回答说：这是一个不同种类的集团。我们看到那里有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也有善良的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统一”的爱好者和叫嚷“纪律”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可以这样说。那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局未定。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会走向何处，它或者

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否会走向曾经为它所不齿的“赦免”的道路上去，这一点现在谁也不敢预言。

而当你听到，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那些十分珍视跟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决裂方面迈出一步的工人中间博得何等强烈的反响，你就不由得想对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说几句话：

同志们，我们现在人数还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坚决斗争到底的话，工人运动中一切有思想、忠诚的人将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比较起来具有巨大的优势，我们已经聚集在一起，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支部，而他们还不能彼此聚集在一起。不过，明天他们会聚集在一起，明天他们会和解，那时将会出现新的情况，将会更加卑鄙地玷污社会主义的旗帜。我们不会向后看。让我们向考茨基主义者宣布决战吧！让我们高举真正的工人友好的旗帜吧！……

不久的将来会向我们表明，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四月代表会议将沿着哪条道路前进。

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2 号

译自《反潮流文集》俄文版第 349—354 页。

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

(1916年6月)

一、第二次代表会议前夕

……在齐美尔瓦尔德时，多数代表甚至听都不愿意听关于建立社会党国际派正式的经常性国际组织的事。他们认为齐美尔瓦尔德是一种临时的、暂时的现象，是那些联合起来为了从事一般和平宣传的人们的即兴式联盟。千万不要同旧的正式政党分裂！社会爱国主义的多数派一定会回心转意，并重新回到旧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竭力协同一致，目的只是为了加速这个转变过程。一旦发生这种转变，我们就解散我们的齐美尔瓦尔德组织。^①

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大致是这样考虑的。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由此产生了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敌视态度，产生了对他们的不满，因为当时他们就说过，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当时他们就声明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并公开举起了第三国际的旗帜。

过了半年，在伯尔尼的二月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派不得不朝

^① 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甚至在报刊上发表了具有此类内容的正式声明，声明引起了不少混乱，这完全是由委员会独断专行地作出的，因为在齐美尔瓦尔德对这个问题既没有表决，也没有讨论。在昆塔尔，伯尔尼委员会的代表格里姆同志在答复我们的抗议时含糊其词，然而（至少在口头上）半收回了上述声明。他“解释”这项声明说，是指一旦社会党国际局放弃自己的政策并在实践上转到齐美尔瓦尔德一边来。我们要求把这一点记录在案。

着我们的方向采取了步骤。又过了两三个月，在昆塔尔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即齐美尔瓦尔德是否只是偶然的插曲，或者相反，它将是通向建立没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并且是反对他们的新的国际工人协会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战争还在继续，看不到它的尽头。各国人民在挨饿，在日益贫困化。不论在巴格达附近，还是在离巴黎几百公里的维尔登附近，在欧洲“文明”的中心，屠杀正以空前的规模在继续。每天，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被“本国”政府不受制裁地赶去进行厮杀……而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屠杀 22 个月以后还在赞扬工人为了小撮资本寡头的利益而作出的这种“英勇”牺牲……战争的进程，新的秘密条约，流血战争 22 个月来发生的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说什么发动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只能引起人们的嘲笑。然而，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发狂似地赞扬这场战争，怀着激动的心情号召人民群众“坚持到底”，它们实际上变成了扼杀社会主义的刽子手，去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在群众中产生必须同领导第二国际的犹大们和彼拉多们实行决裂的思想，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期，在任何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里都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现在，不仅在意大利、俄国、保加利亚，分裂已经成为事实。现在，在德国、英国（在代表会议上得到消息说英国社会党多数派同海德门及其同伙决裂了）、法国、瑞典，甚至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分裂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不，每一个真诚的普通的社会党人，有时甚至每一个真诚的普通的民主党人都都感觉到，他必须或者否定自己，成为资产阶级的不由自主的代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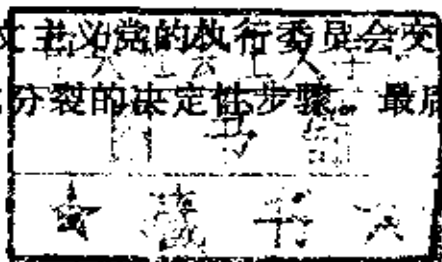
为了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团结的蝇头小利而出卖社会主义的长子继承权,或者成为“分裂主义者”,即公开举起同工人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的旗帜。

二、代表会议的成员及其政治面貌

各国政府竭尽一切可能来阻挠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了把国际警察的注意力转移到虚假的目标上,会议的组织者们在报上宣布,会议将在荷兰召开,但实际上是在瑞士召开的。然而有许多代表未能到达。大约有十名德国代表、一名奥地利代表、两名英国代表、一名拉脱维亚代表、两名巴尔干代表、一部分法国代表和斯堪的纳维亚代表等未能前来。因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人数较少。另一方面,社会爱国主义者还采取了自己的“措施”。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到英国和法国去说服那里的反对派不到齐美尔瓦尔德去。一些正式的政党千方百计地吓唬少数派代表。

不过代表会议还是召开了。单是这一点就是很大的胜利。

德国派了7名代表。这是德国反对派中三个主要派别的代表。一名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和称为“德国社会党国际派”的代表。他代表×城(某大中心城市,其整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持极左派的观点)。另外两名代表是“国际”派(这是李卜克内西和梅林编辑的一个杂志的名称)。在齐美尔瓦尔德时,这个派别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现在这些同志已经“向左转”了。在德国本身,哈阿兹-累德堡-考茨基的拥护者们把这些同志从以前的统一的反对派中开除出去了,尽管《国际》的拥护者们在提出“考茨基主义”的问题上并不是过分明确的。在代表会议前夕,“国际”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建议工人们停止向社会沙文主义的执行委员会交纳党费。在德国的情况下,这是同正式党分裂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另四名代表



是同累德堡-霍夫曼的名字相联系的温和的反对派。他们自称为“组织内部的反对派”，以区别于“分裂主义者”。他们的策略至今仍象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一样是十分暧昧和机会主义的。他们仍然表示反对分裂。他们仍然拒绝建立第三国际的思想。当累德堡和哈阿兹在考茨基的积极参预下最终成立议会党团时，正如斯巴尔达库斯说的，草拟了该党团的第一号原则性声明——半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声明说，我们投票反对拨款，因为我们祖国的边界没有受到敌人的侵犯。不久前，考茨基写道，新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应当“不是反对”，而是同旧的休特古姆党团“一起工作”。换句话说，考茨基一而再地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谢德曼、列金、大卫及其同伙建议和解。考茨基本人不愿来参加代表会议，尽管他和哈阿兹一样都接到了个人的邀请。他们不愿参加代表会议的理由是，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是（过去是！）德国党（休特古姆及其同伙）驻社会党国际局的正式代表，因此他们参加这样的代表会议是“不合适的”。这当然是不成理由的托词。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意大利、俄国、罗马尼亚和其他代表过去也都是各自的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实际上，全部问题在于考茨基和哈阿兹更愿意同列诺得尔，海德门和王德威尔得——就便也同谢德曼派——结成联盟，而不愿同聚集在齐美尔瓦尔德周围的国际主义者联合。

考茨基主义的死气沉沉的影响还强烈地压抑着德国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但是——这也是主要的——，群众中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不满之声到处都在增长。很难举出一个城市，那里不发生反对物价高涨等等的大大小的示威游行。战壕里的不满情绪是巨大的。群众在“激化”。如果战争还要拖到秋天，那么巨大的事变将不可避免。德国反对派中所有三个派别，和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不同，都这样说……。一位意大利代表提出，现在在德国是否可以指望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采取反战的实际行动，所有代表对这

个问题都众口一词地和满有把握地回答说：是的。这是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所没有的情况。德国代表都是些稳健谨慎的人，他们现在这样说，这是时代的最重要标志。这些现象也是代表会议上的重大事件。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从法国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是三位议员：布里宗、拉芬-杜然和勃朗。他们到齐美尔瓦尔德来无疑也是在法国群众对帝国主义大屠杀日益增长的抗议的反映。上述三位代表迄今为止都是最胆怯的“陛下的反对派”。他们都属于龙格-普雷斯曼派，即最糟糕的法国考茨基主义者。他们至今都还在重复考茨基主义，重复考茨基的话，说什么法国人和德国人投票赞成拨款都是正确的，因为一方遭到普鲁士人入侵的威胁，另一方则遭到哥萨克入侵的威胁。他们都不愿看到危机的深刻原因，都鼓吹对业已破产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实行相互的赦免。他们都半重复着社会沙文主义关于“神圣的法兰西”似乎在这场战争中维护着革命传统等等的神话。听着他们的话语，有时可以想起，这是一些直接来自不自觉的社会沙文主义阵营的人。但是，他们在代表会议后的行为，他们在法国反对领导法国“社会”党的那些先生们的行为却表明，他们这些人——尽管还很差、很不彻底和带着很大的动摇性——反映了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和在战争初期受蒙骗的而现在竭力反对战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欺骗的工人们的情绪。他们糊涂得岂有此理，他们有一大堆违背彻底国际主义的偏见。但是，群众运动把他们推到了齐美尔瓦尔德一边。就是在社会主义目前处于困难境地的法国，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也在增长，运动也在发展。在巴黎和外省，成立了一批彻底维护真正国际主义和同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法国工人团体。它们的任务将是利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业已开始的解体状态。

代表意大利的有7位同志。这一次意大利党明确地分成了两

派。多数代表是属于所谓的“左翼改良派”。他们在党内是否是多数，很难说。在议员中间，在“上层”，可能是多数，但在社会党工人中间，就未必是这样。这个多数派是站在考茨基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一边的，他们依然相信，“仲裁法庭”、逐步裁军、对外交政策的民主监督等等应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要求。少数派（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塞拉蒂同志）维护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相接近的另一种策略。

从瑞士来的有5名代表。2至3人（普拉廷、罗布曼、诺勃斯）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其他人是跟随格里姆同志走的。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议员卡茨列罗维奇，他是接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尽管不是在所有问题上。

波兰派了5名代表。3名（拉狄克、勃朗斯基、东布罗夫斯基）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边区委员会）的代表，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名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的代表（瓦尔斯基），这一次他在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问题上也支持左派。一名是波兰社会党左派的代表（拉品斯基），他大致持马尔托夫“派”的立场。

俄国代表团的情况是这样：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彼得罗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委托季诺维也夫担任代表。）代表组委会的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代表“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的是博勃罗夫和其他两名代表。

三、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

代表会议上最重要、最富有战斗性的问题是对待社会党国际局（过去在布鲁塞尔，现在迁到海牙）的态度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因为通过这种形式实质上解决的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的问题。

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英国以及比利时一样，他们所维护的是同样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所采取的是同一个原则立场。然而，战争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国家。目前，他们还不能互相握手，他们彼此敌视着。

社会党国际局所谓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国际社会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社会主义的命令，而是四个协约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命令。这个执行委员会，即王德威尔得、胡斯曼及其同伙再加上两三个荷兰社会沙文主义者，已经变成英法帝国主义者的代理机关。

然而，胡斯曼及其同伙现在企图在海牙成立两个敌对阵营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中间办事处。这两个阵营目前还不可能聚集在一起，但是它们可以在一起做出某些事情来：例如，携手共同反对国际派，和谐一致地对抗齐美尔瓦尔德。两个暂时交战的社会沙文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相互默契现在已经具备了。胡斯曼及其执行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充当着“诚实的”（哈哈！！）经纪人。

请看事实。胡斯曼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在《维也纳工人报》（维克多·阿德勒）、休特古姆的报纸、托马和桑巴的机关报以及俄国格沃兹杰夫派的报纸（《我们的呼声报》）上都十分乐意转载。它们都同样地讨好作出了以下公正发现的胡斯曼：什么“协约国社会党人”的伦敦代表会议和德国休特古姆派的维也纳代表会议实际上都是维护同样的“原则”。当胡斯曼一方面指出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实行和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攻击齐美尔瓦尔德和还没有民主派参加的那派社会党人（“巧妙地”暗指俄国的国际派）时，它们都为胡斯曼拍手叫好。

请看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发生的情况吧！胡斯曼发出信号，而未经任何协商，法国、瑞典、德国等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发表声明，对齐美尔瓦尔德公开表示抗议。法国“社会主

义”部长们有时做出一种姿态，似乎他们对胡斯曼进行的过于仓促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表示不满。然而，他们都完全“承认”海牙国际局，因此当胡斯曼谈到“无论是柏林、维也纳，还是巴黎、伦敦”，即这些世界性大城市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承认”海牙国际局时，胡斯曼是完全正确的。

无论是休特古姆，也无论是列诺得尔和普列汉诺夫，或者是列金，他们都需要海牙国际局。整个可敬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的领袖们不可能不考虑战后的情况。战后，他们需要“恢复”从事欺骗的国际，他们需要互相赦免，为了共同反对工人社会主义者，两个托拉斯必然要互相握手。正因为这样，海牙国际局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全部政治斗争的焦点了。海牙国际局现在已经是欺骗各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国际”股份公司的胚胎和萌芽了。这伙先知们将在“统一”和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下进行反对国际派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海牙国际局，争取召开国际局的会议，就等于帮助这批人来欺骗工人。就拿法国的例子来说吧！动摇不定的国际主义者布尔德朗同“陛下的反对派”代表龙格一起在“社会主义”部长们面前低三下四地鞠躬致意，请求他们允许同意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而那些部长们则装腔作势地表示拒绝，似乎这有损于他们所维护的“文明和自由”的利益。桑巴、托马以及俄国沙皇和法国寡头的走卒们向上帝担保，他们“庄敬自重”，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召开国际局会议。现在，彭加勒和白里安还不允许他们同意这样做。但过一些时候，他们是会同意的。那时将会怎样呢？在国际局开会的还不就是谢德曼辈、艾伯特辈、阿德勒辈、王德威尔得辈、列诺得尔辈、布兰亭辈、特鲁尔斯特拉辈等等先生们。不言而喻，在这样的会议上，从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头上是一根头发也不会掉的。这些先生们可能做的头一件事情是，他们将共同努力来

扼杀目前正在热心地争取召开社会沙文主义国际局会议的布尔德朗。

谁对旧的国际局抱着某种希望，谁就是朝后看，谁就是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匪帮的俘虏，谁就不可能对它进行真正的斗争。分裂是必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分裂已经一半成为事实。只有大胆而公开地号召各国工人同叛徒们决裂并建立自己的第三国际，才能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不言而喻，第三国际只有在群众运动的风暴中才能诞生。不言而喻，现在任何一次代表会议只可能为第三国际提供思想政治上的事先准备。但是，应当做好这项准备工作，应当最终地和彻底地选定这条道路的方向。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两类反对意见：原则性的意见和实践中的意见。无论前者或后者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的考茨基主义，即维护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统一，把国际主义者运动的领导权交给社会沙文主义者国际托拉斯。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发表了原则性的考茨基主义的演说。他一方面在俄国维护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另一方面自然希望把这种统一的福音传布到整个国际。他反对分裂。诚然，他承认，第二国际已经不能胜任，正如在目前世界性的灾难中许多组织和派别都已经不能胜任一样。但是，他反对“在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出现革命的震荡”。群众本身在战争一开始就具有爱国主义情绪。领导机关（“党的机关”）应当不是去分裂群众，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我们应当象一个有经验的和耐心的医生对待可亲的病人那样来对待群众。任何一种药物都应当试验一下，然后再动外科手术。问题不在于背叛。正如一个18岁左右的人会变嗓子一样，第二国际的情况现在也是这样。应当面向群众，应当让群众提出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要求。应当在那里向我们迷途的弟兄们证明，他们错了。（阿克雪里罗得以个人名义提出了类似

决议案的东西；没有公开发表——作者说，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备的初稿。）

另一些反对意见来自“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它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左翼改良派”和德国温和反对派的代表霍夫曼。

意大利人制造了一个神话，似乎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派可能会拥有压倒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多数。

他们说，我们在那里靠举手投票会把胡斯曼及其同伙“枪毙”的。根据意大利人的推测，日本、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社会党人会来帮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忙。

我们不必举出手头的一些数字来揭穿这个神话。即使说意大利人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极端天真的。问题完全不在于谁在国际局拥有多数。问题不在于用一个南非社会党人的票来否决拥有百万人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党。问题在于，按我们的观点的实质说，我们是否是一个党、一个阵营、一个国际，还是不可调和的两种纲领。

有人（霍夫曼、塞拉蒂等）对我们说，好吧，就这样吧！但是，我们不应回避在社会党国际局内去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战斗，我们应该到那里去揭露他们。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排除偶儿去参加这些先生们的会议的可能性，以便在那里撕下他们社会沙文主义脸上的假面具。但是，现在提上日程的不是这个问题。谁也不会来召集国际局的会议。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象布尔德朗和龙格那样来宣传争取召开旧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呢，还是去痛斥国际局，去揭露它，把它钉上耻辱柱，向群众解释胡斯曼辈的欺骗政策，向他们证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号召他们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

两种观点，两种策略。一些人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在世

界大战的炮火中已经锻造出摆脱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第三国际的前提条件。另一些人既不理解战争的性质，也不理解社会主义目前经受的危机的性质。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一个随着战争的结束很快就会过去的插曲。以国际局为首的旧的组织又会重新恢复。迷途的弟兄们会清醒过来，“误会”会解释清楚，那时“何以不能相互赦免呢”（阿克雪里罗得在委员会里说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会议的多数派站在哪一边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以下的事实表明，相对的多数可能在我们这一边。

未经实质性问题上的投票，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为争取召开国际局会议而进行宣传，另一派则反对进行这种宣传。属于前一派的有：拉查理（意大利人）、奈恩（瑞士人）、德国温和反对派的代表霍夫曼和阿克雪里罗得。属于后一派的有：列宁、瓦爾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和“国际”派的一位德国同志。结果产生了两个决议草案。多数派的草案很出色（我们将它全文登在本号报纸上）。作者们赞成召开国际局会议。但是，他们也提出相当严厉的条件，狠狠批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至于彻头彻尾的考茨基主义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既支持又不支持这个草案（支持的只是召开国际局会议的部分）。作者们要求撤销执行委员会，即赶走胡斯曼及其同伙。此外，作者们还要求将“社会主义”部长们，即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开除出党。

从统一的愿望来看，这一切都是极不合乎逻辑的。从一般说来也是不合乎逻辑的。米勒兰是作为个人、作为自由射手参加内阁的。而桑巴、盖得、托马、王德威尔得、韩德逊则是由自己的党，即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派去的。不开除派遣者，也就不能开除被派遣者。这样一来就是公开宣布分裂。

出路何在呢？事变的逻辑使所有人，除彻头彻尾的考茨基主义者阿克雪里罗得外，都建议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实际上也导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这就是时代的标志。

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委员会中虚假的多数派（阿克雪里罗得只是有条件地属于这一派）并不拥有代表会议的多数。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格里姆等同志都指出多数派的草案缺乏内在逻辑。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妥协。波兰人拉品斯基提出一个决议案，激烈批评国际局，而关于参加和争取召开国际局会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要求对所有决议案进行表决。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坚持，终于进行了初步表决。结果（这是代表会议上唯一重要的表决）如下：

委员会多数派草案：10票；委员会少数派（左派）草案：12票；霍夫曼的草案（赞成召开国际局会议）：2票；拉品斯基的草案：15票；塞拉蒂的草案（接近于委员会多数派的草案）：10票；季诺维也夫的草案（如果社会党国际局召开会议，齐美尔瓦尔德派必须前往参加讨论）：19票。

投票表决后，决议案又转交给委员会，由两名左派委员（季诺维也夫、诺勃斯）进行补充修改。我们在委员会里声明说，为了达成妥协，我们将不阻挠通过拉品斯基的决议案。最后经修改后通过了拉品斯基-季诺维也夫-莫迪利扬尼的决议案（意大利人断然要求承认个别一些政党享有要求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权利）。意大利一个机会主义者（杜果尼）投票反对，阿克雪里罗得弃权，其余人赞成。

结果通过了不利于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的策略的折衷决议。决议没有说出全部东西，没有原则性，也不彻底，但毕竟说出了一些东西。愿意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统一和愿意通过相互赦免的办法恢复第二国际的人，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决不能

抱着统一的精神说：你们抛弃了社会主义，你们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你们是政府的人质，你们玷污了国际的旗帜，而我们赞成同你们统一，相信齐美尔瓦尔德的工人群众会从对第二国际领导机构活动的这类评价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局的决议被开玩笑地称为一纸逮捕令（附有对个人特征详细描述逮捕令）。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决议的措词尽管十分缓和，但它确实是给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背上缝制的囚犯标志。决议如此详尽地描述社会沙文主义囚犯们的特征，以致工人国际主义者未必会产生强烈的愿望同这些犯人实行统一。从另一方面说，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胡斯曼及其同伙……以把瑞士党开除出社会党国际局来回答瑞士党执行委员会在信中提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他们将会对逮捕令说些什么呢？

假如事情只取决于外交家和“领袖”，那么通过的这个决议到时候也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收回的^①。但是，世界上还存在

① 在《新生活》杂志上格里姆同志对代表会议拒绝要求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事作了如下说明。他写道：“许多社会党人认为，似乎采取国际行动只是取决于海牙国际局的活动。国际行动应当从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内部产生，只有到那时，国际中央机关才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根据这个(?)理由，代表会议拒绝了立即召开国际局会议的要求。”

格里姆同志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代表会议拒绝召开国际局会议的要求所根据的是另外的理由，而不是“这个”理由。任何一个代表都没有举出这样的理由。

至于没有某些国家的运动，任何中央机关都做不出任何事情来，这当然是神圣的真理。但是，这里根本不涉及到这个真理。要知道，这个真理是属于象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中央机关的。

代表会议拒绝了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要求，是因为会上没有相当的多数来下决心（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维护同社会沙文主义国际局的妥协，而相当数目的少数派则坚决同它进行斗争。格里姆同志如果正视现实，不是牵强附会地进行外交式的“解释”，那么他会做得更好些。

着工人社会主义者。因为有他们，通过的这项决议才有可能成为通向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步骤。

四、反对和平主义

在代表会议上按重要性来说居第二位的问题是社会党人对待和平的态度问题。

我们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已在第二次代表会议的附件中详细阐明，同时也刊登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公报》上，还转载在本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和平主义》一文中专门谈到了对和平主义的态度。）

齐美尔瓦尔德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它说，“保卫祖国”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到处用来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帝国主义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我们时代的最大谎言。现在应当迈出第二步：必须起来反对和平主义。奴隶主政府签订的帝国主义和约也向群众道出了现时战争的真正性质。应当阻止社会沙文主义者又一次地来欺骗这些群众。

在任何地方，人民群众都已疲于战争；在任何地方，都越来越响亮地发出和平的要求。社会沙文主义者估计到这一点，他们也开始在宣扬“和平”。不是别人，正是谢德曼先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和平万岁！”必须向工人们解释清楚，不通过革命斗争，是一分钟也不可能结束目前这场大屠杀的。希望和平，就得组织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集团，反对自己的“祖国”。

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英国社会和平主义者宣扬的社会和平，客观上无非是欺骗群众的一种沙文主义。“仲裁法庭”、逐步裁军、“民主和平”的纲领是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市

绘空想，它散布幻想，似乎和平的资本主义，没有战争、没有军国主义、没有帝国主义掠夺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说的。

奇怪的是：在代表会议上有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存在于大多数意大利人中，他们存在于德国的累德堡主义者中，他们存在于法国人中（布里宗起先以为，我们决议草案中谈到反对和平主义的那一部分是一种误解——可见他已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同和平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存在于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中（阿克雪里罗得）。然而他们毕竟未能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未能提出任何完整的东西。

还可以发现：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正式支持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早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1910年），再一次重复了关于“必要的仲裁法庭”等等的这一高见。不过在昆塔尔，社会和平主义者已经不可能“保持习俗”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同革命社会主义者进行认真的较量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只限于进行修改和缓和语气了。

这一次有些新人同意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决议案：意大利人的代表塞拉蒂、塞尔维亚人卡茨列罗维奇、多数瑞士人。格里姆的提纲被作为基础，尽管提纲对许多东西没有说清楚，然而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在格里姆的提纲中有一条是反对民族自决权的——提出的是通常的表面上科学的“理由”，意思是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等等。我们一提出意见，这一条就删掉了。我们（向委员会）提出的修正案，在革命的条件下争取民族自决权（见本号报纸上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被否决了，理由是问题阐述得不够清楚。

代表会议通过的提纲整个说来是反对社会和平主义，反对考茨基主义的。但这决不等于说，齐美尔瓦尔德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

了社会和平主义空想。不，旧病复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多数派虽然投票赞成，但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保留意见”，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只有左派将来会进行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系统宣传。整个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可能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宣传。它会把这些问题的提交给各党讨论，正如在意大利报纸上已经展开讨论一样。单是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在我们看来，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是代表会议最软弱无力的文件。它是同法国人妥协的结果。宣言缺乏明确性。其中最好的地方是断然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把他们同卖身投靠的报纸和政府的奴仆相提并论。

五、今后怎么办？

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无疑是一大进步，左派的影响要比在齐美尔瓦尔德大得多。反对左派的偏见减少了。然而，是否可以说，大势已定，齐美尔瓦尔德派最终走上了与正式的“社会党人”决裂的道路，齐美尔瓦尔德已成为第三国际的萌芽呢？不，凭心而论还不能这样说。可以说的只是，争取对于革命社会党人来说有利的转折的希望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以后更大了。但是，新的动摇，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新的让步——特别是在战后，当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允许他们在口头上“向左转”的时候，——是非常可能的。不要抱任何幻想！齐美尔瓦尔德派也有自己很大的右翼。它是否会同我们始终在一起，谁也不敢担保。

代表会议后召开了“伯尔尼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代表会议委托它解决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顺便说一下，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胡斯曼及其同伙准备在6月中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

人代表会议。马尔托夫建议前去参加。他的建议得到了半数票。五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建议，五票赞成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坚持站在昆塔尔通过的决议的立场上）^①。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旦出现“被诱惑的”些微机会，一半齐美尔瓦尔德派就“被诱惑了”。

中立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看来会去参加胡斯曼的六月代表会议的。这个首次会晤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前哨战，或者变成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左”派和解的开端，——未来的前途就是这样。

今后怎么办呢？——今后要为争取实现我们的解决办法而斗争，为争取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争取第三国际而斗争。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表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某些工人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每天都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两个纲领，两个阵营，两种和平，两个国际。运动正在朝这方面发展，目前的危机将导致这个结果。俄国的工人可能会对迅速达到这一目的做出不少事情来。

在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奴仆之间不可能有统一。俄国的穆拉诺夫和彼得罗夫斯基、德国的李卜克内西、瑞典的霍格伦和海登、英国的马克林——所有这些被他们“祖国”的政府关进监狱的我们的同志是新的工人国际思想的真正体现者。

争取建立第三国际！

1916年6月10日

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45号

译自《反潮流文集》俄文版第354—368页。

^① 德国报刊上发表的相反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会议主席格里姆同志在正式信件中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数字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提纲)

——在俄共(布)第八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19年3月)

一

早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当第二国际直接接触到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时就已经表明:第二国际的整整半数及其大部分领袖在这些问题上与其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不如说更接近资产阶级的观点。

在斯图加特,只是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承认”资产阶级殖民政策,即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议案。同时,第二国际的一些主要政党——德国党、法国党、英国党——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十分坚定地反对革命的策略。

然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了尼·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指出:

“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为了尽快制止战争必须进行干预,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

二

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应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奏,这对所有社会党人来说都是一清二楚的。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11月)

上,第二国际曾声明:

“让资产阶级各国政府记住,普法战争引起了公社的革命起义,日俄战争导致了俄国各民族革命力量的运动……无产者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角逐和秘密外交条约的兴盛去互相厮杀乃是一种罪恶。”

三

还在1914年7月底和8月初,即战争爆发前的24小时内,第二国际主要政党的领导机关继续谴责即将爆发的战争是滔天大罪。维也纳教授卡尔·格律恩贝尔格所收集的第二国际主要政党在这些日子里发表的声明是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最有说服力的起诉书。这些文献最令人信服地说明,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把他们在1914年8月3日还称为黑的东西说成是白的了。

四

从帝国主义战场上发出的第一声枪响起,第二国际的一些主要政党就背叛了工人阶级,在“保卫祖国”的借口下转到了“各自”的资产阶级一边。在德国,谢德曼和艾伯特,在法国,托马和列诺得尔,在英国,韩得逊和海德门,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和布鲁凯尔,在奥地利,伦纳和佩纳斯托费尔,在俄国,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在瑞典,布兰亭和他的党,在美国,龚帕斯及其同伙,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及其同伙,都号召无产阶级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国内和平”即拒绝同剥削者作战,拒绝为反战而战,实际上去充当帝国主义者的炮灰。

这时,第二国际彻底破产和灭亡了。

五

第二国际之突然转变为执行帝国主义者纲领的组织，实际上并不是突然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30年——大约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些富国的资产阶级，凭借总的经济发展进程，有可能从自己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用小恩小惠的手法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阶级的上层，即工人贵族。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大量涌入正式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并渐渐地朝着资产阶级的方向改变它的政策。在和平的议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在各行各业工会的领袖们中，在社会民主党的书记、编辑、官员中，形成了一批工人贵族。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集团利益，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敌对的。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正式社会民主党也就蜕化为反社会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政党。

战争摧毁了一切虚礼伪饰，剥去了一切外表的伪装。战争彻底震撼了整个人类，迫使所有政党和集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秘密的东西变成了公开的东西。第二国际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它是一个扮演着工人领袖角色的小资产者和大资产阶级代理人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汉尼拔誓言和国际主义的决议被置诸脑后了。第二国际的每一个“领导”党都开始号召本国的工人为了小小撮银行家和将军们的利益去残杀其他国家的工人。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开始执行该国或该帝国主义联盟的资产阶级所委托的工作。

六

在第二国际内部开始出现三个主要派别。在战争年代里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爆发时，这三个派别表现得特别明显。

七

1、社会沙文主义派（“多数”派），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现在同德国资产阶级一起分掌政权并成为屠杀共产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一派的拥护者支持金融资本和君主专制制度，煽动沙文主义的狂热，参与屠杀工人阶级的优秀人士，鼓吹“将战争进行到底”，将工人报刊变为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工具，把工人政党变为帝国主义者的走卒。

“社会党多数派”也同国王、资产阶级部长、秘密外交的英雄、银行家一样，要对战争年代里对工人阶级所犯下的罪行负同样的责任。

目前，当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当它终于为被压迫阶级反对世世代代压迫者的国内战争所取代时，社会沙文主义者公开扮演着扼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

社会沙文主义者现在完全暴露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履行着资产阶级所暗示它的“取消”战争的纲领：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劳动阶级头上，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军队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解散各地刚刚诞生的工人苏维埃，政权保持在资产阶级手里，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目前时期里是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主要障碍之一。资产阶级有意让社会沙文主义者来执政，以便有利

于自己对工人进行镇压。在德国,在奥地利,在匈牙利,资产阶级目前正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着这种摧毁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实验。这一点证实了恩格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序言中的话: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至今仍然是这样一个党,它在未来的欧洲震荡——目前很快就会到来——中,无疑一开始就会作为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救星而执政。”

尽管迄今为止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叛徒们对国际无产阶级所可能带来的全部危险性。使全体劳动者清楚地看到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犹太行径,用武装的手来消除这个反革命政党的危害,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八

2、“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独立党人)。这一派早在战前主要在德国就开始形成。在战争前期,“中派”几乎到处基本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中派”的理论领袖考茨基替德国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所执行的政策辩护。在1915年初,考茨基曾写道,国际是“和平时期的工具”。他补充说,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只有:“为和平而奋斗”,而“阶级斗争是和平时期的斗争”(《国际主义和战争》)。

在四年战争期间,“中派”有时向左摇摆。但总的说来它是忠于上述策略的。在柏林无产阶级一月起义期间,“中派”扮演了非常模棱两可的角色,用同刽子手政府进行谈判的前景来瓦解工人。

从战争一开始,“中派”就坚持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统一”。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害以后,“中派”继续鼓吹这种“统一”,即

工人共产党员同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们实行统一。

从战争一开始，“中派”（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屠拉第、麦克唐纳）开始鼓吹以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沙文主义政党领袖们为一方同法国和英国社会沙文主义政党领袖们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赦免”。目前，在战争结束后，“中派”还继续在鼓吹这种赦免，从而阻挠工人们弄清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

“中派”派了自己的代表去伯尔尼参加国际妥协派代表会议，从而有助于谢德曼辈和列诺得尔辈对工人进行欺骗。

“中派”现在仍在鼓吹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裁军”，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建立仲裁法庭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宣传，从而有助于臭名昭彰的“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者进行反革命勾当。

目前，为国际无产阶级清除“中派”领袖们堆在革命道路上的反动垃圾，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使革命分子脱离“中派”，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中派”的领袖。组织上同中派决裂是历史的必然。决裂的时刻必须由各该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运动发展的程度来加以确定。

九

3. 共产党人。这一派在第二国际中处于少数地位，它（如1907年在斯图加特，列宁—卢森堡的决议案）维护了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德国的“左翼激进派”（稍后是斯巴达克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派、许多国家的青年共产国际的左翼构成了国际的核心。

从战争一开始，忠于工人阶级利益的这一派宣布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5年）上形成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它是第三国际的第一个支部。从那时起，特别是从俄国无产

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时起，共产主义在一系列国家里发展起来。

在德国，享有世界声誉和受到各国工人爱戴的斯巴达克派成立了共产党。这个党的力量在与日俱增并以快速的步伐走向政权。

在俄国，共产党赢得了城乡全体工人阶级的同情，团结了70万党员，制定了有科学根据的纲领，保持政权达15个月之久，建立了强大的红军，赢得了全世界无产者的热烈同情。

在奥地利，成立了前途远大的有影响的共产主义者派。

在匈牙利，共产党已拥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拥有士兵和农民的大多数。

在意大利，在最近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在战争期间进行了反帝英勇斗争并赢得了绝大多数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

在法国，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增长，这一点在法国“中派”集团的行动上也有所反映。象昂利·巴比塞这样的人发表声明说，他认为自己是法国的斯巴达克派，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的征兆。

在英国，英国社会主义派也和马克林派一样，都在着手建立共产党。

在其他许多国家(罗马尼亚、瑞典、荷兰、保加利亚、丹麦、挪威)和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地区(波兰、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爱斯特兰)也都建立了强大的共产党。

十

即将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俄国共产党纲领无疑对于上述一切政党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并将成为共产国际的纲领。

共产国际策略的基本要点在1919年1月25日代表八个共产

党发出的关于具体建议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5点提纲中已经明确。

这一策略是由下列深刻信念决定的：当前的时代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目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立即夺取国家政权以实现劳动者阶级的专政并在苏维埃或类似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第三国际的组织形式应当在各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代表大会上还应当成立一个能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指导各国运动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十一

目前，我们邀请了以下党派参加共产国际：

(1) 斯巴达克联盟(德国)；(2) 俄国共产党(布)；(3)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 匈牙利共产党；(5) 波兰共产党；(6) 芬兰共产党；(7) 爱斯特兰共产党；(8) 拉脱维亚共产党；(9) 立陶宛共产党；(10) 白俄罗斯共产党；(11) 乌克兰共产党；(12) 捷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13)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14)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5)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左翼；(16)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7) 挪威社会民主党；(18) 丹麦“阶级斗争”派，(19) 荷兰共产党；(20) 比利时工人党革命派；(21)、(22) 法国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中基本上支持洛里欧同志的派别与组织；(23) 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24) 意大利社会党；(25) 西班牙社会党左派；(26) 葡萄牙社会党左派；(27) 英国社会党(特别是马克林所代表的一派)；(28)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9) 英国产业工人组织；(30) 英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1) 英国厂工会运动革命派；(32) 爱尔兰工人组织中的革命派；(33)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4) 美国社会党革命派(特别是德布斯派和社会主义宣传联盟)；(35) 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6) 澳

大利亚产业工人联合会；(37)美国国际产业工人同盟；(38)东京及横滨社会主义团体（以片山潜同志为代表）；(39)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以明岑贝尔格为代表）。

凡是同意上述行动纲领并以自己的工作证明忠于第三国际事业的其他一切工人组织都有权加入共产国际。

十二

目前，帝国主义者建立的“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际，目的是摧残各国人民。“国际联盟”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剥削整个文明世界和把所有主要国家内刚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们淹没在血泊中。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企图使第二国际死灰复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手中的工具。

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共产国际，来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的国际组织相抗衡。

俄国共产党内的外国人团体联合会，共产主义前战俘小组应当受到我党的最热烈的欢迎。

俄国共产党应尽力帮助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的一切倡议付诸实施。

共产党国际联盟向帝国主义国际联盟宣布进行坚决的斗争。

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将作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布进行革命战争。首先在本国夺取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社会主义红军的帮助下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加入共产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将把这场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1873年底，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第一国际在巴黎公社

覆没后解散时,马克思曾经预言说:

“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将会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

现在,这个预言将被证实。建立真正的共产国际的时刻来到了,不久的将来它将领导受尽苦难的人类去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去消灭原来意义上的各种国家。

译自《真理报》1919年3月2日。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声明

(代表俄国共产党)

(1919年3月2日)

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如下：我们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建议就在这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由于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只应确认为一次代表会议，所以我们认为暂时同意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不过，我们仍然表示，今后我们仍将为尽快成立作为正式机构的第三国际而进行宣传。

译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
1933年俄文版第5页。

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 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四次會議上的发言

(1919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们将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民主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现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主要派别的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基本材料，我是从一家资产阶级大报《新苏黎世报》上得到的，这家报纸对伯尔尼代表会议十分赞赏，刊登了非常详细的、几乎是速记记录的报道。举行开幕式的情形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会议开幕式是由布兰亭主持的，他一开始便谈到第二国际的产生及其主席饶勒斯，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致起立表示哀悼。报道接着说，然后布兰亭先生又建议向活着的第二个伟人，即威尔逊致敬。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主席的头几句话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左边是我们已故的饶勒斯，右边是健在的威尔逊！……不用解释，事情就已经明白了。

接着发言的是法国前陆军部长阿尔贝·托马先生。他的演说给死气沉沉的会场带来了活跃。托马说：“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些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又有什么作用呢？国际在战前就已存在，现在它又召开会议，但是，所有人是否都象以前那样呢，是否存在相互信任呢？问题就在于此，比利时之所以拒绝参加会议，原因就在于此！”

这次会议的最有影响的参加者之一托马先生道出了真理。他说的话正应验了俄国的一句谚语：“一旦撒了谎，谁还相信你！”在托马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在你们撒了四年谎以后，现在谁还会相信你们呢？托马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指的是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但是他们同样有权向托马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韩德逊先生提出以下的决议案：“代表会议决定，它的工作今后应该这样来进行，以求保证对巴黎和会施加最大的影响，以保障与会代表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

这些话表明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宗旨，我们在韩德逊和其他人的发言中常常可以听到；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对巴黎和会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政治任务就是这样。在韩德逊的决议案中还说：

“代表会议还认为，战争引起了误解和在对待战争态度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照这样说，四年半期间在工人运动内部我们似乎只有一些小小的“误解”！韩德逊的决议案没有超出维博和考茨基提出的要求，即：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应当不是由政府的代表而是由议会的代表来解决。因此，不是由工人和士兵的代表而是由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来解决，因为政府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质上是一回事。虽然威尔逊先生没有参加代表会议，但是他的精神降临到代表会议上了。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胡斯曼提出成立由韩德逊、布兰亭、胡斯曼和每个国家两名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的决议案，以便对巴黎和会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和监督会议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当一名中派分子说了几句反对威尔逊的话时，米利奥站起来声明，如果威尔逊的政策不能得到赞同，他要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胡斯曼立即

起来发言安慰他说：谈不上什么威尔逊的政策得不到赞同。

代表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所谓战争祸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同领土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讨论战争祸首问题时，他们把有关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采取的每个步骤分析得极其琐碎。整个把戏就在于，他们不希望让无产阶级看到主要的东西，看到金融资本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两个集团本身就是战争的祸首。

在领土问题和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两面性达到了顶点，而托马和韩德逊先生在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上则达到了几乎充分明确的地步。他们决定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在领土问题决议案的第2条中，代表会议要求：

“在有争议的地区，归属问题将通过作为终审机关的国际联盟监督下的全民投票方式来解决。”

这样，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组成的国际联盟的监督将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

他们还顺便谈到了殖民地问题，但是他们不敢对此进行详尽的讨论。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请求代表会议保留德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让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对此他们没有得到直接的答复。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受法国资本和英国资本剥削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上述决议案的第五条中，代表会议要求：

“国际联盟应保护附属地区、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居民，它应以下列方式进行活动，以便采取措施促进土著居民得到尽速发展以实现国家的自决。”

可以设想，国际联盟将会怎样来保护殖民地。就这样，在决议中没有一个字谈到应当结束殖民奴役，没有一句话提到考茨基曾经写到的“不许染指殖民地！废除对殖民地的剥削！”，而有的只是

对这种资产阶级殖民政策加以掩饰的话语。这就是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政策的基本点。

随后还组成了以维博、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前中派拥护者，即和平主义者的小派别。这些先生们只是用甜蜜的言词来掩盖多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例如，维博提出这样的决议案：

“把各族人民联合成一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党国际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这个理想符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是请问，联合成什么样的社会？莫非是象国际联盟那样的社会吗？这未必是社会党国际的理想！人们只是对这个社会将阻止新战争的爆发说了一些空话，但是对怎样阻止则谁也没有说一句。荷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先生也扮演了和平主义者的角色，他说什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罪责就在于战争没有在1917年初结束。勃鲁西洛夫进攻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开端，而如果斯德哥尔摩会议开成的话，那么俄国的事态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必须使巴黎不再允许布尔什维主义人为地在德国传播。我认为，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步骤，他们终究要促使布尔什维主义不但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另一条出路。

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俄国状况的评价或者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谴责。在这里我们应当满意地指出，我们法国的许多同志卓越地起来反对多数派，我们代表我们党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无产阶级的职责，尽管一开始参加会议是个错误。保尔·福尔和洛里欧是唯一当着社会爱国主义者先生们的面说出真理的代表。最彰明昭著的是中派领袖考茨基的发言；照他看来，之所以必须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是因为不能把它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他想必认为，应当把俄国革命同孟什维

克，即同反革命相提并论。考茨基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贫困的人类重新富裕起来和恢复生产。应当在什么基础上恢复生产，这一点并不使他感兴趣；必须使人类更富裕，必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才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考茨基转而批评布尔什维克一年来的活动，并说：“俄国革命使大工业破产，使无产阶级组织遭到破坏，迫使幸免于难的工人重新回到农村。布尔什维克希望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唯一的积极成果就是建立新的军国主义。”他的这番话博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言而喻，我们的红军不受这些先生们的欢迎，而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担心在本国出现红军的人们需要对他报以掌声了。考茨基接着说：“我们必须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上采取鲜明的立场，以免丧失群众的信任。”我们可以回答他说，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决不会丧失！……这些先生们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上采取明确的即反革命的立场后，只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先生们的信任。福尔和洛里欧同志回答了这个回答。洛里欧说：“让我们先来谈谈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接着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专政正是同君主专制国家里一样的方式实现的。洛里欧的这番话抓住了伯恩施坦的衣襟，后者发表了公然蹂躏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

大家知道，代表会议未能通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任何决议。会上形成的小小反对派使代表会议未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某个派别的外交胜利，而认为这只是直接证明，西欧无产阶级的真正群众不仅不谴责我们，而且对我们深表同情。代表会议完全回避目前使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感兴趣的那些重大问题。它不敢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体制表示自己的明确意见。他们以此暴露了自己的精神缺陷，他们在理论上已经破产，正如昨天列宁同志所论证的那样。他们没有就我们创建的东西说出一致的意见。他们本来可以对此加以谴责，至少本来应当对我们采取明确的立场。但

是他们未能说出什么，他们的行为使我想起1918年12月9日瑞士五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行为。代表大会本来应当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原因是许多五金工人要求自己的工会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工会的官员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理由是这些苏维埃及其活动的矛头是针对中央组织的，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成立苏维埃……违背章程！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运动的旧领袖对历史运动除了说什么违背章程以外，不可能说出别的任何话来。他们这样说最好不过地暴露了自己的精神缺陷。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活动就是这样。会议结束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巴黎。代表团甚至受到现时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克列孟梭先生的接见。克列孟梭先生说：伯尔尼代表会议所走的道路总的说来也是巴黎和会走的道路。他建议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相应的委员会。这样，克列孟梭公开证实，伯尔尼代表会议确实只是帝国主义者巴黎和会的工具而已。这一点也确定了代表会议的性质。我希望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也象我们一样来判断代表会议的实质。关于保卫祖国的弥天大谎已为工人们清楚理解。巴黎向伯尔尼会议提出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它应当说明工人群众批准资产阶级目前提出的消除战争的那些方法，即把债款和税务的重担转嫁到工人群众肩上，原封不动地保持军队的旧的组织形式，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工作，我们就应当说，它是战前和战争时期整个发展的唯一结果。早在战前就已完全清楚，在第二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派别，站在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观点上，而不是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上的多数派。我要提醒大家，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场讨论。我要提醒大家，以伯恩斯坦和荷兰人万-科尔为首

的修正主义者先生们公开建议第二国际承认殖民政策，只不过以较为人道的方式来执行这一政策。其次我要提醒大家，修正主义者的建议在有关的委员会里只是以微弱的多数票遭到否决。那时第二国际的主要派别在殖民政策问题上，即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已经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我还要提醒斯图加特决议中的最主要之点：“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为了尽快制止战争必须进行干预，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这一点是左派领袖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建议的，只是在左派的压力下才通过的。我们看到，第二国际的基本特点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年在斯图加特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曾经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决议^①。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马赛尔·桑巴在巴塞尔会议后过了几个月所说的话：他把这个政策称为“巴塞尔大检阅”。决议通过了，但谁也不去为之而斗争。他在战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他是正确的。

其次，我还要提醒大家，在战争爆发前，各政党至少在纸面上采取了什么立场。可以说，在1914年宣战前24小时内，这些先生们发表的言论和现在的言论完全不同。维也纳的教授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收集了战争头几个星期和战前几个星期的材料^②。这是对第二国际的最好的起诉书，我们现在应该广泛地利用它。在战争爆发前的24小时内，法国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谢德曼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党的机关报以及几乎世界各国的党报都是这样说的。而当第一声枪响的时候，

①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宣言》（1912年11月24—25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8卷附录第408—411页。

② 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国际和世界大战》（资料集），1916年莱比锡版；俄文版附有季诺维也夫的前言，1919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局出版。

它们都改变了战线，把8月2日还说成黑的东西到8月4日都说成白的了。

这种演变不是突然的，而是理应发生的。和平运动的25年为第二国际的破产作好了准备。我们所划分的三个主要派别不是在一天之内出现的，它们是几年之中形成的。这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个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都实行同的一条路线，即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第二个派别是中派，它在战前就是以考茨基派为代表，执行的也是同样的政策，只是情况有所不同。在战前，他们反对左的激进派并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战争一爆发，考茨基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自己的著名公式：“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战时没有任何阶级斗争。然后，他宣传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先生们，即这些杀害无产阶级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祸首团结一致。正是这位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建议一致起立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的考茨基向我们宣传同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团结一致。考茨基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在战前也宣传他们曾经要求的相互赦免。早在1915年，考茨基制定了相互赦免的一整套理论。而在1919年，当战争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受连环保束缚的人们自然要求给予相互的赦免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是否会给予他们这种赦免，那是决不会的。无产阶级现在决不会容忍对第二国际破产的问题进行掩饰。它将讨论和解决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所产生的这个重大问题。而我们应当竭力使每个普通工人来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唤起每个人来研究和理解现时社会主义的这个主要问题：为什么第二国际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它会破产和为什么我们应当建立第三国际。

在伯尔尼黄色国际和我们昨天成立的红色国际之间将有一场

搏斗。毫无疑问，红色国际将战胜黄色国际，而这个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译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
1933年俄文版第141—148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

(1919年4月)

1919年3月4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更确切地说,这个新生儿早在1918年就诞生了。1919年春天,它受了洗礼并在出生簿上登记,——这时新生儿已经长大并开始站立起来。当1918年5月掌握政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时,几个月以后,具有光荣历史的德国斯巴达克派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这时每个革命者都明白,第三国际已经诞生了。1919年我们只是把已经完成的事情在形式上固定下来。

那些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现在还为时过早的个别反对意见是多么没有根据啊!在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代表匈牙利的是一位长期侨居在俄国的同志。而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匈牙利共产党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较为不大的团体。然而在我们代表大会以后过了两个星期,匈牙利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并把匈牙利的全体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现在,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三国际已经拥有3个苏维埃共和国——俄国、匈牙利、巴伐利亚——作为自己的主要基地。而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不是3个,而是6个或者更多的苏维埃共和国,那是谁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旧欧洲正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奔向无产阶级革命。

现在在我们看来,三四年前发生的我们的激烈争论又显得多么天真幼稚啊!1915年秋天在齐美尔瓦尔德,独立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国际中心(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宣布有必要同社会爱国主义者

在组织上断绝关系，彻底分裂，这在当时看来是异常凶莽的举动，是闻所未闻的邪说。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提出这样的假设，即整个现代工人运动将分裂为三派（社会爱国主义者、“中”派和共产党人）时，人们把我们称为学理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现在分裂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现在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不懂得这一点的只有“落泊者”考茨基），不可能使李卜克内西的党同杀害李卜克内西的凶手谢德曼和艾伯特联合起来。“统一”这个偶像被粉碎了。每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明白，我们应当珍惜的只是那种反对转到资产阶级一边去的社会叛徒们的统一。过去在“统一”党的范围内解决的意见分歧现在已经转到了街头，它们将在由子弹和大炮实际参与的街垒上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看到上述三派都在广阔的世界场景上活动。这三派的政策现在已经展现在亿万工人的眼前。相信第一派和第二派的工人的数目越来越少。而团结在第三派（共产党人）这个依然忠于工人阶级的唯一派别周围的工人群众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日益增加。

同第一派即各国的谢德曼辈在报刊上进行思想争论已经是多余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自觉的阶级敌人，他们打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宣扬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这里，批判的武器应当全面地代之以武器的批判。我们对白色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用拉萨尔的话说就是：“掐住敌人的喉咙，让它屈膝投降！”

第二派（中派）的思想领袖至今仍然是考茨基。

同他现在还在进行思想斗争。已故的罗莎·卢森堡早在1910年说过，如果说同修正主义还值得争论的话，那么只有同考茨基式的修正主义。

在我们最强大的敌人，即所谓“中派”的立场中令人惊讶的东西，也就是它的思想上的难以置信的贫乏。

完全丧失前景，空前的模棱两可和精神贫乏，极端的市侩习气和思想上的无比怯懦——这就是中派立场的特点。

“中派”的拥护者们继续坚持“一般民主”的思想，维护旧的把我们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做法。初看起来，“中派”的拥护者们似乎只是表面上依然忠于旧的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在他们的立场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抛弃。

事实就是如此。姑且说，考茨基及其门徒的预言是正确的。姑且说（尽管这是绝对错误的），目前欧洲的解放运动只限于“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这将意味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前一半已经完成。

这个原理要求依然忠于社会主义的人们干什么呢？自然，正是要求人们现在把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提到首要地位上来。假如资产阶级已经软弱到了不得不让步，不得不同意实现“民主”的地步，那么社会主义者的任务目前恰恰在于继续前进，提出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

“中派”的拥护者们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他们把最高纲领藏在口袋里，不是去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去反对那些把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的工人阶级的拥护者。

请仔细地分析一下考茨基及其同伙在1919年初第二国际臭名昭彰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发挥的“理论”吧！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思想上的怯懦了。

考茨基及其同伙抨击共产党人，要求对布尔什维克作出有罪的判决。姑且说，工人阶级真的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没有更危险的敌人。姑且说，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布尔什维克。姑且这样说吧！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自己的纲领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设想社会主义的实现的呢？

考茨基不愿意“贫困的社会主义”。他不希望工人阶级在生产

力几乎在各国遭到破坏，战争几乎使整个欧洲导致空前饥荒的时刻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

那还说什么呢！在欧洲被资产阶级及其走卒社会爱国主义者弄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是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但是，照考茨基看来，另一条可行的道路是什么呢？

——等待吗？

不过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从战争的后果中恢复元气，等到资产阶级恢复经济，等到工业重新繁荣起来吗？不过考茨基怎能担保，到那时资产阶级不会把我们拖入另一场更加血腥的屠杀呢？而主要是，考茨基怎能担保，在维护私有制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将能恢复它所如此凶恶、如此野蛮地破坏的生产力呢？

或者拿苏维埃的问题来说吧！可以对苏维埃抱敌视态度，就象资产阶级及其走卒实际上敌视它的那样，把苏维埃公正地看作是对资本统治的威胁。也可以对苏维埃抱热烈同情的态度，就象各国工人阶级中一切正直和善良的人们所采取的那样。但是，对苏维埃抱中立态度，即不冷也不热的态度，那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政治家所不可取的。对苏维埃闪烁其辞，支吾搪塞，那是很不体面的。谁都看到，苏维埃是战后亿万工人创造的新的字眼。这里只能是：赞成或者反对。然而，考茨基主义的“中派”无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还是在自己的整个宣传中都装作没有发现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象希法亭及其同伙这些“勇士们”试图把反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思想同革命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思想结成合法的婚姻。散发着考茨基主义精神的第二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怯懦地回避了苏维埃问题。从而证明这次会议本身空前的思想贫乏……

上面我们作了一个假设，欧洲的革命运动可能只限于“民主”

的胜利。我们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直接提出最高纲领的问题，即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这个假设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情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欧洲的运动相反地正以比第三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最乐观的人们所期待的更迅猛的速度在前进。内战的烽火正燃遍整个欧洲。匈牙利资产阶级辞职了，这决不是局部的限于一地的现象。这是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正在辞职。

共产主义在整个德国的胜利是必然的。目前，个别的失败还会有。黑色还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暂时战胜红色。然而，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红色。而且可能会在最近几个月内，甚至最近几个星期内。运动发展得如此令人目眩地迅速，以致可以有把握地说，再过一年我们将会忘记欧洲曾进行过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因为再过一年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欧洲。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转移到美洲，或许转移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从地理上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从东方转向西方的。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条行进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土耳其的最近事件再一次地证明这一点。共产党人在俄国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其主要原因是俄国的资产阶级要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软弱，组织得更差。现时俄国反革命的台柱彼得·司徒卢威，当他还是社会主义者时，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过，“越往东去，资产阶级越加无耻”。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资产阶级越加无耻也越加软弱。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第一个完成现时全世界工人所面临的任务的原因。

我们看到，德国和奥国的资产阶级，如同所有战败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现在已精疲力竭，按实质说，已在作垂死的挣扎。而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即“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也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死神的瘦手将掐住它的喉咙。一家有影响的巴黎资产阶级报纸不久前

写道：组成“四国委员会”的我们的部长先生们，这些奇怪的人们正在瓜分世界，他们关心的是好好地分割巴尔干半岛、俄国和其他“势力范围”，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他们自己已经被布尔什维主义的火力圈所包围，他们将丧失自己的国家。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啊！……

“协约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危险。另一部分则以为自己还比较稳固。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意见就是由此而来的。

为什么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现在是最好战的呢？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和意大利最成熟。是因为法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家几乎无所丧失。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冲破缺口，向俄国和匈牙利宣战。他们企图唆使德国来反对俄国，总之一句话，借助于“外科手术”行动。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倾向于（或者说至少有一个时候倾向于）用比较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谓“俄国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全世界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否存在的问题呢？是因为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比较稳固。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浪潮在那里还没有象在法国和意大利那样冲击着资本主义的堡垒。

这就是为什么“协约国”一部分帝国主义者还指望逃脱自己的命运的原因。由此就产生了战胜国帝国主义者同一阵营中的两条路线。他们都希望扼杀俄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既希望这样做但又无能为力。

资产阶级在日薄西山之时，在堕落和腐败的同时，必然产生特殊的哈姆雷特——无病呻吟者。欧洲反动的资产阶级有其自己的好战之士——加里费 and 克列孟梭。现在它又有另外一些人物：不相信自己的“领袖”，从历史意义上说已经辞职的“领袖”。Facies Kypocratic（伪善的面貌）——当你看到它的垂死的面容时，甚

至对于欧洲资产阶级中最健全的部分也想这样说……

怎样解决现时的危机呢？谁也不能预见这一点。甚至在巴黎成立“四国委员会”的主宰人类命运的四个“强有力的”人物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谁将取得胜利，是克列孟梭还是威尔逊呢？“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会向俄国公开宣战吗？

不久前，法国政府的报纸《时报》（第 21047 号）在一篇题为《保卫和平》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国际联盟和布尔什维克政府，这是两个不能在世界上同时生存的机构。你们希望持久和平吗？那就占领彼得格勒吧！”

说得太妙了……

我们的敌人是否企图在敖德萨事件以后，在匈牙利和土耳其发生的事件以后来实现这个纲领，目前还不能说。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或许可能在美洲，资本主义会同共产主义的欧洲并存几年。或许可能甚至在英国，资本主义会同在整个欧洲已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并存一年两年。但是不可能长期地这样并存。我们可以用法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美洲和共产主义的欧洲不可能在世界上同时生存。至少是不可能较长一个时期里并存。但是作为过渡，上述这样的前景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大局已定。向资本主义的堡垒已经发起冲击。冲击将以我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我们已经听到资本主义欧洲旧大厦行将倒塌的崩裂声。无产阶级革命将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胜利行进。它将一日千里地跨越一个甚至两个和更多的国界。亿万劳动者将对 4 年来因疯狂的帝国主义屠杀而遭受的凌辱实行报复。

工人阶级不能过早地夺取政权。早在 10 年前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工人阶级不能过早地宣布自己的专政。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

已经提到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日程上。再过几个月来看，我们目前的一切失利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相比，都将是微不足道的插曲。没有比1919年3月在莫斯科奠定基础的第三国际的大厦更坚固的了。工人阶级将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期
第37—44页。

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

(1919年11月)

第二“国际”准备在1920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例行代表大会。这个黄色团体的官方吹鼓手们忧心忡忡地为这次代表大会进行着筹备工作，但装出一切都很顺利的样子。以为只要到日内瓦一集合，在那里制定一个新的冗长的决议，就可以奏出另一番乐曲来。真是可怜呀！看来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的末日已经来到。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一命呜呼。

正象一个患肺结核的病人在临死前一天突然起床来，开始设计未来的乐观计划。而这时拖着辫子的死神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了。

但是在最后时刻，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改变了主意，认为最好把原定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推迟到1920年秋天。先生们，把你们的代表大会 *ad calendas graecas* (永远搁置起来) 不是更简便吗！考茨基辈和韩德逊辈、胡斯曼辈和诺斯克辈先生们指望在1920年春秋两季中把历史的车轮倒转。这是妄想！如果欧洲将以前两年的速度实现革命化(有理由希望做到这样)，那么到那时，当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要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时，第二“国际”的遗体已经盖上白色尸布了。而共产国际将领导着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第二国际是注定要灭亡的。无论瑞士的高山空气，无论社会沙文主义学者考茨基这个“江湖医学博士”的巫医术，也无论是第二国际军事“专家”诺斯克先生的佩剑，都不能拯救它。

很难想象还有比臭名昭彰的第二国际周围的空气更败坏、更腐蚀的了。处于目前颓废时期的第二国际实在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舞台。

举两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1914年战争前，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这个执委会的主席是王德威尔得先生，他是第二国际中最有威望的代表之一。执行委员会的书记、王德威尔得的亲密同事和战友是他的党内同志卡米尔·胡斯曼。1914年大战的枪声一响，他们两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就转到“本国”国王艾伯特一边，从而也转到协约国帝国主义一边。然而，胡斯曼在战争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在荷兰过着半流亡的生活，不小心写了两篇并非伤人的文章，羞答答地向交易所巨头们指出，或许该结束当时已经使欧洲无产阶级付出不止一百万人生命的“解放”战争的时候了。仅仅这一点羞答答的抗议之声就足以使胡斯曼被宣布为……“失败主义者”。可不是吗？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艾伯特国王带着自己的王后隆重地访问了布鲁塞尔。大家知道，第二国际已在伯尔尼“复活”。王德威尔得先生依然是第二国际的显赫人物。不过，这位王德威尔得先生除了第二国际领袖的职务外，还担任了一项附带的职务：他是“本国”艾伯特国王的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司法部长。而作为司法部长，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先生不久前将自己的亲密同志、第二国际的书记胡斯曼提交法院审讯，理由是他在荷兰曾写过“失败主义的”文章。难道这不是一出滑稽剧吗？

我们还不知道，这桩奇妙的诉讼案将怎样告终，但是发生这样的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或者拿另外一个人，即第二国际在法国的代表来说吧！我们说的是阿尔贝·托马先生。

阿尔贝·托马早就是第二国际在法国的最大代表。阿尔贝·

托马和列诺得尔先生一起是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公认领袖。大家知道，阿尔贝·托马在战争期间两次到过俄国。一次是应皇后玛丽娅·菲多罗芙娜的邀请，受到王宫贵族们的款待和格里哥里·拉斯普廷“本人”的嘉奖。另一次，阿尔贝·托马到彼得格勒正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以及米留可夫执政的时候，他受到俄国银行家们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精神鼓舞者们的热情接待。在战争期间，阿尔贝·托马大约有两年担任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里军事部长的职务。现在，阿尔贝·托马已因不需要而辞职。阿尔贝·托马在闲暇时还在攻研“社会主义”。但是，他的以往的主子毕竟没有完全忘却这位忠实的奴仆。无线电台不久前刚刚广播了关于阿尔贝·托马被任命的消息，你们想是什么职务吗？是臭名昭彰的国际联盟，即协约国强盗们为了扼杀全世界工人阶级而建立的帝国主义组织的高级助理秘书。

卡尔·考茨基当年将著名的美国社会叛徒赛米尔·龚帕斯钉上耻辱柱，因为后者既是工联的主席又是厂主协会的副主席。记得1910年，当赛米尔·龚帕斯到柏林时，考茨基在《新时代》上登了一篇嘲弄性的文章，文章的结尾是一句带有幽默的欢迎词：欢迎，工联主席先生；滚蛋，厂主协会的副主席先生！

我们向考茨基先生提起这件事，并希望当他的第二国际中的亲密同志阿尔贝·托马先生打算访问诺斯克、谢德曼、考茨基和鲁登道夫的首都时，考茨基再写一篇文章，结尾用以下的词句：欢迎，第二国际的伟大领袖；滚蛋，强盗般国际联盟的办事员先生！……

这只是两个实际例子。

大家知道，艾伯特是加入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和领袖。瑙恩电台1919年12月26日广播说：

——艾伯特总统向布勒恩劳主教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祝他就任红衣主教。

真是不赖呀？……

大家知道，上面我们提到的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他至今仍是这个可敬团体的主要理论家。每个有觉悟的欧洲工人都知道考茨基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反对德国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理论”活动。大家知道，考茨基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文章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其他黑帮沙皇将军们出版的报纸上作为社论刊登出来。正是这位考茨基不久前发表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本刊已对这本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在这里只引述其中一段妙论。为了使布尔什维克丢脸，考茨基在自己的“科学”研究著作（考茨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这样有根有据地来阐述问题的）中说，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大城市里，正如他考茨基根据手里掌握的文件所确认的，正在出现妇女国有化的现象^①。

瞧，这些往日的大人物，现在是垂死的第二国际的优秀思想代表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很难设想还有比这更蜕化变质的了。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之日起开始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赞扬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欧洲帝国主义战场上的每一响枪声，42公分口径大炮的每一响炮声都在葬送第二国际往日的威望。

在战争初期，第三国际正处在准备时期，可以说是胚胎发育时期。被罪恶的手拉去互相残杀的欧洲的优秀工人们经历了一场最激烈的思想危机。在那些寒冷的秋冬之夜，当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工人们不得不躺在战壕里互相残杀并沉痛地考虑究竟为什么要落

^① 引自某位江湖骗子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上刊登的一个愚蠢已极的“文件”。而考茨基竟宏大量地声明，国有化现象大概不是征得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同意而发生的。

到这地狱般的境地时，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产生了和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必须建立新的真诚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思想斗争已接近尾声。第二国际已遭到彻底的思想破产。在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中，由于被最近5年来的伟大事件和动荡所彻底破坏，已经没有留下一点生气了。目前，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冲突已不仅具有思想斗争的性质，而且具有明火执仗的公开斗争的性质。

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手执武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站在街垒的同一边。同资产阶级交锋也就是同第二国际交锋。

就拿德国来说吧。谁是第二国际在那里的最显赫的代表呢？无疑是诺斯克！诺斯克不仅没有被开除出第二国际，诺斯克和他的党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谁是第三国际在德国的最显赫的代表呢？无疑是共产党。是被谢德曼辈杀害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建立的党。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德国的斗争，就是明火执仗的公开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冲突表现得最明显的国家，它具有这样的形式：每个普通工人都明白，第二国际是杀害工人阶级的刽子手的国际，是资本家代理人的国际，而第三国际是决心不惜牺牲战胜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人的国际。

在象爱斯特兰、格鲁吉亚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第二国际的拥护者执掌着政权，而成百上千的工人共产党员、第三国际的拥护者不经审讯就被处决的小国里，两个国际之间的这一斗争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实际上，我们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随着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里转变为国内战争这种最激烈的形式，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将会更清楚地展现出这种情景来……

1919年12月5日，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以227票对54票通过决议退出第二国际，并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这是对已经腐朽和行将灭亡的第二国际的最后一个打击。这一击使第二国际不能恢复元气。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

现在第二国际中还留下什么人呢？

只留下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宪兵，只留下一些残杀工人阶级的明目张胆的刽子手。诺斯克是苟延残喘的第二国际的真正领袖。

伯尔尼“国际”的祭司们迄今在自己的队伍里保留着一些工人，这只是因为“独立党人”及其亲信由于自己加入第二国际而掩盖了社会叛徒们谢德曼辈、列诺得尔辈及其同伙们的真面目。现在这块遮羞布已被撕下了。第二国际现在在全世界工人面前显出了资产阶级公开代理人 and 强盗式“国际联盟”应声虫的原形。第二国际在全世界面前已被一切诚实的工人们所抛弃，已被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所唾弃。第二国际正在度它可耻的末日。

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共产国际的道义上的巨大胜利。考茨基曾是独立党的主要理论领袖和创始人。而考茨基也是共产国际的主要指摘者。考茨基已变成了叛徒，变成了专门从事诽谤和中伤共产主义的告密者。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考茨基已被自己的党所抛弃。甚至考茨基自己创立的那个组织也离开了他。考茨基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公开转向谢德曼的党。

要了解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两派斗争的详细情况，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够。

根据无线电台的简短报道来判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包含

着许多模棱两可的东西。看来，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有一些关于“俄国影响”在国际内的危险性的半沙文主义的发言。关于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提案只得到略多于1/3的票数。在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中包含着不少“外交手腕”的因素。因此毫无疑问，在独立党的右翼领袖们中会有人想把决议“解释”得对第二国际有利。然而，基本的东西已经有了。冰层已经打碎。工人们已经迫使自己的领袖前进了一步。

德国独立党拥有五万党员。参加该党的大多数工人心向着共产国际。这些工人们受着考茨基及其同伙们的百般欺骗。“领袖们”对他们的决定消极怠工。他们的意志受到压抑。现在这些工人们开始进行报复了。

德国独立党的决定对其他国家里的一切中间分子起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法国和在英国，无论在美国，分化将会加速。日前我们看到了波兰的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报纸。迄今为止，波兰的崩得是第二国际最热烈的拥护者。现在，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决定后，就连机会主义的波兰崩得也声明必须脱离第二国际（在崩得机会主义者著名领袖弗·麦迭姆的文章中）。同诺斯克的亲密邻邦情谊也没有太使麦迭姆感到高兴啊！

波兰的崩得离开了第二国际！这就有点儿象：老鼠逃离行将沉没的船只一样。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几乎在除俄国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得不从事非法的工作。资产阶级在第二国际代表们的支持下把毒汁都喷到共产党人的头上。各国的工人共产党员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互通信息。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不但有老奸巨猾的杀人凶手克列孟梭设置的，而且有第二国际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们”设置的带刺的路障。我们必须克服千千万万的障碍。但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国际工人兄弟情谊正在日益发展和巩固。从莫斯科成立共

产国际到现在总共只有9个月。从那时以来，我们的组织增加了好几倍。简单地统计一下9个月来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24个政党和组织。从那时以来，我们得到的关于加入我们国际协会的正式消息^①如下：

1919年3月19日，意大利社会党米兰委员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

4月8日，挪威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10日，我们得到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

6月14日，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会议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

6月22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代表大会通过同样的决定。

7月20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正式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

7月16日，瑞士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

瑞士社会党代表大会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在投票表决时，只有少数人赞成，而且是极少数。

8月，美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现

^① 声明一点，下述正式消息是很不完全的。实际上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和组织要多得多。仅在法国，有几十个地方组织声明加入第三国际。但是要得到确切的情报是非常困难的。

在美国有两个共产党,两个都已加入共产国际。

8月,我们得到东加里西亚加入我们组织的消息。

9月,我们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消息。

同月,我们还得到美国的乌克兰社会党联合会和许多芬兰工人组织的同样消息。

10月,意大利社会党波伦亚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确认意大利党加入共产国际。

10月23日,我们得到关于英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

10月30日,我们得到关于巴伐利亚独立党人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

11月20日,我们得到关于部分丹麦社会民主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

12月,我们得到关于波希米亚、洛林和墨西哥社会党加入我们组织的消息。

12月,我们得到南斯拉夫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12万党员)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消息。

同月,朝鲜社会党人加入共产国际。

同月,我们得到消息,在欧洲的一个大城市里举行青年工人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着22万党员的代表们参加了大会,会上一致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1919年12月,在西班牙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有12500票支持共产国际,14000票支持第二国际。

在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1919年12月)上有268名代表参加,代表着30万工人。一致通过了共产主义的决议。

最后,在12月初,德国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了

著名的决议，已如上述。

在一年半前，资产阶级在白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杀害了7000名工人的那个国家里——我们指的是芬兰——，一家工人报纸(《Weisti》)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国际在胜利行进》的文章。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到：

“初看起来，在芬兰，在匈牙利，在德国，在反革命资产阶级及其奴仆社会民主党人杀害了优秀工人以后，一切都很‘平静’。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当阴险的工人‘领袖们’到处都疯狂地竭力想把革命的人民运动纳入狭隘利益的泥泞道路上并企图羞辱第三国际及其优秀的先进工人时；当用欺骗方式得到工人代表资格的议会中的空谈家们千方百计试图摧残工人阶级的毅力时，议会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在日益加强，第三国际却在不可遏止地胜利行进。

“甚至在‘工人领袖们’玩弄的两面手法达到真正高超地步、工人阶级的欺诈行为发展到完美科学境地的国家里，甚至在象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们自觉地或本能地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国际旗帜的周围。社会的不公已经不堪忍受。有产者当局的最郑重的保证变成了欺骗。战争爆发时灾难临头，战争结束时陷入更深的灾难。议会是个讹诈的机关。本来对付外部敌人的刺刀现在用来对付内部‘敌人’，来对付工人。‘民主的’暴力以拳头和刺刀威胁着饥饿的工人。

因此，如果劳动者群众对自己阴险领袖们的甜蜜蜜的歌曲置若罔闻，对他们不断进行讹诈的行为不加理睬，并竭力不惜任何代价来摆脱灭亡的命运，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劳动群众向往阶级斗争，向往第三国际，向往解放，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读着遭受如此苦难的芬兰工人在报纸上说的这些话，不能不为之感动。的确，芬兰工人说的话是对的。第三国际确实正在胜

利行进。我们法国的洛里欧同志把自己登在《工人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称为《唯一的国际：第三国际》，这也是非常正确的。

共产国际是正在升起的星辰。

第二国际正在可耻地灭亡。第三国际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发展。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是注定灭亡的阶级。无产阶级是新生的阶级，是必将执掌政权的阶级，是有着无限前途的阶级。共产国际将在近期内联合全世界的工人。共产国际犹如天空中的星星照耀着全世界的被压迫者。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7—8期
第1039—1016页。

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任务)

(1920年5月)

自从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召开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当中，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几乎在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所有国家里，我们现在都有发行广泛的共产主义报刊和发展迅速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现在每天都出现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迫切需要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次代表大会将真正是先进无产者的世界代表大会。在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总结1919年春至1920年夏这一时期的经验。我们应当对运动中的所有迫切问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十分明确的回答。

似乎是故意地让各国工人们有可能作出自己的最终抉择，社会党叛徒先生们决定于1920年7月31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在日内瓦举行。我们希望这一次胡斯曼先生及其同伙不要再推迟召开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了。

大约半年以前，这些先生们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地要召开自己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邀请信已经发出，代表大会的地点也已经确定，但突然胡斯曼先生们推迟了代表大会的召开。现在事情已很清楚，这是由于什么缘故而引起的。胡斯曼及其同伙探听到，德国独立党准备离开第二国际这艘沉船。胡斯曼先生们感觉到，法

国社会党人也将这样做。于是，胡斯曼先生们认为推迟召开代表大会是有利的。我们非常担心，目前这类突然事件是否还会袭击胡斯曼。诚然，现在几乎没有人再退出第二国际了。但是，绝不能保证胡斯曼先生不会再面临不愉快的突然事件。

如果胡斯曼先生们不得不再一次推迟他们的代表大会，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为了明确起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第三国际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同时，也召开第二国际的同类性质的代表大会。在胡斯曼及其同伙决定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将讨论专政和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等问题。我们非常希望，在全世界工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两个代表大会，以便使各国无产阶级有两个明确而完整的纲领可以进行比较，并从中一劳永逸地选择某一个纲领。

已经退出或正在退出黄色第二国际的不仅有中间分子即“中派”，而且有一些目光远大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已经感觉到未来的前途将是怎样，他们已经明白，如果他们还希望利用对工人阶级的某些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哪怕在表面上同无耻的叛徒和刽子手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

大家知道，近两三个月来退出第二国际的有：

- (1) 德国独立党；
- (2) 法国统一社会党；
- (3) 英国独立工党；
- (4) 瑞士社会党；
- (5) 美国社会党；
- (6) 西班牙社会党。

在上述政党的领袖中多数是中派分子，这些人按问题的实质来说动摇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即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此外，退出第二国际的还有俄国孟什维克党。在本期《共产国际》杂志上，我们刊登了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正式速记记录的一部分，其中包含有俄国孟什维克主要首领尔·马尔托夫的正式声明：断然宣布他的党退出第二国际。孟什维克退出第二国际对于俄国工人的命运来说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俄国孟什维克在俄国无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第二国际破产的征兆，即使是俄国孟什维克退出第二国际这件事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从各个不同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述说，布兰亭辈、谢德曼辈、列诺得尔辈、胡斯曼辈、韩德逊辈先生们在工人会议上大谈特谈代表俄国真正工人运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孟什维克党，并傲慢不逊地指出，孟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的忠实拥护者。

现在，上述社会党叛徒先生们连这点“论据”也丧失了。另外，退出第二国际（至少是已经一只脚退出）的还有波兰崩得，其领导人是著名的机会主义者弗·麦迭姆。不久前，在苏俄进行活动的所有崩得组织的代表会议曾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内容详尽的决议，声明拥护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里还留下什么人呢？如果人们建议我们说出代表目前第二国际实际活动的三个光辉的名字，那么我们要说的不是别人，正是皮尔苏茨基、诺斯克和布兰亭。

约瑟夫·皮尔苏茨基是屠杀波兰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是现在向俄国和乌克兰工农进行战争的法国银行家的雇佣代理人，是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以达申斯基先生为代表的波兰“社会”党的教父和实际鼓舞者。全世界的工人们，可以说甚至参加比利时工党（其领导人依然是胡斯曼先生）的工人们都仇视这位接受法国交易所最可耻的委托的刽子手皮尔苏茨基。但是，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这些工人都知道，这个最可耻的银行团伙的最可耻的代理

人乃是被称为第二国际的胡斯曼股份公司的股东。

布兰亭是世所公认的第二国际的首领。布兰亭现在是瑞典的内阁首相。瑞典的国王和瑞典的资产阶级认为，能够保证他们从已经觉醒起来去进行斗争的瑞典无产阶级那里取得巨额利润的最好的和最可贵的走狗正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布兰亭。我们不知道，瑞典国王是否已经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或许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布兰亭将为自己的“国王”大唱赞歌，就象在臭名昭彰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他和韩德逊一起曾为当时的老板伍德罗·威尔逊大唱赞歌一样。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现在第二国际的首领布兰亭和他的朋友和党内同志瑞典外交大臣帕姆谢尔恩伯爵正在干着瑞典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卑鄙的勾当，玩弄着瑞典工人阶级未曾见过的最无耻的把戏，进行着瑞典国际外交骗子手们未曾干过的最见不得人的交易。

诺斯克。近一年来关于他的官运已无需多说。法国资产阶级的最残暴的将军、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同“准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前陆军部长诺斯克先生比较起来无非是个黄口小儿。现在诺斯克已辞去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政府陆军部长的一切荣誉职务。诺斯克现在有大量空闲时间。而不久前我们有机会与之交谈的德国同志们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选举自己参加胡斯曼第二国际执委会主要代表之一的不是别人，正是古斯达夫·诺斯克。我们衷心地祝贺这个第二国际。布兰亭、皮尔苏茨基、诺斯克——这是被称为第二国际的这个黄色组织的完全合适的领袖和鼓舞者。

在曾经作为第二国际基本力量的老的社会党中间，现在留在第二国际队伍里的只有以诺斯克先生为代表的谢德曼余孽了。留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可能会仿效德国独立党的榜样^①。留下的还有白色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即芬兰的加利

费——曼纳海姆将军的走卒和其他的一些小团体。

但是不应忘记，在第二国际的队伍里还有一些人数众多的、依靠工人的组织，这些组织对资产阶级是个巨大的支持。我们指的是英国的“工党”、温和的英国工联以及龚帕斯先生领导的美国的一些老的工会。记得大约十年前，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争论，是否接纳英国工党加入第二国际，当时考茨基说，这个党渗透了资产阶级倾向。现在，这个“工党”则是留在第二国际里的唯一的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现在，这两个大的工人组织成了第二国际的真正基础，它们跟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说），但代表着众多的力量。

当共产国际把目前还追随英国“工党”和美国龚帕斯工会的那些工人阶层争取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最后支柱。

当我们在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结起来认为，正式宣告共产国际成立为时尚早。读者记得，德国斯巴达克派参加我们1919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唯一代表认为，正式成立共产国际还需要等一等。

过了一年多，现在事情完全清楚，这些悲观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宣布成立共产国际不但不为时过早，相反，甚至可以说稍晚了一些，因此延误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团结。

从我们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去15个月了。在这15个月当中，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在与日俱增。我们志同道合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我们旗帜的感召力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共产

① 现在我们得到消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拒绝参加第二国际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是以隐蔽的方式退出第二国际。——季诺维也夫注

国际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先进工人的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对国际运动的组织影响还比较薄弱。我们还远远没有具备为胜利斗争所必要的国际组织。

正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日益增长，我们现在有必要规定共产国际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确切的组织界限。我们并不讳言：共产国际在某些地方正在成为“时髦”。每天，不是在这个国家就是在那个国家都通过几十个决议：说有那样一个组织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既然这些组织按其成份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既然这些决议表达了一个国家的工人向其他国家的工人伸出友谊之手的衷心愿望，既然它们表达了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中团结一致的日益增长的决心，那么很自然，这些决议只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但是，当我们听到，德国的克里斯平辈和希法亭辈、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及其同伙也出乎意料地表示同情第三国际并且不反对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第三国际时，我们就对自己说：必须给共产国际的大门上锁，必须牢牢地把守共产国际的大门。

我们清楚地知道，上述这些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者现在叩击共产国际的大门并非“不是由于日子好过”。如果以希尔奎特为首的美国社会党上层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那就是说，普通的美国工人在日益革命化并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如果象希尔奎特及其同伙这些议会事务的老手不是“仰望”议会讲坛上的群星，而是“俯视”奔向共产国际队伍的蚁群，那就是说，美国工人正在摆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影响并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

关于德国独立党的右翼“领袖们”也可以这样说。不久前，在比利时工党代表大会上，胡斯曼先生洋洋得意地转述了考茨基对他说过的话。考茨基曾对胡斯曼说：如果我的党（即德国独立党）强迫我（即考茨基）在独立党和第二国际之间作出抉择，那么我将选择第二国际。胡斯曼引用考茨基的这些话是作为说明第二国际

具有生命力的极重要论据的。但是我们知道，梦是可怕的，上帝是仁慈的。考茨基曾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具有一定影响。而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拥护考茨基的只有他那个装着蹩脚墨水的墨水瓶。德国独立党领袖中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一旦面临加入（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口头上的）共产国际或者不再充当独立党领袖的抉择，那么他们自然会选择前者。因此，即将召开的我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在于：不让这些“领袖们”作出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共产国际应当是行动的国际，它应当是向资产阶级宣布殊死斗争的忠贞不渝的国际工人协会，它应当是由一块铁板铸成的组织。共产国际的观念本身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和旧式“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主义的外交手腕。

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现在有时开玩笑地称为第二半（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而是第二半）国际的那个派别的态度。我们指的是那些已经退出第二国际但还没有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这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党，即不是德国独立党、法国统一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上的我们给德国独立党的答复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断然声明。我们知道：参加独立党的工人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这些工人们衷心地希望在第三国际的队伍里为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而进行斗争。我们向这些工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对他们说，我们永远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我们越严厉地揭露所有这些考茨基辈、希法亭辈、希尔奎特辈先生们的面目，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们就越能迅速地摆脱决定这些政党上层政策的坏牧师的腐朽影响。我们对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们说：欢迎你们！但是，你们要事先放下你们的包袱，事先赶走你们那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领袖”。

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会议呢？是志同道合者的集会，是充满同样一个思想并寻求一个完备的

纲领和明确的理论的人们的集会，还是将起巨大的显示政治力量的作用和联合最广泛的劳动群众的世界性代表大会呢？我们认为既是前者又是后者。但首先是志同道合者的代表大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各国的工人运动的状况，全世界革命情绪高涨的形势是这样：如果没有外部障碍的阻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成为显示正在走向胜利的世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伟大集会。

不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最主要任务还是：明确地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巩固第三国际这个具有一个纲领、一个策略、走着同一条道路的真正志同道合者的组织。

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全世界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宣布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成功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现在的问题是迈出第二步。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进一步明确共产主义的纲领并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使所有共产党都一般齐。共产国际清楚地意识到，不同国家的工人必须估计到多种多样的不同条件，并针对这些条件采取自己的策略。我们观察一下共产主义已经深深扎根的一些主要国家，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分为四类：

(1) 俄国，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工人阶级已执政三年，主要的任务是一手击退敌人的进攻，一手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2) 德国、奥地利，部分地还有巴尔干国家，那里革命已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含辛茹苦地诞生。

(3) 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着极老的议会传统，工人阶级中现在正发生深刻的分化并对价值进行重新估价。

(4) 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如爱尔兰、印度，现在部分地

还有土耳其等，那里的解放运动不可能不同时带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共产党人面临着十分特殊的任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些条件的多样性。它在通过自己的一切决议时，将从这种多样性出发，并将记住：改造整个靠臭名昭彰的资产阶级“台柱”维持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先进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策略问题上。但是它不仅不会忘记美国，也不会忘记印度、波斯、日本和其他国家。

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要讨论的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是议会制的问题。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对这个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争论的不是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否应当保留议会制度。我们清楚地知道，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而不是民主的议会。全世界的议会“民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因此，在共产党人中间，争论的问题只能是：是否可以和是否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直到它不再存在——以便有利于争取苏维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问题只能是这样。

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会作出答复：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正如我们比方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利用出版合法报纸的可能性一样，正如我们在资本专政的条件下利用其他各种合法可能性一样。

在全世界，除了苏维埃俄国，即无产阶级已经执掌政权的国家以外，报纸就象资产阶级议会制一样是压迫群众的工具。然而，就

是在最“左的”共产党人中间，也没有人会想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不应当利用合法的工人报刊，尽管它有时不得不考虑书报检查机关的条件和适应资产阶级的法律。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议会制问题大致就是这样。俄国黑色百人团国家杜马中六个工人代表面对五百个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曾经为工人革命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在战争初期，他们被沙皇送去服苦役，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博得了数十万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同情。

让人们不要对我们说，这只是在俄国才有可能！“不要说：我不能；应该说：我不愿。”当年，李卜克内西一个人面对五百名社会民主党的资产者、容克地主、老奸巨猾的生意人议员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永志不忘的贡献，他一个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从议员席上用简短的插话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国家。

霍格伦一个人面对几百个瑞典的地主和资产者，对瑞典工人阶级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他揭露军国主义的勾当，并号召工人阶级起来进行斗争。在塞尔维亚，在保加利亚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存在着享有某种声望、博得应有尊敬的共产党的所有国家里，我们也很快将会看到同样的情形。向资本主义堡垒实行冲击、期望领导千百万群众而同时又找不到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组织性以便在资产阶级议会中为自己锻炼出一支不受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腐朽影响、不能在“民主”议会的光滑地板上滑行的共产主义战士队伍——这也就等于使人想到：这些人善于说大话，但不善于做严肃的革命工作。

让人们不要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对人民说，我们已经不需要议会讲坛了。这是少数人的观点。这是一种贵族主义。这是那些已经尝到智慧果并懂得资产阶级制度的基本机制的人们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更加广泛的群众。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应当学会运用多位数字。我们应当使我们采取的每一个

步骤适合于：它将对不是一千一万的人，而是对成百万成千万的人起何种影响。除了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的城市工人先锋队以外，城市里还有成百万人受着资产阶级的迷惑。在小地方，在农村，更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战前在资产阶级君主派的压迫下弯腰屈背、辛勤劳动。这些人现在刚刚觉醒起来走向新的生活。从议会讲坛上发出的大胆言论，无论是地方上的资产阶级小报，也无论是教堂高台上的说教都不能使其沉默的大胆言论，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利用议会制的问题上，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鼓动因素，而且是组织因素。

我们记得，1917年3月，当我们在瑞士接到关于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的第一封电报时，列宁同志在给我们彼得格勒朋友们的第一批电报中特别指出，必须首先争取得到委派，参加彼得格勒市杜马的市政选举。这个指示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正如大家知道的，列宁同志想到的是从市政选举中诞生的巴黎公社的雏形。列宁同志清楚地知道，虽然我们党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当时在俄国已经具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们在组织方面还缺乏素养。我们曾寻求各种途径，以便使党有可能在每个城市里扎下广泛的组织根基，于是我们曾经想到，市政选举在革命环境下无疑会对此提供机会。我们还记得，在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前大约六个星期，也是在彼得格勒举行彼得格勒市杜马的市政选举。当时，大多数工人已站在我们一边。在选举的日子里，从彼得格勒所有电车车厢里出来的人都打着大幅标语，号召投共产党人的票。所有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请问：这种利用议会制的做法到底是有害于还是有利于我们十月的胜利呢？我们至今深信，不是有害于胜利，而恰恰是**有利于胜利**。在从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八个月过程中，我们党每日每时

都竭力设法在全国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支部网，这些支部后来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假如我们在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在工会里，在市政自治机关里建立巨大的共产党党团，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巩固这个政权。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里有一批人，他们通过实践学会解决住宅问题、粮食问题和其他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只能成为宣传和鼓动的党。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也丝毫不妨碍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几个月，我们的苏维埃废除、有的地方甚至解散在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市杜马，并代之以在无产阶级基础上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正是在执政前的这个过渡时期里，我们对任何一种机会都加以利用了，我们抓住了每一寸“合法”的可能性。我们记住了，共产党应当在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大的工会、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住房委员会、每一个城市自治机关里“安营扎寨”。

大家还都知道，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曾进行过立宪会议的选举，也参加过这次选举并在立宪会议里有自己的党团。毫无疑问，立宪会议中有共产党党团只会有助于在必要的时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扫除这个立宪会议。

共产国际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应由于议会制这个问题而造成共产党人的分裂。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这一立场。但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将会十分明确地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因为这是使群众清楚看到这些资本主义政党的真正性质的最好手段之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工会问题。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说第二国际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

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只是因为德国、英国、美国的工会还依附于这个黄色工会国际。某些极“左”派的同志或许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对工会来说更糟糕,而我们对它更应该少加重视。不过,这个结论跟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或那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光说,这件事更糟糕。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这个或那个事实,而在于改变它。在工会问题上,共产党人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在漫长的、和平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背景上,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工会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而如今又成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堡垒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通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首先在这些工会内部建立巨大的共产党支部,然后通过这些支部将这些工会引上另一条道路。

可以说,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现在直接碰到了工会的问题。第二国际瓦解了。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自由的”实际上是黄色的工会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开始复活。资产阶级现在跛了一只脚,又赶紧用另一只脚来走路。资产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第二国际这个彻底暴露了旧的社会民主党面目、成了资本的最忠实工具的政治组织的国际联盟,现在则竭力试图换上另一匹马:工会国际。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强盗般的国际联盟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现在要比阿姆斯特丹的黄色工会国际来说危害更小。国际联盟是一伙强盗,这一点现在就是西欧和美国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开始明白了。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实质上就是这个强盗国际联盟的代理机构,这一点还没有被这些国家的千千万万甚至有组织的工人所了解。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把现在成为资产阶级政策唯一的群众支柱的大工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就能排除妨碍无产阶级革命顺利和迅速地推进的主要障碍。那时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就只是一伙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了。缓冲器就可以消除。冲突就不

可避免并立即发生。不言而喻，胜利也就会在我们这方面。

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说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某些假“左派”共产党人正在鼓吹群众性地退出工会。这些左的空谈家认为，只要做个蔑视的鬼脸，给德国的工会送去一个“自由黄色”工会的鄙视性绰号，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的确，由列金、扎森巴哈、罗伯特·施米特以及其他资本的走狗担任领导的那些工会现在确实是“自由黄色”工会！这是事实。但是，假如这些工会过去要比现在更“黄色”三倍，那么我们也没有权利退出，因为在这些工会里有着千百万无产者。当沙皇政府通过自己的宪兵上校如臭名昭彰的宪兵“社会主义者”祖巴托夫在俄国建立黄色的神父工会时，布尔什维克没有退出这些工会，而是呆在那里，以便从内部同反动影响进行斗争，使工人们看清这些工会的作用。当沙皇政府在工厂里实行以反动的选举法为基础的工长制度时，布尔什维克则利用这个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害怕自己的影子、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不能跟敌人的一切腐朽影响有效地进行对抗的组织，只有这样的组织才害怕参加反动的工会以便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在德国的“自由黄色”工会里现在共有700万会员。遗憾的是，这700万会员几乎完全操纵在工会官僚的手中。德国“自由黄色”工会的整个组织机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会官僚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工会。加入这些工会的先进工人只是逐渐地、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开始在对黄色工会官僚进行报复。但是事实毕竟是：有几百万德国工人参加了“自由黄色”工会。卡普先生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周清楚地表明：这些“自由黄色”工会继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工会到时候只能去拯救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王冠，从而拯救资产阶级的王冠。

迄今为止，我们的极“左派”朋友们在组织上能以什么去对抗“自由黄色”工会呢？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组织了自己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rbeiterunion）。名称很响亮，招牌很漂亮，但是包含的内容怎样呢？“左派”共产党人自己说：参加他们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工人最多大约只有10万人。德国的工团主义者也对“自由黄色”工会说了许多骂人的话。德国的工团主义是从半小市民的地方工会中发展起来的。情况怎样呢？德国工团主义者自己说：许多年来，加入他们行列的最多大约只有25万人。这就是我们的“左派”用来对抗列金先生领导的七百万会员的工会所拥有的一切！

对“自由黄色”工会说些漂亮的空话是容易的，但绝不是严肃的。假如俄国共产党人在同孟什维克进行的斗争中只说些漂亮的空话和抛出“退出工会”的口号，那么工会至今还会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即俄国的列金们手中。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应当研究一下我们俄国斗争的历史，那时他们就会懂得，多年来俄国的工会运动一直处在俄国社会党叛徒们的手中。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俄国孟什维克还掌握着工会的大多数。在1917年8月，在由俄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克伦斯基之流召开的臭名昭彰的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在工会的代表团中孟什维克占着很大优势。俄国共产党人没有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相反，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人员派到当时俄国的“自由黄色”工会里去。他们在每一个工会，在每一个区，在每一个分部里建立共产党支部，即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开始时这个党团有时只有三两个人。在每个斗争的事实面前，在每个事变的转折关头，在每个转弯的路口上，工会内的这些共产党党团都为每个细小的问题同“自由黄色”工会的多数派进行公开的较量。俄国工会中正直的和有思想的人们渐渐地聚集在工会中的小小的共产党党团周围。一步一步地展开了争取工会

管理的斗争。为了撤销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工会官僚的职务，不得不进行极其艰难的、坚持不懈的斗争。通过这样顽强的斗争，我们才逐渐地赢得了工会。最后我们终于把这个强大的武器从“自由黄色”工会的领导人手中夺取过来。

郑重的政党就是这样同社会党叛徒们的影响进行斗争的。而如果我们只会对工会官僚大喊大叫，如果我们只会比较机智地谩骂他们，就象现在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在反对所谓“党阀们”（“偶像”、“神像”）时所做的那样，那么车子现在还在原地不动：我们依旧在谩骂，而黄色的领袖们则依旧占据着百万人的工会。

现在在德国，或者在英国，或者在美国，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就等于提出“退出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的口号。现在有几百万工人参加了旧的“自由黄色”工会。这几百万工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他们有时完全处于领导这些工会并象茨冈人拿马匹做交易那样拿工会做交易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的手掌之中。不过，这几百万工会会员迟早必然会摆脱这些生意人，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必然的，正如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一样。二者必居其一。如果现在参加这些工会的几百万工人不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越是少提“退出工会”的口号，越是多在这些工会内部进行顽强的工作，那么工人就能越早地摆脱黄色领袖们的资产阶级影响。

共产党人应当到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任何地方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处在少数的地位上。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应当有自己的特殊组织，不受任何“自由黄色”工会、任何自由的其他工会的支配。共产党人应当有自己的党，这个党尽管人数不多，但始终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共产党人应当任何时候都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象一个政党那样有计划地行动，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投入到那些有受骗的工人群众的地方去。而这些工人越是受骗，欺

骗这些工人的机关越是组织得精巧，共产党人就越应该更多地致力于使工人们摆脱这个机关的影响。要把共产主义的触须伸向所有工人组织，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到有“自由黄色”工会某个分部的辽远的省份去，这自然比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和建立只有一小批会员的浮华的“工人联合会”来聊以自慰要困难得多。不过，人们早就懂得，描绘“波将金村”一般说来要比从事严肃的无产阶级事业容易得多。那些宁愿选择前者的人，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要求的。

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以所谓生产会议（Betriebsräte——工厂委员会）来代替旧的工会的思想。这些生产会议是类似我们在俄国曾经存在和现在还存在的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这是一些由本企业的工人选举的、用来首先领导工厂事务的基层组织。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完全支持成立这类生产会议或工厂委员会，特别是在革命基础上、在革命形势下自发地建立这些委员会。但与此同时，丝毫不能认为，这些工厂委员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产业工会。在苏维埃俄国，这些工厂委员会本身乃是产业工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俄国的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生产委员会）是产业工会赖以建立的基层组织。

这些工厂委员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革新现时的“自由黄色”工会。现时“自由黄色”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生产委员会而蜕变的：事情就是这样。共产党人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掌握工厂委员会，即掌握正在蜕变的工会的基层组织上。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竭尽全力去争取工会本身。如果不掌握例如现时规模巨大的运输工人工会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组织，那么就不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在这个机构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在这个机构中有许多无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将抛弃这一切，无产阶级

专政将按自己的方式来改造这一切。但是，我们目前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掌握这个机构上，抛弃其中无用的东西，按革命无产阶级的方式和方法来改造一切。

在旧的工会中开始出现深刻的动荡。英国的工联已经不是五年前的工联了。美国龚帕斯的劳联也可以这样说。在德国，撤销旧的不可救药的工会官僚的过程已经开始，并正在全速进行。英国工会的“三方协议”即三大工会的联合明显地开始在摆脱英国“古典式”工联的旧的资产阶级传统。1920年3月在伦敦与工联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英国工会运动左翼代表大会是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大事（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见《共产国际》杂志第10期）。如果各国共产党能对工会采取正确的方针，那么旧的工会的这种左倾趋势将不是与日增长，而是与时增长。

不能再用抵制和退出旧的工会这种“左”的策略来为列金辈、龚帕斯辈和茹奥辈先生们效劳了。列金辈、茹奥辈、龚帕斯辈、阿普列东辈巴不得让优秀的工人退出“他们的”工会，使他们在这些组织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主人。然而，共产国际不能给予这些黄色首领们以这种满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提出这样的口号：在每个工会中建立哪怕由几十人组成的共产党党团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而通过几十个退出“自由黄色”工会的响亮决议则具有深刻的反动意义。

共产国际在彻底击溃第二国际这个政治组织的联盟以后，现在把争取对工会的影响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工会将发生象无产阶级政党所已经发生的那种演变过程。工会运动内部的分化已经开始，并正在迅速地前进。有些地方，运动将通过工会的公开分裂而进行。在公开分裂必不可免的地方，共产国际将丝毫不加以反对。但是，再过一些时候，目前加入“自由黄色”工会的绝大多数工人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将掌握这些工会，按生产原则进行改组，

使它们变成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把资本的代理人从中赶走，使它们变成战斗的组织，象在俄国那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流砥柱。

最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得不对共产党的作用问题——无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还是在掌握政权以后——表示十分明确的意见。关于政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党的专政和阶级专政，关于群众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目前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之间的讨论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

非常奇怪的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这位拥护和宣扬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忠实信徒的追随者，竟怀疑集中制的共产党的必要性，从而怀疑共产党的必要性。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应当吸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作为可能的同盟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即旧的工人运动已经进入死胡同并完全落入社会党叛徒们的手掌，与此同时新社会的阵痛已经开始并出现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征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那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特别卖身求荣，“民主”资产阶级的压迫特别无耻，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特别成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没有经过周密考虑，也没有贯彻始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表明，一大批工人在美国贪得无厌的百万富翁和龚帕斯式的卖身求荣的工人“领袖”的双重压迫下开始攥紧了拳头。攥紧的拳头威胁性地举向资本主义的剥皮场——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毫无疑问：看到工人们攥紧拳头举向资本主义制度，比看到工人们屈服于资本主义种植场主及其雇佣的社会民主党走狗的呆滞的身影要愉快得多。但是，攥紧的拳头没有也不可能详尽说明被压迫阶级的策略，因为后者应当反对整个敌人世

界，应当看清自己自始至终的整个路程。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反对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世界产联有时候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和政客手腕混为一谈。世界产联希望改造现时的社会，使它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中心是工会的总理事会，周围是按行业或按生产划分的工会分部。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观点，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是祸害，是政客集团，是满足自己小集团利益的帮派。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忠实信徒们看来，任何集中制，包括共产党的集中制在内都是不能容忍的压迫。世界产联不仅否定作为政治斗争形式之一的议会制，而且根本否定政治斗争。

然而我们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可以成为共产国际的同路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比起龚帕斯和列金来是前进了一步。那里是资本的雇佣走狗，这里是真正仇恨资本压迫的人，虽然他们还不完全懂得，怎样才能顺利地推翻建立在欺骗和暴力错综复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是的，同迄今还操纵在资本主义代理人手中的“自由黄色”工会运动比较起来，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彻底的共产主义比较起来，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是倒退了一步，是反动的运动。

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大脑。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眼睛。一个失去视力、没有头脑的人不可能上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可能做到象一个自由的人那样。同样，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远见、最忠诚、最顽强和最高尚、能够作出自我牺牲和进行斗争的代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手中的杠杆，只有借助于它才能使整个阶级走向斗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象一个庞大的躯体没有头脑一样。

当我们看到有人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同时又不接受独立的共产党的思想，我们就对这位同志说：否定政党的必要性的思想，就等于把自己的右手砍掉。可以设想一下：你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强盗进行斗争。如果有个好心的人跑来劝你说：在同强盗进行斗争以前，你把自己的右手砍掉，那么对这样的人应当说些什么呢？

那些“左派”同志们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劝告，他们不懂得，要同强盗资本主义作斗争，我们必须有一只右手（政党），而且这只手应当是坚强有力的铁手。

某些“左派”共产党人恰恰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重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拥护者的滥调。我们不得不带着苦笑来阅读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之一的“左派”弗里茨·沃尔弗海姆的书，他竟一本正经地向德国先进工人们证明，在关于政党的作用问题上，必须追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弗里茨·沃尔弗海姆及其志同道合者自认为是非常先进的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却把运动拖向后退，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拖向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工团主义。我们还痛心读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代表1920年4月在柏林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纲领性声明中宣布：我们成立了新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但是“这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党”。德国的“左派”没有充分说明自己的思想，但是十分明确的是，在这里他们是跟着弗里茨·沃尔弗海姆及其志同道合者的足迹走的，实际上他们否定共产党的必要性，并认为借助于某种不定型的、无党派的“工人联合会”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13年前，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提出了召

开无党派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根据许多孟什维克的设想，这个代表大会应当取代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原来意义上的政党”。当时，先进的俄国工人嘲笑了这种反动思想。我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同志们现在不知不觉地在重复1906—1907年俄国孟什维克提出的胡言乱语。

我们需要共产党，就象肺需要空气、饥饿者需要面包一样。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象船没有舵和帆一样。没有共产党，我们既不能在思想上，也不能在组织上对抗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简单是共产党，而是有**严格集中制、铁的纪律、军事组织的共产党**。是的，有**军事组织的共产党**。这是俄国共产党——目前在俄国执掌政权的唯一政党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党是在20年的过程中通过作为它的基础的优秀无产阶级的自然淘汰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党的章程宣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党在纷繁复杂的条件下，无论在沙皇反动专制的困难环境中，还是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都实现了铁的集中制。俄国共产党现在大约拥有60万党员。俄国的工会拥有450万会员。俄国在选举工农代表苏维埃时履行选举权的人数大约有8000万人。居住在现时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人数大约1.2亿人。基本的数字就是这样。

我们的反对者，俄国的谢德曼辈和龚帕斯辈，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责备我们党在俄国建立了党的专制，而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但是，俄国的任何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铁的专政，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能维持3年，而且连3个月也维持不了。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应当懂得，工人阶级专政不可能不通过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当工人阶级不得不抗击大批敌人时，当它不得不同无数的敌对势力进行搏斗时，当半个世界向它宣战时，俄国共产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斗

争，成了它的司令部。当我们不得不通过党的途径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奔赴前线时，当工人们每天不得不经受流血牺牲时，当工人政府每 24 小时不得不作出包含着极大后果的决定时，就需要有一个集中制的党，一个有内部军事纪律、无限忠于事业、党员绝对信任有充分权力的中央、相互间同志般团结的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才能做到：今天把成千上万的党员派到一个战场上，明天又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战场上，后天把优秀的力量转去搞运输业，再过一些时候又把成千上万的党员派到从事生产的省份，以便为忍饥挨饿的城市弄到食品，等等。没有一个拥有权力的司令部，没有极严格的铁的纪律，不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组织，就不可能战胜无数的敌人。

目前还面临着争取政权斗争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所要关心的不是联邦制的组织，不是地方派别的“自治”。他们应当关心的是建立统一的、具有严格集中制的、由一块铁板铸成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建立在完全无产阶级集中制基础上的政党。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革命就必然灭亡。

也不应以为，在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的作用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缩小。相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例子说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的作用仍将极其巨大并日益增长。在俄国，经济建设、军事组织、国民教育、粮食政策等所有这些维系着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首先和主要是在党组织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而由于在这些党组织内集中着俄国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力量，集中着在战斗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人员，所以对苏维埃机关、工会的监督是唯一可靠的保证，保证它所体现的不是行会的、派别的利益，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工团主义的拥护者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们以及某些“左派”共产党人正在制定美好的规划，试图建立不要过

多集中制的、没有自上而下压力的、完全在同志般团结基础上的“未来社会”(«Zukunftstaat»)。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不要迷恋于贝拉米式的幻想小说之中。应当记住我们在推翻资本以前所面临的那场残酷的国内战争。而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忘记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要集中制的组织,那么他们将借助什么样的组织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并捍卫这一专政使其不受敌人的攻击呢?我们的这些左派朋友们忘记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里,即不是延续一年的、在这期间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的军事组织乃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的时期里,无产阶级专政将表现为何种组织形式?

对于多少考虑到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进程的无产阶级来说,应当十分清楚的是:不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就谈不上共产主义的胜利。而除了在严格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基础上的整个国家范围内可以建立真正的红军以外,还能以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的确,我们建立的不是五金工人的特殊红军,不是纺织工人、木器工人等等的平行的独立的红军。而在彻底贯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我们无知的左派同志们原则的情况下建立红军,那就会使无产阶级革命事先注定遭到失败。

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详尽地来阐明所有这些问题。它必须彻底清除在共产党的作用问题上的工团主义偏见;它必须无情地抛弃在无产阶级的集中制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市侩观点;它必须制定在共产党议会党团和整个共产党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在共产党议员完全服从共产党的基础上,不管是合法的党还是非法的党都一样);它必须使共产主义的麦子去掉工团主义的糠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最后的时刻增加了一项新的议程,即

对待只是在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和加入第三国际条件的新的“中派”的态度。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程。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公布的提纲是一份极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它表明执行委员会多么希望弄清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策。我们希望向我们的“左派”同志们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希望预先警告他们以最坚决的态度防止继续犯重大的错误。

特别是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应该这样做。我们在一国范围内进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今天不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这场斗争——何况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国际性的问题。

我们决不会停留在最坚决地从思想上，如果必要的话从组织上反对共产主义策略的“左派”敌人这一点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在这些“左派”当中有许多忠于我们事业的人，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他们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会完完全全地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看到，在某些国家里，有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只是在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的原则。第三国际正在成为“时髦”。有些人试图以加入第三国际来保护自己，为的是在实际上继续贯彻考茨基主义的“中派”政策。有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却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推到渺茫的未来，正如过去某些“正统派分子”所做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Endziel（最终目的）无非是红色的招牌，是遥远未来的音乐。

现在开始在形成一些共产主义的“国务人才派”，他们规定一个次序：首先让某个某个国家去完成苏维埃革命，然后再轮到他们，等等。

我们将对这些右派“共产党人”进行毫不容情的斗争。

•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制定共产国际的章程。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自然不是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东西，而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能够切实地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因为这个斗争以其本身的进程正日益成为国际性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必须向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些政党建议从参加共产国际这一事实本身得出一切绝对必要的实际结论。我们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应当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名称。我们必须使每一个落后的农村雇工、小农、女工十分清楚地看到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当然，如果内容不变，光是改变名称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谁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内容，谁完全地站到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谁就应当改变自己党的名称。

今后我们应当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将那些社会民主党人老爷们开除出自己的队伍，他们虽然只构成加入共产国际各个政党的少数，但是他们留在这些党内却是为了消极怠工。为了不致走得太远，我们不妨举出意大利党的例子，意大利党是最早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她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许多卓越的功绩。我们完全同意瑞士安贝尔-德罗同志的意见，他不久前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要求将屠拉梯及其同伙开除出意大利党的队伍。屠拉梯及其朋友们是无疑的机会主义者，是第二国际的拥护者。意大利党的多数人完全明确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与此同时，屠拉梯依然留在这个党内，表面上又是共产国际的成员。继续保持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这样就等于继续保持第二国际的恶劣传统。这就等于为了维持表面的统一，在自己的队伍里容忍那些在决定性时刻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人。谁说了一，谁就应当说二。谁说我

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谁就应当跟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彻底分手。谁加入共产国际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为了向工人们的情绪作出让步,不是为了玩弄可鄙的“外交手腕”,谁就应当善于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一切必要的实际结论。

两个世界互相对立着。两个阶级互相对立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稍有模棱两可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一点思想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虚假,无产阶级就会蒙受无数不必要的牺牲。鲜明的纲领,明确的策略路线,明确的组织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国际所绝对必要的,如果共产国际希望完成它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话。

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全世界先进工人们在未来的决战前夕进行经验交流的场所。各国的工人共产党员应当做到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能够将自己应有的一页载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史册。

1920年5月14日

于库尔斯克-哈尔科夫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0期
第1725—1750页。

共产国际今昔

(1920年7月)

我们正处在转折关头。共产国际目前需要以崭新的节奏进行工作。15个月来，共产国际无比迅速地发展了。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情况是：一方面，第二国际虽然摇摇欲坠和威信扫地，但它毕竟还联合着（尽管只是表面上的）一些老的大党；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里，最初的一批勇士们还刚刚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一方面我们有了第三国际，几乎所有老党都愿意加入它的队伍，在每个国家里几乎都有坚强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第二国际成了一堆废墟。

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宣传和鼓动的机构。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必须直接领导各国运动的战斗组织。共产国际在头一年里无非是奋起进行坚决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旗手。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世界斗争的实际组织者。

这一点不得不使共产国际肩负起崭新的义务。当问题还只是涉及到某个政党对我们表示同情的时候，共产国际是不会因此受到损失的。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昨天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希望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加倍地谨慎和慎重了。

现在摆在日程上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如何对待德国独立党、法国社会党、美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瑞士社会党和其他一些政党，总之，如何对待目前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十字路口的整个“中派”。这些党的普通党员们——工人们敦促这些组织加入我们

的队伍，而“中派”领袖们现在也表示比较坚定的决心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

看来，首先应当使上述一切政党很好地弄清，第三国际现在是什么样的组织和加入第三国际的每个党应该承担何种义务。

共产国际断然提出，在拥护我们观点的人占多数的那些党内，如在意大利、瑞典、南斯拉夫等国家里，必须同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脱离关系。希望加入共产国际队伍的上述老党的代表们首先要估计到这一情况。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希望。

我们现在有可能了解德国独立党中央机关报《自由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该党发出的著名的纲领性信件的答复。首先，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对我们信件的答复没有任何人的签名。在《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也没有独立党中央委员会的署名。显然，这并不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答复。同时，答复也没有署上某位撰写人的名字。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些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过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糟糕的主要是，在这7篇文章中，作者总是在细小的琐事上纠缠不休，没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提出的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任何答复。你们可以在上述文章中看到对一些次要事实的繁琐的“驳斥”，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冗长的申诉，说什么俄国共产党人对俄国的事情了解得很好，但对德国的事情却不了解。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系列具有希法亭精神的耶稣教教徒式的攻击——无数具有克里斯平空泛“社会主义”精神的折衷主义的空谈。但是你们在独立党人的文章中却找不到革命者对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的迫切问题的真正的坦率和诚恳的答复。结论是德国独立党的普通党员们，男女工人们，越来越逼迫自己的领袖，要求他们真诚地同志式地声明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右派领袖们则阻挠这种联合，一再地企图用空话来支吾搪塞。

法国社会党上层的情况也不比这好些。马赛·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自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宣言中作了深谋远虑的声明。而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仍按过去的方式出版。在我们刚刚收到的几号《人道报》（大家知道，该报编辑就是马赛·加香）上，我们看到臭名昭彰的列诺得尔写的一篇社论，这位公民在社论中说，如果苏维埃政府向他提出保证，他可以带任何译员和助手自由地到全国各地旅行，那么他到俄国去将感到非常荣幸。《人道报》编辑部非常了解列诺得尔先生实际上无非是国际联盟的代理人，但是在显要地位发表这篇文章时却不置一词表示反对（《人道报》1920年6月10日）。在该报另一号（1920年6月16日）上，我们看到正是伊格纳齐·达申斯基先生的文章，尊敬的《人道报》编辑部把他称为“我们的波兰同志”，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客气的按语，说这篇文章是作为文献刊登出来的。达申斯基是屠杀波兰工人的刽子手、正在同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波兰白匪头子皮尔苏茨基的右手和帮凶。《人道报》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但同时竟把反革命匪徒，第二国际的成员达申斯基称为“同志”！在同一号报纸上，我们还看到龙格的一篇阐述“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苏维埃俄国的使命”的文章，其中每一行字都表露出旧的“外交手腕”，可贵的只有一点：龙格说法国社会党极左派（即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法国龙格派关于参加跟加香和弗罗萨尔一起的代表团的友好邀请。

只要有可能哪怕稍微注意一下德国独立党和法国社会党每天的报纸，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里斯平和龙格把加入共产国际看作是纯粹的手续。他们一方面同意发表大吹大擂的“原则宣言”，另一方面认为加入共产国际后仍可保留象过去那样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充分自由。

他们“原则上”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他们“只是”从实际的考虑出发希望稍微等待一下，总之他们希望保留“自治权”。

“原则上承认等于实际上否定——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外交家的原则。”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句话是俾斯麦说的。独立党人和龙格派队伍中的小俾斯麦们就是按这样的原则行事的。

“我同意加入第三国际，我承认它的原则。但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声明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我同意德国独立党人的观点：先去瑞士，然后再去莫斯科。”^①（这就是说先在瑞士召开中派党的代表会议，成立某种第二半国际——即所谓重建派的臭名昭彰的计划。）

这是法国社会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劳尔·韦弗伊在答复巴黎共产主义杂志《共产主义评论》的征询意见时说的一段话。

现在据说龙格派的一些著名领袖准备放弃成立中派国际的计划。他们清楚地看到，任何“重建”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不要么加入第三国际，要么就脱离工人。现在这个党的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但是这还不能真正保证该党的机会主义病症已经痊愈，尤其不能保证不再复发。

或者拿另一个“中”派的著名代表、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格里姆来说吧。一年前他是坚决反对第三国际的。过了一年后，他倾向于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当瑞士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时，格里姆及其同伙则又动摇了，帮助通过全党投票的方式拒绝瑞士党加入共产国际。现在，瑞士党的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加入第三国际，而罗伯特·格里姆似乎又倾向于赞成加入。但是，让我们看一看罗伯特·格里姆是怎样设想共产国际的意义和作用的。

在以罗伯特·格里姆为精神支柱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总题目是《国际》。在其中的第四篇文章上说：

^① 《共产主义评论》1920年3月号第57页。

“第二国际有自己的社会党国际局。国际局起了各个支部之间邮政信箱的作用。国际局没有执行独立的工作，首先没有对各党实行思想领导。这与其说是由于国际局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由于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党之间原则性观点的差异所致”。

说得很不坏。的确，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领导的社会党国际局无非是个邮政信箱。不过，开启这个信箱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最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手里。事情很清楚，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执行机构。显然，共产国际必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那么格里姆及其朋友们是如何设想共产国际的作用的呢？请听：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它不仅给我们提供情报，而且帮助我们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批评，提出建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在同时提出革命要求的意义上对议会活动的经常性影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组织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的情报服务。”^①

读者可以看到，罗伯特·格里姆一伙对第二国际国际局的作用进行了很好的批评，但实际上却要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来起略微不同于邮政信箱的作用。显然，罗伯特·格里姆及其同伙甚至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不仅应当出版杂志，不仅应当做到在议会中同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应当学会组织工人们手执武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他们现在都“左倾”了，包括近年来一直“批评”我们的那些人。例如，请看意大利改良主义的著名代表特雷维斯的纲领性声明。他在回答《共产主义评论》杂志提出的“您对加入第三国际怎样看”的问题时说：

^① 《伯尔尼哨兵报》1920年1月8日。

——您问我是否主张立即加入第三国际。我回答说：是的！特雷维斯无条件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不过他又说：

“任何理论上的迁就，任何想要在纲领和策略方面把同样的义务强加于各个党的愿望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荒谬的，这样只会使我们达不到国际的目的。”^①

特雷维斯的这段典型的话使我们充分了解了意大利党的现状，那里多数工人无条件地拥护我们，但是遗憾的是最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在党内依然象“在家里”一样。

当然，共产国际绝不打算使所有党一般齐。共产国际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表明，它善于估计各个党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多样性。共产国际十分清楚地了解在纯粹地方性问题的领域里，决定性的一言应当属于各该政党。不过，特雷维斯说的自然不是这个问题。他试图给自己和给自己的改良派保留“自治”权，实际上也就是改良主义者的充分行动自由。^②

① 《共产主义评论》巴黎版第6期第51页。

② 英雄所见略同。德国独立工人党内的“左派”作家也要求象特雷维斯及其改良派所要求的那种脱离共产国际的“独立”和“自治”。

我们刚刚收到由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主编的“左派”共产党人汉堡机关报的最近几号报纸。在这些报纸上刊登了几篇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德国独立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章。对于这类谩骂和恶意宣传，我们将不作答复。但是，德国独立工人党“左派”领袖们的以下“原则性”声明则值得注意。

在《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6月26日第64号上刊登了劳·沃·的一篇题为《搔首弄姿与专政》的文章，上面说：“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获悉，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声明答复说，我们党在一切策略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背道而驰。我们对此回答说：国际的策略只是某些国家内不同党派策略的综合，离开各国共产党实际策略的国际特殊策略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为策略的确定是各国无产者的事情，而不是某个小集团的事情。当然，如果执行委员会认为，莫斯科小集团可以强制地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俄国的特殊策略强加于各国，那么这只能说明执行委员会对国际策略的要求持有特殊的看法。”

《共产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在对特雷维斯答复所写的按语中说：“特雷维斯同志是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的领袖之一。但是他与我们的艾伯特、托马·列诺得尔等人相距多远啊！”

可惜，尊敬的《共产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把特雷维斯的政策说得太好了！当然，特雷维斯和列诺得尔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这种差别实际上只是：特雷维斯及其朋友们所维护的也是同样的改良主义，只不过更加巧妙而已。

我们说，改良主义者在意大利党内就感到象“在家里”一样。来俄国访问的意大利代表团的能干的团员之一波察尼先生在同俄国不无名气的教授季安德尔的谈话（载《Hufvud-stadsbladet》1920年6月6日）中说：

“我们从我们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的电讯中获悉，以塞拉蒂为团长的意大利代表团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而这个意见在芬兰传播开了。然而，波察尼却对这种虚假的观念表示反对。代表团成员听到这个意见后感到惊讶和气愤。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这还不等于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

同是这位波察尼在谈话中又说：

“世界大战给意大利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于得到了的里亚

说得不是很好吗？

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先生，请继续这样说下去吧！你们说得越多，工人们就会越快地认清你们的面目并抛弃你们。

根据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的处方，共产国际的任务很简单：把头脑不清的人以及民族主义者之流忽然想起的东西加以“综合”，把沃尔弗海姆的观点和克里斯平的观点拿来加在一起再分成两半，于是就得到“综合”了。迄今为止，我们对共产国际的任务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劳芬堡和沃尔弗海姆没有发现，他们是怎样从一个台阶滑到另一个台阶的，越滑越低。要知道，他们所说的把俄国的特殊策略强加于人的话，正是从考茨基和希法亭那里抄袭来的。他们向共产国际建议的东西则是回到第二国际的策略上来。事情正是这样。

斯特和特兰托。此外，意大利还占领了波伦亚和高地。至于费乌美和阿尔巴尼亚其他部分，那么这些问题尚未解决。”

不久前，当我们向一些著名的意大利同志指出菲力浦·屠拉梯在意大利的这类谈话时，同志们宽宏地（太宽宏了！）回答我们说，屠拉梯在一次私人交谈（报刊上没有发表）中说，他的话被曲解了。是否可以对改良主义者表示更大的宽宏呢？……

一位饱经世故的意大利改良主义外交家——在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中起很大作用的议员莫迪利扬尼不久前访问了巴黎。在跟龙格的交谈中，莫迪利扬尼用如下的方式劝法国“独立党人”的领袖加入第三国际。他对他说：

“我的朋友龙格，的确，我们干吗不加入共产国际呢？这需要我们对此承担什么义务呢？实际上无非是比方说每两个星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寄去一张带有漂亮风景画的明信片。”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两位朋友之间的这场友好对话的片断。塞拉蒂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正式发言中也引用了这次谈话。了解议员莫迪利扬尼活动的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话确实是他说的。莫迪利扬尼跟其他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在他身上某些意大利式的多情善感和无比粗鲁的政治犬儒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改良主义者莫迪利扬尼用言简意深的话语表示了“左翼”改良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确，所有这些先生们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不需要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给我们寄些漂亮的明信片就行了。而加入第三国际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向普通工人炫耀第三国际的招牌，工人们会对他们采取更信任的态度，至少不会再在会上吹口哨嘘他们了。

莫迪利扬尼等先生们并不象诺斯克先生做得那样蠢笨。克伦

斯基和策烈铁里的教训对他们来说不是无益的。现在他们没有去参加他们非常乐意参加的资产阶级内阁。他们要把自己“保守”到美妙的日子。因此，他们暂时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似乎这是一个旅馆），在革命工人当中为自己占居一个位置。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他们就飘然出来，从内部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让这些改良主义者明白，加入共产国际是需要承担巨大义务的，共产国际将揭露最狡猾的改良主义的最老练的生意人的最“精巧的”政策。

共产国际正在成为革命工人的战斗组织。我们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外交家。

二

全世界工人阶级成员的极大革命化一方面造成了上述老的社会党“上层”的可悲现象。另一方面，群众的这种革命化也引起了可喜的现象。我们指的是具有革命本能、但在理论上极端糊涂的英国厂工会委员会运动、一系列国家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早在15年前，当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正在度蜜月的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革命的工团主义确定自己的态度。而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试图从麦子中挑出毒麦，在工人群众对同情革命工团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自发反抗中找出健康的种子。

我们现在也应当遵循这条路线。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按实质说也就是彻底制定了这条路线。一些著名的共产国际活动家也曾表现出一种成见，即反对把厂工会运动的拥护者、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吸收到我们队伍中来，这种成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克服。无疑，在上述运动中有许多不清楚的甚至混乱不堪的东西，我们一刻也不否认。但是，厂工会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运动，按其成

分来说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我们应当耐心地等待这个运动净化为共产主义的运动。我们应当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

这些运动具有过渡性质。在那些旧的“古典式的”工联和旧的钦定的社会党已经威信扫地、但共产主义政党尚未建立或者还非常软弱的国家里，这些运动是作为特殊的发展阶段而出现的。首先，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共产国际不应也决不会对这些具有革命本能但理论上混乱的派别的偏见作任何思想上的让步。然而，共产国际将诚恳地和同志式地向他们伸出手来，并充分相信这些派别将日益接近我们。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厂工会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派最缺少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对共产党作用的理解。上述派别的拥护者们习惯于在“政策”和“政客手腕”之间划等号。他们习惯于把政党看作是毫无原则的、只是由一些议会钻营家领导的和靠吃机会主义饭的人。要使这些人相信，要使这些组织摆脱对政党的成见，必须向他们表明确实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政党：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有明确纲领、革命策略和铁的纪律的政党，善于吸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和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向资本堡垒冲击的政党。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事实来宣传。

——你不相信有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吗？你认为任何议会制都是机会主义的吗？你以为任何政党都是玩弄政客手腕的吗？那么请看：俄国共产党，她就是善于领导本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剥夺资产阶级的政党！请看：德国共产党，她就是善于把全体工人阶级不管怎样联合到自己队伍里来的政党！请看：在意大利，在保加利亚，在法国，在英国，在美国正在建立这样的政党！瞧吧，你很快就会明白，不要共产党就等于不要自己的右手。

这就是我们要对参加上述组织的无产者们说的话。那时他们就会看到，共产国际是正确的。那时他们就会完全向我们靠拢，并

在无产阶级基础还缺乏的那些国家里给我们共产党创立这样的基础。

三

我再说一遍，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从事宣传工作。它在应当转向组织各国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斗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必须尽可能使任何一个多少具有群众性的组织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敌人手里。

我们不能忘记，虽然第二国际已经被击溃，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黄色的工会国际联合会，第二国际企图重新靠它来复活。

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甚至根本不存在共产党人是不是退出工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左派”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不是“退出”工会，而是在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国家里加入工会——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口号。哪里有工人，那里就应当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让千千万万的工人受社会叛徒们的影响而自己袖手旁观。被开除出党的社会党叛徒们正躲进工会的“避难所”里。我们必须攻克这个堡垒，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正确的、经常的和耐心的围攻，我们必须将工人阶级的变节分子从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撵出去，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个缓冲器，那时我们就只是单独对付资本家，他们也就在劫难逃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在半年前就提出建立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来对抗黄色“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的问题。我们毫不讳言，这项倡议进展得非常缓慢。在这方面我们碰到许多实际困难。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样的情况：甚至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完全拥护我们，而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工会实际上操纵在改良派领袖们的手里。我们得到消息说，这些改良派领袖们已经六年多根本不打算召开意大利工会代表大会，因为他

们知道，工人群众的情绪比这些改良派领袖们要左得多。我们还必须估计到，英国旧的工联内部的分化（即所谓“三方协议”等等）进行得依然相当缓慢，而英国工联的左翼领导人有时也染上改良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估计到，厂工会委员会以及类似运动的领导人常常也抱有无政府主义的偏见。

最后，关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问题本身按实质说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反对参加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们主张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参加**某些部门或行业**的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因为这些国际代表大会同工人群众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们反对所有工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立即分裂，而同时我们又赞成对这些工会的黄色领袖进行无情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解决我们自己提出的这一任务造成了巨大困难。不过我们再说一遍：为了使共产国际成为它所应当成为的那样的组织，成立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要加以解决的。

四

最后，为了使共产国际成为它所应当成为的那样的组织，我们必须使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共产党。迄今为止，我们在美国有2个共产党。德国也是这样。在英国，我们有4个或5个共产主义派别。在法国，情况也是这样。这种现象必须结束。

在**德国**，在两个共产党之间划定了最明确的原则性分界线。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就是在这里最困难的事情还在后头，而现在是在我们在德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巴达克联盟）无疑犯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大错误，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斯巴达克联盟最重要的政治错误是卡普叛乱时期的行为。我们在本期杂志上刊登了德国共产党著名领袖克拉拉·蔡特

金、保尔·列维、恩斯特·迈尔的极重要声明。这些激烈抨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时期的动摇立场的信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些信为参加德国第二个“左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真诚的革命工人们开辟了同旧的政党合并的充分可能。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队伍里，有许多真诚的和正直的无产者，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巴达克联盟)多数派的机会主义和无能妨碍他们跟我们接近。共产国际将原则性地谴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的”倾向，同时也将指出老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德国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在法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对建立共产党这一思想本身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在革命工团主义者领导人身上，看来包括象罗斯梅这样杰出的同志身上还都残存着。现在是法国无论如何应当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必须从建立真正志同道合者的融洽的政党着手，以便使他们今后将目前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英国，近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仓促地试图在决不参加议会和英国工党的“左”的基础上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尝试是共产主义的明智的做法。相反，我们竭力想使英国的所有共产主义派别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当然，不是在“左派”的分立主义的纲领基础上，而是在整个共产国际的总的决议的纲领基础上联合起来。

意大利兄弟党在对本国命运起重大历史作用方面情况较好。为此，她必须清除改良主义分子。为此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会运动不是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中，而是掌握在真正共产党人的手中。为此必须使目前对党内多数派持一定反对立场的都灵支部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博尔迪加领导的“弃权派”同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瑞典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将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改良主义者清除出自己队伍的任务。

改良主义是一种容易染上的病症。这种病症也波及到一些年轻的政党身上，如我们的南斯拉夫党。它也毫不怜惜老的当之无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决不掩饰自己身上的这些弱点，即使是出于爱护党的不正确感情。我们的责任是估计到这些事实并正视危险。

在已经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中间（由于它们还没有清除中派和改良派）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次序游戏”。某个国家的党说，他们的邻国还没有夺取政权，我们也不着手进行夺取政权的决战。我们希望先有个后方。让某某国家先搞吧！当某个国家取得了胜利，那时我们再来搞。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是最不鼓励未经深思熟虑的起义和暴动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催促事件，而只能耐心地 and 冷静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只有当条件成熟时才去号召行动。然而，共产国际也不会忘记，这种“按次序”斗争的思想是第二国际许多政党所固有的。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对上述论点采取怀疑的态度。

1919年，共产国际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团体。1920年，共产国际则成为向资本主义堡垒进行直接冲击的工人们的战斗协会。内战的烽火还没有静息，它正以空前未有的势头在燃烧。苏维埃俄国同地主波兰的战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为国际革命开辟了非常有利的 prospect。东方发生的一些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在近东和远东看到的一切还只是软弱的开端。东方已经出现了革命的火舌。整个东方燃起革命烽火时刻已经不远了。

在工人阶级哪怕是几个星期执掌政权的国家里，反革命的疯狂暴虐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里爆发。在匈牙利，刽子手们杀害工人的鲜血流得最多。但是就是在那里（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无产阶级革命将重新露头。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暴行的数量说占第二位的无疑是白色的芬兰。但是就是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也已重新站立起来。

日前我们有机会同两位直接来自赫尔辛福斯的工人进行了交谈，一年来他们在那里进行了巨大的共产主义的地下工作。从芬兰现在发生的情况看，有一个小小的特点说明芬兰工人们的情绪现在怎样。

同志们告诉我们，几乎在芬兰的所有大城市和小工业城市（1918年时那里曾是白匪和红军斗争的场所），现在都在进行特殊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在埋葬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墓地上，聚集着大批工人和数量更多的劳动妇女，他们脉脉含情地细心打扫这些陵墓，加以装饰，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捐躯的工人们树立简单的纪念碑，在人民当中，编写了简短朴素的歌曲和诗篇来纪念这些牺牲的战士。而副歌往往表达很朴素的思想：你们没有白白牺牲，我们将继承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尸骨堆上就升起复仇之神……

芬兰资产阶级眼看着这一切，但束手无策，因为这是群众性的现象，因为所有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都这样想。

这是一种象征。这说明在当前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无产者的整个情况。目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叛徒们只能延缓它，只能使它对工人阶级来说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位来自赫尔辛福斯，来自资产阶级屠杀了三万无产者的国家的首都的普通工人还顺便向我们指出一点。他对我们说：芬兰

工人自然仇视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更加仇视在革命期间出卖我们的白色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大家的共同情绪是：首先消灭叛徒、黄色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资产阶级也就无处可逃，灭顶之灾也就临到他们头上了。

这些话或许以略微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对以下事实的正确评价：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是靠黄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第二国际拥护者的反动作用任何时候都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

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共产国际应当成为已经觉醒的和日益壮大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真正的司令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长。共产国际应当善于组织它和领导它。共产国际的事业不仅是准备胜利，不仅是在夺取政权时期领导工人阶级，而且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指导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

共产国际如若不是团结的、有纪律和集中的国际战斗组织，那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共产国际应当成为这样的组织，它无疑将会成为这样的组织。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2期
第1993—2006页。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0年7月29日)

我们现在讨论议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共产国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谈一下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正式报告。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委员会增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两个代表团出席了各次会议，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提纲作了某些修改，但总的内容没有变。当然，我们会向你们介绍修改的情况，你们将有机会讨论这些修改。只要我们了解到有关同志的意见，我们当然愿意接受和采纳。

德文本提纲中没有包括第二条，法文本有这一条。第二条说：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害怕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其次，对第七条作了重要修改，这一条原来说：

“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

现在委员会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不光列举出意大利的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对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我们共产国际也应该加

以谴责。委员会决定，至少每一个国家要举出一个改良主义者的名字来。这样，“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就改成了：“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考茨基、希法亭、龙格、麦克唐纳、希尔奎特之流”。

喊声：还有格里姆！

季诺维也夫。应当承认，这张名单是不全的。代表大会可能会加以补充。

其次，还对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进行了补充。这两条说：

“18. 各国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都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重要文件。

19. 一切已经加入共产国际或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短期间，至迟不得超过四个月，召集本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一切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下面接着是列宁同志个人的建议^①。

委员会讨论了这一建议，结果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两票弃权予以通过。但是我应该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声明，我们愿意原封不动地收回这一建议，我们把这建议仅仅是当作一种愿望，而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或指示。我们认为，只要代表大会表示这样一个愿望就足够了。

其次，还作了某些修辞方面的改动，尤其对谈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那一条作了改动。这些修改定了以后将提交你们审议。

我现在来说明这些条文。首先，第79页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动摇不定、态

^① 指列宁关于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建立领导机关问题的建议；后来根据俄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条被委员会通过作为参加条件的第二十条。——编者注

度暧昧的集团削弱的危险。”

委员会修改了这一点，决定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坚决一点，不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而是说“削弱的危险正威胁着共产国际”，这一点委员会改得好。的确，共产国际正面临着被那些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最近迫于群众压力也可以说是出于需要才加入我们行列的党削弱的危险。即使他们愿意，要一下子抛掉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亚当也是不容易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即第三国际建立时，我们也面临许多危险。但削弱的危险以及接受过于复杂的成分的危险当时还没有。15个月以前，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团体，有人嘲笑它说：“有十把椅子你们整个共产国际就坐得下了，它没有任何影响。影响大的老党仍然都在第二国际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老党都力图加入第三国际。既然工人群众已经向共产主义运动靠拢，我们就应当接受他们。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是背着因袭的重担也就是那些老领袖参加我们行列的，而这些领袖在战时和战后一直在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在整个第一年里它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当时欧洲刚经历了一场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战争，工人们正在探索新的道路，在这样的时刻，成为国际性的宣传组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应当坦白地说，当时它不过是一个想向群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组织广泛的宣传团体。现在我们想成为更大的组织，想成为另一种组织。现在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宣传团体，而想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在这方面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开始新的篇章。我们想建成一个战斗组织，它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要把共产主义付诸实现，并努力为此目的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组织。

不久前我读了保尔·路易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第一国际遭到破产是因为它没能防止1870--1871年战争的发生。第二国际的情况同样也是这样。战争爆发了，要防止它已经不可能，因此第二国际也遭到了破产。第一国际当时的处境同现在第二国际的处境是一样的。

这种谎言可能是半自觉的谎言，但并不因此而成其为社会和平主义的谎言。第一国际希望阻止战争的爆发。它进行过斗争，并在斗争中牺牲了。第二国际不想进行这一斗争，逃避这一斗争。第一国际英勇地牺牲了，它的优秀战士在巴黎公社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杀害了。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我们必须明确地，不含糊地向工人们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应当谴责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的说法，因为这样做就是对社会和平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支持。

第一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甚至力图由中央机关领导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罢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运动当时还处于初期阶段，还很弱小。我们现在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直接领导每一次大规模经济罢工的中央机关。现在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经济罢工，对此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中央机关，因为运动的规模已经发展得极其巨大。第二国际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象是一对正题和反题。现在，当我们需要为新的关系确立条件时，我们就好象在做一道社会意义上的合题。当我们要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相当一部分不久前还参加第二国际的领导同志认为，加入第三国际不会使他们承担任何重大的义务。我这里有一份刊登格里姆文章的《伯尔尼哨兵报》（罗伯特·格里姆的机关报）的剪报。他说，第二国际及其执行机关只是一只信箱。他说得完全正确。但

是文章的作者向第三国际提了些什么建议呢？他说，第三国际应该成为另一种组织：它应该在各国组织“大规模的行动”，就是说，它应该设法建立情报机构、组织“议会中的一致行动”。这样一来，你们瞧，还是一回事，还是一只信箱，只不过深一些、容量大一些。

我们需要一个情报机构，对此我不反对。我们的情报工作非常薄弱，它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同样也不妨在各国采取一致的议会行动，例如，谴责国联是一个强盗联盟或者一致提议反对改良主义者。但这还远不是国际性的战斗组织。现在金钱支援也不是最主要的。格里姆及其一伙对第三国际的看法实际上跟他们对第二国际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说第三国际是一只容量大些、做得好些、涂了红漆的信箱。第三国际不应当是这样的一只信箱！

我还读过各种“左派”改良主义者的一些声明。如克洛德·特雷维斯发表在法国同志的《共产主义评论》杂志上的声明。特雷维斯主张立即加入第三国际，但条件是不要束缚他们，不要给各个国家规定政治口号。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愿意立刻加入，但不愿因此受约束，他们要求一种“自治权”，使他们能继续象以前一样行动。意大利那位“也算社会党人”的莫迪利扬尼说得最明白。现在形式上他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但他不是我们的同志。不久前他去了一趟巴黎，他竭力劝说龙格加入第三国际，他是这么提出理由的：为什么不加入第三国际呢？要知道，这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义务的。只要每两周给执行委员会寄一张明信片就足够了。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凡是知道莫迪利扬尼及其无耻的机会主义的人，通过这些话就能把他看透。在这些来自改良主义营垒的先生们看来，加入第三国际就象住旅馆一样。我们过去 15 个月来的短暂而意义重大的经历向每一个严肃的政治活动家表明，那些加入了第三国际但

还要为所欲为的人在国际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我们要建设一个行动的国际。我们不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认为国际仅仅是一个“和平的工具”。不，国际在和平时期、在起义时期、在起义前后都应该成为一个斗争的工具，应该成为一个集结力量的中心，成为一个目标明确并愿意为之奋斗的那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有人常常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他们力图使工人相信，似乎第三国际是东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而西方则被撇在一边。法国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们试图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即中派）不立即单独参加第三国际，我们首先应该吸引西方所有的工人群众参加第三国际。实际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对立根本不存在，但是存在着另一种对立即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对立、共产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之间的对立。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立是胡诌出来的。我们看到，所有各国的运动都同样分为三个部分：（1）表现明显的机会主义右翼，它现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2）表现比较明显的中间派别、泥潭派、中派，它们也是资产阶级的支柱，以及（3）多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或倾向共产主义的左翼。很清楚，西方工人阶级，如英国工人阶级非常了解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它了解苏维埃政府意味着什么。每一次示威游行都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对这一点是完全明白的。早就该抛弃关于“东方”和“西方”间存在鸿沟这样的神话了，早就不该再向英国工人阶级提出只要“西方”未加入就得等一等这样的建议了。

首先，我们不会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一位匈牙利同志在谈到党的作用问题时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了。这是一个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请你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吧。匈牙利共产党曾为社会民主党人大开方便之门，一下子把他们都吸收了进来。当我们在委员会里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某些同志说，

他们觉得似乎第二国际的许多党现在会毫不踌躇地接受我们的条件，就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匈牙利党自称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名称之争。匈牙利人进行过斗争，我们不想从背后攻击他们。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有退让的弱点，同意了他们两个党的合并。他们说，要知道，一个党怎么称呼这并不重要。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很可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有一半取决于下述这一点：共产党人不幸收容了大部分老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这些先生在关键时刻却倒向了资产阶级。我们意大利党的某些朋友说，在不久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提议将自己现在称为社会党的党也改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我们不要忘记匈牙利的例子。现在的问题不是挑剔字眼，而是能否相信这些不愿同旧思想体系决裂并力图掩饰这一点的老社会党人先生。这一教训使匈牙利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付出了如此惨重的牺牲，以致他们现在懂得，你只要向改良主义伸出一只小指头，改良主义马上就会抓住你整只手，然后抓住你的脑袋，于是叫你彻底完蛋。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有明确路线的共产国际。我们应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而应该是依靠尽可能集中的组织和明确的策略，经过许多次战斗争取来的。对于那些想用明信片来敷衍我们的先生，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还未进来之前就关上大门。

实际上，现在的危险是，第二国际可耻地破产之后，第三国际变得时髦了。第二国际成了一个臭气冲天的泥潭，成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自然，第二国际的某些部分就分离出来，企图在第三国际中继续干自己过去的勾当，“只不过使用的是稍微不同一些的语言”。他们中许多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坚决同它作斗争。我今天收到7月15日《自由报》上题为《关于国际的问题》的一篇文章。《自由报》认为，如果我们坚持1920年2月5日由我签署的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信^①中的立场，那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我十分明确，十分郑重地声明（但愿代表大会的意见也是如此）：总的来说，我们现在仍然坚持2月5日信中所提出的条件，并且我决然地说，我们拒绝同右翼领袖如龙格、考茨基和希法亭等进行任何合作。法国人对我们说：龙格现在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现在同意我们的观点，那当然更好；如果他能真诚地严肃地接受这些观点，我们当然对他表示欢迎。对那些可能愿意改变自己观点的德国同志，我要讲的也是这一些。但是我们要十分郑重地声明，我们不会同右翼及其领袖一道工作。我想以俄国代表团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我们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会上我们作出了下列决议：如果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或其他同志要求同这些右翼分子结成联盟，那么我们党宁愿完全孤立，也决不同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那些人联合。我是代表我们党作的这个声明。

现在我尽量具体地探讨一下那些愿意加入第三国际并正在努力争取加入的政党的情况以及已经加入国际的政党的情况。我想分别谈谈每个国家的情况。我先从至今还未加入我们行列、但现在愿意参加的那些政党谈起。我收集了有关法国党的大量材料。我不可能向你们叙述全部材料，只能谈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应当预先告诉你们，我们根本不打算对以前的观点吹毛求疵。毫无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国际的决议于1920年2月5日发表的《致德国全体工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这封信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第1382页至第1392页。——编者注

疑问,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后来又后悔。我们要谈的只是原则的东西,并且只限于主要方面。

先谈谈加香,关于他个人的忠诚,那是毋庸置疑的,所有了解他过去的人都知道,他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诚实的战士。我手头有一篇他在1920年1月7日写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文章^①。早在一月份他就称威尔逊先生是当代“最后一位伟大的资产者”。接着他还声称,“美国的民主”作了一切努力以防止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自然是明显的社会和平主义思想。而社会和平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已故领袖饶勒斯的精神,遗憾的是他也只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一点,虽然大家都尊重他的伟大贡献。他的传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里保存了下来。这种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现象,甚至许多共产党人都不能逃脱它的影响。例如,拿上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来说,瑞士的一位左派同志弗里茨·普拉廷带来了他在议会中一次发言的铅印速记记录。他在发言中声称,威尔逊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愿意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战争问题。总之,甚至我们那些自称共产党人的同志们,有时仍然还经不住这种社会和平主义的诱惑,因为领袖们几十年来宣扬的就是这一套。我们同它作斗争又很不够。应该彻底埋葬社会和平主义了,应该十分明确地对我们的法国同志说,接受加入第三国际的正式条件要比甩掉社会和平主义容易得多。社会和平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瓦解斗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和平主义者可以接受几千个条件,但仍然成不了共产党人,不能加入第三国际。所以应该开诚布公地声明,他们愿不愿意同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

^① 指加香1920年1月7日在《人道报》第5738号上发表的文章《一年以后》。

——编者注

其次，我还应当谈谈有关法国同志的一点情况。这是弗罗萨尔1920年2月13日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第三国际的文章^①。弗罗萨尔在文章中说，至于说到我党的政策，那么，在参加第三国际后很有可能仍然不变；即将开始大选，第三国际无论如何不能妨碍我们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

总之，你们看到了，这还是同样的观点：第三国际是一所上好的旅馆，各国代表在这里高唱《国际歌》，互相吹捧一番，然后各奔前程，继续干自己的老一套。我们决不允许第二国际这种可诅咒的实践重演。

我还可以援引许多别的能说明法国同志实际情况的材料。但是，我只援引上述这一些。正如加香和弗罗萨尔向我解释的那样，《人道报》发表指导性文章是有一定比例的：每星期发表中派的文章八篇，左派的四篇，而列诺得尔之流的文章两篇或三篇。你们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这就好象下面这种混合剂：八滴蒸馏水、三滴毒液，然后，是四滴牛奶作为解毒药。（掌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可能这是由于法国运动的历史形成的，但是应该铲除的正是这种旧传统。弗罗萨尔在离开巴黎前声明说，我不想同列诺得尔一起去莫斯科；我们将同俄国同志进行一场困难的谈判；最好他还是留在国内。而在这封信里弗罗萨尔把列诺得尔称为“我们的朋友”。这种法国派头应当收起来了。当然，它并不完全是法国派头。莫迪利扬尼对塞拉蒂、塞拉蒂对普拉姆波利尼也这么称呼：“我的朋友”。这种法国和意大利的方式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方式。我希望你们责成执行委员会要求每个政党每月进行汇报，而且汇报要象镜子一样，把发生的一切反映得清清楚楚。

^① 指弗罗萨尔发表在1920年2月13日《人道报》第5775号上的文章《在莫斯科怎么样？》。——编者注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独立党人。

我只想摘引几段独立社会民主党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交给我们的该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正式答复中的几段话。首先是这样责难我们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应该把真心诚意地对待每一个同它谈判的外国革命工人组织看作是自己的职责，然而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竟然把下述论点作为答复的根据，他们说：‘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他们的右翼领袖比起来情绪完全不同’，这一句话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复信中”。

不错，这句话确实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我们的整个原则声明中。在目前相对平静时期，独立社会民主党有将近一万名党员被关在狱中，我要向这些同志致敬。我认为，他们是严肃的战士，是严肃的工作人员。我们应该设法接近这些工人。但是这同我说的存在一个以考茨基、希法亭、施特勒贝尔为首的右翼并不矛盾。克里斯平曾同希法亭一起在琉森呆过，他不想退出第二国际。右翼是存在的。

有人对我们说，现在谁还听考茨基的呢？谁也不听。我的回答是，这样说不正确。考茨基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领袖口头上宣布与考茨基脱离关系，实际上推行的却是考茨基政策的翻版。我们能够做的一切就是注意到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有一批工人，他们进行着严肃的斗争，他们反对那些暗中破坏革命斗争、至今为资产阶级卖命效劳的右翼领袖。有人对我们说：“德国没有右翼领袖”。有人对我们说：“执行委员会将领袖分成右翼和左翼是不真诚的。”我们对其他国家中那些正同资产阶级作真正斗争的兄弟们必须非常真诚。但是，对考茨基、希法亭、施特勒贝尔真诚，无异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这样的真诚我

们是不赞成的。在善于同英国军官进行友善谈判的希法亭和我们之间有着一道鸿沟。贯穿我们全信的红线正是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工人们和破坏斗争的领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写道：“指责我们采取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协约国方针’的根据是什么，这对我们真是个谜。这种指责迄今大部分来自右派政党。去年正当我们开展反对民族主义煽动和军国主义阴谋、争取签订和约的斗争时，我们听到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对我们的指责，说我们是‘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代理人’。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这就象当年俄国共产党人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是由严峻的现实所决定的一样，而这一立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招来了对他们的指责，说俄国共产党人同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结成了联盟”。

当俄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前夜时，形势是明朗的。我国工人群众掌握了政权。它在挨饿，但在继续进行斗争。德国帝国主义掐住了我们的喉咙，而德国工人阶级当时还很弱，无法立刻给我们援助。我们对自己说：为了获得某种喘息时机（这个词当时刚刚流行），暂时我们需要同这些强盗签订和约，赢得时间。而1918—1919年德国的形势怎样呢？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或者说掌握在谢德曼之流手中，这是一回事，德国情况的发展同俄国的不一样。谢德曼这只狡猾的狐狸说：我不负任何责任，我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他正是用这种最狡猾的方式欺骗了德国英勇的工人阶级。竟把事情说成了这样，似乎谢德曼反对凡尔赛和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出面了，它开始竭尽全力帮助谢德曼；它声嘶力竭地高叫：必须签订和约！现在你们却说，德国当时的情况同俄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的情况一样。你们在德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小小的差别：在我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已被战胜，而在德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工人被战胜并被无数次出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小小”的失误呢？这是因为在1919年3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右翼领袖都认为，谢德曼和我差别不大。（掌声）要知道，这是同一个工人阶级的两个部分，要知道这是老的社会民主党。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弥漫着这种不自觉的情绪，才会提出极端错误的主张，才会混淆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状况是政权属于工人阶级，另一种状况是政权属于资产阶级，而兴登堡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蹂躏和镇压工人阶级。人们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同你们之间观点上没有特别的分歧。考茨基在我们党内没有多大的影响。”难道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现在交给我们的这封信中表现出来的不就是考茨基精神吗？

“关于恐怖手段问题和国内战争问题同专政问题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特形式被当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原则。因此，形式压倒了内容，给革命进程造成了困难，因为对由于社会条件不同而需要采取另一种革命形式的那些情况注意不够。在讨论暴力问题时，必须记住，暴力和恐怖手段之间是有区别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任何专政甚至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政一样，一定要运用暴力，那么运用暴力的程度毕竟取决于反革命反抗的程度。而作为政治手段的恐怖主义就是制造恐惧气氛，就是运用国家暴力手段来迫害无辜者，其目的是用恐吓的方法来压制各种反抗的念头。针对这一点，必须说，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反对采取这种恐怖手段不仅是从人道、正义出发，而且是从这种手段是否适当这一考虑出发的。如果说暴力不过是任何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暴力不可能在旧社会腹中的新社会尚未成熟之前促使其诞生，那么应当说（历史也千百次地证明这一点），恐怖手段不是运动有力量的表现，相反，是运动内在软弱性的表现。因此，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经验的教导，反对颂扬恐怖手段，遵循这些原则并不象执行委员会的复信所责备我们的那

样,就是意味着‘腐蚀工人的革命觉悟’。相反,这意味着维护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利益”。

这些话是在柏林一月起义之后写的,是在这场起义使我们失去了工人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一切之后写的,是在我们了解了俄国、芬兰、格鲁吉亚、匈牙利等国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之后写的!写出这些话来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本能,而不是出于革命者的良心!我觉得,应该说这是“为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利益”。这一声明完完全全站在考茨基主义的立场上。既然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次会上说,考茨基再也没有任何影响了,那么为什么这封复信又一次抄袭了考茨基写的那些庸俗、愚蠢的言词,那些反革命的垃圾呢?

当我们在莫斯科这个大会上问独立党的左派代表,他们是否在这封信上签过名时,他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回答说,事情来得“非常快”,他们来不及加以考虑。这根本不是政治理由。坏就坏在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对这样的问题决定得“非常快”。精力充沛的多伊米希本来应当一把推开僵尸考茨基和他的全部反革命垃圾,可是我们却看到,僵尸考茨基怎样揪住活人多伊米希的头发往水里拖,把他淹没了。

以上谈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其次,不管某一政党是否已经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某一政党已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就不批评它。我们有责任进行批评,有责任把实际情况说出来。

因此,我下面首先要谈谈意大利党。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现在仍然强调说,意大利党是退出第二国际的优秀政党之一。意大利工人阶级是英勇的工人阶级,它对待革命、对待共产主义的严肃态度博得了我们大家的热爱。但是,对于其领袖我们却不能这样说。塞拉蒂同志会对我们说:“又要提屠拉梯了,这已经令人乏味了。”

是的，塞拉蒂同志，只要屠拉梯这类人仍然算我们队伍里的人，我们就要反复说这些话。要知道，屠拉梯现在是第三国际的成员，因为他是意大利党的党员。难道这不是耻辱吗？要是我们发给第三国际的每个成员党证，那么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也会拿到一张第三国际的党证。而这些人却在意大利进行反革命宣传！前几天屠拉梯在议会里作了长篇演说，这种演说他一生中已经作过不止一次了。屠拉梯是这样说的：“资产者先生们，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你们同工人阶级一样处境困难吗？我们将互相帮助。在土地问题上，在住房问题上，在粮食问题上我愿意向你们提出一个彻底的半资产阶级的纲领”。《前进报》没有报道意大利资产阶级是如何接受这一建议的。此后，意大利党追究了屠拉梯的司法责任。谁会认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党是一个严肃的党呢？意大利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完全用不着对那些三十年来始终持同一观点的人提出起诉，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

我这儿有一大堆意大利人文章的摘录，可能有 200 至 300 段。我不能全部读给你们听。我们将出版一本有关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情况的红皮书。塞拉蒂同志会从我这里拿到这本书的。这些鲜花般的摘抄文字将会芳香扑鼻，使塞拉蒂同志心满意足。屠拉梯对他为什么仍然留在党里这一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因为这样我可以影响工人阶级”。屠拉梯一点也不隐讳。他公开声称，他继续留在党里，是因为他这个改良主义者可以挂着社会党人、党员的招牌在议会里、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议论。在党内他干自己的事情来得更方便。他为什么要退党呢？我们奉劝我们的朋友们注意屠拉梯自己说的话。不能让这些先生继续留在我们党内、暗中破坏我们的斗争。我们这里公开的敌人太多了，党内不能再留下暗藏的敌人。

博姆巴奇代表党在全国化工工会代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后，

屠拉梯首先发言，他说了许多改良主义胡话。意大利共产党人博姆巴奇的发言相当温和。我要问：为什么允许屠拉梯在工会会议上发言，允许他在工人中散布改良主义言论呢？而博姆巴奇对这些言论的批评却是如此温和呢？只要屠拉梯仍是党员，博姆巴奇当然就不能说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根本不应该让这些先生能以我们的名义向普通的工会会员们宣传改良主义观点。

现在来谈谈瑞典党。遗憾的是同我们一起参加建立第三国际的霍格伦等同志没能出席会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当把实际情况都讲出来。瑞典左派至今没有把自己的党称为共产党。现在清楚了，这不是偶然的。瑞典同志们出版了一份理论机关报，名叫《齐美尔瓦尔德报》。他们没有超出齐美尔瓦尔德的立场。这份机关报刊登了德国右翼独立党人的文章。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同病相怜。最重要的是，瑞典左派政党内仍然有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参加会议。至于林德加根我就不去说他了，尽管他仍是党员。1920年3月12日他公开提议瑞典加入国际联盟；他卖力地研究，为国际联盟章程提出了五处修改意见。

尽管党在一篇文章中宣布不同意他的观点，然而林德加根仍留在党内，因此，从形式上说他还是第三国际的成员。

瑞典党的一名代表埃恩别尔格在一篇提出社会和平主义的裁军要求的文章中说，现在可以（就是说征得政府同意后）完全撤销军事部了。接着他表示希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兰亭在这个问题上将给他以最广泛的支持。还有一个瑞典的著名议员或者说领导同志伊瓦尔·韦恩涅尔斯特罗姆发表了同布兰亭一样腔调的言论。布兰亭说：“看起来，左派社会民主党想同我们结合”。霍格伦反对这一点，他说，至少他本人根本不想同布兰亭这个老头子结合。但是左派党的报刊却声称，存在着将这类结合提出讨论的条件。

我们应当承认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对第三国际的贡献。这是从青年运动中产生的为时不长的运动。我们知道，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参加了这一运动。但是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要的是共产党，共产党不会去讨论同布兰亭结合的问题，而且要把裁减军备的问题甩到一边去；我们的使命不是修改国际联盟的章程，而是埋葬国际联盟。

丹麦左派的纲领草案说：党认为军国主义的消灭增加了进行不流血革命的可能性。是的，如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被消灭了，我们进行不流血革命的可能性当然是更大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资产阶级和我们自己都不流血的话，怎么能消灭军国主义。

现在谈谈挪威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对党内的右翼持容忍态度。舍弗洛在委员会里声称：我们一部分党员是反社会党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他们把整个整个的工会都吸收入党了。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同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工会里建立共产党党团，但是，把整个整个的工会（其中10%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吸收入党，这是错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挪威党注意这一点。

现在谈谈南斯拉夫党。它现在叫作共产党。但是我们以前在我们南斯拉夫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上读到过大量改良主义文章。确实，党反对这些文章。但是，不能也不应该容忍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提请我们南斯拉夫党注意，不能允许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不能允许我们的报刊等为他们效劳。在其他所有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政党。

可能其他党会有人对我们俄国人提出警告。如果我们犯了错误，第三国际的每一个党当然都有权指出我党的错误。这是每个党的国际义务。我们应当把共产国际看作是一个在各国有自己分

部的统一的国际政党；共产国际的每个分部都有权“干涉”和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这里有真正共产主义的、构成共产国际核心的共产党。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这里还有许多党在为改良主义者提供机会，让他们欺骗工人阶级，窃取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一部分信任。很清楚，作为参议院议员的特雷维斯每天都在窃取群众对我们的一部分信任，而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同志”则在洗劫博姆巴奇和塞拉蒂。现在有许多大的老党，想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中有一部分工人拥护我们，赞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一部分工人则还犹豫不决。我们不想提议立刻吸收法国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而是提议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检查他们是否履行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报刊，过一段时间再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法国同志在委员会里对我们声明说，总的说来他们同意我们的条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声明也是这个意思。从我们这方面说，要尽一切可能促进这一接近。最重要的是：认真仔细地研究发表的文章；以代表大会名义正式授予我们全权，以便在一段时间内监督这些条件的执行情况。可以接受18000条条件，但仍然是个考茨基主义者。问题在于行动。我们提出这些条件，是为了有个标准，为了有可能对代表大会所想达到的目标进行客观的检查。无论如何，我希望代表大会要明确态度，并给我们能够遵循的观点，以便使每个工人都明白第三国际想做些什么。我可以满怀信心地断言：不管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我们的态度如何，不管法国社会党的领袖怎样为所欲为，反正各国工人的心都向着我们。他们将越来越拥护我们，因为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丧钟已经敲响。为社会主义进行真正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

全体工人或迟或早都会懂得这一点。他们一定会越过他们动摇不定的领袖们的脑袋向我们伸过手来，革命工人阶级的战斗组

织一定会建立起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34年俄文版第162—178页。

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9月1日)

同志们！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说明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这次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目的和任务的。

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想法是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一部分代表到了莫斯科，他们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起以一些国家的名义向你们，向东方各民族人民发出呼吁，建议在巴库召开一次我们今天能够荣幸参加的大会。

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有欧美 37 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也有几个东方代表参加了那次大会。但今天我们却把整个东方劳动人民的代表都召集到一起来了，我们认为，巴库代表大会将作为最近在莫斯科结束的共产国际二大的补充，将作为大会工作的后半部分而载入为解放而斗争的史册。

今天共产国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东方 20 多个民族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我们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在过去，他们一直生活在相互仇视的状态中，彼此互不了解，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迫切问题。

我们把这次代表大会看成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它表明，现在不仅欧美的先进工人和劳动人民在觉醒，而且我们终于看到了东方各族人民——不是个别几个人，而是千百万东方劳动者——觉醒的日子，这些人民构成了整个地球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他们才能最终解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

同志们，正如你们知道的，今天的大会是由共产国际，由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但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不只是共产党人，还有几百名不属于共产党的代表，他们把自己看成无党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属于其他政党的组织。

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确实，参加今天这个大会的不只是共产党人，还包括一些不属于共产党的人，而且这部分人也许还占多数；共产党组织怎么能召开这样非严格的党的代表大会呢？

但是这个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愿望、精神、理想和努力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把东方各族人民召集到一起来的时候，没有问每位代表：“你现在是否属于共产国际，是否属于共产党？”我们没有问：“你属于什么党？”我们只是问：“你是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人？你是否属于劳动群众？你是否希望结束各族人民之间的冲突？你是否要组织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这就足够了。用不着再问什么了，不会向你们要党证。让我们走到一起来讨论今天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问题。

同志们，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和正在日益壮大的第三国际之间的冲突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党与党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关系到属于某个政党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它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是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冲突。过去在俄国也有很多无知、愚昧和受尽摧残的农民，而现在他们却十分注意政治生活；今天在俄国已经没有一个村庄的农民不知道世界上有个第三国际，不知道它正在为把劳动者从富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斗争。而我们相信，在东方这样的时刻也会很快到来，那时，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大都市或一个大的居民点的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农民不知道有个第三国际，不知道它正在为解放东方各族人民而斗争。同志们，这是因为现在生活已经尖锐地提出了劳动的解放问题，生活正在迫使每一个农民都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你要知道第二国际是个什么组织，那么你们看看格鲁吉亚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的一个化身。在格鲁吉亚，政权由属于第二国际的孟什维克政府掌握。目前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就是第二国际的重要代表。现在格鲁吉亚的每一个农民从自己的艰难经历中都知道，属于第二国际的政党掌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农民得不到土地。它意味着对于资产阶级才有出版自由，而对于工人和农民根本就没有这种自由。它意味着工人群众最优秀的领袖被逮捕。它意味着政权属于象看家狗一样保护着富人统治的那帮家伙。它意味着格鲁吉亚由那些准备随时把无产阶级的血肉放在英帝国主义盘子上的人统治着。（掌声。）它意味着格鲁吉亚由那些人统治，这些人准备随时跪在任何一位他们认为是有势力的英国、法国或意大利将军面前。它意味着政权掌握在那些人手中，这些人在他们认为沙皇将军邓尼金将要得势，而苏维埃政权将要在俄国灭亡的时候就准备向邓尼金暗中献媚。在德国，第二国际最显赫的代表就是杀害了几千德国工人的刽子手诺斯克。在格鲁吉亚，第二国际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诺依·饶尔丹尼亚先生和他的同伙，他们也是准备剥农民皮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热烈的掌声。）

当然，饶尔丹尼亚的政策总是以“格鲁吉亚”的独立和捍卫这个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名义奉献给格鲁吉亚的农民的。但是同志们，尽管格格奇柯利先生和其他一些先生们象夜莺一样唱着“格鲁吉亚的独立”，但对农民来说，土地还不是象以前那样仍然是旧地主的财产？原来的压迫还不是照样存在？英国将军还不是照样用他们的皮靴踩着格鲁吉亚农民和工人的喉咙和胸膛？

同志们，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冲突所在。这不是那种书生秀才之间的冲突，它是关系到工人和农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使在第二国际最兴盛的时期，它也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

“文明的”欧洲能够而且必须保护“野蛮的”亚洲。

早在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就表示赞成所谓“进步的”殖民政策。口头上，社会民主党人宣称这一政策是富有人性的、人道的、温和的和文明的殖民政策。但事实上，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支持资本家的强盗殖民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给殖民地带来了梅毒、鸦片和一个腐败的官僚阶层，正是这种政策把这些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马厩，正是这种政策在到处残酷地掠夺他们。

早在1907年，第二国际就宣称要帮助白皮肤的资产阶级压迫黑皮肤和黄皮肤的各族人民，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已经彻底堕落的第二国际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不久，它象一座纸房子一样很快就倒塌了。

共产国际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宣布，在亚洲居住着8亿人，这个数字是欧洲人口的四倍，而且还宣布我们要把所有的人，把世界上所有的劳动人民解放出来，而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不管他们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

我们要消灭各种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和社会党人不同，我们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反对那些帮助资产阶级的人，也反对那些不愿意承担帮助被压迫人民任务的人。为了反对资本家，反对这个世界压迫者，我们赞成把黑人和其他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所有人组织起来，赞成把所有劳动人民和所有受尽苦难、受尽折磨的人组织起来。

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宣誓并以37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名义发表宣言的原因。

在这个宣言中，我们向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发出呼吁，我们写道：“社会党人是这样的一伙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巩固一个国家的特权地位而牺牲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他们迁就殖民奴隶制

度；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制造种族和肤色之间的差别；他们帮助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而不是援助殖民地的起义——比如英国的社会党人就不去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援助爱尔兰、埃及和印度反对伦敦财阀统治的斗争，这些‘社会党人’即使不枪毙的话，也应该给他们打上耻辱的印记，他们根本就不配接受无产阶级的重托和信任。”

这就是我们的宣言，这就是我们在欧美工人面前发出的庄严誓言，而今天我们要在巴库，向聚集在这里的整个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庄严地重复这一誓言。

我们将誓死反对那些忘掉——那怕只是片刻忘掉——自己对被压迫民族、对正在受资本剥削和掠夺的那些国家的劳动群众的责任的人。

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共产国际愿意和东方各族人民、和所有被压迫群众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我想，同志们，你们也愿意这种联盟，肯定不会不愿意这种联盟。欧洲无产阶级现在看到，历史发展的进程将会把东方劳动人民同欧洲工人团结起来。他们能够一起胜利，或者一起灭亡。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在每一阶段都可以看到，当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时，它是怎样用有色人组成的军队反对欧洲工人的。资产阶级把黑人军队开进德国，也开进其他国家。

意大利资产阶级现在正在威胁着意大利工人，如果他们要起义的话，意大利资本就动用黑人军队来反对他们。今天欧洲工人正以痛苦的经历学会懂得在他们受到第二国际欺骗时所不懂的东西。工人们正在懂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和整个东方、整个世界的劳动群众结成一个紧密的联盟。但是现在必须使整个东方千百万群众也懂得这一点。你们回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向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农妇，向每一个牧民，向每一个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向每

一个愿意听你们的话的人说明，没有彼此互相支援，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现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同整个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以便能够一起打败和最后摧毁我们至今仍很强大的、可怕的敌人。

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唤醒千百万农民，向他们说明，必须更深地耕耘，必须发动新生的农民阶层；向他们说明，除非和世界上已经组织起来的全体工人阶级结成兄弟般的友好联盟，别无他路；还要向他们说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面临的就只能是灾难。一旦有了这个联盟，那么劳动的彻底胜利，对世界掠夺者和压迫者——压迫了你们上百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彻底胜利就有了保证。

同志们，第三国际在它最早的一些声明中就指出，今天世界已经分成强权民族和弱小民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

第二国际不愿意谈论这一点。它只能泛泛地谈论平等，不去确切地说明具体情况。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又一次指出，世界分成了强权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同志们，早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就有机会指出过这一点。在我们的一本书中（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读一读我的《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一书），我们说明——而且是用数字来证明我们的论点——在战争以前，世界是这样划分的：有 4.37 亿人口的所谓六大强国，它们压迫着拥有 12.2 亿人口的其他民族和国家。这就是直到战争结束时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你们知道，现在一些所谓列强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地位。现在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列强，几个掠夺者。根据列宁同志在我们代表大会上的计算，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这四大强盗的人口加起来只有 2.5 亿，但它们却压迫着附属国的 12.5 亿人民。在我上面提到的书中，我计算出，在英国有 5 % 的英国人是大宗财产的所有者，这 100 人

中的5个人不仅压迫着其他英国人，而且还压迫着890个其他国家的人，比如印度人、波斯人、中国人等等。每一个英国资本家都能够强迫近100个英国工人和几百个生活在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中的劳动者为他的利益劳动。战争以前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这次东方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考虑这一事实，并向每一个劳动者说明这一事实。请记住这一点，即每一个英国大资本家不仅强迫几十、几百个英国工人，而且还强迫几百、几千个波斯、土耳其、印度和很多从属于英国资本的国家的农民为他劳动。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这15亿被压迫人民首先必须团结起来，到那时，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你们服从这些英国资本家强盗了。在这场艰苦但又必要的斗争中，全世界工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向你们呼吁，向你们伸出了友好援助的手。我们完全相信，当欧美工人向你们伸出这只手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热情地抓住它，并报以友好的握手。（掌声。）

我们知道，东方劳动群众现在有些地方还很落后，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很落后：不识字、没有知识，他们迷信，信奉神灵，他们不会读报，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懂最起码的卫生常识。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才会因此而嘲笑他们。不幸的土耳其和波斯的劳动者是文盲，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坐在巴黎和伦敦的“文明的”资产阶级想出了各种办法，使印度农民、波斯和土耳其劳动者永远处于无知的境地。

比较文明、比较有知识和比较有组织的欧美工人阶级的任务是帮助落后的东方劳动者。不是嘲笑他们，不是摆架子，不是炫耀自己比落后的东方农民高贵，而是要关心他们的无知和落后，要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以自己唯一能够做到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这种方式就是，教会他们掌握武器，把武器对准那些坐在伦敦和巴黎公司和银行里的衣冠楚楚的白色野兽，帮助东方农民自己占有土地，帮

助他们把俄国农民经过艰苦努力开始的那场伟大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中，东方的僧侣和封建地主懂得怎样对农民要花招，他们搬弄出一些虚无缥缈的幻想，使农民认为他已经得到了土地，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了控制落后、无知的农民，他们设下合法的圈套。我们必须揭露这一骗局，唤醒东方农民象那些半个世纪以前还是农奴，而且至今有很大部分还是文盲的俄国农民一样去进行土地革命。不久以前还是农奴的俄国农民能办到的事，为什么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亚美尼亚等国家的农民就不能办到？我们相信，在西方有组织的工人的英明领导下，整个东方亿万农民会站起来，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土地革命，以便清除大土地所有者赖以生存的土壤，根除各种债务劳役、苛捐杂税以及富人玩弄的各种花招，把土地交给劳动群众。这就是共产国际希望带给你们的一切。

无产阶级想要帮助你们夺取土地，创立一个世界各民族的自由联盟。这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纲领，它写在欧洲每一个正直工人的心中，而现在必定会写在你们这些东方劳动者代表的心中。

同志们，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远东国家能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你们知道，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一个国家必须首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产生出大工厂和大宗财产所有者；工人必须集中在城市里，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现在我们认为并不是如此。从俄国——尽管只是一个国家——挣脱了资本主义链条时起，从工人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起，我们就可以说，在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和亚美尼亚，直接开始为争取苏维埃制度而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欧洲工人掌握政权当然不是为了掠夺土耳其、波斯和其他国家，而是帮助这些国家。既然如此，这些国家现在就能够而且也必须准备进行一场苏

维埃革命，能够而且也必须准备在它们的境内消灭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以便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同全世界组织起来的工人结成紧密的联盟。

现在我们向你们提一个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问题，即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方组织？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就是即使在那些没有城市工人的地方，也必须建立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劳动农民的苏维埃国家。不是象现在有些人在土耳其硬塞给你们的那种苏维埃，而是真正的苏维埃，即每个劳动农民都有选举权的苏维埃。我在《红色达格斯坦》杂志上看到，在达格斯坦，现在他们正在制定苏维埃选举法，而且还看到选举农民苏维埃的权利给了正直的拥有不超过一定数量的牲口的劳动农民。我不能决定这个数目是否恰当，但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不管是谁，只要他占有的大牲畜或其他生产资料超出经营和维持他一家生活所必需的数目，而且以别人的血汗养肥自己，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他坚决排除出农民苏维埃之外。这必须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是由那些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不谋暴利、不搞投机倒把、关心公共利益的人组成的苏维埃。我们必须组织真正能够表达劳动群众意愿的苏维埃。

我们不仅要向那些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发出呼吁，而且也要向无党派的人民群众发出呼吁。我们现在有两股潮流。一股是很快、很猛烈和很强大的潮流，它就是俄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人无产者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潮流，这股潮流正在向四处扩展。但还有另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现在还不甚强大，有些地方还在走着曲折的道路，这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运动，这些民族还没有选定它们要走的道路，还不知道确切的要求，但它们感到，有一条皮鞭正在抽打它们的脊梁，感到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正骑在它们的脖子上。

我们希望把这两股潮流汇集到一起，使第二股潮流清除民族

偏见，使它们汇成一股猛烈的、强大的潮流，使它象大海一样冲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冲垮使我们长期蒙受灾难的一切邪恶的土壤。

因此我宣布：我们将耐心地支持那些现在还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反对我们的组织。比如在土耳其，同志们，你们知道，苏维埃政府支持基马尔。但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基马尔领导的运动不是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知道这一点。我手头有几张油印的安卡拉土耳其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基马尔自己说：“哈里发和苏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基马尔领导的运动是要从敌人手中解救哈里发的“神圣的”人身，这是它那个党的观点。它是共产主义的观点吗？不是，它不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我们知道如何重新教育群众。这要求做长时间的工作。我们要谨慎地对待东方和其他国家劳动群众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有责任向这次代表大会指出：基马尔政府现在在土耳其的所作所为是支持苏丹的政权，你们不应该做这种事，即使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不应该做这种事。你们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我们认为，苏丹的末日快到了，你们不应该容忍独裁制度。你们应该抛弃和打破对苏丹的信仰，建立真正的苏维埃。俄国农民过去也相信沙皇，但当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爆发时，对沙皇的这种信任也就荡然无存了。当一场真正的农民革命在土耳其、在东方爆发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景。到那时，人民将很快丢掉对苏丹和对他们的主人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再说一遍，目前的土耳其人民政府正在奉行的政策不是共产国际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但同时，我们说，我们准备支援反对英国政府的任何革命斗争。今天，在土耳其，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富人，但用不了多久，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土耳其，在波斯，在东方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农民，他

们正在开始懂得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什么。

最近，我问一位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土耳其知名人士，土耳其农民如何理解“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这位杰出的知名人士回答说：“在我们国家，人们一般把‘布尔什维克’理解为一个要反对英国而且要帮助我们反对英国的人。”我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么在土耳其一般的农民是否想到，布尔什维克不仅反对英国，而且还反对一切富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富人和土耳其的富人？”这位知名人士没有回答，但他认为，一般的农民不懂这个问题。但我有理由认为他们懂得这个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用翻译，既不用翻成波斯语，也不用翻成其他语。（掌声。）我相信，劳动群众不仅在反对英国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富人的斗争中是需要这个词的。是的，我们正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国，“正在掐住英国帝国主义的喉咙，让它屈膝投降。”我们必须给英国资本主义以最有力的、致命的打击。确实如此。但同时，我们必须教育东方劳动群众去恨那些富人，恨那些俄国、犹太、德国和法国的富人，并且要同他们作斗争。将在东方开始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是要求那些英国帝国主义绅士们把他们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然后让土耳其的富人心安理得地把脚翘到桌子上。不，我们要求所有的富人——那怕是非常客气地要求——把他们的臭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不是让那些骄奢淫逸、欺骗人民、愚弄百姓和游手好闲的人来统治我们，而是让那些手上长满老茧的劳动者来统治这个世界。（暴风雨般的掌声。）

因此，我可以向今天在座的非共产党代表坦率而坚决地说，泛伊斯兰主义、木沙瓦特主义^①，所有这些思想都不是我们的思想。

^① 指 1912—1920 年阿塞拜疆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穆斯林民主党木沙瓦特的主张。——译者注

我们有不同的政策。我们可以支持一种民主主义政策，比如目前在土耳其已经形成、而且也许今后还会在其他国家出现的政策。我们现在支持将来也支持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国的民族运动，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私利，而是因为一个觉悟工人会对自己说：今天还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土耳其人明天就会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支持这个土耳其人，必须帮助他，等待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在土耳其出现。到那时，对苏丹的崇拜和其他一些残余思想就会立即从他头脑中完全消失。这位先进工人说，作为一个老大哥，我必须把这场运动推向前进。这位共产主义工人说，我将支持土耳其人目前的这场民族民主运动，同时，我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就是号召土耳其、波斯和整个东方受蹂躏、受压迫的劳动农民去憎恨一切富人和一切剥削者、把我们需要一切人的真正经济平等和一切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之间的真正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简单道理告诉他们。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坦率的声明。我认为，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以外交官的姿态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讲话。东方各民族有几亿人口，他们受到的压迫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深重，而且归根到底，整个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他们，我们现在已经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来了，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把一切虚伪的外交辞令抛置一边。同志们，当东方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将成为这一巨大舞台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只有当生活在亚洲的八亿人民和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只有在非洲大陆和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只有在我们看到亿万人民加入我们的运动的时候，一场真正的革命才算展开。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上，任何人都不用以外交辞令来掩饰，都不用吞吞吐吐。大家都掏出自己心里的话，使彼此都能够听到各自的心声和真理，使我们能够选定通向胜利的道路。我们对你们无可隐瞒，我们坦率地告诉你们，我

们和当前民族运动的代表在哪些问题上是不一致的，在哪些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告诉你们：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东方摆脱英帝国主义。但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任务，这也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就是帮助东方劳动人民反对富人，在此时此地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向他们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他们进行一场争取真正自由、争取把人类从各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劳动革命作好准备。

同志们，我坦率地告诉了你们我们对这些困难问题的一些想法和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我认为这一事实本身使我们和那些同我们有意见分歧的人更接近了，因为坦率地说，达成一些明确的协议总比暗地里怀恨在心而相互接近要强得多。

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发动一场反对英法资本家真正圣战的任务。同志们，请想一想，在这个时刻，在这里的北方，这些强盗正在干些什么。我不是指在这里参加大会的那些民族。你们自己知道英法资本在土耳其造成的状况，英国资本在波斯造成的状况，还有亚美尼亚的状况，昨天所有协约国政府还说要保护亚美尼亚，而现在却没有一个国家来保护它。

我想对那些只有少数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国家，象印度和中国，多说几句。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英国资本大肆掠夺的印度生活着好几亿人。你们也许已经听说过那里最近的情况。最近，在印度又发生了一起枪杀事件，一些印度人仅仅因为一次轻微的反抗就遭到了枪杀，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戴尔事件^①。一群手无寸铁的人被骗

^① 即1919年4月发生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城的英国当局屠杀印度居民事件，史称阿姆利则事件。由于下令开枪的英国军官叫戴尔，所以季诺维也夫把这一事件称为戴尔事件。——译者注

到机关枪的射程之内，然后被打死。

当国会对此事进行调查时，伦敦出版的报纸不得不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配有一些照片，这些报道和照片表明，在秩序恢复时，拿枪的英国士兵强迫一些印度人在城市街道上爬，这时英国人是多么得意忘形。这就是那些文明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大学毕业的儿子们惯用的方法。他们派他们的军官拿枪口顶着印度人的耳朵，逼着他在地上爬，英国军官好以此取乐。

一家意大利报纸的记者从中国也发回一些同样的照片，照片的标题为：《华南的早晨》。

同志们，在任何一家外国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照片，它们向我们描述了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同志们，不要忘记，英国资本家这些白皮肤的畜生，不仅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压迫印度人，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把数以万计的印度人招进军队，派他们去镇压无产阶级的运动。目前在英国将军的指挥棒下，印度人至少在七条战线上打仗。印度士兵正在君士坦丁堡战场，在阿拉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波斯东北部和波斯西北部打仗。同志们，从这里你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可怕处境：他们掐住印度人的脖子，逼着他们在地下爬，为一个英国军官取乐，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受压迫的印度农民兄弟又很愚昧，同样一个英国人竟能把印度人招进自己的军队，然后从地主土豪中挑出几百名军官来指挥他们，派他们去镇压埃及或波斯的民族革命运动。同志们，我们所处的地位多么可怕啊！我们正在用自己的手帮助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帮助英法资本家。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我们一定要最终合上这本记载着不幸的过去的书，使它再也翻不回来；我们还要掀开历史的新的一页，到那时，东方被压迫民族再也不当奴隶了。再也不能允许英国军官无耻地掠夺印度人和

波斯人了，再也不能允许他们杀害、侮辱和嘲笑任何人了。

同志们！近几年来，很多人都在谈论“圣战”。资本家在进行他们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时就企图把这场屠杀说成是一场圣战，并且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在1914—1918年，他们说的那场“圣战”是一个大骗局。但是现在，同志们，你们在东方各民族大会上第一次聚集起来了，你们在这里必须宣告进行一场反对英法资本家强盗的真正的圣战。现在我们应当说，全世界的工人唤起千百万农民，组成东方的红军，在英国人的后方拿起武器，组织起义，反对那些强盗，彻底消灭一切在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作威作福的蛮横的英国军官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同志们！兄弟们！你们组织一场反对强盗和压迫者的真正圣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今天共产国际向东方各族人民呼吁，并向他们说：“兄弟们，我们呼吁你们进行一场首先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圣战！”（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高呼“乌拉”。一些代表站了起来，挥舞着武器。发言者很久不能继续讲话。所有的代表都站起来鼓掌。高呼“我们誓死进行圣战！”）

让伦敦、巴黎和所有仍由资本家掌握政权的城市都听到今天的这一宣告。让他们听听东方亿万劳动群众的代表发出的庄严誓言：英国压迫者对东方的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帝国主义对东方劳动群众的压迫就要结束了！

东方各民族和共产国际的兄弟联盟万岁！让资本灭亡，劳动的统治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77年
组帕克出版公司英文版第23—37页，并根据
1920年俄文版校订。

孟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

(1920年10月)

同志们!

讨论清楚地表明，独立党右翼领袖们加入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绝不是因为我们通过的不是18条，而是21条，而是因为缺乏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即这些右翼领袖实际上缺乏严肃地对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这个先决条件不具备，因此，而且仅仅因此我们不可能达成协议。独立社会党右翼领袖们不愿意加入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也不愿意在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些右翼领袖。

共产国际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在这里进行一场纲领性的，即原则性的讨论。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使右翼领袖们不是在细小的组织问题上躲避过去，而是对一些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极重要问题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朋友们、独立社会党左派同志们的目的，而我们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党代会的右派昨天欢欣鼓舞地欢迎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纲领性发言。

马尔托夫的发言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苏维埃政府的起诉书，另一部分是对正如马尔托夫所说的“群众对社会主义立即胜利的天真的迷信”的谴责，也就是对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谴责。第一部分是投掷的炸弹，我下面再来说这一部分。我先说一说更为重要的第二部分。马

* 本文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德国党哈雷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原编者注

尔托夫在发言的这一部分中主要谈到的也就是独立社会党右翼代表鲁道夫·希法亭在反对我的发言中谈到的东西。

当我们责备右翼领袖们说，他们不善于同群众一道前进，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时，鲁道夫·希法亭把这叫做“在激进主义上进行卑鄙的竞争”。我们应当怎么办才能领导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样一个大问题，在希法亭这位右翼领袖看来，竟然只是在激进主义上进行的渺小竞争。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证明希法亭也和马尔托夫一样，根本不懂得群众的斗争，他们和工人群众不是息息相通，他们不仅不走在群众的前面，而试图把他们拉向后退。

马尔托夫在自己的发言中多次谈到这种“群众的天真的迷信”。他认为运动的最大不幸就在于工人群众目前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正如他所说的群众“狂热化了”并抱着社会主义可以立即实现的希望。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怎么可以抱怨群众中存在着这种信仰呢？我认为，我们决不应当抱怨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对此感到遗憾，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高兴。

实际上，所谓无产阶级群众的天真的迷信正是世界历史的极重要革命因素。没有这种所谓的天真的迷信，没有这种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狂热，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所谓的群众的狂热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灵魂，这是世界革命的极重要动力。我们决不应当对这种现象感到遗憾，而应当加以欢迎。马尔托夫和希法亭怎能不这样考虑这一点呢？假如群众不是精神振奋地起来斗争，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不是坚信胜利、满怀信心，那么历史性的世界变革怎能到来，我们怎能使无产阶级取得对全世界的胜利呢？

同志们，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指出已故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不止一次地向德国无产阶级群众所讲的话。你们这些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们想必都记得，奥古斯特·倍倍尔何以对德国和全

世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来说如此亲切，是什么东西使他在德国和全世界广大工人群众中赢得如此亲切的感情呢？正是他对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热情的、“狂热的”信仰，正象马尔托夫现在所说的那种热情的“迷信”，即相信资产阶级的日子已经不长，工人群众必将战胜资产阶级。

同志们！大家记得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年迈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一次党代会上无比激动地说：“我深信，我们在座的诸位还能活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大家记得，倍倍尔的这些话一直使德国党内的优秀无产阶级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同志们，而倍倍尔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几年说这些话的。后来战争爆发了，可怕的经济危机爆发了，正如这位倍倍尔常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快到了。而现在，当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已经来临，共产主义热情的电流真正通过群众的时候，象马尔托夫和希法亭这样的领袖倒想来给狂热的无产阶级群众泼冷水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群众的迷信狂热无非是一种反动现象！

马尔托夫和希法亭是怎样设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呢？莫非他们真的以为，只要这些善良的、德高年劬的领袖在党代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写一些厚厚的书，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著作，或者在某个国会里投投票，那么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不，同志们，这只有改良主义者，只有象马尔托夫和希法亭那样一些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内心感受、不懂得无产阶级群众的深刻感情的人才会这样说。不，我们决不能因为群众对社会主义很快胜利抱着“狂热”的信仰而感到遗憾，相反，我们应当加以欢迎。我们应当加以发扬，我们应当站在前面领导这些所谓狂热化了的群众。因为，同志们，在这种信念中根本没有天真的东西，没有迷信的东西；相反，那些认为不要无产阶级群众的极大热情就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才是天真的人；那些认为不经过内战就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才

是天真的人。那些认为可以用社会和平主义的手段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才是天真的和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那些认为可以用爱尔福特纲领中的所谓久经考验的旧策略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才是天真的和具有资产阶级宗教迷信的人。马尔托夫和希法亭，以及各国的右翼领袖们指责群众说：你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过分狂热地相信了！是的，同志们，我以为无产阶级群众有更大的权利反过来指责这些改良主义者和右翼领袖说：听着，领袖们，为什么你们对我们神圣事业的胜利，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对我们的专政，对我们的迅速和最终的胜利如此缺乏信心，缺乏狂热的信念呢？

右翼领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我曾试图在我的第一次发言中加以证明。而同志们，马尔托夫和希法亭的全部发言不就是我的这一说法的绝妙证明吗？马尔托夫和希法亭的发言不是证明他们确实缺乏这种信念吗？

同志们，在英国，一个很有意思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可以把这个团体看作是古典式的改良主义领袖。这就是费边社。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也同样嘲笑所谓群众的宗教狂热，希望缓慢地和不知不觉地前进，而实际上象虾一样后退。这些费边派是些很有教养的人，他们毕竟相信革命可能过五十年总会到来；他们是典型的**迟疑不决**的人。他们希望群众也不要那么迅速地前进。同志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逗留伦敦期间曾经仔细地研究了英国的这个改良主义派。

我不能肯定说，所有右翼独立党人都是费边派。当然，我同意在这些右翼独立党人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一些比较革命的分
子。但是，以考茨基为首的理论家们现在十分接近于费边派。社会和平主义，这也就是费边主义。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摘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述中的一段话吧！1892年12月31日^①，恩格斯从

伦敦写信给左尔格说：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作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它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要主张阶级斗争。”^①

同志们，这是恩格斯说的话。我不想把恩格斯关于费边派所说的话都加诸于现代改良主义者。在改良主义者中间，对于有些人或许不能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来如此无情地加以评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和确切地分析一下某些右翼领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视态度，那么我们毕竟应当说：害怕革命依然是目前许多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的指导原则。

是的，同志们，请问在马尔托夫的发言中，除了这一点以外，除了极其害怕未来的伟大的、在某些方面残酷的、但毕竟使人类得到解放的革命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在希法亭的发言中不也就是这种害怕吗？

同志们，这里还有一点。不仅有些学者，有些知识分子把害怕革命奉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有一小部分工人也把这种害怕奉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工人贵族，即人数不多、但在政治上极端重要的那部分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他们称为工人贵族，

① 应为1893年1月18日。——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9页。

目前他们在我们的解放运动中正在成为反动因素。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我们争论中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即工会问题。同志们，在我们争论最激烈的两天中，当我们在发言中涉及到所谓工会国际的问题时，我们之所以“万分激动”不是偶然的。目前，这对整个运动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已经指出，无论是克里斯平，无论是迪特曼在莫斯科都没有谈到我们对这个国际的攻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旧的改良主义的工会是工人贵族的庇护所，茹奥辈、列金辈、阿普尔顿辈、乌捷赫斯特辈和赛米尔·龚帕斯辈则是工人贵族的思想家。不言而喻，这个工人贵族把害怕革命奉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一切明智的资产阶级领袖都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尽力支持工人运动的贵族分子，因此他们也把这些旧的改良主义工会看作是自己的堡垒和支柱。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再一次重复说一遍我们在共产国际已经说过一百遍的话：我们不是说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所有组织都是黄色组织。决不是这样！我们清楚地知道，参加这个国际的几十万和几百万工人决不是黄色工人，而是真正的工人和无产者，他们只是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要退出工会组织，而要留在那里，在那里不断地进行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进行反对改良主义的经常性宣传，并通过这种办法使工会组织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贵族改良主义的陷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这样做。

同志们，但是你们应当注意，工人贵族的领袖们已经开始在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工会组织。英国的工党实际上是个工会组织，它通过决定不接纳共产党员加入该党。在德国，则出现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工会组织的倾向，理由是：他们打算在工会组织内建立共产党支部。就让人们试一试把我们开除吧！改良主义者将会因此

折断自己的脖子的。假如列金及其同伙，或者茹奥及其同伙由于我们建立共产党支部而把我们开除，那么我们总归还是要建立的，即使非法也要建立，以便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反对茹奥和列金，而工会组织的会员群众，即马尔托夫所说的染上了宗教狂热和天真迷信的群众迟早会属于我们。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工会领域内的作用也象布鲁塞尔或日内瓦的第二国际在政治领域内的作用一模一样。阿姆斯特丹国际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或许采取的办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对它采取的办法应当象对第二国际在政治方面采取的办法一样。我们在政治上已经使基本工人群众摆脱了改良主义，同样我们也将要在工会方面这样做。假如你们在德国打算认真地和彻底地支持阿姆斯特丹国际，那么事情就会弄到成立某种工党的地步，即成立模棱两可、半政治、半工作、半议会、半经济的改良主义组织的地步，它所实行的将是工人贵族的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政策。目前在德国，在工会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搏斗。我们满怀信心地注视着这些决定性的战斗。战斗的结局将不是工人运动的分裂，而是工会运动的协调，是工会运动摆脱改良主义和工人贵族的思想。

现在请允许我对在这里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所说的话进行一下答辩。

右翼独立党人在其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中说，他们今后仍将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但同时他们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这里对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一切指责。同志们，你们有充分权利充当孟什维克。不过你们也就不应当否认这一点，你们应当公开地表示这一点。当你们哪怕是简单扼要地了解一下什么是俄国的孟什维主义时，你们就能理解马尔托夫提出的指责是什么货色了。请允许我简单扼要地向你们介绍一下孟什维主义发展的过程吧！

同志们,早在1905年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就背叛了革命。早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时期,他们就同自由资产阶级,即所谓的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人阶级。

接着反动时期来到了。那时,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背叛就更严重了,他们提出取消我们非法的党。他们公然要求我们成为改良主义的政党。

随后战争爆发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国孟什维克的基本核心(马尔托夫当时侨居国外)都赞成帝国主义战争,都支持沙皇政府进行这场战争,并试图使俄国工人阶级染上最庸俗的沙文主义。

随后爆发了俄国的三月革命。改良主义立即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孟什维克要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同德国的谢德曼和诺斯克完全一样。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德国战线上准备了著名的六月攻势,使我们付出了几万俄国工农生命的代价。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地主和银行家(如捷烈申柯部长)一起成立了所谓的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一起迫害我们的报纸,查封了《真理报》,并驱散我们的组织。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孟什维克的联合政府对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暴行。孟什维克的部长们,如策烈铁里等人对联合政府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所作所为负有责任。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解除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武装。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孟什维克政府企图把列宁、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我和其他同志打成德国威廉二世君主政府的间谍和代理人,唆使群众来反对我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同志被捕了。孟什维克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后,很大一部分孟什维克,即所谓活跃派,手执武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马伊斯基成了萨马拉反革命政府的成员:他是这个政府里的劳动部长。这样,孟什

维克也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分子叛乱期间成立的萨马拉反革命政府，等等。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发展的简单过程，它和德国谢德曼党的发展过程一模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过时。马尔托夫可能在哈雷右翼独立党人中间还有威信，但是马尔托夫不可能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会议上享有威信，这是因为俄国工人清楚地知道，孟什维克总的说来在俄国的所作所为也象谢德曼和诺斯克在德国的所作所为一样，是的，我们对孟什维克曾进行了通缉。但是，如果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已被消灭，这决不是仅仅由于通缉。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布尔什维主义曾遭到大力的迫害，但是未能把它根除。相反，迫害越烈，布尔什维主义则越强大。孟什维克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俄国的工人们了解并仇恨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政策。

现在你们就会懂得马尔托夫的指责了，他的党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已不存在，因此他如此狂热地攻击我们。马尔托夫忘记告诉你们，他毕竟得到了参加你们党代表大会的护照，尽管我国政府清楚地知道他在这里会说些什么。我们不怕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指责；就让波兰资产阶级的报纸刊登马尔托夫所说的关于我们的坏话吧！就让全世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报纸刊登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指责吧！工人们懂得，他们相信这些指责的程度，不多不少，就象德国革命工人相信谢德曼向他们提出的指责一样。

马尔托夫硬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讨论俄国和波兰的战争问题。这是不确实的，正如他说的其他许多东西都不确实一样。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工人发出的呼吁书正是关于俄国和波兰的战争问题，诚然，这个呼吁书在代表大会上没有特别进行讨论，那只是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很明显这场战争是俄国工人反对波兰资本家的防御战争，而全世界工人应当支持苏俄。

马尔托夫以及希法亭、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硬说，我们共产党人喜欢新的战争，喜欢让德国无产阶级卷入战争。我再一次地声明：这是不对的，这是上述演说家们毫无根据的说法。但是，同志们，今天我从巴黎接到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10月9日的报纸《社会主义生活》。那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加入第三国际就等于准备新的战争。”这是什么人说的呢？是列诺得尔先生、谢德曼先生的法国兄弟说的。这就有点意思了。

右翼独立党人说，他们今后仍将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但与此同时，昨天《自由报》刊登了一篇呼吁书，题目是：《新的暴君，救救亚美尼亚社会党人》。亚美尼亚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呢？这就是一些谢德曼分子，也就是同达申斯基领导下的波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模一样的人。亚美尼亚社会党人叛徒们写道（我逐字逐句地加以引用）：“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将把上述事实通知社会党国际局。”

同志们，所谓社会党国际局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第二国际的国际局。亚美尼亚社会爱国主义者加入了第二国际。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们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因为他们是诺斯克分子，因为他们也同波兰的达申斯基一模一样。据说他们将支持苏维埃政府，但同时又在显要的地位发表这篇反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呼吁书。对于对苏维埃政府的这种“支持”我们只能表示拒绝。所谓亚美尼亚的民主派，所谓亚美尼亚的工人党无非是协约国的工具而已。《自由报》现在试图支持协约国的这些工具。《自由报》昨天在《摊开着的牌》一文中写道：“在我们对激起东方被奴役各族人民起来同英法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的解释中，我认为既要很好理解亚洲各族人民的心理状态，也要很好理解苏维埃政策的实际需要，后者需要伊斯兰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来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自由报》上的话。同志们，现在要问：

真的只是苏维埃政府需要伊斯兰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吗？难道德国工人阶级，难道全世界工人阶级就不需要伊斯兰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来反对协约国、反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吗？同志们，总之，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自由报》究竟打算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苏维埃政府。我们不要这种支持，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自由报》刊登向第二国际发出的呼吁书，那么这只能说明，《自由报》已经开始成为第二国际的机关报，成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机关报。对此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世界上已经有成百上千家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报纸，就让柏林再增添一家名叫《自由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报纸吧，或许它不会永远操在改良派的手中。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关于条件”的问题。希法亭代表右派提交的书面声明 100 次地证明，对于右翼领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条件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工会等等的纲领性问题。在右翼独立党人公开依附孟什维主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来争论个别一些问题了。

希法亭在自己的发言中引证了已故的罗莎·卢森堡在 1904 年说的话，即 16 年前，当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差别还不甚明显时说的话。这样的引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希法亭有更大权利来引证托洛茨基早在 1916 年时反对我们的话。是的，曾经有个时候情况还不是那么明朗：孟什维主义就是改良主义，而许多革命者对孟什维主义的性质还看不清楚。现在，在革命时期，成百上千的优秀孟什维克分子逐渐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无论如何，当人们提到我们的领袖和导师罗莎·卢森堡时，我现在有可能来纠正希法亭所说的话。有一个罗莎·卢森堡的文献，不是 1904 年而是 1916 年即危机已经明朗和第二国际已经垮台的时候的文献。这个文献叫《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指导原则》，是作为尤尼乌斯小册子的附录刊载的，并出自罗莎·卢森堡的手笔。我们可以读

到这样的话：

“3. 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重心在国际。国际在和平时期应解决各国支部的策略问题，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贸易政策和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以及战争时期的一切策略问题。

4. 执行国际的决定的义务应优先于其他一切组织义务。违背国际的决定而进行活动的各国支部也就自外于国际。”

同志们，这里说得很清楚，很明确。罗莎·卢森堡不是反对二十一条的，她象我们一样是拥护二十一条的。

代表大会的右派们说得不对，根据第十七条条款，左派同志们应当转向斯巴达克联盟。这不对。这既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意见，也不符合斯巴达克联盟的意见。我们认为，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兄弟般地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转向一边。请右翼独立党的领袖们放心，这种兄弟般的联合终将克服任何障碍、避免争吵和纷争而同志般地实现。

二十一条的意义就在于此。党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证明，二十一条已经很好地达到了原来提出的目的。它有助于我们区别莠草和麦子，有助于我们统一真正的共产党人。当我们摆脱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摆脱半资产阶级的贵族时，当我们只留下自己人时，我们也就容易达成协议：二十一条中哪一点根据实践经验应当进行修改。但是现在我们还应团结一致地坚持共产国际的一切原理和国际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所制定的二十一条。而现在正是彻底决裂的时候，同时也将是（不管愿意与否）德国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一边联合起来，而一切共产党人在另一边联合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断言，既然在右派如此匆忙地召集起来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当四十五家报纸还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把一般性的讨论也转到组织范围内来并企图曲解二十一条时，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党内的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竟然占了极大多数，那么这就充分证明，绝大

多数工人、独立党党员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在德国正在形成巨大的统一的共产党，这是当前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我要再一次高呼：

新的统一的共产党、德国统一共产党、共产国际的统一的支部万岁！

同志们，朋友们，兄弟们！欢迎你们加入共产国际！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5期
第3061—3072页。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

(1921年6月25日)

同志们！我们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两年多了。但是执委会作为真正国际性的机构实际上只工作了一年，即从第二次代表大会才开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参加领导机关的只有一批俄国同志。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整整一年要求各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执委会的工作很不容易。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想必记得，德国党和其他党的代表们反对参加执委会的代表在莫斯科任命并留下来一直在这里工作。他们希望领导工作还象过去一样由俄国同志来担任。只是在我们强烈反对并断然坚持我们的要求而代表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之后，至少有10个兄弟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执委会。我们毕竟还应当说，在这一年当中，不是所有党都履行了自己对共产国际所承担的义务。有些党只是部分地履行了义务，因此建立的联系还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执委会本身也很不满意执委会的工作。我们要求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建立由国际无产阶级代表组成的真正的执委会，建立能够研究当前问题并实行统一政治领导的真正国际性的执委会。我们必须公开地和全面地讨论执委会的工作。执委会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也犯过错误，因此，我们要十分关心这场讨论并了解各个党的意见。

在组织方面——对此我们要立即说明——工作做得是不够

的，有时甚至是糟糕的。不过，同志们，我想我们可以满意地确认，不管怎样，我们毕竟在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国际性的领导机关。大家记得，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首先不是一个政治领导机关，其次它也不是履行日常具体工作的机关。它3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常常是为了摆摆排场。我们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领导中心也不是完全国际性的，只是在这一年过程中（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一点），我们才有了至少可以说由10到12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试图从国际的立场出发来领导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机构的萌芽。假如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国际今后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假如我们大家都不怕承担任何损失，准备把最优秀的力量贡献给共同的工作，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和强有力的国际领导机关。

我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比章程规定的早了一些时候。我们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意识到在目前这个时候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执委会所承担的巨大责任，目前，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许多国家里，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认为，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乃是决定性的力量。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每当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执委会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尽量经常地诉诸代表大会，以便通过我们的各项决议。由于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极其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尽可能迅速地来召开世界代表大会，以便让代表大会本身来寻求解决这些迫切问题的办法。

首先，我要引证一些有关我们执委会工作的数字材料。自从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到现在还不满11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执委会开了31次会议，讨论了196个问题。其中128个是纯政治性质的问题，其余则是组织性质的问题。我们同德国的联系要算是最好的，那里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性质。在这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德国问题曾有 21 次提到了执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意大利有 12 次，美国有 12 次，英国有 9 次，罗马尼亚有 12 次，捷克斯洛伐克有 10 次，法国有 7 次，保加利亚有 7 次，远东和近东有 10 次。其次是其他一些国家，提到执委会会议事日程上的各有 2 次、3 次到 4 次。

我还应当指出，除了执委会以外，大家几乎都知道，还成立了执行局，目前它是由 7 位同志组成的，它所召开的会议要比执委会本身大约多 1 倍。在这一年当中，各个国家的许多同志来访问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象去年那样有所抱怨。到俄国来旅行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许多党也都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这一年来我们工作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这个政治工作是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规定的。总的说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说过，实际上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成立大会，因为我们称为成立大会的那次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极少数团体的会议。因此，第二次代表大会才真正是成立大会。它要制定共产国际的章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政党作用的主要决议，它还极其一般地、粗略地确定了共产国际的策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行动路线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我们不得不为反对我们的同志，即同认为自己是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英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进行斗争。例如，关于英国同志加入工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两天。我们的英国同志几乎一致地反对加入，认为这样做是机会主义。我们的美国同志，已故的里德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他们。我们则表示反对。我们认为，正是在英国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发展得很迅速而共产党的影响增长得很缓慢的国家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参加每一个联合着成千上万无产者的群众性组织，必须在这些组织

中建立组织、成立支部，以此来争取其中的影响。因此，我们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所有我们的年轻的共产党发出明确指示：参加象工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在那里建立组织；你们应当在工会内部反对工会官僚，反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策。你们应当扩大对这些组织的共产主义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还不得不同议会制问题上的左翼进行斗争。大家记得，博尔迪加同志（现在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整个共产国际，他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伍中最忠诚的革命家之一）和他的同伴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向我们宣战，进行反对议会制的原则性斗争。当时，瑞士和比利时的许多同志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共产党人无权拒绝革命的议会制。我们的观点还是跟决定我们在参加工党或工会问题上的态度一样。

这是代表大会给共产党的指示之一。第二个指示表现在著名的第二十一条上。这个指示对于我们这个时期的工作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针对机会主义的，针对中派和半中派分子的。当时，站在我们的左翼的不是敌人，而是具有某种宗派情绪的、很不懂得革命的具体的前提条件的朋友，而站在我们右翼的却有许许多多敌人。大家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欧洲和美洲的总的形势是：加入共产国际被认为是一种时髦。每一个比较猾头的中派分子都希望加入。希尔奎特党的代表团从美国来到我们这里。这个党的方针大致接近于德国的右翼独立社会党或谢德曼党的纲领。这个代表团对我们不很热情的接待感到惊讶。大家记得，现在非正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要求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国际。大家还记得，目前扮演无产阶级斗争的公开破坏者的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包括达拉贡纳在内，在这里曾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加入第三国际。另一方面，情况很不清楚，联系也很

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在俄国由于封锁而同全世界隔绝，消息很不灵通。我们曾经非常天真，以致在开始时把象达拉贡纳这样的先生也兄弟般地接纳了。当时，成千上万彼得堡的优秀无产者几乎是抬着这些先生们在该市革命的街道上行进，对此我是要负部分责任的，当我回想起这个情景，我至今还感到内疚。我们曾以为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忠实的朋友。

然而，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情况大致弄清楚了。正如大家知道的，代表大会激烈反对了右翼分子。站在我们的右翼的确实是一些敌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狡猾的人会囫圇吞下一切，只要能钻进共产国际并从内部来破坏它就行。二十一条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代表大会的这些指示规定了我们的活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德国形成了这样的形势：属于共产国际的只有斯巴达克联盟这个具有光荣历史、但还不是群众性政党的组织。此外，还有独立社会党及其左翼。我们从代表大会接受的任务是：使优秀的、真正共产主义的力量从独立社会党分化出来，并把他们与斯巴达克联盟联合起来。

在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上，我们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

同志们！目前，经过一年工作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问一下自己：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究竟谁是正确的，是我们的左派朋友还是我们的右派敌人？就拿英国共产党人参加工党的问题来说吧。大家知道，这个党根据韩德逊和麦克唐纳的建议决定不接纳我们的同志。我认为，这最好地证明，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担心参加工党会丧失共产主义纯洁性的英国同志。机会主义者立即感觉到这种危险性，他们立即发现，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党内部建立组织并从内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那么这对机会主义者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塞拉蒂（我们还要多次谈到

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左派一边。他说,参加工党是不行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请看共产国际的不一贯性吧:在意大利,它要求开除屠拉梯,而在英国则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工党。”不过,塞拉蒂并不是黄口小儿,他是不会不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的。他是有意地试图把意大利工人陷入迷途。我认为,我们英国朋友们现在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他们,而是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曾说:不仅不退出工党,相反要参加进去,以便在内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并从内部羞辱那些叛徒领袖。(掌声。)

在关于议会制的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夸耀这一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应当承认的。在各种分裂的情况下,暴露出在议会党团中有一些动摇不定的、极端温和的和毫不中用的分子。这表现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表现在这一年来发生分裂的所有国家。

还有一点。如果你们问我:这一年来,二十一条中哪一条遵守得最差?那么我不得不回答说:就是要求议会党团无条件地服从全党并执行真正革命议会制的那一条。不过,同志们,我认为,尽管这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多成就,但是我们每个人毕竟都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是正确的。不管怎样,我们在这方面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在许多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已取得初步成就,我们将争取使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进一步开展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工作。

同志们!那么执行委员会从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接受了什么遗产,接受了哪些任务呢?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在共产主义还比较软弱但工人运动广泛开展和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的那些国家里使英国和美国的同志们接近群众;就在于,不让这些同志袖手旁观,而要使他们不致成为宗派,并积极参加这个群众运动。

第二项任务是:在加入第三国际被认为是时髦的地方,执行委

员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揭露中派分子的狡猾手腕，以便使那些还跟随我们的优秀分子脱离他们的营垒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是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就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做的工作，而今天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在目前条件下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

按年代顺序来说，情况是这样：德国独立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去年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极重要阶段；但是，从政治上看，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与其说是德国问题，不如说是意大利问题，因为它是同我们今年遇到的最大困难联系着的，而它也是共产国际内部某种危机的最初征兆。因此我想详细地来谈一谈意大利问题。

我已说过，当意大利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联系还没有建立，以致我们不知道来的是些改良主义者。我们以充分信任的态度对待塞拉蒂和他带来的人。我们曾认为，虽然对这些人的思想还不完全清楚，但他们毕竟完全忠诚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然而后来我们大大失望了。

恰恰在这些日子里（很遗憾时间晚了许多），用德文出版了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我希望技术部门现在能工作得更好些，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能不晚于一个多月以后出版。德国同志们至少可以读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读过这些记录并了解塞拉蒂和意大利同志的立场的人应当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指望塞拉蒂是我们的人呢？记录上附有一张表格，表明每个发言的人发表了几次讲话。塞拉蒂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发表了四次讲话：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关于二十一条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大家可以看到，这四个问题是共产国际章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塞拉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发表声明，归纳起来不是投票反对就是干脆弃权。同时，他还有一个讲十分钟笑话的习惯，但实质上他的全部

见解都是反对代表大会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切看作是由于误会造成的，并尽一切努力使他转到我们方面来。以后事态发展的进程证明我们的推测是错误的。我们不得不就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出版一部专集，主要收集了塞拉蒂本人的文章、声明和决议。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不过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以便使他们到这里来。三个半月以前，我们向他们发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书，请他们及时地前来参加。在第一批意大利代表两个星期前到达莫斯科以后，又向他们发了邀请的电报，然而，党员们至今还没有来到，虽然从6月1日，即原定代表大会的正式开幕日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星期了，从其他国家也已经来了将近一千名代表。这说明意大利同志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来讨论意大利问题^①。

塞拉蒂回国后在《前进报》刊载的第一篇文章无非是企图损害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声誉。我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证一下，因此我预先请同志们表现出点耐心来。我个人认为意大利问题是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一年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请看，塞拉蒂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说了些什么：

(1)“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下列情况下召开的：大多数代表来到俄国时，二十一条在那些国家里还不得而知，因此他们的代表权力只具有一般的和个人的性质。”

塞拉蒂的第一句话是他的第一个谎言。接着他又说：

(2)“各种问题没有得到各党的事先讨论，因此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为代表们所完全不知道。”

^① 应当指出，意大利同志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以后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
——原编者注

我应当告诉大家，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相比较，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前者的筹备工作要比后者的筹备工作仔细得多。提纲是在几个星期的过程中拟定的，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同独立社会党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来讨论。

第二句话是第二个谎言。

(3)“代表大会远离无产阶级运动的各国，联络的困难，持续的封锁，几乎完全缺乏工人和报刊的监督，工人们本来有权参加讨论，报刊可以立即将讨论情况公布于众——所有这一切使会议具有秘密会议的性质，失去了同外界的任何联系。”

这是塞拉蒂在代表大会以后过了几天写的，是在他同意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写的。缺乏工人的监督，缺乏报刊的监督，一句话这是密谋！

(4)“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彼此很不了解(这倒是真的：真正的塞拉蒂至少是为我们太不了解了)，很少知道关于相应的运动，关于某个代表所代表的力量，关于他们对国际政策所具有的影响等情况。”

当然，塞拉蒂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5)“代表大会开会时受到其保护的伟大革命政府的战斗力(难道这一点也使塞拉蒂不满意吗?)处于同反动派的斗争中，而共产党的政府不得不象现在一样对国际资本实行防御性的进攻政策。”

这里开始露出了塞拉蒂的卑鄙暗示。

“……这个政策有助于苏维埃共和国，无疑也给予整个无产阶级以巨大帮助，但同时可能并不符合处于本国革命刚刚开始成熟的紧要关头的国家的策略要求。”

我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塞拉蒂的

这第五点，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要比目前正借赫尔曼·哥尔特之笔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派更有先见之明。

(6)“在代表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而且是任何一次国际会议上所未见的。这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过程中所以产生各种困难和动摇的重要原因。”

谁能理解这番话呢！我个人对“极不协调”这个术语用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代表的关系是极不理解的。我认为，他想说的也就是希法亭在嘲笑“希瓦国的教士”时说的话。这是些什么共产党人啊！

(7)“给一些国家的席位的分配不是根据不同政党实际的道义作用和政治作用，而是根据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的各该国家的作用。例如，法国得到的席位同意大利一样，虽然法国代表只是党的或党团的极少数派的代表。”

请看，塞拉蒂为了诬蔑第二次代表大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8)“代表大会驻地的遥远、联络的困难对宣传它的决议是重大的障碍，其程度之严重要比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期更甚。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有些党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两个月还没有接到有关大会的材料，而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最后文本是在闭幕后一个多月才公布的……”等等。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塞拉蒂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即1920年9月，就竭尽一切可能甚至超出他的可能来贬低代表大会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心目中的意义，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代表大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国际性的。遗憾的是，我们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并且继续指望，塞拉蒂是拥护共产国际的人。意大利的情况是，塞拉蒂不得不“输牌时装出笑脸”。例如，关于二十一条他曾声明而且不得不声明，他是赞成二十一条的。他在我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中说：

“我们接受以如此激烈的形式向各国社会党人提出的第二十一条，同时也提出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对于那些在战时染上民族主义狂热病并以最卑鄙的方式出卖无产阶级，而现在又以过去那种轻率态度同意服从莫斯科制定的严格纪律，以便明天很可能再出卖我们的人不应作过分的让步。在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巴维尔，以致可以把他们称为心地善良的人，而如果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人的道义经历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毕竟存在着某种政治准则来判断某些蜕变者的不道德行为，而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准则，以免在它的队伍里发生变节行为。

第二，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有权由本身负责在党内进行必要的清洗，但采取的方式务须不致给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和在莫斯科人们相信很快就会到来的革命本身带来危害……。”

塞拉蒂就是这样披着革命者的外衣，首先向右派，即对法国同志们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要求。对于他们，塞拉蒂显然是忌恨的。只是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试图在意大利工人们的眼里扮演对右派要求严厉的正统派分子的角色。首先向他们提出了第二十二条。他声称，虽然对共济会会员通过了第二十二条，但是季诺维也夫把它束之高阁，并将它取消了。塞拉蒂在意大利正是这样郑重地进行了谴责。实际上对共济会会员的态度究竟怎样呢？意大利同志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自然认为通过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但补充说，共产国际不可能把它刊印出来；显然，塞拉蒂要当着意大利工人的面把这件事解释成这样：似乎我是站在共济会会员一边，而多数人投票赞成他们。塞拉蒂提出的第二个条件表述含混不清：“进行必要的清洗，但采取的方式务须不致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后来他又采取了另一种表述，即：“进行清洗，但同时实行自治”，也就是说由每个党单独进行。

接着是将这个问题提交意大利党中央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特拉契尼的，另一个是塞拉蒂的朋友巴拉托诺的。特拉契尼同志要求无条件地接受二十一条，巴拉托诺同志也同意接受，但要由党本身来解释这些条件。在中央投票时特拉契尼获得了多数，而塞拉蒂失败了。他试图威胁同志说，他要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务，但那些人不是欢迎他辞职，而是说服他留下。我们的同志现在承认犯了错误，而我们现在不想来触动尚未痊愈的伤疤。不管怎样，他们让塞拉蒂留在编辑的岗位上，条件是他将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这是失策的。

塞拉蒂保留了对《前进报》的领导权，这是一家发行量达20万份的有影响的大报，而塞拉蒂除了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以外，随心所欲地行事。他发动了一场闻所未闻的运动来反对执行委员会，这场运动逐渐变成了卑鄙的论战。下面我要向大家指出最严重的一点。

后来在雷焦-艾米利亚召开了改良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在那里组成了“集中派”。他们集中起来了。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屠拉梯和达拉贡纳。这是些狡猾的人，他们知道，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意大利工人说：“我们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因此，他们在决议中声明：“在评价现时历史因素的观点上的分歧不能成为党内分裂的充分理由。在一个政党内同时存在几个随时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派别在过去并没有成为党的巨大发展的障碍；在将来也不可能妨碍友好的共同工作，而这个政党的某些部分越是彼此相互重视，越是抱着在每个具体问题上要求发表自由见解的共同意愿，以及他们在开展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上越是遵循最严格的纪律，那么这项共同工作就越有成效。”

这是登峰造极的改良主义的外交手腕。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是谙熟这项艺术的。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出色的部

长。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通过了以下的决议：“集中派确认党加入第三国际就等于千篇一律地解释本应根据各国条件才适用的二十一条。集中派断然声明，应将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派别以及共济会会员开除出国际的队伍。”他们重复了塞拉蒂暗示给我们的话。他们主张接受二十一条，但是要根据各国的特点。他们主张统一的党，但是他们反对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员同志称为工团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要知道，这是毫不费力的事。当然，集中派的决定也不得不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屠拉梯和达拉贡纳扮演着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角色！）并不是纲领的必要要求，而只是暂时措施，它的必要性取决于特殊条件。”

他们是狡猾的，他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专政不是永远需要的，而是暂时的。但是他们把事情看成这样，似乎专政已经是从日程上取消了的事，因此他们说：“意大利的革命，以暴力和破坏的形式，立即按照俄国的模式实行苏维埃制度（极端分子正试图这样做）——必将导致迅速来临的灾祸，如果在国内经济必然衰退的时期某个革命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积极支援的话。”

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的学说就是如此，他们不喜欢意大利有暴力的和破坏的革命，他们不喜欢立即按俄国的模式建立苏维埃制度。不过我们倒愿意按意大利的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笑声。）

这个简短的声明是同关于共济会的长篇决议联系着的。

这就是改良主义派在雷焦-埃米利亚发表的信条。如果走近仔细地看一看，那么它的面貌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采取行动，并将它开除出去。全部争论正是在于，这个派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反对按照“俄国模式”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塞拉蒂竟敢说，意大利没有改良主义者，他同意将他们开除出去，他比我们更

严厉,只是他不知道改良主义者在哪里…… 可怜的塞拉蒂,他竟然不知道,在意大利哪里有改良主义者啊!……

大家记得,当列宁同志给塞拉蒂写了一封公开信,并且不言而喻地提出了开除改良主义者的要求,塞拉蒂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意大利共产党人对列宁同志的答复》。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难道在党的队伍里能够容忍改良主义者吗?请允许我提出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谁是改良主义者呢?’如果象您信中所说的那样,改良主义者就是那些向往阶级合作,准备同资产阶级一起执掌政权,执行反革命的事业,并随时可以去见意大利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人,那么您说得对,而我跟您一样,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去。”于是,塞拉蒂企图来证明,屠拉梯、特雷维斯等人并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说:“这些人受您的政府的委托,根据您在意大利的代表之一沃多沃佐夫同志的建议,在两个月以前,代表议会党团对焦利蒂施加压力,以便争取得到某些让步。”

这就是塞拉蒂的手法。如果您跟他谈论原则性的问题,那么他就利用诸如给《每日公报》提供津贴这类谣言,等等。但是他不对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究竟他是同改良主义者一鼻孔出气的呢,还是反对他们的?

以后,塞拉蒂在10月24日《前进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又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有两条截然分明的道路:或者是合法地取得政权,或者是进行革命。取得政权,为了谁呢?又为了什么?在目前解体的形势下,移交政权的唯一后果是资产阶级将它所承担的责任推到社会主义政党身上来。”

1920年10月,塞拉蒂就是这样写的。这怎么理解呢?要知道,这也就是迪特曼和克里斯平说过的话,他们说:“即使在我们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的地方,我们也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承担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条件失常的责任。”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必

须等待，等到经济条件好转，等到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而再一次壮大起来，那时才能进行革命。在此以前，只有考茨基谈到过这一点。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提高生产率，然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否则，这就是消费性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塞拉蒂在1920年10月完全公开地站到这个观点上来了。

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一致的意见是这样：意大利要比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无产阶级革命。塞拉蒂也应当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说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党忽视了有利的形势从而给运动带来了直接的危害，那么这样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真不能设想，一个政党竟会这样错过时机。一年前，意大利工人阶级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精神振奋，组织优良；资产阶级被压倒了，军队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我们这方面。以后爆发了光辉的九月运动，那时意大利工人创造了新的斗争形式，夺取了工厂。资产阶级完全涣散了。焦利蒂本人就说过，他在9月时无能为力。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在9月时他不派军队去把工厂从侵占者手里夺回来呢，他回答说：“对此我没有力量，开始时我不得不采取顺势疗法，只有到后来才能用外科手术。”由于塞拉蒂及其走卒的间接帮助，焦利蒂先用顺势疗法镇压运动，而现在就转而采用外科手术了。法西斯分子是卓越的外科手术专家。他们出色地对意大利工人阶级进行了外科手术。

党的作用，特别是塞拉蒂的作用可以归结如下：他们没有利用这个形势，并在客观上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赢得了整整一年时间，以便完全恢复元气，组织起来并从顺势疗法转向外科手术；而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里就分裂、灭亡。

后来召开了里窝那代表大会。同志们，正如大家知道的，执行委员会曾想派我和布哈林到那里去。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意大利党，特别是塞拉蒂没有动一个手指头来使这件事成为可能。因此

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式组成代表团，派了保加利亚的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同志作为我们的代表。国际报刊上对这两位同志的出现造了许多荒唐的谣言。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塞拉蒂。这是他的手法。

有同志认为，假如卡巴克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表现得机智一些、巧妙一些，那么在里窝那事情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人们竭力试图把卡巴克契也夫同志说成是毫不收敛的独裁者。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凭空捏造。他是一位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冷静的人，决不会被激情所迷惑，那是塞拉蒂强加于他的；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保加利亚党内工作了许多年，对他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就让里窝那的同志们去说什么事情都是从外部安排的吧！代表大会简直成了马戏团。当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发言时，掀起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响起了呼喊声：“爷老子万岁！”，然后放出一群鸽子，出现了闻所未闻的沙文主义场面。以后人们就说，一切罪过都是卡巴克契也夫同志。

在上述9月和10月的表现以后，大厅里再没有怀疑的人了。这里说的不是卡巴克契也夫同志的发言，而是党蜕化成为（至少是它的领导集团）一般的社会民主党了。这就是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情景。这是倒退，是在一系列情况的压力下领袖们变成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我要说，右翼独立党人在哈雷的表现——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我应当承认这一点）——也比塞拉蒂及其同伙要体面得多。

后来代表大会召开了。塞拉蒂和他那一派发表了一个决议。他们建议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并表示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但是他们保留行动的自由。分裂是谈不上的。屠拉梯是唯一发表了原则性的演说并受到热烈欢迎的人。他确实也是党的真正的精神

领袖。他完全公开地声称，他反对暴力，一切都应通过和平途径来安排。总之，人们想把分裂的一切责任推到执行委员会身上。不过难道他有别的选择吗？这是共产国际同改良主义分子的第一次冲突。这是第一次较量。假如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么目前（我可以完全公开地说）共产国际就不再存在或者说没有任何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就等于是共产国际向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屈膝，共产国际就不再存在，或者说可能存在并在自己的队伍里拥有一些大党，但是从道义上说它就是灭亡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较量，而我们坚持认为，共产国际可以自豪地说：“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没有动摇；它可以坚定而明确地说：如果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大部分意大利工人，那么就让它这样吧；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的。但是不能后退，一步也不能后退，因为否则共产国际就会灭亡。”问题涉及到共产国际的纯洁性，涉及到共产主义的原则。使我们非常难过的是某些领导集团，例如某些德国同志，尽管他们拥有十分巨大的功绩，但是在这个时刻没有站到明确的立场上来。

不过，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总的说来已经立即明白了：我们实际上也在丢掉巨大的幻想，我们应当彻底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

后来塞拉蒂又唱起了新的调子。起先他非常严厉，并要求不对共济会会员作出任何让步。现在事情变了。塞拉蒂发表了平等权利的理论。他要求给意大利和法国平等权利。为什么对法国同志比对意大利同志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呢？我还要回过头来谈法国党。我们的责任是对于每个党要根据该国的具体条件，根据历史和革命运动成熟程度，等等。我们不能用同样的尺码来衡量法国党、美国党、意大利党、拉脱维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国际性表现在，我们根据每个党的具体条件来看待它，从

而确定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对法国党有着特殊的关系。显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可能说：由于法国党是落后的党，那么你应当对意大利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让它延缓发展。这不是国际主义。

塞拉蒂对我们进行了卑鄙的人身攻击；例如，他在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逐字逐句地加以引用）：“如果继续争论关于阿姆斯特丹的问题是适当的话，那么 we 想问一声季诺维也夫，为什么俄国政府那么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者，然而正如欧洲众所周知的，却要付给在英国执行机会主义社会主义政策的《每日公报》以为数72000英镑的津贴呢，为什么共产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参加属于第二国际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党呢？”

同志们！上面这段引文就足以使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明白，站在共产国际面前说话的是什么人。

塞拉蒂声称，契切林和他的政府付给了《每日公报》72000英镑，依据的是劳合-乔治最初发表的和成为加米涅夫同志被逐出英国的理由的说法。塞拉蒂简直是在告密。俄国政府不得不同各种人物和各种分子进行谈判，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的。它为什么不得不同这些人进行谈判，共产国际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还很软弱。但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谈判，这个事实同是否应当将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已说过，塞拉蒂对法国人怀有特殊的怨恨。1921年1月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另外一些想法》中，他写道：“在法国，昨天还主张‘Patrie’（‘祖国’）和‘union sacrée’（‘神圣同盟’）的大多数社会党议员，今天完全转到了共产国际一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有55名议员转到了共产国际方面。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在社会党党团中有67名议员，其中12或13名转到了

共产国际方面，而其余 55 名则留在龙格那里，即塞拉蒂的朋友那里。他在欺骗意大利工人，并利用自己在《前进报》的地位来宣传虚假的消息。他说，有 55 名议员转到了我们这方面。假如事情真是这样，那就很糟糕。不过这是塞拉蒂式的可耻谎言。在对德国党的问题上，他也做了同样的事。塞拉蒂说：“德国独立党的分裂与其说是国际理论和实践的缘故，不如说是民族性质的原因。”这样说来，分裂和一半党员转向共产主义，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是由于民族的理由造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地道的沙文主义。他想要使意大利工人们相信，他们的德国同志加入共产国际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的理由，而是根据民族的理由。这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诽谤。塞拉蒂也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反对执行委员会，反对我们国际的最大的支部。就拿 1921 年 1 月 1 日他的一篇文章为例来说吧：同志们，请允许我向大家念一段：“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员，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从俄国同志中挑选出来的代表和执委会中为俄国同志所了解的代表从莫斯科派到各个国家去。这些代表是否具备为执行这类使命所必要的一切品质，是否可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纯粹是执行委员会的事。执委会就是从这种‘愚昧的主教’那里获得情报，而这些情报是或者可能是‘情报员’进行活动的那个国家的党的领袖所不知道的。对于这种情报没有任何政治监督。”

同志们！我已说过，塞拉蒂是列维的先驱。他使用了“愚昧的主教”这个外号，而列维则使用了“土耳其斯坦分子”（“塔什干分子”）。

同志们，我还可以引用更多的引文，但是第一，关于意大利问题的文集大家手头都有，第二我所引用的已经足够了。我只想给大家念一下里窝那通过的卡蒂沃里奥的决议，这项决议通过后我们的同志就退出了会场。决议说：“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

会进行了重新讨论，确认党加入第三国际并毫无保留地接受国际的斗争方式的决定。代表大会反对执委会代表发表的关于因在评价具有地方性质和偶然性质的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而开除党的声明，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友好的解释和兄弟般的协商得到解决的。代表大会在确认完全加入第三国际的同时，将冲突交给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并承担接受和服从它的决议的义务。”

同志们，表面看来，事情似乎是这样：塞拉蒂的党是在共产党人退出该党以后通过这项决议的。他的党诉诸于我们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事先声明，将服从代表大会。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以后怎么样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塞拉蒂丝毫没有服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志；他通过各种诡计，设法使党在这里没有代表。同志们，请你们，你们当中担任法国和其他国家议员的人，找出一个适当的议会术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吧！他们决定，在共产党人退出以后，他们将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们却不派代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他们是不想服从。决议通过之后，塞拉蒂公开声明说：“很可能，声明（执委会代表的声明）是在里窝那拟定的，但第三国际并没有放弃。列维在这里对我说，在德国对他也是相当不礼貌的。可以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和支持卡普-路德维茨冒险政策的党，也是作为同情党被第三国际接受的。”

《前进报》上刊登的就是这些东西。而所有这一切都正好安排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这些东西。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同志们，我们应当明白，从里窝那代表大会以来，党越来越倒退了。举几个例子：在5月11日《前进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国际声援》。文章充满了振奋人心的精神和国际主义的情感。是因为什么写的呢？原来，是因为某个组织给了工会50000

里拉。这确实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但是寄这笔钱的是什么样的组织呢？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这便引起了这篇热情的文章，其中说：

“向我们联合会表示如下声援和同情之意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联合会，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要求的问题上同我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我们的政治理想对于它的许多领导人来说也是格格不入的。假如目前要同个别人进行一场论战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在战时在对待无论我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里成为资本主义反动派的顽固拥护者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加以谴责。但是我们决不能贬低使我们深受感动的这种国际声援的意义。

不管领导阿姆斯特丹书记处的人们被称为什么，毫无疑问，集合在它的旗帜下的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是以共同利益与全世界的被压迫者联系着的；我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与它联系着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任何衷心的和诚挚的国际声援都会加速全世界工人的无产阶级联合。”

同志们！大家知道，所有庸夫俗子，所有修正主义者，所有中派分子，对莫斯科的钱总是吵吵嚷嚷，尽管俄国的胜利的工人们给予世界各国工人的援助是十分自然的事。不过，这是俄国人的钱，而现在同国际联盟有着联系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通过以托马先生为主席的劳工局寄给他们5万里拉，那么接受这些钱就不觉得害臊，为此写文章就不感到可耻了。塞拉蒂也没有觉得这样做弄脏了自己的手。他接受了这些叛徒的钱，而这些钱也不象灼热的火炭一样会烫伤他。他还在大谈国际声援。大家可以看到，死人很快会跨上鞍马。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已经死亡的这个人很快会到站的。

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意大利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主

义的评价》。这是一部资产阶级作者的作品。这本小册子要比列维的小册子发行得更广泛。全书是由塞拉蒂带到这里来和我们曾经亲切接待过的先生们的言论、作品、演说汇编而成的。而这些先生们竭力添枝加叶地来叙述实际上存在的和根本不存在的——一切，以便证明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地方，事情是多么糟糕。

同志们，我还想同你们谈几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即有关选举的事情。在保尔·列维出版的和由一些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杂志上，我读到库尔特·盖尔关于意大利选举的文章。

他说，这次选举似乎表明，塞拉蒂的党获得了140万票，而共产党只有大约40万票；这样看来，群众拥护塞拉蒂，这证明共产国际的明显失败。接着他又说，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失利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灭亡，而且是季诺维也夫的失败，是国际执委会的灭亡。

一个新的年轻的政党获得40万票，说这是失败。但是，如果谢德曼在他和他的匪帮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后仍然获得了100万票，而这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那么怎么能谈得上执委会在意大利的失败呢！

总之，工人和许多小资产者仍然投票赞成这些人。但是这里又有什么失败可言呢？我这里有4月14日《人民报》上切撒尔·亚历山德拉的文章。这是意大利的议员，按其观点来说相当接近于塞拉蒂。他谈到了选举，我在这里只向大家引用这篇文章中的数字：

“新的社会党党团是由123名议员组成的，其中3人是为了表示抗议而选出来的，这3人是在监狱里和不属于该党的。这样总共只有120名议员，其中48名属于右派，42名属于左派，30名属于中派。”

总之，塞拉蒂的朋友切撒尔·亚历山德拉说，新的党团是由120名议员组成的，其中48名属于右派，42名属于左派，30名属于

中派。同志们，你们应当想一想，当切撒尔·亚历山德拉说“右派”时，这对意大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也就等于是谢德曼-诺斯克。这里说的左派则应是拉查理、马菲等人，也就是究竟是否到这里来的那些人。拉查理在战争期间曾是象伯恩施坦那样的和平主义者，请看，左派就是这样一些人，而站在右派一边的是杜果尼先生。昨天，有人给我看一份刊登着曼图伊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报道的报纸。杜果尼在那里发表了演说，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会和合作社运动中由于最近事态造成的局势，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管它是什么人或在什么地方采取的。”（笑声。）

总之，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塞拉蒂的朋友提出一项决议案，反对任何暴力，不管它来自何方。这是完全“中立”的立场：不管暴力来自何方，是来自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它都是祸害；他的观点就是如此。

我还想给大家引一段话。在竞选期间，屠拉梯亲自起草了一份告化学工人书，这篇宣言在法国报纸《工人生活报》上转载了。屠拉梯在宣言中说：“朋友们，不要灰心丧气，不必担惊受怕！我向你们发誓，暴力不会给行使暴力的人带来任何好处，一旦风暴的最后呼啸静息下来的时候，你们仍然会比你们的敌人强大。不要受敌人的挑拨，不要给敌人以任何口实。不要对侮辱进行报复；要温良，要耐心，要圣洁。千百年来你们曾经是这样，现在你们仍要这样。要忍让。怜恤和宽容那些受屈的人们吧！你们报复得越少，你们得到的报偿越多。那些向你们使用恐怖的可耻武器的人，将会在亲手干出的勾当面前发抖的。今天战争还在继续，它还在继续自己的可耻事业，虽然它已经在垂死挣扎了。你们意大利农民们，你们就是和平和劳动，因此有人反对你们，但是胜利是属于你们的。未来是你们的。”

弗罗萨尔同志看了这篇宣言中的几段话以后，下了一个朴实

的评语：“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

的确，这是对上述言论可能做出的最朴实的评语。瞧，胜利就是通过这样的竞选宣言取得的，塞拉蒂的党在1921年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发展的。同志们，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决议。塞拉蒂的党开始在渐渐地四分五裂了。巴拉托诺要求至少将那些比别人更严重地违反党的纪律的人开除出去。塞拉蒂立即表示反对。巴拉托诺打算就此发表一篇文章。塞拉蒂不让他这样做。巴拉托诺终于在选举以后发表了一封信，信中说：“假如你塞拉蒂和你的朋友们确实相信，党必须向右转，那么你应当设法召开代表大会，并向党提出改变自己政策的建议。”塞拉蒂象往常一样又以笑话和谎言来回答，他有点怀疑巴拉托诺，并明确地说：“是的，选举的结果向我们证明，我们应当使党的方向盘向右转一下。这不是我们的发现和屠拉梯的臆造，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列宁本人也向右转了。”这样的论据你们还可以在列维的臭名昭彰的《苏维埃》杂志上看到。他在该杂志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布尔什维克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向工人和农民作让步，因为他们必须同群众保持联系。”但是要知道，我在德国也向列维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即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和农民构成了居民大多数的国家里，党为了保持专政正在向群众作出让步而且应该这样做。但是在德国，人们往往不注意这样的“小事”，在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这方面的让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塞拉蒂不是孩子，他应当懂得这一点，而且很好地懂得这一点。

同志们，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要建立空中的城堡。我们还要等待很长时间，以便使工人们真正倒向我们这一边。我们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塞拉蒂对于我们来说微不足道，而工人们则是一切。我们应当以本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工人们发出

热情的号召。我们应当有耐心，以便使他们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越是迅速地向全世界揭露塞拉蒂的面目，我们就越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全场活跃，掌声。）

我认为，意大利的例子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局势如同对于总的政治形势一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意大利出现了五金工人占领工厂的光辉运动。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许多地方，工人们坚持了两个星期。他们着手建立红军。结果出现了劳工联合会，从背后向工人进行攻击，将他们的运动出卖了。然后塞拉蒂出来，在回答列宁时说，那不是革命运动，而只是工会运动。“占领工厂决不能证明，我们有着革命性质的运动。这不如说是一场广泛的和深刻的工会运动，如果不算小的冲突，那么是完全和平地进行的。”这句话是打在塞拉蒂身上的犹太的印记。每个人都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和平的工会运动，而是真正革命斗争的开端。

党在塞拉蒂的领导下竭力使这场斗争变得微不足道，把无产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的全面政权。资产阶级很会利用这一点。这个例子我们不应忘记。不应当轻率地开始进攻，但也不能错过可以转入进攻的时机。由于错过了时机，意大利的运动倒退了许多年。意大利工人阶级现在注定要忍耐和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作出牺牲，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它的领袖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都是因为他们扮演了运动中的绊脚石的角色。无论对于意大利党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的内部关系来说，教训就在于此，正如俗语说的，闪光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的确，冒充共产主义的东西并非都是共产主义。

同志们！今后我们不应盲目相信：我们看到象塞拉蒂那样背叛的事例太多了。我们应当十倍地考验每个党，然后再说我们相信它。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反对这样做的。从上述例子中我们

清楚地看到，主要的敌人在右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掌声。）在意大利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即试图把我们的左派朋友们拉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我已指出领导意大利共产党的博尔迪加同志。他解散了党团，抛弃了对旧的政党的一切私人的和派别的关系。这是一位革命的战士。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应当对左派采取友好的态度，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超越了这些界限。不过，真正的敌人在右面：它在窥伺我们的每一个弱点，利用它并时刻准备钻每一个空子，以便从内部使我们变得软弱无力。塞拉蒂先生不久前说过：“我们现在站在 devant l'église（教堂的门口），好吧，反正我们是基督徒，等门开了我们再进去吧！”说得倒很漂亮。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站在我们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他一头扎进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粪堆里。（全场活跃，掌声）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了非常坚决的行动。当然，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神圣职责，平心静气地等待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我们对这些先生关上了大门并说：“这里是共产主义，那里是改良主义”，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谁就跟资产阶级在一起。（热烈的掌声。）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党的问题。不言而喻，我只能谈及真正接受我们政策的影响的那些最重要的支部。哈雷代表大会是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它打下了基础。我觉得，我们在哈雷的行动使人清楚地明白，共产国际需要的不是宗派，而是巨大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而我们竭力在德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以为，这个想法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我们是成功了。在哈雷，有两个问题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否应当保留斯巴达克联盟，作为预防措施，作为保障，作为补充组织？我曾以执委会的名义主张保留斯巴达克联盟。

我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俄国对类似的组织进行了巨大的试验。我们认为，这类组织有其自己的内在逻辑，最好不要联合，这样会使党有稀释的危险。但是如果已经联合起来，那就应当诚心诚意地联合，抛弃宗派的组织。我应当说，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同志们实际上是持这样的观点的。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发展速度。当时德国的气氛是：甚至象累德堡这样的人也谈到了“杀人犯的中央局”。资产阶级伙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独立党人企图尽可能迅速地挑唆党进行一场巨大的战斗，以便使它不能组织起来。当时我们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劝告领导同志不要过于匆忙地投入决战。自然，我们并不是学究，我们知道，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取决于总的局势和敌人的立场。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给党较多的时间以便加以彻底巩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意见。显然，两个大约拥有10万和40万成员的党的联合是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的，必然会有磨擦、反复、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的毛病。考虑到德国运动的过去全部历史，我们意识到，威胁着这个党的危险，与其说来自左面，不如说来自右面。（掌声。）我们看到，斯巴达克联盟在联合以前忽视了象卡普的冒险举动这类的形势。这证明，党在这段历史运动期间不是很活跃的。对于独立社会党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是这样。看一看它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毛病也正是在这方面。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对德国同志们说：“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每当你们那里发生运动，你们总是毫不迟疑地说，这是‘盲动’，是冒险举动。不要滥用这个字眼。”我们还对他们说，不要过于匆忙地行动，不要没有事先准备就投入战斗。不过，我们回顾一下德国工人阶级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说，它始终布满着冒险举动和冒险分子。把没有导致直接胜利的任何运动都说成是“盲动”，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我们在俄国，在取得胜利以前也经受过大约一打的失败。如果我们

把它们都看作是“盲动”，我们就永远不会取得胜利。（掌声。）

我们从一开始就担心，德国党内会出现中派倾向。遗憾的是，我们应当说，我们的担心证实得太早了。我在谈论意大利问题时曾指出，它具有国际性质，是同德国的问题联系着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并对以尊敬的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德国党领导同志采取了纪律措施。我们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这样做的。我们曾考虑了很久，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冲突是在意大利问题的基础上发生的，关于意大利问题的情况，刚才我已详细地说过。

情况怎样呢？列维带着党的委托书到了里窝那。他在意大利同塞拉蒂一起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共产国际。里窝那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一点。接着，5个或者6个党员由于在意大利问题上不同意执委会的意见而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谴责执委会犯了错误，想要人为地制造分裂，制造宗派，等等。塞拉蒂前往柏林，而且到了斯图加特。他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而且用大号字体——一封信，说德国党站在他的一边，而年轻的兄弟的意大利党遭到了德国同志们的背后一击。我对德国同志们说：“请设想一下，如果在哈雷分裂后，俄国同志中有人，例如列宁或托洛茨基发表声明由于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对它在哈雷的行动的 意见，你们会说些什么呢？意大利党遭受的正是这样的背后一击，至少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喊声：“完全正确！”）

我们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塞拉蒂已经堕落到改良主义的地步。”今天，我在一些最主要的问题上引了他的文章中的话，证明他对法国党和德国党泼了多少脏水，证明他在九月运动期间如何背叛了党。因此很明显，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而这里有人又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背后对我们进行攻击。

拉狄克问道：在对某个问题不同意的时候，在一个老的社会民

主党内是否可以如此轻率地丢下自己的委托书？即使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不对（而我们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也应当更审慎地行动。事先对执委会没有说过一句话；它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因此，我们想，这里是有某种不协调的东西。而且不仅仅在意大利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然而我们知道，在德国，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意大利问题而急躁，这种急躁常常只有当问题涉及到本国的党、本国的运动时才会表现出来。这里使人感到有某种瓜葛。

如果情况是这样，塞拉蒂做得非常巧妙，那些作为相当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同志们只是因他而充当了牺牲品，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误会，那样就很好！不过同志们，对此我们很难指望。

正因为这样，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请代表大会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到底是不是错了，以便使共产国际得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如果是同志们的错误，那也让代表大会这样承认，并使我们有可能感到自己是真正国际性的政党。

关于三月发动将作一个专门的报告。我只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当我们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时，布拉斯、盖尔和克南同志正在这里。最初听到消息时，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感觉，山岩终于移动了，德国终于发生了某种运动，空气在洁净起来。

当我们起草第一个宣言时，即已经失败之后了，布拉斯和盖尔的想法跟我们大家一样。（拉狄克在座位上说：“请听！请听！”）

宣言是我们口授给库尔特·盖尔同志的。（喊声：“请听！请听！”）他只是扮演了速记员的角色。

他们没有进行任何修改。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正因为他们有一种革命家所应有的感情；我们进行了斗争，斗争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在斗争中失败了。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背后向工人们发起进攻。他们当时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因此，我公开地声

明,并相信这两位同志必定会同意这一点,第一个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宣言中我们维护了发动(场内活跃。)你们看了我们关于策略的提纲,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没有说一些奉承的话,而是明确地说了已经犯下的错误。代表大会不是为了互相奉承而召开的。

关于革命进攻的理论已经说得很多了。上帝保佑,我们不再重复这些荒谬的话了。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说的:“那不是发动,而无非是防御性的斗争。”敌人出其不意地向我们进攻。我们不应叫嚷进攻。犯下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工作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他们希望纠正这些错误。

问题是我们把这场斗争看作是前进的步骤,看作是德国工人阶级痛苦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呢,还是看作“盲动”?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是,三月发动不是“盲动”。有50万工人进行斗争的地方,说什么“盲动”那是可笑的。这不是冒险,这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强加给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我们应当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无可掩饰,我们不是执行秘密政策,不是进行幕后外交,但是我们认为,德国党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无需为这场斗争而感到惭愧(场内活跃,掌声。)我们也应当明白而直截了当地说,过早发动的危险是存在的。当特拉契尼同志向执委会报告时,我部分地感觉到,意大利共产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使党摆脱了泥潭,现在应当不顾一切地干了。不!不扎扎实实地研究形势,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行的。正是在现在必须二十倍地审慎行事,做好一切准备并在投入战斗前二十倍地权衡一切利弊。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对法国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始终看到这种危险性,即使稍有夸大,也并不那么可怕。

现在来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也具有国际意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向该党作了一系列让步,

使它有可能在这里在国际讲坛上讲话。但是它的代表们宁愿及时地躲藏起来。奥托·吕勒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大家知道的，他已经倒退得相当远了，尽管他自己认为属于极左翼之列，但是实际上他处在反革命营垒之中。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同德国统一党的同志们就这个问题谈过多次。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该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国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好。执委会则持不同的意见。我在柏林时就以它的名义向同志们说过这一点。当然，在有关德国的重大问题上反对党的决议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是，同志们，无论从形式的观点上看，还是从政治-道义的观点上看，在出现这类情况的地方，执委会有这个权力。我们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应当被接纳为同情党，理由如下。我们认为，为了教育该党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不应有任何犹豫。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德国党的过去历史，它的消极面，甚至它的重大错误——例如在卡普冒险的日子里——或许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认为，在国际的影响下，我们能够容易地克服它的根深蒂固的毛病。我们认为，虽然这个党人数不多，虽然它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甚至是一个宗派，但是我们还应竭力争取使这些工人的优秀分子出现在国际队伍中。我们对自己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危机，以致在各政党和团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些革命分子必须具有耐心。执委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几乎一致的决议，于是我们决定接纳这个党。在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中，哥尔特同志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托洛茨基同志详尽地阐述了执委会的基本路线，这之后，执委会决定准许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享有发言权。

我代表执委会在发表结束语时说了以下的话：

“从逻辑上说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两条出路。在一个国家内长期存在属于同一个组织的两个政党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应当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德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整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它不能属于我们，即使作为同情党也好。目前的问题就处于这种局面，而我认为，代表大会不能不作出抉择。遗憾的是，我应当指出，领袖们在该党的作用相对说要比在其他政党内大得多。（喊声：“对！”）既然说的是领导层的问题，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在这一年当中，表现出了倒退的迹象。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列维博士的道路就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小册子是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作者没有标明；但根据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出自哥尔特之手。的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把哥尔特写的东西都刊登出来，是对他效了狗熊之劳。假如把他近来写的东西中的许多东西放在写字桌抽屉里，那样就会好得多，也不会损害他曾经确实是个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望。同志们，请听一听这个同情党是怎样对待共产国际的。小册子第三章的标题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是什么和怎样夺取？》哥尔特用了三页篇幅尽详无遗地向我们叙述了这个问题。在夺取国家政权方面他是很有经验的，他曾在荷兰取得了这种经验。（笑声。）哥尔特说：‘列维在18—42页上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作者的愚蠢，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愚蠢，执委会的愚蠢，第三国际的愚蠢。’正如有人向我解释的，荷兰式的愚蠢不等于德国式的愚蠢。哥尔特接着说：‘因为执委会对国际革命犯了罪。’哥尔特的逻辑是：在俄国，农民是革命阶级，在世界其他地方，农民则是反革命阶级；在西欧，只有一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而这个在西欧存在的唯一的革命阶级，说实在也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哥尔特的前提条件。照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革命

阶级，即工人，而工人也是反革命的，因此……因此不应拖延，不应同这些群众、同这些糊涂的工会周旋，最好不要拖到明天，而今天就进行革命。这就是他的逻辑。所有这一切都带着对共产国际，对苏维埃政权和国际的大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哥尔特同志接着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列维，而同他在一起的有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执委会、各国党，只有一个例外……”谁是例外呢，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不知道，或许这就是‘荷兰派’吧？或许是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不认为，哥尔特就这样轻易地同荷兰党分手了。我不这样认为。请看，例如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产者》，标题很简单：《荷兰马克思主义派》。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集中了全部理论。小册子分三章：第一章是哥尔特执笔的《党和阶级》；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社会革命中最紧要的问题），潘涅库克执笔；第三章是《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在法国的产生》，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执笔，对于她我实在要说：“我衷心感到遗憾，竟在这伙人当中见到了你。”她以她杰出的才能本来能够为共产国际做更有益的工作。”

同志们，我不是开玩笑地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按其写出的作品来说逐渐表明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敌人。哥尔特在一个地方说：“列维的精神，就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精神，执委会的精神，第三国际的精神，因为它在哈雷、图尔和里窝那是怎样表现的呢？”瞧，我们在哈雷行为不端，在图尔表现不良，竟将法国中派分子开除，而在里窝那行动错误，竟允许过多的群众加入我们行列！照哥尔特看来，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群众。要知道，他就是这样说的：“你们需要的只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总之，整个国际不具备任何质量：质量全在哥尔特一边。于是，他仿照西塞罗的风格，叫嚷道：“领袖政治代替群众政治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难道俄国、巴伐利亚和德国（即使单是俄国）的例子还不够吗？”同志们，这是什么

话？这简直有点儿象迪特曼。这是什么意思呢？俄国应是领袖政治的范例吗？不过让他们来明确地说清究竟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领袖，这种政治究竟在什么地方？工人阶级在什么地方给自己带来了无谓的牺牲？这些人所谴责的领袖政治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来说清楚吧！哥尔特接着说：“我们支持工会的虚假斗争、同这些虚假的人们打交道和破坏生产组织的斗争还要多久呢？破坏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还要多久呢？”

总之，作为社会革命真正出发点的工会是些虚假的人物，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奉行我们的政策。诺斯克、谢德曼、托马斯、艾伯特、哥尔金——所有这些都是虚假的人物，而只有哥尔特一人是实在的人物。

但是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是的，工会是极端反动的；而如果我们不争取它，不掌握这个有力的武器，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大成问题。谁企图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会是个虚数，谁就顶多只是一个轻佻的空谈家，而不是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哥尔特接着又说：“说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一次不能应付局面，因为它还不够强大，这种托词是经不起驳斥的”……接着又有粗体字刊印说：“既然它是群众性的政党，它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

总之，一方面是政党一般说来不应是群众性的政党，而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群众性的政党，但要求实行群众政治。谁能理解这一点，就让谁去理解吧！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用不着再引用“荷兰派”这本小册子中的话了，不过我应当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哥尔特同志开始采取的正是和塞拉蒂同样的手法。我这里有一份《共产主义工人报》的五一号，即专门的节日版，其中确实有应当推动国际的团结并强调把我们联合起来的一切。你们可以在其中看到：“莫斯科应当懂得三月战斗的教训。如果不这

样，如果它在最近不下决心将二十一条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重新审查，那么我们不得不从中作出唯一可能的结论。”

对此我应当回答：“请吧，我们不反对！”（笑声。）

接着哥尔特又说：“那时我们有权得出结论：‘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的主要罪过在于完全不理解西方革命的任务和过多地关心执委会所发现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利益。’”对此我只想重复一下我在哈雷说过的话。当时我们向右翼独立社会党说：“先生们，今天你们拥护苏维埃俄国，而明天你们会落到它的敌人营垒中去。”他们回答说：“永远不会！”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是俄国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了。今天我要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重复同样的话：“带着这种半幼稚和半犯罪的政策，你们一定会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拉狄克在座位上喊道：“哥尔特已经在维护喀琅施塔得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但是，第三国际从政治上放弃俄国国家政策的体系是我们应当争取的目标，假如我们想要实现西欧革命的前提条件的话。”

这虽然有点外交辞令，但意思是清楚的。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声明，今天代表我党再重复一遍：“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胜利的时候，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移到柏林去。”当然，我们有权对于各国工人至今给予我们的这种荣誉而感到自豪。我们过去和将来都将具体地研究每个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研究它在各国的条件，并向各国学习比我们知道得更好的东西。不过从这篇五一节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正步着塞拉蒂的后尘，而这条道路会把他们引向迪特曼的怀抱。

我以电报形式接到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中央委员会 1921 年 6 月 5 日通过的决议。决议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中央委员

会声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或全权党归属第三国际的问题，取决于它的纲领不受侵犯。”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多么好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应当“不受侵犯”。为什么不是法国党、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纲领呢？这是什么样的哥尔特式的幼稚病呢？这个或那个党认为不受侵犯的那种国际主义是不可能有的。

中央委员会接着声明说：“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上，我们拒绝任何最后通牒的方式。我们的代表受权声明，在一定条件下党将立即退出第三国际。”同志们！一旦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确实认为有必要退出第三国际——不过我希望他们事先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共产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决议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对他们来说有约束力的只是“荷兰派”的意见，那就让他们退出吧，而我认为，我们整个代表大会不应为这样一个尝试而感到遗憾。我们已经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每个革命工人证明，我们衷心地和诚挚地希望同他们一道工作，我们给了他们考虑的时间并对他们作了各种让步。如果他们立即要离开我们，那么他们这样做正是在我们德国有了群众性的、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政党的时刻。或许她犯过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但毕竟在我们德国，她现在是个在战火中经受过考验的大党，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具有完全不同的道义分量的政党。如果我们遭到不幸，如果哥尔特及其亲密的朋友们离开我们，那么我们将竭力度过这个灾难，因为我们相信，目前还拥护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工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不会再认为这些错误是“不受侵犯的”。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可以侵犯”的，而共产国际应当成为我们大家的法律。

这就是我想对德国共产党说的话。

在结束德国问题以前，我想再对“列维事件”说两句。我们接

到保尔·列维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重新审查他被开除出德国党的事。主席团就这个问题向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正如大家知道的，执委会是同意开除列维的。既然在列维的小册子里谈论了策略问题，那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得到详尽的阐述。至于其他问题——关于对土耳其斯坦人的议论，各种谣言和秘话——，那么我认为，如果我在这里继续谈论它，那就是对这本小册子过分推崇了。（掌声。）因此，这个问题不谈了。

.....

译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22年俄文版第72--92页。

共产国际的策略

(1921年8月)

人们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议论纷纷。不仅敌人而且有些朋友还不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然而，每个共产党员为要自觉地参加现时的斗争必须十分清楚地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它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地位。

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觉得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的立场出乎意料，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不难理解的是，一些代表世界资本的资产阶级大报刊叫嚷说似乎我们放弃了“纯粹的”共产主义。这些先生们非常希望我们成为他们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上的“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些先生们看来，“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唐·吉珂德式的人物。“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不顾现实形势，不顾时间和空间条件的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容易上资产阶级投下的钩钩，容易落入阶级敌人布置的圈套的人。

“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并非在自觉估计要求这样做和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去采取坚决斗争的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在资产阶级乐意这样做并容易落入圈套和陷阱的时刻就去进行斗争的人。总之，在资产阶级看来，这样一些“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同纯粹的傻瓜相去不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使世界资产阶级大失所望。代表大会表明，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完全不象世界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敌人的、被赞誉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那样的傻瓜。

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怀着难以掩饰的懊丧情绪大叫大嚷说什么：共产党人似乎向右转了，他们的代表大会似乎离开了共产主义。

不言而喻，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和领袖们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资产阶级的后面。马尔托夫先生一方面叫嚷什么共产国际的“没落”，另一方面又事后证明共产国际在1919—1920年间确实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然而这并不妨碍同是这位马尔托夫叫嚷说共产国际在1919—1920年间只不过代表一小撮人。格里姆先生在7月23日《伯尔尼哨兵报》上洋洋得意地宣布，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共产主义烈酒加上了水”，“放弃了顽固的二十一条”，最后又毫不犹豫地宣告：“这恰恰是向维也纳国际的策略靠拢。”《自由报》、《前进报》、《人民报》、布兰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比利时的《人民报》都以同样的精神来解释代表大会的文件。

敌人们这样来解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不足为奇的。要向他们说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是徒劳的。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些朋友们所表现出来的不理解必须说几句。我们的瑞典同志斯特勒姆在作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说：“俄国党和法国党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了右翼。”而斯特勒姆同志也象霍格伦同志一样兴高采烈地认为这个“右”翼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单是对两党的这种比拟就清楚地表明，斯特勒姆同志和霍格伦同志不完全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说什么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法国党的代表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几十次地表示，他们的党只是刚刚在发展成为共产党。这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无比高兴地指出了法国党近一年来在发展中所取得的这一巨大进步。但是与此同时，第三次代表大会完全同意法国代表团的优秀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法国党要成为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还有许多东西需要

改进。

另一方面，来自德国的消息表明，那里也远不是所有同志都正确地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位新委员在耶拿党代会（1921年8月24日）期间写的一封信中对我们说：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你们谴责的不仅是进攻理论，而且是参加三月战斗的工人们的斗争。这种印象无疑是不正确的，然而必须估计到这种心理因素，才能正确理解德国共产党队伍里的内部斗争。”

不言而喻，那些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的不仅是进攻理论而且是工人们的三月斗争的德国“左派”同志们，也象认为法国党的路线在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那些洞察入微的瑞典同志们一样是多么地错误。

那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代表大会决议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国际现时策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事情非常简单。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内容是，共产国际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于新的条件。共产国际所遵循的还是过去的目标，采取的基本上也还是过去的手段。但是，它估计到新的障碍，在必要的地方放慢脚步，绕过沟壑，实行退却，以便明天更好地组织进攻，在后卫队过于落后的地方使先锋队的过热头脑冷却下来。

共产国际成立两年来，工人运动中的组织性因素无疑大大提高了。1921年，各个共产党所代表的有组织的力量无疑比1919年时多。然而这两年来，群众斗争的自生性，即自发性因素减弱了；两年来敌人壮大了，团结和组织起来了，从战后的最初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重整队伍，又以强大的敌人，有些地方甚至以凌厉的敌人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

际的拥护者们在1919—1921年两年当中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帮助资产阶级站稳脚跟。在资产阶级孤立无援的时候，在资本家领袖们象发疟疾一样哆嗦、资产阶级政党象小草一样摇晃的年代里，许多事情，几乎一切事情都有赖于主观因素：有赖于工人们的决心，有赖于党和工会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在这决定性时刻，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仅有的一切放到资产阶级的秤盘上，这就是为什么在1919年可以一举达到的目的，现在我们就得费很大努力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来确定自己的策略。

这个过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意大利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在1919年以及部分地在1920年，意大利具备进行胜利革命的一切前提条件，只是缺少社会党和工会的组织性和革命性。资产阶级抱头鼠窜，没有真正的武装力量来反对工人。意大利无产阶级中的群众性自发革命浪潮非常高涨。大部分农民和复员士兵无疑站在工人们一边。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意大利工人们本来能够一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缺少一样东西，即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意大利工人阶级政党在决定性时刻不能胜任自己的革命职责。意大利党无力应付时代的要求；早就受改良主义腐蚀的意大利党在决定性时刻腐朽了。1920年9月，当工人们转而夺取工厂时，党和工会的行为表明（连瞎子也可以看到），意大利社会党开始在意大利起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所起的同样的反革命作用。自然，所有这一切不能用偶然性或者这一派或那一派领袖们的罪恶意图来加以解释；意大利社会党的现状本身就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工人阶级因此吃了不少苦头。要知道，俄国的农奴制，沙皇专制制度，威廉、诺斯克以及白里安——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有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

决定性的时刻错过了。现在意大利似乎落在后头了。它在一定

意义上说比在1919年时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远了。自然，意大利共产党人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意大利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基本因素，以便制定不是1919年的策略而是1921年的策略。这决不等于说，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不再成为共产党人，应当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应当向第二国际靠拢。决不是这样！但是这意味着新的形势迫使他们更加慎重地巧妙应付，估计到长期准备的必要性，理解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的必然性，不倦地努力以便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把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也不得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即对整个第三国际相应地说大致同样的话。

在7月9日米兰《前进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昂维奥·阿戈斯提尼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假如我们依然硬说，党目前正经历着1919年的动荡日子，那是自己欺骗自己。那时候，在俄国和匈牙利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汹涌澎湃并迫使整个欧洲在新的未来的阵痛中发抖的共产主义，曾激励我们不得不在自己周围听到反对战争的拥护者和发动者的狂热喊叫，不得不看到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恭顺的表现——这一切曾激励我们去争取我国的立即胜利。而那时我们的唯一愿望不就是击退资产阶级还可能作出的微小反抗吗？相反，目前我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临近，那就是欺骗群众……而我们决不能承认法西斯分子有权把形势的变化归结为他们的暴力政策的胜利。暴力政策的胜利甚至不是这一变化的因素之一。法西斯分子开始对我们的运动采取暴力是在我们的动摇和错误引起的深刻失望的影响下运动已经开始减弱，以及资产阶级已经发明新的手段和改善旧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进行自卫来镇压我们的一切起义尝试的时

候。”(《前进报》第164号)

这里，十分真实地描写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危机的原因。这位在塞拉蒂的机关报上写文章的作者非常诚恳地指出，正是“我们的动摇”(即意大利社会党的动摇)引起了群众的失望，而资产阶级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把意大利工人阶级抛到后面。只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正确。他看到了1919—1920年“动摇”带来的巨大危害，却在新的动摇中……寻求治愈的办法。

我们上述那位作者接着写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最近在莫斯科的讲话中主张加强斗争以便在资产阶级遭受危机和无力摆脱危机的时刻，无产阶级找到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专政。如果这个纲领应当指导我们党的全部活动，那么我们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因为它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但是，如果它作为目前必要的纲领，那么只要在双方斗争的范围内把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加以比较，就可以认为这种策略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只要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形势，那就可以认为，目前这是完全不利的。但是我们要说得更多一些。我们不仅不承认加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而且也看不到它的意义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主张加强斗争，我们就要消灭资产阶级财富的泉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要消灭工人们生存的泉源……工厂的无声无息和对劳动力任何需求的丧失将给工人家庭带来不祥的影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将让位给更加迫切的要求：维持和仅仅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计，这是一场断然无望的斗争，以致使工人组织不得不遭到解体，争取新的成果的努力不得不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历史现实不允许我们在目前作出建立我们专政的极端尝试，如果依我们看来，它使阶级斗争完全不可能变得尖锐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就面临着一项明

确无疑的任务：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保卫已经争得的阵地，保卫自己的精神财富和自己组织的士气。”

这段议论不仅使我们找到了理解意大利社会党现时多数派心理状态的钥匙，而且使我们最清楚地明白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策略的真正意义。阿戈斯提尼指出意大利工人阶级被抛到了后面，这是对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德国工人阶级也被抛到了后面，这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利用德国无产阶级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全部有组织的资本来帮助资产阶级，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亲手解散工人苏维埃并在诺斯克的领导下杀死成千上万的优秀德国工人，那么德国革命就能在1919年取得胜利。象匈牙利、奥地利，甚至荷兰和瑞典这样的国家，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也可以这样说。

阿戈斯提尼说，在意大利光靠共产党人的力量立即举行胜利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这样说也是对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其他国家也希望这样说，代表大会要求集中一切努力来为共产党争得多数。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自己的全部文件还想说：群众性暴动的自生性和运动的自发性减弱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团结增强了，虽然在这期间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也增强了，但是这种增强还没有达到能弥补上述两种因素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因此，**要慎重，要十倍、百倍地做好对每一次发动、特别是武装发动的事先准备；要更接近群众；为共产党人争得多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或许是相当长时期的日常工作。**

然而，阿戈斯提尼从确认上述资产阶级力量增强和群众性自发运动减弱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根本不可能尖锐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推迟几十年以至永远不可能，如果革命者

继续同改良派一起工作，无产阶级运动的软弱性就不会消除，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阿戈斯提尼从确认经济危机和失业增长的事实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似乎在这个时候任何革命斗争都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提纲中表明，把群众性革命运动只是同经济萧条的时期联系起来或者相反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指示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都具有意义。

的确，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群众性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被抛到了后面。的确，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正处在准备决定性战斗的时期，而不是处于直接进行这些战斗的过程。然而，不仅不能因此得出同改良派必须留在一个党内的结论，而应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确，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几乎在整个欧洲抬头。的确，资本的进攻在全线展开。然而，不仅不能因此又得出同国际孟什维主义必须在一个党内和平共处的结论，而应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反动时期，在士气低落的时期，改良主义是比高潮时期更危险得多的敌人。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是由于它常常同多数派站在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刻，革命也把一部分改良派吸引了过来。无疑，例如当意大利改良派在1919年表示拥护第三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并不都是耍滑头。但是当革命浪潮低落时，当资产阶级掐住工人脖子时，那时甚至改良派中的最优秀分子也会成为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悄悄地对力量软弱的工人说：“投降吧！”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通过内部瓦解的方式去做资本家所做的工作，直接掐住工人的脖子。

或许目前这种极不稳定的平均势会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地遭到破坏。燃料到处绰绰有余。但是，共产国际必须“给双脚钉上

掌”。共产国际必须这样来确立自己的策略，使它能够适应较长时期的危机。如果事变进程需要的话，我们永远来得及转而采取更快的速度。

决不能采取现在有助于敌人阻挠我们对工人群众施加影响的任何步骤！资本主义现在正借助于黄色工会，借助于阿姆斯特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实行统治。光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争取工会，使其摆脱“黄色”工会的影响。如果普遍的革命危机来得更快些，我们转而采取直接的决定性战斗就更容易些。

总之，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特点首先是：到群众中去，到最广泛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中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全部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哪怕是为了些微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也好。参加工人们各种组织，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到体育团体和文娱小组。在每一个这样的组织中不倦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系统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使工人群众做好未来战斗的准备。为建立非法的组织进行细小的工作。耐心地、不懈地进行武装工人的工作。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共产党，清除机会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首先争取工人们的工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时要说的就是这些。第三次代表大会善于根据业已变化的形势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善于将共产党人的策略适应于新的形势，善于号召党并使党做好准备根据这一新的形势进行切实的工作。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伟大历史意义。

上面我们引用了德国同志来信中的一段话，说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进攻理论”，而在德国被认为是不仅对这一理论的谴责，而且是对1921年3月工人们实际斗争的谴责。确实，在第三次代

表大会上对进攻理论进行了不少争论。必须明确弄清，代表大会谴责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必须较为详细地来谈一谈，尤其是因为这场争论不仅具有德国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争论的概念本身。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战”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防御战”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原则性区别。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本身是完全相对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14—1917年时是怎样提出各国之间的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大家知道，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曾宣扬这样的思想，在每次防御战中，社会主义者应当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同时千方百计地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祖国所进行的无疑是防御战。证据是：对方向“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某种挑衅性的照会，对方在一个半小时以前开始进行动员，对方的部队开了第一枪，等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根本上摒弃这种问题的提法。他们说：任何战争，从表面上看，从战略等观点看可能是进攻战，但同时从更深的历史意义上说也可能是正义的防御战。例如，十九世纪的一些民族战争就是这样，那时问题确实涉及到反对异族压迫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①。

相反，可以设想，任何战争从表面上看，从战略等观点看可能具有防御性质，但同时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即按其内容说也可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进攻战。

从一系列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庸俗的分类都是不行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更是如此。就拿芬兰工人1918年反对立宪资产阶级的起义来说吧，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角度看，它无疑是进攻战。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理由“进

^① 见拙著《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第1卷。

攻”可怜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因此，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应该同情可怜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当然，这并不等于，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分类。但是，即使在经济领域内，一种战争常常可以转化为另一种战争。就拿不久前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来说吧。罢工是因为煤矿主决定降低工人们的工资开始的，因此开始时是典型的防御战。但罢工一旦开始，在某个时期里就有转变为进攻性罢工的趋向，而在结束时由于一系列因素在起作用，又表现为典型的防御战。分类是应该的。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内，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经济萧条的时代是同盟歇业和防御战的年代，而工业高涨的时代则是罢工和进攻战的年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是区分这些差别的。但同时我们也说：谁“原则上”反对向资本主义进攻，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就是资本主义的走卒。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点，也不能不确认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不批驳、也不可能批驳进攻战。

那么第三次代表大会批驳的是什么呢？

关于策略的争论部分地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展开了，但那时争论具有与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争论不同的性质。我们说的是俄国波兰的战争。

这次战争对苏俄来说在战略上是防御战，但后来从战略角度看转变为进攻战——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反对波兰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防御战。1920年苏维埃俄国同资产阶级波兰的战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是否可以“用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另一个受资产阶级压迫的国家去。1920年夏天，这决不是一个喜庆节日和单纯理论的问题。当苏维埃军队接近华沙的时候，这个问题具有极深刻的迫切性。共产国际核心，首先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完全肯

定地回答了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必要，只要力量对比允许的话。我们说，这样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有时甚至是进攻性的，而从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资本家强盗的正义的防御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在柏林的《红旗报》上刊登了一位波兰共产党员的文章反对这一观点，文章当时是得到保尔·列维和看来还不仅仅他一个人同意的。实际上是通过上述这位波兰人之口道出了狭隘的、尽管是精巧的民族主义。他的全部论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正式决议，但是从代表大会的全部争论和各种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是完全主张采取这种进攻策略的。

遗憾的是，欧洲的战事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很快地从日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至少是作为纯实践问题被取消了。欧洲的发展沿着与1920年夏天所确定的以及共产国际优秀政党所希望和期待的不同的道路前进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关于进攻策略的问题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不久，特别是由于德国的三月事件，开始形成一种企图提出一整套“进攻理论”的倾向。这里，问题已经不是工人阶级一般地是否可以对资本家采取进攻战的问题，已经不是胜利了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可以用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别的国家去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同了。

从1920年下半年起，群众性的自发的革命运动明显地延缓速度，至少在欧洲一些国家里是这样。当然，这将不会是很长久的事。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约莫过了一个半月，群众运动又复兴起来了。我们看到席卷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以及还是这个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巨大的罢工浪潮。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估计到上述延缓。

于是，在那些高度忠于革命但非常缺乏耐心、不是始终具有足

够远大目光的共产国际人士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想法：

——少数积极的勇敢分子应当打通这堵消极的墙。共产党队伍里的少数人正是现在应当转入进攻。那时冰层就会打破，勇敢的少数人就会把全体群众争取过来。

这些同志不是具体地分析事实，不是清醒地估计整个形势，而是把主观因素提到首位。这些缺乏耐心的同志们不愿意也不善于深入分析由于深刻的历史因素所产生的形势的各种困难，起先是羞答答地，然后则是大叫大嚷地宣布，似乎现在正是(par excellence——主要是)进攻的时代开始了，只要尽快地“开始”“强化”运动，以后就好办了。

今年春天，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非常清楚，这种倾向在一系列国家里开始露头。在暴风雨的1919—1920年到1921年的转折关头，当短期内出现另一种形势的时候，这种倾向是十分自然的。这种左的倾向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共产国际不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倾向也是极其危险的。

在德国，由于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的种种情况，这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进攻理论”非常流行。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批驳的正是这种错误的“理论”，而且仅仅是这种“理论”。

代表大会批驳的正是那种认为现在我们已进入不断进攻的时代的错误理论。它批驳的正是那种认为明显的少数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候，通过大胆的起义尝试破除群众的消极情绪，克服其余一切困难并在武装搏斗中取得胜利。它批驳的正是那种认为在起义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的形势下运用“强制”手段使工人运动“强化”的理论。

第三次代表大会反对所谓“左”倾的斗争就在于此。

这绝不等于说，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意那些认为目前我们各党

的任务只是单纯进行宣传的共产党人的意见。不，代表大会清楚地明白，我们的一些大党应该准备进行直接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在近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在这些局部战斗中的任何局部失败归根到底不可能阻挡我们的胜利。代表大会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指出，在欧洲目前不稳定的“均势”下。任何大规模的罢工，甚至任何大规模的议会冲突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序幕，成为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序幕。代表大会以后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测。单是德国白卫分子向议员埃尔茨贝格尔发射的子弹就足以破坏德国的整个均势。因此，如果已经开始的危机将在较短时期内在德国导致几乎决定性的战斗，那是谁也不会奇怪的。而在波兰已经爆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将导致这样的危机，以致直接提出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里的问题，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波兰或者在德国的爆发自然会使整个形势立即百倍地加剧起来，并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上日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预见到、预言到和估计到了这一切。然而，正因为欧洲没有稳定的均势，正因为“群众的消极的墙”无非是一堵想象中的墙，正因为如此，考虑不周的武装发动和冒险举动是特别危险的，它在目前情况下只可能破坏共产党人在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声望，从而只可能有助于资产阶级。

反对所谓左倾的斗争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决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同这些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那时这些倾向表现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英国厂工会委员会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者身上。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场斗争是正确的，因此也是有成效的，使上述组织的优秀分子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共产党内部的左倾进行斗争，我们相信成效将不会是很小的。

但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我们说，当“左”倾还不是那么强大，而相反右倾却还很强大的时候，是否值得如此激烈地来同这种左倾进行斗争呢？有人对我们说，在共产国际的右面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阿姆斯特丹，有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有意大利的多数派等等，而在共产国际的左面则只有一些小小的派别，而且他们都强烈地倾向和非常忠于共产国际。这种见解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不得不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策略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个组织站在我们的右面，有多少个组织染上了“左”倾，问题在于这样或那样的倾向按其内在的趋势来说包含着什么样的危险。当然，主要的敌人是在右面；当然，从整个战线来说，共产国际始终是向右面同资产阶级，同阿姆斯特丹，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同龚帕斯和谢德曼之流进行斗争。然而，正是为了在这场主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应当有一种摆脱“左”倾的策略。当然，右派是主要敌人。正如德国人说的，这是 *der feind*（敌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它在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代理人的斗争。事情完全是这样。但问题恰恰在于，“左”派客观上就是帮助右派，妨碍我们去战胜它。

我们说，问题不在于所谓极左派拥护者的数量，问题在于倾向。一个小小的例子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工会的态度。每一个明智的共产党人现在都懂得，如果不从内部夺取工会，我们既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从而也不能战胜社会爱国主义者。然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形成了一个派别，他们反对我们参加工会，并且或多或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退出工会的口号。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这个假“左”的口号。他们人数不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个小派别。从数量的

意义上说，这个极“左”派根本不危险。但是，我们且稍微设想一下，如果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估计到在工会问题上的这个假左派的危险性，没有发现它，忽视了它或者对它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对共产国际的有害后果将是难以估计的。如果不开始切实地去争取工会，如果我们不开始这样做并在一年内大踏步地前进，那么我们会把工会送给龚帕斯、茹奥、达拉贡纳、斐孟之流。从数量上说，这个极左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所代表的倾向对于共产国际的未来命运来说却是极端危险的。

关于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出现的所谓左派在更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

现在，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是很复杂和很困难的。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明确理解这一形势的复杂性并找到接近群众的新途径。缺乏耐心的“左”派则不然。他们的行动把积累起来的党的和组织的全部资本挥霍殆尽，不仅不把群众吸引过来，而且相反，把群众长期地推到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营垒中去。

第三次代表大会无疑有责任来纠正这种路线，而既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应向左派宣布坚决的斗争。许多同志的过错，包括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人的过错只是在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时机。既然他们不坚持自己的错误，并公开地放弃虚假的“进攻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说，绝大部分德国同志的确已经抛弃了这个错误），那么问题就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而共产国际只需估计和吸取所犯错误的教训。但是，既然在德国（马斯洛夫同志一派）或许也在其他国家^①，还有一些同志和一批同志，想把业已犯下的错误奉为

^① 典型的例子是卢森堡共产党的机关报《斗争报》认为不应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该报1921年7月20日发表一篇题为《革命的道路》的社论，以广告式的大号

“理论”，当作圭臬，并顽固地坚持这种“左倾”，那么对于这种酷似俄国召回派的“倾向”，共产国际不得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什么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召回派呢？

现在非常了解被称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派别的外国同志们应当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被称为召回主义的另一个派别。1903年，当俄国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时候，从布尔什维克内部分裂出一个极左派，这些同志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召回派”因此得名）。早在这以前，这个布尔什维克“左”派宣布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认为参加这样一个杜马的选举就等于背叛工人阶级。

外国的“左”派同志们有时以为，召回主义就是抵制主义。由于这些外国同志现在没有提出抵制议会机关的建议，所以他们似乎同召回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把他们比作召回派，是冤枉了他们。实际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抵制主义确实是召回派的一个特点，但是抵制主义还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个派别。

字体刊印，最后几句话是：

“因此，卢森堡的工人们要和我们邻国的同胞们联合起来，首先振作你们的斗争精神，准备好各种武器：

——步枪！

——手榴弹！

——机关枪！

——大炮！

成立非法的战斗组织

——在各条大街！

——在各个工厂！

——在各区！

——在全国！

工业和农业工人们，准备内战吧！”（《斗争报》第35号）

显然，这种大喊大叫的“鼓动”既不会给工人们增添一尊大炮，也不会增添一颗手榴弹。而对于这种“左派”共产党人，人们有理由加以嘲笑。

俄国的召回主义正是在两次革命浪潮之间的年代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05年开始掀起的革命高潮到1906—1907年时终于沉寂下来了。1911—1912年开始了新的高潮，而从连纳罢工时起又蓬勃发展起来。在1907—1911年间则是整整一个艰苦的时代，反动势力逞凶肆虐，工人们意气消沉，孟什维主义（那时称为取消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变节和局部失败层出不穷，如此等等。在这四年当中，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给予孟什维克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千方百计地迫害我们布尔什维克。他们挑唆我们进行过早的斗争，以便将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淹没在工人的血泊里，使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任何根基。在斯托雷平分子、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当复杂和精巧的合作关系，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性工人运动中失去任何基础，使他们变成僵硬的宗派，蜕化为软弱无力和徒劳无益的空谈家。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忠于革命旗帜。我们必须学会既不呜咽啜泣又不虚张声势地参加工人们的最普通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组织；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揭露孟什维克的变节行为。同时我们必须任何情况下不尚空谈，而是走在前列去进行细小的日常工作，无论在议会的杜马党团中，在合法和非法的组织中，在合作社和工人俱乐部，在文娱体育团体，还是在受书报检查的工人报刊中，等等，等等。当时，在召回派的队伍中有不少是优秀的、无比忠于革命的工人。就是在召回派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老的党的工作者、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后来回到了我们的队伍里。但是，在这些艰难困苦、暗无天日的过渡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真正地决定了未来的命运，极“左”的召回派实际上危害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帮助了孟什维克。由于缺乏革命的耐心，由于盲目地向前奔

跑，由于企图在群众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就使党置于受打击的地步，由于愚蠢的抵制主义，由于崇尚革命的空谈，由于认为似乎可以用小小的党来代替广大工人群众从而“强化”运动的荒谬理论——总之由于这一切，召回主义在那个时代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

因此，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召回主义的“左”倾进行长期的和十分激烈的斗争。事情弄到了公开分裂的地步。召回派同我们正式分裂以后，根据事物的逻辑及其内在虚伪立场的逻辑很快就同孟什维克结成同盟来反对我们。新的革命高潮越临近，召回主义就越变焉，优秀的工人们就越坚决，他们过去支持召回派，现在则又回到我们的队伍，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了。他们看到，我们反对左的空谈家是多么正确。他们深信，只有靠我们的策略，同群众的联系才能保持，我们党才能保证完整无恙，不是作为左派空谈家的宗派，而是作为群众的领导者。俄国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在1914年战争前夕开始的。战争只是加速了这次革命。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力量就在于党在最艰苦的时期里保持了同群众的联系，而经过若干年后领导了全体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决战，并在1917年10月取得了胜利。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时代在许多方面与俄国革命1907—1910年时所处的时代是不相同的。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革命事件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我们决不希望相提并论，我们决不划等号，我们决不作简单的对比，不过我们要说：在我们谈到的俄国革命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国际形势之间，虽然有很大差别，但也有相同之处。

总的说来，国际工人阶级现在无疑也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前就已开始掀起的，在一两年内曾经震撼整个欧洲的群众性自发高潮，目前在有些地方已经沉寂下来，而

不管怎样，它具有比较平稳的形式。在一系列国家里，资产阶级转而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正猖獗一时。法西斯主义、艾舍里希组织^①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白卫组织自然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于灭亡，但是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的繁荣只是在资产阶级得到加强、有些地方使我们处于防御地位的今天才有可能。

这决不象希法亭之流所想象的那样，革命已经结束。这决不等于说，1919—1920年是革命高潮的顶峰，以后就只是革命的平常日子了，这期间工人们必须采取工联主义的政策或者类似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丝毫不是这样！在1908—1909年间，俄国的斯托雷平反动派正处于胜利的顶峰。孟什维克宣扬革命已经结束，说什么我们应当开始为争取君主立宪而斗争，成为温良恭谦、衣著整齐、头发光洁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同“左”派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一刻也没有忘记：1905年革命提出的客观任务尚未完成，新的燃料正在积聚，社会发展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比之1905年时更加轰轰烈烈的革命。

目前，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颁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连瞎子也看得清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众目睽睽之下已经变成了和平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天生瞎眼的“领袖们”在新的纲领草案中小心翼翼地回避“阶级斗争”一词，他们象小鬼见阎王似地害怕阶级斗争。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克服了战后的一切困难，资产阶级制度将不断“更新”和“民主化”，将再存在一百年。实际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整个第二国际就是以这个前景为出发点的。当克里斯平早在哈雷把目前的形势比作1849年欧洲的形势时，他就

^① 1920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反革命半军事组织，领导人为君主派军官艾舍里希，该组织在颠覆巴伐利亚共和国时起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想以此来说明，正如当时革命浪潮已经在1848年结束一样，现在革命运动的浪潮也已经在1919年彻底结束了。意大利的改良派以及塞拉蒂也完全是这样来看问题的。问题的提法在许多方面也很象上述反动年代里俄国孟什维克的提法。马尔托夫和唐恩那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处在1847年还是1849年？于是他们毫不含糊地回答：自然是1849年。1847年，这是革命的前夜，而1849年则是革命的结束。布尔什维克当时在速度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曾以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将比实际上要快得多。当时谁也不可能知道，在1905年以后，俄国的反动年代竟延续了整整10年。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当时形成的不稳定均势将延续2年、4年还是10年。但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预见，而且实际上也预见到，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批驳关于“1849年”的预测时，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当中谁也不是预言家，不可能准确地说：在一个确实决定着世界革命命运的大国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次胜利要经过几个月或几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点，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欧洲经济形势所作的新的估计又一次使我们相信：革命没有结束；比以往所有战斗加在一起还要厉害得多地震撼欧洲和全世界的新的战斗开始的时刻不会很远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对事态发展的一切基本因素的清醒估计得出不可动摇的信念：革命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1907—1911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客观形势依旧是革命的。革命的任务尚未解决。决定我们整个纲领和整个策略的我们的基本前景，我们的指路明灯，这就是新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现在暂时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半均势状态。但是正因为新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依然把我们的砝码放在革命的秤盘

上,我们这边的秤盘迟早将倾斜下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际范围内的问题的提法基本上就是这样。谁哪怕是稍微地离开一下新的革命的前景,谁就不再是共产党员,谁就会转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营垒中去,谁就不再是我们的同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右派的斗争依然高于其他一切。但正是为了使我们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不致变成空谈,我们必须对“左”派进行与布尔什维克当年对召回派进行的同样的思想斗争。

比较决不是牵强附会的东西!召回主义的细菌在空气中扩散。在国际工人运动目前所处的这种艰难困苦的时代,新召回主义必然会诞生。只有在共产党的最先进部队善于及时地吸取过去的教训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减少生产费用,为共产国际节约内部斗争。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自己反“左”倾的斗争想说明的就是这一点,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当霍格伦同志在《政治报》(第149号)上写文章,说什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着“比较温和”的派别,当他说“这一派的主要思想简短地说就是世界革命要求较为长期的革命战斗,因此,我们的策略必须确定在较远的瞄准点上,而不应以直接面临的革命为出发点”,当霍格伦同志这样说时,他是把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世界革命将占居整整一个较长的革命战斗的时代,这是共产党人早在俄国革命胜利前就知道的,这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早在1915年就说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策略完全没有必要确定在较远的瞄准点上。瞄准点还是和过去一样……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8期
第4459—4478页。

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

(1921年11月)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可分为四个。第一个阶段大致从齐美尔瓦尔德到俄国革命爆发。第二个阶段从1917年底到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著名的呼吁书(1918年底)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初)。第三个阶段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个阶段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一阶段,即从齐美尔瓦尔德到俄国革命,仿佛是共产国际的胚胎发育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思想方针。组织上的尝试当时还只具有十分谨慎的性质。

首先,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十分孤立的,当时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在我们党的机关报第33号上登载的我党中央的著名宣言中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口号。

列宁同志在1914年10月底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见《反潮流文集》)中这样写道: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打倒机会主义,既清除了‘倒戈者’(就象《呼声报》所希望的那样)也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他接着写道: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现在面临

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在1914年时就是这样阐述共产国际的任务的。

我在1914年底在我们党的机关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见《反潮流文集》）中这样写道：

“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里，口号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我们应该高举国内战争的旗帜。真正名副其实的国际或者在这个口号下复兴，或者灭亡。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好即将来临的战斗，并教育自己和整个工人运动懂得这样的思想：或者我们必然灭亡，或者我们在国内战争的旗帜下取得胜利。”

在列宁同志1914年12月初写的《国际和保卫祖国》一文中说：

当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欧洲一些主要政党内取得胜利时，第二国际就不再存在了。代替它的将是新的国际。”

当我们回忆过去这些年代时，我们不必讳言，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同意我们的这些观点。第一次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团结起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决议中提出了以下的要求：“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社会主义部长退出资产阶级政府，从议会讲坛上、从合法报刊上，有必要的話，从秘密报刊上揭露战争的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性质。举行反政府的街头示威游行，在战壕里宣传国际团结的思想，支援经济罢工，在有利的条件下竭力把它们变成政治罢工，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否决了我们的这些建议。在齐美尔瓦尔德的正式机关刊物上声明说，“无论如何不应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似乎齐美尔瓦尔德希望引起分裂和建立新的国际”。在齐美尔瓦尔

德会议上，甚至有些左派分子也口沫飞溅地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思想。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对我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提出第三国际的口号”。为争取旧的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而斗争当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读者会记得，甚至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时也正式地属于“统一的”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迄今为止要想恢复国际联系的不益尝试正是沿着这条‘相互赦免’的道路进行的。第一次卢加诺代表会议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谁也不能加以‘谴责’。简直可以持空前未有、骇人听闻的背叛态度去进行战争，不谴责战争，也不把背叛说成是背叛。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变成了一出真正的喜剧，因为害怕说出哪怕是一句明确的话。伦敦代表会议做出了英法资产阶级想做的事情，但有意不切断通向相互赦免的道路。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则持这样的观点：最好不要‘谴责’任何人。会议的决议被完全纳入赦免的轨道。”

笔者在《关于“赦免”及其预言家》一文（见《反潮流文集》）中就是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然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没有白做。播下的种子很快长出了幼芽。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我们的思想取得了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更大的影响。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开始在组织上团结起来。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同法国、德国、瑞士和瑞典的左派同志们一起返回俄国前夕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起了第三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的作用。

从1917年春起，“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在俄国越来越普及了。在第三国际诞生之际，它就把自己的命运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有了具体的内容。而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壮大和巩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地位也加强了。

1918年底,越来越起着未来第三国际组织者的实际作用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斯巴达克派和奥地利共产党人发出一封公开信。发出这封信的缘由是英国工党决定在1919年1月6日在洛桑召开国际代表会议。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拒绝参加社会爱国主义也将参加的代表会议(在1917年时我们就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号召所有志同道合者一致拒绝。中央委员会列举了与它意见一致的所有组织:芬兰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立陶宛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列举了与它意见一致的瑞典、瑞士和意大利的部分社会党人以及英国马克林、美国德布斯和法国洛里欧的拥护者。这是当时站在我们一边的整个阵容。

1919年1月24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邀请全世界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邀请书是由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兰共产党国外局、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局、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人国外局、拉脱维亚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签署的。读者可以看到,当时发起者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但是,当时“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日益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那时德国斯巴达克派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初的光荣的战斗。在德国和奥地利,帝国宝座一个个烟消云散。革命的旋风开始在欧洲掀起。

那时候,似乎觉得刚刚刮起的旋风很快也很容易地会把旧的社会民主党象纸房子一样吹掉。当时,还不可能清楚看到,例如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成为如此强大的反革命因素。可敬的德国资产阶级教授李哈尔德·费斯特尔在一本题为《1914—1919年的国际》的小册子中说:“诚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未能阻止德国革命,但

它毕竟得以扼杀这个革命并组织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抗。”（见上述小册子第 29 页）这些话是在斯巴达克派在柏林被第一次击败后说的。但是在德国革命的蜜月里，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支柱。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的人数不多，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宣言性的。在上述邀请书上以十二条提纲的形式阐述了第三国际的“目的和策略”。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只限于这十二条的范围内。

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事情已经办了，第三国际已经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了。

1919 — 1920 年，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是共产国际蓬勃发展的时期。自发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整个欧洲汹涌澎湃，这种运动自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来一开始就日益蓬勃高涨。共产国际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对共产国际的同情浪潮波及到旧的社会党队伍内。甚至许多旧的“中派”领袖也转到了共产国际一边。1920 年春夏，正如马尔托夫不久前承认的，许多“中派”领袖在当时各种情况的压力下，产生了“中派”和左派结成同盟的念头。因此，象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样一些“中派”领袖，象希尔奎特领导的美国社会党代表等等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面临着被这些中派分子践踏的危险。当时，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时髦。封锁切断了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心的联系达数月之久。当时在国外，人们很少知道共产国际的真正观点，而许多“中派”代表开始认真地指望第三国际将会变成实质上很象第二国际那样的组织。意大利中派的代表莫迪利扬尼最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在 1920 年春主张加入(1)第三国际，理由是：“为什么不加入第三国

际呢?这不需要承担任何特别重大的义务,因为每三个月寄给共产国际执行机关一个明信片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共产国际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就从自我保护的朴素感情出发,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就产生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后来围绕这个二十一条展开了如此激烈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右派采取了防范措施,也同所谓左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当时就以最坚决的方式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思想,也对反对共产党人参加工会的所谓“左”的倾向进行了回击。代表大会竭尽全力可能把革命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代表大会一寸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阵地让给这些分子。

* * *

在1920—1921年期间,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的自发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大大地消沉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运动相对沉寂的时候召开的。资产阶级变得强大了,因此它的奴仆——社会民主党人也变得强大了。资产阶级起先窃笑伯尔尼代表会议,即战后恢复第二国际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述德国教授费斯特尔写道:“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唯一积极成果是在关于工人立法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见上述小册子第30页)资产阶级现在则看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拥护者们对它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共产国际的反对者:阿姆斯特丹国际、伦敦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第二半国际现在正企图联合起来。

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估计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期望的更加缓慢的发展速度。共产国际比较易于取得胜利的时期被这样一个时期所代替了:即每走一步,每前进一寸都要

经过战斗，只有通过顽强的斗争我们才能从资产阶级及其奴仆——阿姆斯特丹分子手中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是相当明确的。共产国际现在已进入了自己的组织阶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年中，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到处都发展起来了。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里，共产国际都有巨大的基地。

共产国际不能放弃细小的日常的工作。我们的党也应该参加并正在参加竞选斗争。法国党十分注意如象在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复选中共产党人的策略这样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这样做是正确的。德国共产党在佐林根或萨克森，即所谓“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取决于德国共产党的票数的地方，建议自己的代表不要采取一概抵制的立场，这样做也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在同阿姆斯特丹的斗争中对于还没有被夺取过来的阿姆斯特丹堡垒采取了围攻的办法，而不是冲击的办法，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尽千辛万苦、排除资产阶级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们设置的带刺的障碍物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共产国际各党一分钟也不应忽视摆在它们面前的那些伟大任务。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口号是：“到群众中去！”

共产国际发展中的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工人群众几乎带着宗教的色彩来对待共产国际。但是，这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某些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相当薄弱。那时候，共产主义对于群众来说尽管是很有吸引力的思想，然而还是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目前的阶段就不同了。不仅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组织已经深入广大群众的心灵。在旧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国家里，我们不仅要同重新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打交道，而且还要同几十年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非常有步骤、有计划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打交道。现在光凭热情是不能战胜资产

阶级及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的。我们必须用三倍的组织性来同它们的组织性相对抗。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到群众中去！”的口号的。只有战胜了“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我们才能直接给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有人把共产国际业已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堡垒进行的正确的然而缓慢的围攻，把共产国际刚刚开始细小的然而表面上效果不很显著的困难复杂的工作，看作是共产国际影响的衰落。不仅马尔托夫先生谈论起共产国际的“黄昏”，不仅毫无气节的列维哀叹共产党人影响的衰落并以证明德国共产党已经灭亡而引为光荣，而且一些比较年轻的和无耐心的共产党人有时也相信我们敌人的预言。实际上，任何悲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国际存在第一年之所以比较“易于”取得成就，是因为那时共产国际正处在玫瑰色的富于幻想的青春时期。现在共产国际已进入成年，已进入工作更为困难、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共产国际是在国内战争的口号下诞生的。这个国内战争必然会经历许多波折，有时激烈以至达到沸点，有时表面上沉寂似乎无声无息。现在有些地方就出现后面这种现象。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象一首法国社会党的士兵歌曲中所形容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较为合法的战争，
就是反对压迫者的战争；
而这种唯一合法的战争，
我们也没有去进行。

不，现在这种唯一合法的战争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国内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就象冬天过后春天必然会到来一样。

俄国共产党可以为她迄今对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而感到骄傲。然而，她将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底。

事态的发展“使俄国变成了苏维埃国家,使莫斯科变成了国际的首都,使俄国农夫变成了世界文化命运的主宰者”——一位俄国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喧嚣一时的《路标转换文集》中这样写道。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标转换派”出于民族爱国主义的激情承认苏维埃政权,但按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过于简单的态度来想象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个派别“保卫”苏维埃政府,反对俄国反革命,说什么你们干吗要批评同第三国际相好的苏维埃政府的反爱国主义和变节呢!难道克里姆林宫利用第三国际来为自己的大国主义政策服务有什么不好吗?……

“由于命运的不幸戏弄,或许由于历史的公正裁决,现在可能完成俄罗斯民族大业的不是在‘第三罗马’的俄国,而是在‘第三国际’的俄国。”(尤·尼·波切欣:《路标转换文集》第83页)

这些新教徒简直相信,似乎苏维埃政府把共产国际看作是自己对外政策的辅助工具。最有教养和最有远见的资产者毕竟还不懂得,国际工人协会对于世界上第一个劳动者政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新教徒先生们,不是共产国际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而是我们大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服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就是共产国际。先生们,事成之后你们才会明白这一点,因为你们是最大的经验主义者,你们只相信“马上可以到手的东西”。先生们,给我们时间吧!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再前进一步或几步时,当苏维埃政权至少再在两三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时,你们或许会明白共产国际的真正的国际意义和世界意义了。

译自《真理报》1921年11月13日。

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 加入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 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支持无政府 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

(提 纲)

(1921年12月)

1. 目前，国际工人运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向整个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提出了新的重要的策略问题。

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化，失业现象正在增长，国际资本几乎在所有国家里都转而向工人发起不断的进攻，这首先表现在资本家公然设法降低工人的工资和整个生活水平。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凡尔赛和约的破产。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制度，那么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几场这样的战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2. 由于种种情况而在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中显得有些活跃的改良主义幻想，在现实的打击下，已经开始为另一种情绪所代替。在帝国主义大屠杀以后重新出现的工人（一方面是最有特权的工人。另一方面是最落后的、最缺乏政治经验的工人）的“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华盛顿会议今后“工作”的进程和结果将给这些幻想以更大的打击。如果在半年前还有某种根据说欧洲和美洲的工人群众有某种普遍右倾的趋

势,那么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已经开始左倾。

3.另一方面,在资本变本加厉的进攻的影响下,工人中间产生了自发的、简直无法抑制的统一的愿望,同时,广大工人群众对共产党人的信任也逐渐加强。

越来越多的工人现在开始重视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英勇精神,而这个先锋队早在广大工人群众对共产主义漠不关心甚至抱敌视态度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现在相信,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在最困难的、有时还要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来捍卫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现在,当比较落后的工人阶层看到了改良主义幻想的破灭并了解到不进行斗争就无法摆脱资本家的掠夺性进攻的时候,对工人阶级的毫不妥协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爱戴和信任就重新加强起来。

4.共产党现在可以而且应当收获自己过去在群众漠不关心的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斗争的果实。但是,全体工人群众一方面越来越信任工人阶级中最不调和、最富有战斗性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统一。投身到积极生活中来的、缺乏政治经验的新的工人阶层希望把所有的工人政党甚至所有的工人组织都联合起来,希望以此来增加抵抗资本家进攻的力量。这些过去往往没有积极参加过政治斗争的新的工人阶层,现在正在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来重新检验改良主义的实践计划。无论是这些新的工人阶层,还是参加旧的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工人都已经不愿同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的反对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行为实行妥协。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同共产党人协商。但同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改良主义者的信任,并且有很大一部分群众还支持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政党。这些工人群众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计划和意见,但是整个说来,他们都有一种

新的愿望，希望恢复统一战线，并竭力迫使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政党和工会同共产党人一起去反击资本的进攻。因此，这种愿望是进步的。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实质上已经破灭。在目前工人运动所处的整个环境中，每一次重大的群众发动，甚至在开始时只是提出局部口号的发动，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更加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革命问题提上日程。如果新的工人阶层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确信改良主义是一种幻想，确信妥协必遭破产，这对共产主义先锋队只会是有利的。

5. 在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背叛行为进行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抗议的初期，这些领袖掌握着工人组织的整个机构。他们利用统一和无产阶级纪律的原则来无情地压制革命无产阶级的抗议，并且毫无阻碍地把工人阶级组织的全部力量用来为本国帝国主义服务。在这种条件下，革命派必须竭力为自己争得鼓动和宣传的自由，即向工人群众揭露工人群众自己建立的政党和工会过去和现在所表现的史无前例的叛变行为的自由。

6. 当在组织上已能保证充分自由地对工人群众发生思想影响以后，各国共产党现在应当在一切场合下竭力使这些群众的实际行动尽可能达到更广泛和更完全的统一。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在口头上宣传统一，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完全相反。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妥协派在用组织手段压制抗议、批评和革命号召的企图失败后，就开始在劳动群众的斗争中进行分裂、瓦解和有组织的怠工，以便趁机逃出他们自己走进的死胡同。目前，共产党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事实揭露这些旧的叛变行为的新形式。

7. 然而，欧美工人阶级的总的经济状况引起的深刻的内部发展过程最近正在迫使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政客们和领袖们把统一的问题提到首位。对于那些正在积极投入新的自觉生活的、缺乏经验的工人阶层来说，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真

正表达了把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进攻的真诚意愿,而对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和政客们来说,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不过是再一次企图欺骗工人,企图以新的方式引诱他们走上阶级“合作”的老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华盛顿)日益临近的危险、军备的增加和暗中缔结的各种新的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使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敲起警钟,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是相反,这一切将必不可免地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内部引起摩擦和分裂,整个说来就同国际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发生的摩擦和分裂一样。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改良主义的基础就是“社会”改良主义者同“本”国资产阶级的团结。

这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确定自己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的总的条件。

8. 考虑到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支持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主动。当然,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必须根据各该国的条件和环境而加以具体化。

9. 在德国,共产党在最近的全德代表会议上表示支持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并认为也可以支持愿意多少认真地反对资本家政权的“统一工人政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并相信德国共产党能够在充分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深入到更广泛的工人阶层中去,并在群众中加强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德国,将有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群众日益相信,共产主义先锋队是正确的,它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愿放下武器并坚决指出:用来消除危机的各种改良主义方案都是幻想,这种危机只

有用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

10. 在法国，共产党在参加政治组织的工人中享有多数。这就使法国的统一战线问题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是在这里也必须使我们的对手对统一的工人阵营的分裂负全部责任。不管茹奥、梅尔黑姆之流所领导的改良主义的劳工联合会如何经常不断地出卖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法国共产党人和法国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分子仍然必须在每次群众性的罢工、革命示威或其他直接的群众发动开始以前，向改良主义者提出支持工人发动的建议，并在他们拒绝工人的革命斗争时不断地揭露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容易地争取到无党派工人群众。当然，这绝不能使法国共产党削弱自己的独立性，例如，在选举运动中有任何支持“左派联盟”的做法，或者对那些因为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而痛哭流涕的动摇的共产党人采取容忍的态度。

11. 在英国，改良主义的工党拒绝接受共产党，但接受了其他工人组织。在上述情绪在工人中增长的影响下，伦敦的工人组织不久前通过一项决议，接受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

当然，英国在这方面是个例外，因为由于种种特殊条件，英国工党已成为一个类似全国工人总联合会性质的组织。英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掀起有力的运动迫使接受英共加入工党。英国工会领袖最近在煤矿工人罢工时的叛卖行为以及资本家不断压缩工人工资等等——这一切在革命化的英国无产阶级群众中引起了深刻的骚动。英国共产党人应竭尽全力无论如何要在反对资本家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

12. 在意大利，年轻的共产党对不久前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改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党和社会叛徒式的劳工联合会采取绝不调和的态度，同时，正在开始宣传建立反对资本家进攻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意大利

共产党人的这种宣传是完全正确的，并要求朝着这个方向加强宣传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具有充分远见的意大利共产党能够给整个共产国际树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榜样，能够处处无情地揭露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改良派和中派的动摇性和背叛行为，同时在越来越广泛的群众中不断地、日益加强地、深入地开展争取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统一战线的运动。

13.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参加政治组织的工人中享有多数，在那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某些方面同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相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巩固自己的独立性，同中派断绝最后的组织上的联系的同时，应当善于在国内普遍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从而在最落后的工人面前彻底揭露实际上是资本家代理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中派分子。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还应当加紧进行工作，以争取目前大部分还掌握在黄色领袖手中的工会。

14. 在瑞典，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以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不大的共产党党团能够起很大的作用。第二国际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瑞典资产阶级的总理布兰亭先生目前的处境是：为了形成议会的多数，他不能不考虑瑞典议会中共产党党团的行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瑞典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拒绝支持布兰亭的孟什维克内阁，就象德国共产党人在德国某些州政府（如图林吉亚）中所正确地做过的那样。然而，这决不是说，瑞典共产党人应当尽量削弱自己的独立性或拒绝揭露孟什维克政府的性质。相反，孟什维克掌握的权力越多，他们就越背叛工人阶级，而共产党人也就越应当努力在最广大的群众面前揭露这些孟什维克。

15. 在美国，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的一切左派分子开始在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使共产党人有可能成为这种左派联合中的核

心,从而深入到美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去。在任何地方,哪怕只有几个共产党人,美国共产党人就应当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联合组织,同时应当善于领导这个把一切革命分子联合起来的运动,而现在应当特别有力地提出旨在保护失业者等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龚帕斯工会的主要过错就是他们不愿意参加建立反对资本家、保护失业者等的工人统一战线。

16. 在瑞士,我们党在上述道路上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宣传,迫使工会官僚们召开工会紧急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该很快举行,在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朋友一定能够在全体瑞士工人面前揭露改良主义的虚伪性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事业。

17. 在其他许多国家中,由于其他许多地方条件的不同,问题的提法也有所不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制定总的路线时相信,各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根据各该国家所处的情况来运用这条路线。

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共同的和必须遵守的主要条件是:在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各党实行某种协议时,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批评共产党人的反对者时,每个共产党都要保持绝对独立和完全自主。在遵守行动纪律的同时,共产党人务必使自己在行动前和行动后,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行动时有权利和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任何一个组织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这个条件。共产党人要支持使所有工人组织在反对资本主义战线的每次实际行动中最大限度地统一的口号,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拒绝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始终不渝地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对所有兄弟党提示一下俄国布尔什维克——目前唯一战胜了资产阶级和掌握了政权的党的经验是有好处的。在从布尔什维主义诞生到它战胜资产阶级为止的十

五年间(1903—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改良主义即孟什维主义的不倦的斗争;同时,在这十五年间,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同孟什维克的正式分裂发生在1905年春。但是到1905年底,在蓬勃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暂时建立了共同战线。同孟什维克的第二次正式分裂最终发生在1912年1月。但在1905和1912年间,即在1906—1907年以及在1910年,分裂曾被联合和半联合所代替。这些联合和半联合的产生不仅是由于派别斗争的变化,而且是由于广大工人阶层的直接压力,这些工人阶层已经投入积极的政治生活,按实质说,他们要求有可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检验孟什维克的道路是否真的同革命的道路有根本的分歧。在连纳罢工之后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夜的新的革命活跃的形势下,俄国工人群众中间出现了特别强烈要求统一的愿望,当时俄国孟什维主义的政客领袖们打算利用这种要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体上就象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现在所打算的一样。俄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用拒绝任何统一战线来回答当时工人们要求统一的愿望。相反,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对抗孟什维克领袖们的政客手腕而提出了“来自下面的统一”的口号,即建立工人群众本身在反对资本家和争取实现工人的革命要求的实际斗争中的统一。实践表明,这是唯一正确的回答。由于采取了这种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的策略,很大一部分优秀的工人孟什维克逐渐被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了。

20. 在提出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允许共产国际各支部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各政党和工会达成协议的同时,共产国际自然不能拒绝在国际范围内达成这类协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经在援助俄国饥民时向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过这个建议。它在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发生对工人的迫害和白色恐怖时又提出这个建议。

现在,当华盛顿会议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它表明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正在威胁着国际工人阶级)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提出建议。到目前为止,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当提出实际行动问题时,他们实际上就拒绝自己的统一口号了。在所有这种情况下,整个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任务就是向广大的工人群众揭露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的伪善。这些领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统一,而不愿同革命工人统一,例如,他们宁愿留在国际联盟所属的国际劳工局内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的组成部分,而不愿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华盛顿的斗争,等等。但是,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对共产国际某个实际建议所作的拒绝,不能使我们放弃在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的、我们应当善于坚持不懈地发展的既定策略。在共同进行斗争的建议遭到我们的对手拒绝的情况下,必须让群众知道这一点,从而使他们认清,谁是工人统一战线的真正破坏者。在建议被对方接受的情况下,应当竭力使斗争逐步深入和提高。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使广大工人群众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同其他组织进行的谈判,必须关心建立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中的一切变化。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提出预定计划的同时,向所有兄弟党指出这个计划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遇到的危险。并不是所有共产党都已完全成熟和巩固,并不是所有共产党都已同中派和半中派的思想完全决裂。因此,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的现象,也可能产生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的党派溶化在暧昧不明的统一联盟中的倾向。为了成功地实行上述策略以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必须使实行这一策略的共产党本身坚强有力,团结一致,必须使领导人思想明确。

22. 在共产国际内部多少有些理由可以算作是右派或者甚至

半中派的集团中，无疑也存在着两种倾向：（1）一些人确实没有抛弃第二国际的思想和方法，没有摆脱对第二国际以往的组织力量的崇拜，而半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同第二国际，因而也是同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上妥协的道路。（2）另一些人则反对形式上的激进主义，反对假左派的错误等等，竭力使年轻共产党的策略更加灵活机动，以保证它们有可能更迅速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各国共产党迅速发展的进程有时在表面上把这两种倾向纳入一个阵营，似乎成为一个集团。采用上述办法是揭露共产党内部的真正改良主义倾向的最好办法，其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群众联合行动中给予共产主义的鼓动以支持，如果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就可以根据经验改造那些偏激的或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左派分子，并把改良主义的赘瘤从党内清除出去，从而大大有助于共产党内部的革命团结。

23. 工人统一战线应当理解为一切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战线，其中也包括目前还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等等的工人。在拉丁语系的国家中，这种工人的数目还相当多。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这样的工人也能帮助革命斗争。共产国际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指出要对这些工人采取友好的方针，他们现在已逐渐克服自己的偏见而越来越靠拢共产主义。现在，当反对资本家的工人统一战线已开始成为现实的时候，共产党人就更应当关心他们。

24. 为了最后确定按上述方针规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不久将来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国党应派比通常多一倍的代表参加。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密切注意上述方面的每个实际步骤，并要求各国党把实行上述方针的每次尝试和每个成就的详细情况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译自《真理报》1921年12月18日。

再论统一战线的策略^{*}

(1921年12月)

在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当中,有些人把共产国际的新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放弃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人们竭力制造这样的流言,说什么在我们当中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特别是硬说托洛茨基同志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被置诸脑后,导致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前景已因工业开始繁荣而变得黯淡。

应当说在柏林出版日报的列维派至今还在转载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片断,这些人总想从那里读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必须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从根本上驳斥了所谓我们的分歧的神话。

人们还引用最近一期(第19期)《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的巴甫洛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决不认为世界经济危机业已结束,那里只是说,在一些国家里,“看来已经出现某种变化”。作者对11月份的综合评论则具有较为悲观的性质。

在我们的提纲中说得很明确:“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化”,不言而喻,这丝毫不否认,在某个国家里,在某个月份里,出现暂时的好转。总的说来,所有——比较严肃的——观察家都证明危机的尖锐化。就拿法国为例来说吧,日益清楚地表明,这个最富裕的国家正经受着濒临破产的金融危机。

* 这是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全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摘要。——编者注

我们还听到对我们的提纲作这样的解释：国际帝国主义者分割中国之后——这一点已在华盛顿会议上谈到——，就准备来分割俄国。形势对我们十分危险，因此我们就宣布统一战线的口号。

这种解释是十分荒谬的。难道在1919年时形势对苏维埃俄国不危险吗？然而正是在1919年，共产国际卷起袖子到处实行了决裂。当时四面八方对我们叫嚷说：你们在埋葬自己，你们在挖自己的墙脚。龙格曾叫嚷说：我们拥护苏维埃俄国，而你们把我们开除了，不理解我们的统一是你们所必要的，以便使我们能够帮助你们保持政权。当时我们回答这些先生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是从“克里姆林宫”的某种特殊利益出发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那么你们就错了，另外，你们对我们进行了诽谤。不言而喻，我们希望俄国的政权保持在工人阶级手中，保持在我们党的手中，但是，我们决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如果我们看到这有损失于其他某个国家工人阶级利益的话。

我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前景时，根本不是考虑使我们本身能够维持一段时期，我们是掂量各国工人的利益的。目前，估计到全世界的形势，我们深信，统一战线的口号正是出于无产阶级的这些共同利益而提出来的。

如果我们现在提出由于贯彻我们的提纲而出现的一些策略问题，那么我们不得不指出，很明显，引起同志们最大困惑的是我们同俄国孟什维克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发言的一位同志试图援引匈牙利共产党人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这个例子是很不恰当的。我们的匈牙利同志在取得政权后同孟什维克联合成统一的政党。这正是不应实行统一战线的例子。

当然，我并不是想来责备某位匈牙利同志；他们犯这类错误是有其重大原因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力量薄弱。我们现在

活动的环境不同了，而由于环境不同，策略也应有所不同。

不，这里不应当援引匈牙利的例子，而应当援引我们俄国在为政权而斗争、使千百万群众做好革命准备时期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曾经有个时期，我们不得不同孟什维克达成某种协议，这种协议后来我们撤销了，以便在一定阶段上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来恢复

俄国以往历史上的这一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深刻考虑的。

可以在我们革命道路的一定阶段上同孟什维克达成某种协议。我们同孟什维克的共同生活是以年来计算的。曾经有个时候，我们同马尔托夫坐在一张编辑桌子后面，同在一个党内；曾经有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委员会；而当我们掌握政权时，我们必须把许多孟什维克关进监狱。当相当广泛的群众中还存在着幻想，似乎可以不经武装起义就能取得胜利，一切都可以靠联合政府来安排，可以把所有工人都联合成一个政党，可以付出较低的代价来为工人阶级购买舒适的生活时，当身上带着不完全成熟的孟什维主义杆菌的新的工人阶层来参加政治生活时，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在这些群众的压力下同孟什维克实行暂时的和解，同他们达成临时的协议，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经验向这些工人阶层表明，孟什维主义是不正确的，除了我们预先选定的道路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出路。

有人或许会问：“那么现在我们俄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不是说让孟什维克合法化呢？毫无疑问，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一定会对我们说：首先请你们把关在监狱里的孟什维克放出来吧！他们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我们珍惜的是同忠实的孟什维克工人联合。但是我们说，我们目前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可以在孟什维克同意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罕见的清醒的时刻，同孟什维克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而在我们这里这个问题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提出来呢？是

否可以在组织反苏维埃俄国的罢工的基础上，在支持去年春天孟什维克企图发动的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基础上提出来呢？正因为这样，我们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已经赢得了政权，我们已经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从孟什维克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政党那里争取过来了。我们依靠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工人阶级按一定的路线支持苏维埃政权的统一战线。在我们这里，同孟什维克的任何一种联合都将是无的放矢、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根本谈不上。正因为如此，不管向我们提出多少这样恶毒的问题，我们在每次工人国际集会上都将象现在在这里说的那样公开地进行解释。我们说，在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式人物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在大资产阶级的特殊压力下，孟什维克有时可能倾向于工人阶级，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我们就不能拒绝协议。而在政权已经转到工人阶级手里，孟什维克已成为公开的反革命势力并企图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的那些国家里，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他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一定会明白这一点。

我是从我在哈雷的一次经验中明白这一点的。在哈雷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些恶毒的问题，在那里独立党人领袖先生们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会使我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甚至让我说出这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所实行的恐怖。但是，我们拾起了手套，接受了挑战。通过这一点，左翼工人们，即未来的共产党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了解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当他们对他们说，他们到时候可以把谢德曼^德辈和半谢德曼辈关进监狱的时候，他们简直是馋涎欲滴，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不难理解这一点的。

其次，人们问我们，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怎么办呢？同半执政的和象诺斯克那样关在监狱里的孟什维克们实行统一战线吗？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们必须说定：我们不想同大大小小的诺斯克

结成任何的联盟。那么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象俄国 1913 年时一样：我们把新的工人阶层和一部分还跟着国际孟什维克走的老工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建议的革命战略就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我们希望从这里得出同诺斯克结成联盟的结果。有人对我们说，昨天我们要绞死谢德曼，而今天又向他伸出一只手，这是妄费心机的。问题不在于谢德曼。我们是面向群众，而不是面向谢德曼。我们指望向那些还相信可以同谢德曼结成统一战线的工人们清楚地表明这个谢德曼的面目。我们是面向群众。他们将会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希望同考茨基联合，我们希望同那些不想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而想维护自己工资的无党派工人们结成统一战线。我们主张向这些工人们作一系列让步，我们不怕在所有的国家里说出这一点。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困难，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参与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参与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过程。自发的高潮已经开始，但它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始的。自发的因素还很软弱，而有组织的因素要比它大一百倍。正因为如此，目前已经开始的新的要高潮要按新的方式来进行。

它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现在我们有了或多或少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共产党。这将是同共产主义的组织性伴随而来的新的高潮。换句话说，躯体上将长出一个脑袋。这就是新的高潮和过去的高潮不同的地方。新的特点就在于此，而这个新特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这个新过程。我们迎上前去，以便在起码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揭露那些还跻身于工人阶级朋友之列的领袖们，他们在三个星期以前还通过决议：一旦战争爆发就实行总罢工。我们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说：我们不需要总罢工的决议，把这些决议藏在口袋里吧，因为我们不相信你们的任何一句话。我们看到你们通过的决

议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我们要别的东西。我们建议你们：支持在德国和意大利开始出现的反物价高涨的运动。我们建议你们：在税收等问题上支持工人。换句话说，我们建议你们支持工人们的起码要求，这是每一个忠心拥护工人阶级的人所必须捍卫的。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建议你们给现实的工人运动以实际的支持。

但是问题在于，妥协派把自己和资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不可能支持工人们的这种起码的斗争。为什么我们要同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对话呢？是因为资产阶级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因此，孟什维克也变得强大起来。但他们变得强大是因为资产阶级变得强大，因为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第二国际没有最终灭亡，这是因为我们在1919—1920年时没有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资产阶级活着，因此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也活着。但是这两个国际之所以强大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光。它们已处于奴隶般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地位，没有资产阶级，它们是连一个指头都不敢动的。它们不可能支持德国的规模巨大的经济罢工，在税收问题上它们也必然同反动派站在一起。它们不可能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反对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向他们建议不是在10年后未来总罢工的基础上，而是在现在业已开展起来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把尖刀，而我们正是用这一点来揭露他们。

共产国际的策略就是这样，我们相信，在我们拥有的俄国经验的基础上，在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将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将完成它应该完成的工作。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20期

第5149—5154页。

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2年1月22日)

同志们!我的任务是向你们最扼要地阐述一下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拟定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任务是怎样设想的。

亚洲已成为政治的中心

全世界象一只被套索套住的小鸟竭力挣扎以便消除帝国主义大战的可怕后果,迄今已经3年多了。我认为,战后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是欧洲问题,而是亚洲问题、远东问题越来越占居首要地位,这些问题开始排挤世界政治中的其余一切问题。如果看一看围绕着帝国主义战争后缔结的和约所发生的斗争,那么这一点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最近发生的事件,如白里安内阁的辞职清楚地表明,欧洲问题已经越来越趋于结束。曾经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踏步不前。战胜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战败国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在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亚洲问题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那时欧洲问题毕竟还居于首要地位。现在,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不得不相信,倘若纷争只限于欧洲的范围,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就象是杯水中的风浪。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角逐已经结

東，重心已经移向亚洲，从而远东问题开始变得比过去迫切百万倍。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

你们清楚地记得华盛顿会议的保证，会上曾试图解决裁军问题，答应医治朝鲜的创伤，解决中国问题，使远东各国人民得到幸福。实际上，这次会议试图把最无耻的帝国主义掠夺与最卑鄙的两面手法和虚伪态度结合在一起。只要回想一下威尔逊答应使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得到幸福的臭名昭彰的讲话，就可以使人们相信，在帝国主义采取特别虚伪形式的地方，人们就可以在美国资产阶级中间寻找它的炮制者。这一次情况也是这样。在华盛顿，本应实现伟大的奇迹。远东各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尽管曾经多次受骗，但仍对华盛顿会议寄予某些希望。现在，我们可以对华盛顿会议下结论了。1921年12月10日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12月10日，当今最强大的四个帝国主义政府，即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签订了协议。华盛顿会议的主要保证大家都已知道。这个保证就在于他们不愿解决裁军问题，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解决了扩大军备的问题。

受骗的朝鲜

关于远东某些国家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朝鲜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人们曾经向你们保证，而连朝鲜解放运动的某些活动家也天真地寄希望于华盛顿，并以为棍棒里是射不出子弹来的。在会上甚至没有提到朝鲜这个词，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先生们在幕后交换意见，如何进一步扼杀朝鲜。

对中国“门户开放”

大家知道，中国问题总的说来是按照美国的意图，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来解决的，也就是说美国资本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在中国市场上以更大的力量战胜其他一切资本。据我们掌握的远非全面的材料，中国革命南部的大活动家们无不恭敬地注视着美国。华盛顿会议将擦亮中国南部具有远见卓识的活动家们的眼睛。

对蒙古的忽视

华盛顿会议也没有忘记谈及蒙古问题。蒙古问题正在成为所有资本家踢来踢去的皮球。现在，得到一部分卖身求荣的中国政治活动家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利用这个问题，以便通过他们在爱国民主义的借口下使蒙古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由于蒙古现在是否应当归还中国的问题而尖锐起来。

远东问题的尖锐化

大家知道，在华盛顿开始的外交巨头会议目前还在继续。继华盛顿会议后，又召开了热那亚会议。不知热那亚会议将何以告终，将在何种程度上涉及远东问题。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华盛顿所确认的无疑是远东问题的尖锐化。

早在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前，一个英国商人平均剥削不少于八百个殖民地土著居民，英国从这些殖民地身上榨取血汗和利润。进一步的斗争和角逐也将因此而展开。

看一看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情况，就使人想起了已故饶勒斯在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几小时说的话。他在揭露即将爆发的战争的实质时说：“现时政府的代表们是按下列公式行事的。我在这个街角上进行掠夺，并对你在那个街角上进行掠夺闭上眼睛。”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大致也是按这个纲领进行的。日本对美国说：“我将对你在某个地方的掠夺闭上一只眼睛，我也要求你对我掠夺朝鲜闭上两只眼睛。”等等。我以为，对于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所有领导人，包括那些不同意共产主义观点的领导人来说，华盛顿会议将特别清楚地表明，除了新的压迫、新的剥削以外，每一个有觉悟的人都不可能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期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华盛顿会议后，又空前迫切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真正解决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问题的出路何在？

现在我来简单地谈一谈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个重要国家面临的这些任务。

对中国的掠夺

近10年来，中国似乎是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者面对一个手无寸铁和力量软弱的国家所能恣意妄为的典型国家。

20世纪初期和更早一些时候的事件是帝国主义无耻行径和强盗行为的典型事例。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民族被人数极少的一伙帝国主义强盗所掠夺，至今还部分地处于这种地位。根据最新的资料，在有150万中国人的上海，共有2万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奴役着当地全体居民，并且企图扼杀他们的文化生活和民族生活。我不想来谈当地居民所受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侮辱事件。关于这一点，你们自然可以向我们欧洲人说很多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竟然发生这样的现象，这是整个人类的奇

耻大辱。如果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方式，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给中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们提供指路明灯。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分散的和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完成最基本的任务，即把一切掠夺者从中国赶出去。

我们非常清楚，在中国掀起的反帝怒潮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抗议怒潮，而是人民想要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但是我们声明，共产国际完全地和无私地支持中国人民的这种愿望。

日本在朝鲜的压迫

在朝鲜也象在中国一样，一小撮人统治着全体朝鲜人民。据不完全精确的统计，1917年在朝鲜2千万居民中有33.2万日本人，约占1.5%。在这33.2万人中，有14.4万人居住在朝鲜的八个城市，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渗入朝鲜基本居民所生活的农村。日本借助这些极少数的资本家及其走狗企图统治和压迫98.5%的朝鲜人。不应忘记，日本资本将在朝鲜日益强大，直到朝鲜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止。

当某些领袖把希望寄托在凡尔赛，寄托在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善心上时，共产国际怀着疑虑和委曲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发生的某些事态变化。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应是向朝鲜和中国的革命者们说明，他们应当一劳永逸地抛弃自身中和人民中存在的幻想，认识到要解决中国和朝鲜的民族问题，只有同欧美革命工人结成紧密的联盟才有可能。

蒙古问题

现在来谈谈蒙古问题。倘若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家中间，有人学究式地对待蒙古问题，提出蒙古现在应当归还中国的问题，那是极其可悲的。只有当中国本身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任何一个企图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远东各国人民决不应当忘记这一公理。我们应当提醒中国革命者，他们不要在蒙古问题上重犯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中常犯的那种错误。

日本无产阶级的作用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还有压迫民族的代表。我们这里有来自日本的很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一点说明共产国际在解决远东问题上的道路是正确的。

日本人被称为东方的普鲁士人，部分日本资产阶级因此引以自豪，他们企图使日本工人也染上这种血迹斑斑的爱国主义，正如欧洲帝国主义者曾得以使欧洲工人染上这种爱国主义一样。年轻的日本工人阶级必须严防自己染上这种被称为沙文主义而日本资产阶级正竭力在工人中加以培养的痼疾。

日本是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

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我们套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没有日本的革命，远东的任何革命都将是杯水风浪。只有战胜日本资产阶级，才能真正解决远东问题。

日本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日本的工人刚刚开始觉醒并组织起来。

日本大约有 300 万工人和 500 万贫穷的农民。日本正经历着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同时我们看到，日本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日本资产阶级正处在极其幸运的境地。它正在收获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果实，大发横财，同时又没有碰到日本工人运动的紧握着拳头。日本工人运动的命运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未 来 的 战 争

鉴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仇视和角逐，可以预言随着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将会发生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其目标是解决太平洋问题。不可能确切地说，这场战争将在 1925 年还是在 1928 年爆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爆发，但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年轻的日本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并同美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才能使人类防止这场战争，才能使我们摆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由于陷入空前苦难和由美日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带来的过多的花费。因此我们有权说，解决生活在中国、朝鲜和蒙古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的钥匙掌握在日本工人阶级的手里。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使被压迫者，不只是无产阶级，而且是整个远东的人民群众和日本的工农业无产阶级之间的行动协调一致。东方各国少数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们应当找到这种十分正确的、完全合适的解决办法，以便使以日本的年轻工人阶级为一方和以遭受日本压迫的那些国家的亿万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行动取得真正充分的协调一致。

为被压迫者说话

共产国际在自己旗帜上写的是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不仅仅是欧洲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掌握着主动权，能否使目前主要任务是民族解放的远东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中国、朝鲜、蒙古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这不是它们的过错。它们现在不可能立即跳越几个阶段。它们目前处在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是很自然的。这没有什么不好。真正糟糕的是，我们不善于把这个运动同日本和美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要劝告我们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人同志们，他们不是站在运动之外的小团体，他们不要藐视那些目前还不是共产党人的苦难大众，而要深入群众，与正在中国和朝鲜进行斗争的千百万人打成一片。

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民族运动的活动家们说，抛弃你们对凡尔赛和华盛顿的信仰吧！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诡计。要知道，历史的进程将这样提出问题：不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一起赢得独立，就是你们不能赢得独立。这个问题不是由理论家、作家，也不是由某个领袖的幻想这样提出来的，而是由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进程这样提出来的。目前，世界帝国主义把远东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

我们要对代表大会的两部分人，即一部分是有觉悟的并负有使命组织工人阶级去战胜资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另一部分是率领

劳动群众去争取民族解放的领导人说，你们之间的联合是必要的事业，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这种联合，我们就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事。目前，当世界资产阶级还不知道它的未来的光景将是怎样，还不知道它是处在繁荣的前夕还是处在奄奄一息的境地时，你们就是天平上举足轻重的砝码。如果你们向东方的昏睡宣战，如果你们领导斗争，不惜牺牲，并知道有共产国际这个领导人，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活到世界革命的真正的和彻底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2年1月24、25日。

关于统一战线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

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简要报道)

(1922年2月)

季诺维也夫同志一开始谈到统一战线问题同苏维埃俄国及其新经济政策的联系。我们的敌人常常幸灾乐祸地来谈论这一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当然，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问题有联系的；我们的策略是考虑到世界革命及其进程和准备工作的。世界革命目前只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俄国是全世界的1/6，因此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大部分。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处于何种关系，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1920年华沙附近的事态具有另一种性质而我们战胜了波兰资产阶级，那么这就是在世界革命发展事业上前进了一大步。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对农民，部分地也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影响到世界革命的进程；但是反过来，世界革命的延缓也影响到俄国革命发展的速度。我们无需讳言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我们的弱点。的确，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有关系的，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俄国的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是同世界革命的利益紧密联系着的；一个影响另一个。只有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立场上的人才会说，这是为了自己的狭隘利益而滥用这种紧密联系。

有些同志完全同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在俄国问题和救济饥荒的问题上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统一战线”在我们的共产主义文献中是有巨大的理论根据的。他回想起，在1919—1920年，当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那时还没有进行热那亚谈判，苏俄还处于外国军事危险的威胁下，列宁同志曾建议实行这一策略。季诺维也夫从列宁同志的小册子《左派幼稚病》（《英国左派共产主义》一章）中引用了一系列引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有充分根据的，早在1919—1920年时就解决了，当时列宁同志谈到必须支持工党，但同时也认为，我们“支持韩德逊，正象用绞索吊住绞犯一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5日谈到过统一战线，说它可以起到用来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策略手段的作用。我们同机会主义者不是派别的意见分歧，而是十分明确的阶级矛盾。只有同共产国际交往不多的知识分子才会忘记，即使在1919—1920年，在苏维埃俄国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我们也象现在这样坚持同样的观点，而统一战线是由世界革命的整个进程所指使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谈到为什么正是现在我们才特别强调统一战线时，简短地叙述了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1919年时我们相信世界革命很快会取得胜利；正如蔡特金同志在谈到德国时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当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甚至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做好准备。当时还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起了消极的作用。直接的迅速的胜利没有取得，它可以说是从手指缝里溜掉了。必须制定新的策略，采取新的立场。必须在各国建立坚强的共产党，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建设世界共产党的阶段。

群众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已经感觉到需要安宁，他们想避免新的危险，想躲避新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作为有远见的马克思

主义者曾经未能预见这一点。我们曾预言战争，预言深刻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未能预见这种想要安宁的愿望，要求一块面包或者一块肉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新的改良主义，即同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的新改良主义盛行起来。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尚未成型的运动，群众乐于倾听关于安宁和一块面包等等的甜言蜜语。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无声的反对势力。这种现象可能是危险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签订持久的协定来奴役群众；但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它一看到这种情绪就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我们是各国发动这种进攻的目击者，其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日，缩减实际工资，恶化生活和工作条件。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新的危机，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中出现了新的思潮，产生了对改革的不信任。工人们相信，不经过斗争，他们是得不到他们所如此渴求的面包的。他们看到，社会民主党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履行也不可能兑现。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工人运动中的崭新的时期，只有聋子和瞎子才感觉不到这一点。进攻引起了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同时也产生一种感觉，为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需要团结，需要统一战线，过去由于没有统一战线，它一直被打败。对于处境为什么恶化的问题，工人们回答说：是因为我们分裂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正确的。工人们这样想：“如果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那么我们还要被打败。”看不到工人们的这种思想状况（不解决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就等于帮社会民主党人的忙。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是给我们提供了通向这一策略的钥匙，但是群众对统一战线的向往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朗，在代表大会上它还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情绪也有其缺点。工人们有时想，如果实行统一战

线，一切政党就必须联合起来。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需要向工人群众解释政党的作用，它是阶级的头脑，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假如工人群众千百次地强烈希望一切政党联合起来，我们将坚决反对，不受群众的情绪所左右，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我们将这样做。同时，这个运动也具有自己健康的内核：它的实质是希望统一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希望吸取战争的一切教训。而这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果我们善于深入群众并掌握对他们的领导，那么这将是一件大事。1919年，群众运动曾经是强大的，但那时没有共产党，后来有了共产党，但是群众运动却没有。现在两个因素都有了，而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它们。至于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指的不仅是属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工人，而且是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无党派和基督教社会党联盟的工人。法国同志们对后一种说法特别挑剔。但是，我们早在统一战线的提纲中就谈到这一点，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同所有工人，包括基督教社会党人在内并肩投入战斗，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资产阶级的事业就完蛋了。正是有这样一些群众参加的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表明，发动经济罢工的工人们实际上不自觉地举行了政治罢工。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愚蠢的！除了资本的进攻以外，工人们还感觉到新战争的危险。连一个普通工人也明白，既然在华盛顿大谈和平，那就是说新的战争就要到来。阿姆斯特丹分子在群众的压力下答应为反对新战争而斗争，不过他们在巴塞尔也许下了这类诺言，我们不相信他们，并对他们说：不要许下大话，最好是支持工人们的斗争，支持德国的铁路员工，支持英国的矿工，不要出卖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会有助于他们得到一块面包的胜利。

反对统一战线的同志们看不到，我们已经赢得了争取统一战线的这场运动。我们已经做到使人们不敢再把我们说成是职业的

分裂者。过去，鉴于历史的必要性，我们所促使的那些分裂曾引起工人们难过。我们那时必须这样做，以便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为了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联合，我们曾使一些党分裂。群众对分裂的某种不快，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但我们不能被它所左右，我们利用各种场合来表明，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即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才是工人阶级的分裂者。有一种说法，说统一战线是绝望的产物。相反，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看不到工人运动的高潮，那我们就不能来谈论统一战线。正是工人运动在各国的活跃才给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其危险性和巨大的危险性，这一点我们在提纲中就已经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也象议会制一样有着巨大的危险性。

接着，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党的行为的正确性时，谈到法国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摇摆，并批评了弗罗萨尔、梅利克等人所采取的使群众思想混乱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反对统一战线的反对势力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倾向——这是工人们曾经多次受骗的健康的革命情绪的一种反映，即群众的不信任，缺乏足够的情报和不了解情况。

但是在这种反对统一战线的反对势力中也有极端危险的方面：在这种反对势力中有中派分子想要——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用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国际的企图。季诺维也夫同志通过一系列引文证明，某些法国同志在《人道报》上给这个问题所造成的混乱。他们把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同政党的联合混淆起来；对于后者我们自然是应该反对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连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我们的敌人也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情况。龙格、希法亭先生们懂得，统一战线对于这些领袖们来说意味着灭亡，但是他们却害怕公开出来反对统一战线。

法国共产党理应起巨大的作用。法国共产党应该到群众中去，成为千百万工人的真正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上层的领导者。应当考虑到整个共产国际内的情况，而不仅仅考虑自个家里的事情；但是，就是在一国范围内来说，法国共产党内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也是不对的，而如果考虑到我们必须善于利用的群众的革命情绪，那么我们不能不对个别一些领袖的策略进行批评。

接着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意大利党对统一战线的态度，认为意大利同志希望实行的统一战线，即只限于工会问题而完全排斥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最后，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问题是工人群众的情绪上出现了转折点。这不是什么罪恶降临，而是历史的必然性，对此德国同志们是最理解的。问题不是玩弄小小的手腕，不是采取狭隘的计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使他们暴露自己的面目，挖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根基，他们是害怕我们的策略的。马尔托夫先生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我们的所有敌人一起异口同声地在叫嚷：我们的策略是极端不道德的。当然，这些先生们害怕自己脚下失去根基，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同机会主义者领袖们的殊死战斗，但是它是正确的策略，我们将击中敌人的心脏。统一战线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社会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胜利就有了保障。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所必须毫不犹豫地明确确定和制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译自《真理报》1922年2月26日。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

(1922年4月)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结束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获悉这次会议的详情细节。但据我们所知，我认为列宁同志说作了过多的让步，这是对的。不言而喻，只有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并了解了柏林会议的所有重要文件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能表示最后的正式意见。无论如何，协议无疑是会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小小的开端已经奠定了。局部性问题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基本的前景。在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情景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插曲。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将对各国工人说：“不要往上看，而要往下看！”考虑一下“在下面”，在千百万男女工人中间发生的事情吧，因为归根到底决定真正的政治斗争的是这一点，而不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某些领袖们的手腕。

当然，看一看最巧妙的机会主义者塞拉蒂的行为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在柏林会议上的发言几乎象个第三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以此来抓住机会挽回他在意大利革命工人眼里业已扫地的声誉^①。看一看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行为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俩装出一本正经的姿态在红色国际和黄色国际的重大争执

① 这个发言也是一种征兆。如果塞拉蒂这样说，那就意味着，正是有必要来这样发言，那就是说，意大利工人是拥护共产国际的。

上愚弄那些几乎持不偏不倚态度的人。而始终扮演着工人阶级捍卫者的角色、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的资产者王德威尔得的喜剧式的表演则使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产生完全另一种感情。当你听说，王德威尔得、福尔、肖、维尔特等这些“资本陛下的社会主义者”在会议结束时竟高唱《国际歌》，你不由得会发出笑声。这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忘却国际的劳动之歌。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和花絮。

如果你们看一看下面工人同志们的情景，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何以王德威尔得辈和谢德曼辈先生们虽然对共产国际恨得要命，但也不得不走上或者装样子走上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道路。

请大致浏览一下各个主要国家里发生的事件吧！

英国工人的众所注意的事件是什么呢？从1921年的煤矿工人罢工开始到1922年3月25日涉及70万工人的机器制造业中的同盟歇业，或者1922年3月29日涉及35万工人的造船业中的罢工和同盟歇业为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点：资本正在全线发动进攻，逐步地排挤工人，削减他们的工资，剥夺他们在制定以往年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的劳动条件方面的起码权利。

看一看德国吧！1921年整个下半年充满了巨大的防御性罢工和同盟歇业。1921年2月2—9日的铁路工人罢工大约涉及80万工人。从2月5日到10日进行罢工斗争的市政机关工人就有7万人。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又有成千上万的五金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并遭到解雇。原因都是同样的：缩减编制、延长劳动日、削减工资等等。

看一看捷克斯洛伐克从1922年1月23日到2月10日矿工举行的罢工吧！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矿工都参加了（大约20万人）。罢工的原因是：企业主企图削减工资。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们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一批接着一批，直到银行职员都为资本进攻所迫，纷纷起来实行罢工。

法国的情况怎样呢？纺织工人的罢工从1921年8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涉及10万人。原因是把工资降低了10个法郎。里尔的矿工罢工吸引了2万人。原因也是降低工资。如此等等。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这样。1921年9月的纺织工人罢工开创了一系列这类经济运动的先例。

工人们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在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黄金国里，工人们都遭到了打击。不久前在南非发生的事件以几十名罢工工人付出生命代价而告终。

欧美各个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最重要、最紧密联系和最起决定作用的派别正经受着艰苦的考验。资产阶级似乎是有意地轮流向这些最重要的工人们发动攻击。今天是100万煤炭工人，明天是50万铁路员工，后天则是50万五金工人或机器制造业工人。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投入战斗。而这些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经过战斗以后都怀着一个信念：如果不联合起来，如果不把工人的全部力量攒成一个拳头，那么就不能捍卫自己最起码的权利来反对恨得发狂的、企图“抓住每个时机”对不久前的不愉快事件进行报复的资产阶级。

当然，参加规模巨大的经济斗争的工人们所遭受的失败会使一部分无产阶级意志消沉。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社会党人”正竭尽一切努力来这样做。但是，另一部分，而且是更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经过艰苦的考验以后受到了锻炼，具有了新的面貌，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了事业的光明前途。

从这些已经经受考验和正在经受考验的千百万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呼声：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今天，这些工人还没有看到他们这种新的情绪的政治后果。明天，他们就会采取新的步骤。后天，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人。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

来，我们应当沿着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的道路前进。

请看一看“下面的”情况，分析一下欧美工人群众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过程吧！那时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连王德威尔得辈和谢德曼辈先生们也不敢公开地说，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情况就是这样，连顽石也要为之惊呼！广大无党派工人群众对于结成反资本家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致谁要是公开地说：“我反对这种统一”，那么工人阶级就会立即回答他说：“滚蛋吧！”

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尽管出现某种意外插曲，尽管第二国际或第二半国际的某个领袖无耻或伪善到何等地步，毕竟具有广阔的前途。

不过人们或许会说：如果联合只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进行，那么干吗要同敌对政党的领袖们谈判呢？例如，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同志向我们指出：要知道，这只是经济啊！不，意大利共产党人同志们，你们错了！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德国铁路员工的罢工吗？参加这个惊人罢工的人并不想顾问政治，在主观上是反对政治斗争的。但实际上他们举行的是出色的政治罢工。现在，要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大可能了。而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我们正应当向这些政治领导人提出他们对待巨大经济冲突的态度。难道迫使英国工党领袖们作出明确的答复：这个所谓的“工人政党”究竟怎样对待目前发生的英国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同盟歇业，有什么不好吗？难道这样不是可以撕下第二国际英雄们和领袖们的假面具吗？

第一步已经迈出了。现在对于每个共产党来说是严肃的考验。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都应当在实践中表明，它是善于做到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并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柏林发生的事情自然还不是组织上的联合或政治上的联盟。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

这一点。柏林会议丝毫没有责成共产党缓和对于工人阶级叛徒们的论战。丝毫没有。在4月20日或5月1日的示威游行中，共产党人应有进行鼓动宣传的充分自由。请你们在实践中表明，你们是善于以新的态度对待群众的，你们在目前复杂的环境中是善于根据经验具体地抨击叛徒们的，你们的每一支箭都将击中目标，而每一个无党派的男女工人将会看到你们是正确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这样的呼吁。

统一战线不是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们和解的节日。这不是抹煞分歧。这不是磨平矛盾。德国共产党的例子是很清楚的。德国共产党人越强大，他们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之间的论战和斗争就越激烈。在任何地方，事情就是这样摆着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家就是反对社会妥协派的领袖。这一点目前还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但明天全体工人阶级都将明白这一点。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和叛徒领袖们，这就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当这个前景实现的时候，胜利就在眼前了。

译自《真理报》1922年4月12日。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2年11月)

资本主义的瓦解

首先我们应当来分析一下以下几个问题：世界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状况。

至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不必重新再来审查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在我的提纲中我建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只确认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托洛茨基同志和瓦尔加同志的提纲。我们可以确认，近15个月来的事变进程基本上证明了这些提纲的正确性。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里，虽然出现了暂时的高涨，但这无疑是暂时的，而瓦尔加同志把目前的形势看作是资本主义瓦解的时期，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形不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是它的黄昏，是它的解体。

因此，国际经济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仍象以前一样。拯救人类及其生产力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诊断仍象过去一样，我们重复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话：客观形势依然是革命的。

政治矛盾尖锐化

在国际政治形势中,我们也可以确认,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化。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在这15个月期间,协约国的瓦解过程大大加速了。我们经历了以各种形式实际废除凡尔赛和约的过程,而这个废除过程还在继续。

以自己的杰出领袖劳合一乔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彻底破产了。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完成了这一破产。现在在英国进行的竞选运动证明资产阶级政党已空前地丧失气节。在古典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古典式的旧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这场斗争证明,在这场斗争中任何原则已经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些政党无力进行原则性斗争,它们已经陷入道义上彻底解体的境地。

作为被我们称作世界革命过程的极重要因素之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段时期里已把本国的斗争提到很高的水平。我们看到,在一系列被压迫的国家里,尽管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但是解放运动在顺利地发展;我认为,在我们当中已经不可能对以下这个问题有分歧意见了,即这种斗争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但毕竟是客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已日暮途穷,每时每刻都越来越处于瓦解的过程。

意大利事件

意大利事件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它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空前打击吗?意大利过去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幸福之邦吗?法西斯政变不仅是对君主政体的一个打击,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

一个打击。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种地方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在其他国家或许以不同的形式必然重演。如果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这在近期内是十分可能的),那么这类事件无疑也会在德国,或许在整个中欧发生。德国斯汀尼斯政府的胜利按其形式来说或许不完全同意大利事件相似,但是按其内容来说两者是血肉相联的。

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情形有点象意大利政变。在那里,对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一个打击,在奥地利,不仅资产阶级政党和第二国际,而且第二半国际都支持这种民主。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在进行一场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就不必说了。

在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我们已经看到类似意大利事件的现象。我们应当看到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在或许不会持续很久、但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是充满考验的时期里,这是必要的。

非法状态的危险性

在整个中欧实行法西斯政变的这个时期可能是必然的,也必然会使我们党处于非法状态的时期。早在几个月以前,执委会已向一系列最重要的政党事先警告这一危险,并指出必须对意大利已经到来的这个非法时期作好准备。很可惜,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所表明政治形势证实了这一预言。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一危险,当然这一危险决不意味着世界革命的沉寂。相反,这个时期将是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不是直线式地进行的。不,这里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插曲。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情形是反革命。而它的前景将是形势的尖锐化,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国家里成熟起来。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

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这段时期内，国际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尖锐化了。均势是不稳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说得对，象议会冲突、大罢工等等这样的事件很可能变成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并导致革命战斗。我们看到，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因土希战争而发生的事件意味着，新战争的阴影目前是十分明显的。近东事件实质上只不过是未来世界战争的小小的演习。而目前这个问题又趋于尖锐，可能引起极大的麻烦。根据目前形势的分析，事情还不致于发展到战争的地步。但是，我们在近东看到的情形乃是事件的缩影，如果社会革命不是较早地发生，不从资产阶级国家手中剥夺发动新战争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些事件是可能而且必然发生的。

俄国变得更强大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国这个已经坚持五年的唯一的革命国家的政治地位空前加强了。至于新经济政策，那么我们深信，不仅象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而且无产阶级占居民多数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将以某种形式经历这一政策的阶段。新经济政策不仅是我国力量薄弱的结果，而且是工人阶级和小农之间真正关系的表现。

当然，在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农民的情况同德国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在象德国这样一个城市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使农民中立。在讨论俄国问题时，我们还要来谈这个问题。

在讨论世界政治形势时，在协约国摇摇欲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进行激烈战斗、巴尔干半岛上出现战争阴影、资产阶级世界均势发生动摇之际，我们首先必须估计到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头等重要因素。在这个时刻，苏维埃俄国正在加强，并为自己建立新的经济形式，从而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星辰升得越来越高了。目前的形势可以而且应当算作客观上革命的形势。

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国际 和第二半国际的联合

现在我来分析一下工人运动内部的状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联合，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既成事实。在德国，联合已经实现，昨天我们接到关于瑞典实行这种联合的消息。在其他党内，情况也将这样。诚然，在组织上的联合还没有完成，但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这一事实具有极重大的历史意义。联合起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半国际溶入第二国际，而不是相反第二国际溶入第二半国际，这一情况自然不必在这里详细地加以论证。不过，我还是要援引一下马尔托夫在《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的最近一篇文章中的话，他说：“不要抱任何幻想。两个国际的机械联合在目前的条件下无非是回到当时退出国际而指望建立另外一个国际的那些政党的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里来。”

改良主义者的这一联合将以空前的速度加快工人阶级的分裂。而我们应当说：不要抱任何幻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联合意味着两件事：首先是准备对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其次是准备工人阶级的空前的分裂，以削弱后者的力量。至于第一点，我

们很快就会相信，随着联合而来的确实是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领导意大利反革命运动的是第二国际的叛徒、前社会民主党人墨索里尼，这不是偶然的。在德国，领导政府的是艾伯特和诺斯克，在波兰是皮尔苏茨基，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第二国际在象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倒是偶然的，因为在德国只要工会一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情况就会大大改变。改良主义者感觉到和看到，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这些先生们的嗅觉很灵。他们感觉到和理解到这是必不可免的，但想方设法想要保持下去。他们就象执行资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一样地行动——破坏工会组织。我且不说他们是在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在政治上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斯汀尼斯不是给工会运动的领袖们发出直接的书面指示，但是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命令是存在的。

改良主义者的背叛

他们希望大门砰然一关，所有玻璃都四处纷飞。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多久，但是从历史上说它是必然的，而第二国际的先生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当他们一感觉到大部分组织转到我们这边来时，他们就有步骤地开始准备分裂。他们希望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粉碎它的组织。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这种背叛甚至超过了1914年时的背叛。现在计划的背叛正在进行，这种背叛必然会破坏和分裂工人阶级，使它在应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刻丧失组织能力。我们在这里碰到的不是偶然的插曲，而是重大的问题。尽管犯了各种错误，尽管领袖们背叛，尽管遭到失败，但是工人阶级还是以工会的形式保持了强大的组织。在目前时刻，这种组织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是决定性的，而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分子一起企图破坏工人阶级的这

个最后避难所。联合起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部政策就是执行这一任务。

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仅是一种战略手段，而且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形势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本身引起的。从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可以得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是从必须给予第二国际的计划以有系统的对抗这一点而得出来的。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在许多国家里，我们党的影响大大增长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还不能说，或许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还不能说，我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争取这个大多数，还需要进行很艰苦的工作，而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争取这个大多数的极重要手段。必须清楚地懂得，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是我们斗争中的一个插曲，而是整整一个时期，或许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情况下使这一策略多样化，但是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我们将坚持这一策略。

资本主义业已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国际形势无疑是革命的。第二国际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没有这个支柱资产阶级就不能维持。因此，我们对第二国际的态度问题不是党的内部策略的问题，而是世界革命的问题。

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就

我们已经从统一战线的策略中赢得了很多东西。我们虽然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

么我们就几乎拥有了一切，但是我们已经做到使工人阶级认为分裂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我们。过去，工人们是持另一种观点的，而且这样看还有一定的理由。曾经有个时候，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分裂旧的社会民主党。那时我们不得不容忍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是工人运动分裂的祸首。否则就不能进行活动，就不能为我们的力量建立集合点，就不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工具。

但是现在，新的时期来到了。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任务。我们现在有了共产党，虽然其中保留着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虽然它们患有幼稚病和老年病。我们必须使我们党治好这些病症。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争取工人的大多数，是拯救和争取工会这个世界无产阶级手中的极重要工具。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同志们，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巨大的意见分歧。在法国，反对统一战线的“最后的莫希干人”已经放下了武器，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在法国，不仅共产党人而且大部分工团主义者都在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昨天我们和统一劳工联合会中的我们的同志进行了一次匆匆的谈话。当我们问他们，你们是否还反对统一战线，他们简短地回答说：我们正在实行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要求促使所有希望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都不得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反对者的这种信念变化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它表明，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了，我们将系统地 and 自觉地贯彻我们的策略。

统一战线的策略应是什么

统一战线应是什么，它不应是什么。无论如何，它不应是法国

人所说的“竞选运动”。我们散发了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 调查表，这个调查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不仅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而且从扎根在工人群众中的同志们那里得到了 300 或 400 份答复。调查表说明，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意义还存在着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如何不应是竞选运动或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是极大的犯罪。我们中的任何人宁愿割掉自己的手，也不愿同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资产阶级的走卒合并。统一战线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在其日常斗争中的指路明灯。统一战线应当回答的是，我们愿意同全体工人一起跟资本家进行斗争，不管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基督教社会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在争取一片面包、反对缩减工资、反对侵犯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常斗争中共同斗争。在这里，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其中也包括同某些资产阶级领袖实行某种妥协。这就是统一战线。我认为，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是革命者，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不懂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必要性，哪怕是极微小的改善。我们反对改良主义，但不反对改善工人的状况。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现时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真正的改善，但我们也同时意识到，只有当我们为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而进行斗争时，我们才有可能把它组织起来。

工 人 政 府

工人政府的口号还没有很好弄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几乎世界各国都应当实行的。它适用于美国，正如它也适用于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关于工人政府的口号则不能这样说，这个口号是决不能到处都采用的。这个口号具有有限的意义。它只能在这

样一些国家里采用：政权问题，政府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都已居于首要地位，力量对比确实已经接近于提出这一口号。当然，在目前和在美国，可以进行“工人政府”这一口号的很好的宣传工作，向工人们说明，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解放，那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不能说，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工人政府的口号就象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就象在德国可能的那样，就象在意大利曾经和即将到来的那样已经是某种决斗了。工人政府的口号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条件下的某种具体运用。工人阶级应当明白，工人政府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并不预先防止战斗和内战。只有意识到这个口号的危险性，我们才能平心静气地运用这一武器。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包含着危险性，执委会在12月的提纲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工人政府的口号会有特别巨大的危险。在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里，如法国，这个口号被理解为，似乎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指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正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在工人政府成立时，我们也不能防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内战还可能更加尖锐。

工厂委员会运动

我还要再来谈一下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说，在企业里还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即共产党支部的党，就不是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我要进一步说，工人运动如不善于支持和组织工厂委员会的群众性运动，那么就不是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我们时代的标志，德国已相当迅速地接近于进行大规模的决定性战斗，工厂委员会代表了运动的整个先锋队。在谈到其他国家时，我们应当劝告我们的同志，首先应当在企业中建立共产党支部，然后支持工厂委员会

运动。

无产阶级纪律

我不能不来谈一谈国际纪律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内有一派人向巴黎代表大会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提纲有整整一个部分就是谈国际纪律的。这一派人光辉地证明,没有纪律就不能前进一步,没有纪律,整个国际就会灭亡。然而,正是这一派人表明,在我们这里言论和行动是脱节的。国际纪律只能用行动来加以证明。

迎接决定性的战斗

为了同第二国际进行斗争,我们需要具有严格纪律的严格组织。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声明这一点并加以贯彻。我们很快就将迎接决定性的战斗。

有些同志说,现在世界革命发展延缓了,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状况超过欧洲或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时,我们才能前进。依我看,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俄国工人的状况现在已经在改善,这是事实。欧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在日益下降。在我们这里,提高是缓慢的,但毕竟在提高,而将来俄国工人的经济状况会比欧洲工人更好。但是如果说,当俄国处在困难境地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斗争就不可能,那是机会主义。这是纯粹的机会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进行真正的革命,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有更多的面包和肉。不!之所以进行革命是因为各该国家的工人阶级除了推翻资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在我们的鼓动宣传中不应出现这类调子。

俄国工人所要克服的困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多。

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都将得到俄国工人的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第一个举起革命的旗帜并遇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反抗。我们应当向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介绍俄国无产阶级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封锁、饥荒、流行病，以及它的全部伟大成就。现在 we 应当懂得，俄国工人阶级正在日甚一日、月甚一月地改善自己的状况，尽管还受着各种苦难，但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构成我们整个策略基础的俄国革命的情景就是这样。(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2年11月11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 扩大全会上的报告(摘录)

(1923年6月12日)

主席团的报告。——统一战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民族问题。农民问题。

同志们,自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已经工作六个月了。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要想做出许多新的了不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有些问题看来比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显得更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在这次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我们还得再通过一些新的政治决议。

国 际 形 势

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以后将有专门的报告,因此,我只能稍稍谈一谈。显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美国出现高度繁荣。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出现某些好转。中欧的情况仍然是一片混乱。日本和印度发生经济危机。今后事态如何发展,还很难预见。瓦尔加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说美国已日益接近经济危机,其他正在开始复苏的欧洲国家是紧步美国的后尘,或者相反,这些欧洲国家将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工业高涨时期,现在还不得而知。

至于国际政治形势，当前最令人注目的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我深信，英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的改变同整个资产阶级国际政策的改变一样，证明国际资产阶级之所以欺压苏维埃俄国，原因并不在于俄国的软弱，而在于它的力量的日益强大。英俄冲突的直接结局如何还不清楚，但是已经很明显，我们毕竟看到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政策开始了新的篇章。国际资产阶级觉察到，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象资产阶级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人的投降。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这帮老爷当真以为新经济政策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俄国的根本性的投降。他们在笑眯眯地期待着有一天俄国共产主义会自我毁灭。如今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连瞎子也会看到，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绝不是投降，而是相反。自从世界市场上俄国的粮食重新出现时起，世界资产阶级就开始明白了这一点。现在证明，俄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工人阶级那里从来也没有得到象现在这样坚定不移的支持。正因为如此，现在国际资产阶级的首领们在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得赶快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再放过两年，那就太晚了。这就是对待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政策的新变化的根据。这一变化也许将在国际政策中占居整整新的一章。

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

至于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很遗憾，我们看到，它们越来越猖獗。保加利亚昨天的事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们大家今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鲍里斯国王在国家发生政变和整个政府以及斯坦鲍利斯基党的所有代表遭到逮捕之后颁布了一项法令，按照整个法律程序免去了斯坦鲍利斯基的总理职务。大家看，事情干得是有准确法律根据的。所有这一切只是证明了一点，如果错

让国王或皇帝继续逍遥自由，那么始终会留下隐患，这个皇帝有朝一日还会颁布类似的法令。斯坦鲍利斯基农民政府的民主党人先生们完全罪有应得。

至于法西斯主义，我认为，在那些法西斯主义特别猖狂的国家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应该侧重于经济方面。不应把反动派的任何表现都叫做法西斯主义。必须分辨清楚并认识到，比方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已与半年或一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同志们，总之，现在的形势基本上还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的形势一样。新战争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欧洲曾几次出现过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燃起战争的局势。整个形势依然未变，我们所能预料到的危险还和从前一样。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

在这一时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了。同志们，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在我们这样的会议上详细地批评汉堡第二国际的工作。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有些报界的同志指出，即使从彻底的改良主义观点看，汉堡第二国际的工作也是经不住任何批评的，的确是这样的。那是一次没有头脑的代表大会。那次代表大会没有任何固定的、哪怕是改良主义的原则路线。这纯粹是一番衰败的景象，就象我们最近看到的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衰败景象一样。谁还留在第二国际里呢？实际上，只有两个象点样子的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这样一些人在汉堡都不起任何作用。走到台上的是一些比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还坏的人物。新出现的一批人物甚至连考茨基后期的“社会主义”传统都没有了。同志们，大家回忆一下，想当年甚至第二国际对是否吸收工党参加的问题都表示过犹

豫。我记得很清楚，那好象是在1908年，考茨基证明说不准接受工党参加第二国际。只是在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接受了这个党以后，考茨基为了不失面子才对已经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理论”论证。难道说这个时期工党变好了和更具有革命性了吗？丝毫也没有。我觉得是相反，是第二国际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只是因为这样，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工党不仅被吸收进第二国际，而且在那里坐了第一把交椅。

如上所述，那是一次没有头脑和没有灵魂的代表大会。我们看到了一场有趣的俄国孟什维克和英国工党领袖进行论战的闹剧。不久前还把自己封为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孟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变成了第二国际的极右翼。只要回忆一下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在汉堡通过的臭名昭著的组织章程就够了。这既不是笑话，也不是儿戏，而是事实：聚集在汉堡的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决议说，他们的执委会委员只要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就自动暂时退出执委会。而当这位“社会主义”部长一旦被资产阶级象挤柠檬一样从内阁挤了出来，那么他就又可以成为第二国际执委会最合法的和最可敬的委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决议。这就等于说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如果他们当中有谁作了贼，那他就不能再作为他们的组织的可尊敬的成员，而一旦刑满释放，那就又可以就这个贼展开辩论，决定是否再把他吸收进可尊敬的人的行列中来。第二国际的这批先生墮落到了极点，简直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们的批评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完全超出了对一个多多少少象个革命者的人所能提出的最低要求。

在我们共产党的报纸上，人们试图从各方面来证明，汉堡国际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国际。甚至保尔·列维先生也带着藐视的口气说：这算什么国际，在这里，这些人在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而

另一些人也在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这倒更象一座巴比伦塔。是的，同志们，这的确不是什么国际。但是我们只是应该记住这样一点：这些先生也不需要任何国际。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这样的批评同样也是不中用的。这意味着白白浪费时间。我们不必去证明第二国际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国际。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明白并向工人们讲清楚，社会民主党先生们不需要任何真正的国际，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一面用来欺骗工人的国际招牌。他们在汉堡出色地证实了这一点。

汉堡国际的意义

汉堡的这个联合组织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我们的敌人的力量呢？在有些国家里，在短时期内也许是可能的。我们有些法国朋友对我说，在法国，汉堡代表大会可能会对一部分落后工人产生某些影响。这是可能的。同志们，大家回想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当时我们有些同志夸大了这次联合的意义，认为它几乎会形成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时期，并且会为社会民主党增加许多力量。但是，还没过一年，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这次联合不仅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强，而且相反，使它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几乎根本召集不成群众性的集会。它在国会的发言同样平淡无奇。从前，当这些英雄比较纯正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点彻底性，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相信，现在在整个国际范围内都将出现这样的局面。

在汉堡，在代表大会期间，有一小部分稍有良心的与会者就已直言不讳地说过，第二国际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二国际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存在，从我们共产党的利益的角度看，这对

我们是有利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聚集到汉堡来，仿佛是专门为了加速它们的解体过程似的。

共产国际——无产阶级唯一的战斗机构

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十分清楚地证明，除了共产国际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国际了。我们还没有争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很遗憾，这是事实。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工人联合组织在一心一意地为团结我们国际范围内的力量而工作，那么这个组织就只能是我们的第三国际。只要回忆一下海牙的那场喜剧就够了，阿姆斯特丹分子在那里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进行着比赛，看谁更厚颜无耻。与此同时，同样还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两次与鲁尔区有关的代表会议：一次在埃森，一次在法兰克福。这是事实，战后在欧洲的腹地从事活动的两个大党——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第一次不仅在原则上相互支持，而且共同携起手来开展巨大的实际政治运动。这一运动还不够有力，我们还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我们还举行不了大的罢工或起义，甚至大的示威游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样的事实，即在欧洲的危急关头，两个大的共产党在苏维埃俄国的全力支持下手携手地进行了工作。我相信，许多诚实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看到这一切之后，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即只有我们的国际组织在试图组织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是的，我们的组织的比重还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现在实践证明，我们不仅一起通过决议，而且也一起行动。当两个欧洲大国相互掐住对方的喉咙打起来时，这两个国家的两大共产党却象兄弟一样团结一致地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一个证据，说明我们的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

战斗机构。

这些事件也说明了其他一些问题，并且证明，共产国际的确在开始成为统一的世界共产党。世界党意味着什么呢？这绝不意味着象个别同志有时强加给我们的一种看法，认为这意味着要取消各国共产党。不，这仅仅意味着，当历史真正要求国际性行动的时刻，共产国际就会作为统一的政党来组织这一行动。这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刻共产国际是根据国际斗争的需要来集合自己的党和领导自己的力量。我不想使用过分响亮的词句，所以我不说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鲁尔危机时期进行的共同斗争证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但是有一点已被证实，这就是我们无疑有了这种世界共产党的萌芽。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加重了我们国际组织的分量。这是事实。

.....

统一战线的策略

是手腕还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

我现在来谈谈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我认为总的说来，我们已经克服了在贯彻这一策略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和困难。例如，当你看到法国工人运动现在是怎样发展的，当你看到不仅我们的共产党人朋友，而且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也都在努力热情地贯彻统一战线策略，这时你就会感到真正的满意。有些同志在几个月前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屑一顾，现在他们自己也学会了出色地实行这一策略。

我想，在这方面只剩下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某些朋友往往是用下面的方式来表述的。他们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统一战线？这仅仅是战略手腕，还是说统

一战线真正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了清除这一策略道路上的最后障碍，这次执委会扩大全会必须对这一问题仔细加以研究。到底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呢？它仅仅是策略手腕，还是说它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们要用下面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请问：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初年代，即在1919—1920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愿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真诚地接近或友好呢？我认为当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的人都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接近。

现在我要接着问：那我们在1919年和1920年是否实行过统一战线策略呢？没有，没有实行过。这就是说，如果你们指的是共产国际存在初期，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这段时期，那么你们就会看到，情况是这样：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和友好是有的，而统一战线的策略则没有。

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真诚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我们一向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现在希望，将来也永远希望，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希望和将来也希望整个工人阶级都联合起来和团结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胜利的唯一重要的前提。

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质

那么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大约从1921年开始作准备，1922年最后提出，而现在，即在1923年则在大力贯彻，这里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增加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这里新增加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战略手腕的东西。这里首先应该谈谈群众与领袖的

问题。我要重申，对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工人群众，如同对无党派工人群众一样，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始终主张同这些群众接近和友好，以便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我们的确在这一方面实行了转变，这一转变完全是由整个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满怀信心指望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由战争带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会更严重，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的急切心情、他们的愤怒使我们有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立即诉诸群众，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希望。这样也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的路线。这不单纯是我们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愿望是建立在当时的许多事实基础上的。

但是，事情有了变化。从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起，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另一种信念。我们看到，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快。群众的愤怒是强烈的，但是情绪毕竟开始低落。结果，资产阶级坐得更稳了，社会民主党所依靠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总之一句话，世界革命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缓慢得多。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放弃越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愿望。我们对自己说，有一点是照旧不变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密切联系，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则必须改变。我们现在不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把社会民主党群众吸引过来。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这些领袖。我们必须同这些领袖进行斗争，逐渐地、或许经过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将做到使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最后认清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面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统一战线策略。

战略手腕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有些人发出呼吁，对于这些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不想也不会和我们一起走的。我们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坚信，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总部并不想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也不会和我们一起走。如果有谁对此多少有过一点怀疑，那么现在，在汉堡代表大会之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地被证实了。总之，简单说来，战略手腕表现在我们向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总部发出呼吁，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总部实际上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目的，而且不愿同我们一起斗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所以我说，问题的提法本身——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是战略手腕还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是不正确的和愚蠢的。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仍然希望同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由于大约从1921年起形成的这种力量对比，我们必须向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我们必须给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写信，尽管我们十分清楚，这些人不想反对资产阶级。从狭义上来说战略手腕就表现在这里。

所谓战略手腕是否正当的问题

我还要问你们，这种战略手腕是否是正当的斗争手段，是否可以允许的，是否是道德的？任何一个郑重的共产党人都不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可允许的东西。要知道，这无非是组织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我们的阶级在数量上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还相当大，所以工人阶级至今还没有获胜。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志对我们说：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是何必要这样大声地对我们说呢，这不是在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们反对我们提供方便吗？同志们，我毫无保留地承认，在反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斗争中存在着各种军事计谋，但是唯有这样的军事计谋不会败坏我们自己的军队。以法国共产党为例。大家都记得，不久前在法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恰恰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闻所未闻的混乱。法国党内的这次危机是否能排除呢？是否能在政治上使这个党站立起来，并给它指出正确的道路呢？如果我们不仅怕对这个党的领袖说，而且也怕对包括工团主义者在内的所有法国工人说：问题是要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为了在他们面前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为了说明事实上这些人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才向所有这些列诺得尔和茹奥之流的人们发出呼吁。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把话说透，如果不把统一战线策略的全部战略意义向法国同志讲清楚，我们就不能把法国共产党人，更不用说把法国工团主义者争取到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来。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法国，而且也适用于一切与我们一起走的工人。总而言之，我们每走一步，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就试图加以污蔑、诽谤和歪曲。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当害怕直接谈论我们的战略手腕。对于集聚在我们周围的有觉悟的少数人，我们必须充分地指明他们的道路，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争取不到大多数。

还有一点。不应忘记统一战线策略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在1921年的最初几个提纲里就已经谈过这些危险。我认为，我们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今后在社会民主党群众中的工作越深入，这种危险也就越大。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勇往直前，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党在这方面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毕竟不要忘记危险。

.....

“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必要的

同志们,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快摆脱旧传统的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现在把“工人政府”的口号发展成“工农政府”的口号。大家记得,事情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起先是统一战线策略,然后是工人政府。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把这一公式加以扩大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举几个例子。美国共产党(工人党)未经我们任何提示,自己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正是因为采取了这一提法,立即在美国这一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得到巨大的吸引力。工会运动的左翼由于一般说来是关心政治问题的,所以完全支持这一口号。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斗争。后者试图直接在组织上与部分农民党合并,从而失掉了在工人阶级中的阵地。社会爱国主义者正在寻求新的社会基础。我们不仅在美国发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这是时代的征兆。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看到这种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整个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日益失去社会基础,因此现在拼命地在城市的小市民、职员、官吏和部分地甚至在农民中寻找新的社会基础。你们还可以在美国、德国和几乎所有的地方看到这类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简短地说,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失掉一些阵地,我们则应当立刻去占领这些阵地,因为工人阶级是我们的主要堡垒。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失掉这些阵地,另一方面又在农民中寻找新的阵地。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呢?我们应当立即在这个新领域里赶上社会民主党,并在这一领域里同它进行决斗。我们在占领社会民主党失去的阵地的同时,还要留心地观

察，看它走向何方，我们要对它进行跟踪并竭力在它企图占领新阵地的地方超过它。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这一提法几乎到处都易为人们所接受。今后我们不再说劳动的政权、社会主义的政权等等，今后我们将在一般宣传中把这些概念表述为工农政府的口号。对于一个尚未成为社会主义者、而仅仅开始辨认社会问题的劳动者说来，这个提法是最易于理解的。我要问，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工农政府”的口号在 一系列国家中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国家中，工农政府的口号具有直接的迫切意义。事实上在我们中间半年前谁能想到工农政府的口号会成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呢？请大家读一读关于福斯特和鲁腾贝尔格审讯案的报道吧，那时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口号在美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的确这一口号在象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怎么会不能接受呢？我已说过，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日益失去阵地，正在寻找新的阵地。我们坐在萨克森工人政府中的同志们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涉及农民现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吗？

在萨克森工人政府里，我们有些问题提得非常得当和明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现实。难道涉及农民的问题真的连一个也没有吗？当然，这样的问题是有的，尽管在萨克森贫苦农民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在东普鲁士，贫农是一个很大的阶层，而不管怎么说，普鲁士在德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再以波兰这个国家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在那里，农民问题具有直接决定性的意义。在波兰，没有农民，光靠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当然，我们在波兰可以建立一个始终都站在极端反对派立场的严肃的共产党，但是没有农民，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制度是不可能的。

一个现在就已具有在明天(从历史意义上说，明天一词可以意味着五至十年以后)就战胜资产阶级的心理的共产党必须现在就准备好相应的口号。工农政府的口号最适合于这项任务。我们采取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在开始作准备并把某些阶层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农民知道共产党人提出了这一口号，对于事情的开端来说，这就已经很好了。单是这一点就为新的力量对比奠定了基础。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看一看另外一些国家的事态。以芬兰这样的国家为例。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已经争得了多数。在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比例是 24：3。在芬兰，农民绝对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或许有人对我们说，象波兰和芬兰这样的国家毕竟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就算是这样。但是请问，那么法国呢？再过几个月，法国就要进行选举了。大家知道，法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如果全党在法国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那么让·雷诺同志现在在农民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就会取得更大的规模，难道这不是很清楚的吗？毫无疑问，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和整个声名狼藉的“左派集团”，将是一个最准确的打击。

现在谈谈德国。在德国不存在俄国革命前那种意义上的革命农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东普鲁士，我们也有很大的农民阶层，他们无疑将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对于那

些在斗争中已经厌倦、已经不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来说将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只会起好的影响。

同志们,我认为,甚至象瑞士、挪威、荷兰、丹麦这样一些没有参加过战争、农民因而也没有遭受破产的富裕国家里,工农政府的口号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在那里也有这样的农民阶层,这些阶层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不仅不矛盾,而且部分地是一致的。至于巴尔干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那里有过所谓的农民政府,但恰恰在最近垮台了。这就再一次地证明,在当前激烈的斗争中,“中间的”政府是不可能巩固的,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的重要性和同农民的联系

大家知道,有些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建立所谓的绿色国际,即农民国际。不久前,就在前几天,我们还见到一份电报说斯坦鲍利斯基先生又在试图建立绿色国际。众所周知,现在斯坦鲍利斯基就在不远的地方。他试图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反对共产党人,结果他垮了台,也不能不垮台。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建立绿色国际的意图无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实质上来说,我们在近代政治史上有过几次农民党不无成效地试图起独立政治作用的事例。不管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巴尔干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只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才成为可能,因为经过战争,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非常清楚,农民党不可能长期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争取第二种结局。我们应当仔细地研究农民队伍中发生的分化。如果我们想战胜资产阶级,我们

就不能仅仅成为城市的党。我们既应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党，同时又要同农村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俄国共产党至少在 20 年的时间里都曾仅仅是城市的党。但仅仅是在通过千百万士兵和农民并同全体农民保持了足够的联系时，它才得以战胜资产阶级。

请不要再对我们说，我们党没有能在农村进行工作的人。人是足够的，只是要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普通工人毕竟是同农村有联系的。当然，如果普通工人知道他们的党不认为在农民中的工作有任何政治意义，那他们就会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一旦工人知道了他们的党认为这项工作具有巨大的决定性意义，那么这些普通工人就会利用每一次到农村去、往农村寄信和寄报纸的机会来建立同农民的联系。我不怀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土地法案，并以“给人民以土地”为副题发表这一法案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工农政府的问题将日益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不怀疑，如果在象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里，如果年轻的共产党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农政府的口号，那显然就是因为这一口号是适时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巴尔干国家，实际上在整个欧洲，我们都应当提出这一口号。

问题的困难

我不隐瞒，在我们中间，对这个问题的准备是不充分的。我们各国党对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讨论过。这是一个新的、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宣布统一战线策略时，我们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惘然不知所措，就是因为我国党准备不足，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这一教训。我有些担心，在工农政府的口号问题上，这种情形是否又会重演。这一口号可能不会一下子就被人们所理解。同志们，我要预先告诉你们，如果在讨论中真的证明，我们各国党对

这一口号的运用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我们完全同意暂时不要最后通过这一决议。这样可以让各支部彻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过几个月以后，再来通过决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教训对于我们各国党来说，不会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各支部毕竟多多少少地学会了见机行事，并且明白，机动灵活的策略，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变节者包围的环境里活动的各国共产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事情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真正达到了充分的相互了解，那么我建议最好在这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批准这一口号。我们看到，形势在发生变化。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中越来越失去“人心”。我们已经冲破了阿姆斯特丹领袖们的反革命阵线。在最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我们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在不断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丧失时机。

“工农政府”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我们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们中间或许有的同志会提出疑问：既然我们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是不是因而就放弃了我们的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否仍旧是工人的政党，还是变成为工农的政党？

谁要是对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有所了解，谁要是开始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战略，那他就应该明白：工农政府的口号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绝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工农政府是未必能实现的。苏维埃政府事实上是工人的政府。政权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执掌的。国家的权柄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懂得，必须

迎合农民，必须吸收他们参加国家的领导。一句话，必须明智地管理国家。正因为如此，俄国无产阶级考虑到国内力量的实际对比，建立了同农民应有的协作，开创了农民支持工人的局面。由此可见最伟大的革命——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这对于我们的共产党来说是可行的。问题是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利用和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由此可见，当我们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一步也不能离开这后一点的。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道路。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及其政党可能明智地行事，也可能愚蠢地行事。如果我们的阶级能够明智地行事，那我们就能很快地达到目的，付出的牺牲也会少一些。我们要善于部分地使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保持中立，部分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行事，如果我们是从行会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阶级解放使命，那我们自己就将推迟胜利的时刻。

新口号的适时性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是普遍推行工农政府的口号的时候了。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已经感到情况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对于中欧的一些国家，我们几乎已经这样地提出了任务。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几乎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它正在成为真正国际性的问题。正当汉堡代表大会如此清楚地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完全无能，我们就应当加紧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王德威尔得之流的先生们将试图争取农民，但是，只有在我们毫无作为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按要求那样来行事，那我们就能成为把广大农民阶层争取到工人阶级

一领导者方面来的政党。

法西斯主义和“工农政府”的口号

即使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口号也必将起到不少的作用。就拿意大利这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为例来说。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顺序。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恰恰是在农民奋起争取土地的那些农民地区产生的。最初，法西斯主义曾是土地占有者对这一农民运动的一种反应。现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后，它的深仇大恨正向这些农民地区发泄。墨索里尼在有些地方恢复了纯粹中世纪的法律，如禁止在八小时以外离开家门。现在法西斯匪徒搜索的正是这些农民地区。这帮匪徒把触犯法规的农民集合起来，强迫他们喝法西斯士兵的尿。这些事实是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告诉我们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法西斯主义的愤怒和仇恨与日俱增。那又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毫无办法。我并不是要通过这件事来专门指责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我知道，在农民中的工作很薄弱，这几乎是我们所有支部的国际性通病。我们在意大利也看到同样的情况：改良主义者也好，共产党人也好，最高纲领派也好，都没有为发动农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尽一点力。显然，在现时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工农政府的口号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必须提出这一口号。

“工农政府”口号是绝对适宜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先生们马上会对我们进行辱骂，会证明说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无非是一种蛊惑宣传。但是，希望战胜资产阶级的工人们对这一口号的评价却不同。他们看到，我们在反对资产

阶级的这一斗争中会找到同盟者。同样，劳动农民对这一口号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我们会做到不仅使广大的劳动农民阶层保持中立，而且把他们争取过来。当然，在有农民的每一个国家里——哪个国家没有农民呢？——，我们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这一口号。当然，我们这里指的首先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还有一点。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向你们作过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国际现象，而绝不仅仅是俄国革命的一个插曲。我们曾向你们证明，几乎每一个国家在革命后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阶段来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单纯是俄国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到时候都将提出工人阶级同农民进行应有协作的问题。如果事情是这样——毫无疑问，一定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工农政府的口号也同样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当我们观察一系列国家的形势时，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一口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宜的。现在我们对落后的工人和农民说：我们想消灭富人的国家，我们想建立劳动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再加上一句：因此我们建议成立工农的政府。当我们通过这一决定时，那么社会民主党再想超过我们，即使在议会的舞台上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新口号的危险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光是通过决定是不够的。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口号也同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样，包含着严重的危险。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包含的危险在于，我们某些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的支部会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口号。大家都记得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什么样子。这个党说，它是工人、农民和

知识分子的政党。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在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并执掌几年政权之后，它不仅可能把很大部分农民争取过来，而且可能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在苏维埃俄国，只要事情发展顺利，经过几年的时间，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即跟着我们党走的不仅有全体工人阶级，而且有农民，有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只是忘记了 Chronos(时间)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的，当无产阶级——领导者第一个投入斗争，第一个组织起来并带领农民的革命部分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就能取得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支持。但是，仅仅是在之后。为了在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不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掺和，它必须是一块铁板铸成的。的确，如今在俄国，不仅是农民，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怠工之后，开始真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伟大革命时代的几年英勇斗争证明：它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它们为苏维埃俄国争得了完全的独立，它们发展经济，支持科学，重视知识分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倒向我们这一边。但这只是证明，党必须是工人的政党，它绝不能接受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

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在于我们一些不够坚强的党可能会使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模糊起来。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们仍然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可调和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仍然是牢牢坚持阶级观点的工人政党。党的界限必须划分得清清楚楚。我们党的社会成分必须是工人，是无产阶级。但是我们的工人政党必须善于巧妙地行动，学会随机应变，根除宗派主义。我们必须尽力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事情并不是这样：一边是一

小撮资产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么胜利也就不困难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小撮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阶层，存在着千千万万的农民、小市民、职员、知识分子等等。如果我们想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想在国家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准备自己的胜利。如果我们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较短期间取得胜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善于争取中间分子，部分地使他们保持中立，部分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必须善于向一切与资本的统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阶层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道路。

必须扩大我们的活动基地

总之，我们丝毫不应隐讳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既然怕狼，就不要到森林里去。我们多少已经学会了对付灵活策略的困难。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学会游泳，我们的党跳进了水中，我们有些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从实质上说，应该把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开展的运动算作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的第一个运动。曾经遇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障碍差不多已被我们克服。现在已经到了扩大我们的活动基地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党的心理的时候。最后，我们党必须认识到自己不是只为自己提出特殊“工人”任务的行会式的党，而是在真正准备战胜资产阶级的党。如果我们能够既从理论上，也从组织上、政治上采取预防措施，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除了好处之外，不会带来任何坏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在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在美国、在德国，一句话，在所有的国家，情况都是这样。

走向胜利的道路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用一句话概括过我们的任务，即到群众中去！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明确和发展了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正象过去 6 个月的情况已经证明的那样，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为崇高的任务：唤起我们党夺取政权的意向，使之变成为在每一个工作步骤上都意识到自己是要在明天战胜资产阶级的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自己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并用这一意向去感染广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层。当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满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时，胜利就不是那么困难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
(1923 年 6 月 12—23 日)速记记录》
1923 年俄文版第 6—14、36—45 页。

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1923年12月)

最近几周来德国发生的事件和共产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是必须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彻底说明的事实之一。每个有头脑的共产党人不能不考虑德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能不寻找对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可恶问题”的答案。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现在是可以和应该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德国共产党现时面临的具体的实际任务，我们将在专门的文件中详细地来谈。这里我们只谈谈具有明显国际意义的一些问题。

1923年10月，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认为，德国的革命危机业已成熟到武装起义在几周内立即就可爆发的程度。事件表明，我们的估计夸大了。有些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德国的革命危机确实业已成熟，他们说，武装起义可以在10月就取得胜利，但是德国共产党错过了时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落到了现在这般地步。我们认为这种诊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错误就归结为准备起义的“日程”问题，或者说除了技术任务以外，德国共产党再没有其他任务了。德国共产党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暴露出了许多弱点和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我们并不认为，她在10月没有号召无产阶级发动总攻是个错误。

党在退却的同时毕竟还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群众进行一些规模

* 本文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提纲初稿。

巨大的发动、示威游行、罢工等等。发动不应如此软弱无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拒绝总攻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技术准备，而且政治准备都是不够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1923年8月高涨起来的政治罢工浪潮曾使我们说，德国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或者至少赢得了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阶层。看来这是不对的。德国共产党当时还只处在（正如现在所处的那样）争取多数的过程中。但是她还没有赢得这个多数。9月下半月和10月初正是组织一系列示威游行和其他发动以便使大部分工人阶层投入积极斗争的最合适的时机。但是恰恰没有这样做。当时，党内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意见，似乎危机已经到了起义的程度，似乎局部发动已经不可能；要么起义，要么什么也不做。由此产生了例如对与反法西斯日等有关的运动的错误评价。每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和参与发展过程的当事人人都知道，德国共产党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她没有足够能力在较长的时期里致力于一项突击任务、逐步开展战斗并使广大工人群众投入这个战斗，不善于在群众性组织中巩固对工人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影响，等等。党拥有工厂委员会这个基本的、历史地形成的群众性无产阶级组织。本来应当依靠工厂委员会进行争取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生动有力的鼓动工作，同时提高和发展工厂委员会，以便使它本身能够暂时地起到苏维埃的作用。党根本没有进行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又做得很不令人满意。结果对于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已经脱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来说缺乏一个权威的中心。

有些同志希望“立即”一蹴而就地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这种希望是没有根据的。技术准备工作（我们指的是党的组织机构、工人的武装、红色百人团的团结程度等等）显得非常缺乏。

另一方面，对敌人的技术力量和政治力量估计不足。现在已

经弄清，敌人至少拥有 50 万武装人员。此外，敌人表现出了比预计的更大的政治弹性和适应性，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比在九月事件以前更接近于反革命营垒。

在规定日期和估计速度方面，革命者过去犯过错误，将来还可能犯错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尽快地改正这些错误并作出必要的修正。

当时在估计事变的速度方面也是犯了错误的。

然而，对 10 月份出现的德国形势的基本估计仍然是正确的。德国共产党决不应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从日程上撤销。相反，这个问题仍应具体地和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尽管德国反革命势力的胜利多么巨大，它们毕竟不能起决定作用。

应当坚持不懈地继续武装工人，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技术准备。红色百人团可以建立起来，但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地建立，只要得到全体工人群众的支持和同情。要得到这种支持和同情，必须使它的发展同无产阶级的日常的局部的战斗密切联系起来。只有当工人群众在示威游行和罢工以及与资产阶级当局发生的各种冲突中得到红色百人团的保护时，红色百人团才能指望群众在武装、训练和侦察敌人力量时全心全意地来帮助它们。只有在那时，群众才会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突击营。汉堡的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突击队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尽管在汉堡，来自群众方面的支持是很不够的。

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曾宣布革命已经结束和已被埋葬。布尔什维克则说：革命的客观任务尚未解决，第二次革命将会到来。

在这场原则性的争论中，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第二次革命终于到来并且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关于第二

次革命的日期问题上犯过局部的错误。她曾指望在1906年和1907年爆发新的起义。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速度和日期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她在对阶级力量的基本估计上没有犯错误。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最近时期无疑将使德国的革命危机重新加剧。革命的客观任务尚未解决。使德国面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巨大因素不仅继续在起作用，而且在日益加剧。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相隔了12年。从第一次德国革命到现在已经过了5年。但发展的速度在加快。

毫无疑问，离第二次德国革命将不会是几年，而会是短得多的时期。在法国当局占领鲁尔以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敲起警钟，让各个支部集中注意德国的革命危机。埃森和法兰克福两次国际会议是完全讨论这些问题的。在共产国际对这两次会议的指示信中曾直截了当地谈到，问题不在于声明和宣言，而在于有秩序地和坚定不移地、合法地和非法地准备决定性战斗。

共产国际丝毫用不着后悔在1923年10月曾指示各支部注意德国革命的到来。在类似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应这样做。

毫无疑问，事态不仅在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而且在最近时期里（很可能就在今年冬季）可能发生德国无产阶级同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战斗。德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策略仍应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乃是最近时期的问题。

德国共产党从合法状态转入非法状态是经过很大困难的，但是总的说来，党是胜任自己的任务的。牺牲是巨大的，困难是无限的，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塞克特将军是永远不可能使德国共产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德国运用得特别认真。这一策略的优点和缺点都经受了最近时期德国经验的最好检验。要领导共产国际各支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在蓬勃发展

的事件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经验。

统一战线策略的优点正是在德国得到最光辉的证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曾十分详细地讨论了德国共产党因德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三月起义中遭到失败而面临的任務。正是在那时候，共产国际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正是在那时候，共产国际向德国共产党人声明，问题暂时不在于争取政权的斗争，而只在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后，德国共产党着手特别认真而系统地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策略贯彻得越有计划，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就越混乱，我们在群众中得到的同情就越大。德国的整个客观形势有利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如果说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作出这一决定后过了两年多，即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德国共产党已把如此众多的德国无产阶级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那么这无疑说明，德国共产党在这几年里正确贯彻了统一战线策略。

姑且说到1923年10月，我们还没有在德国无产阶级中拥有可靠的多数，但不久前还只是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德国共产党人在1923年秋天就能够严肃地提出我们是否在德国无产阶级中拥有可靠多数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其实行的最初阶段就在德国达到了目的。德国目前的形势是，德国共产党还必须在争取和巩固德国工人阶级多数的问题上做许多工作。但不管怎样，可以大胆地说，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初阶段，当问题只是涉及到将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完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并使他们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起码任务时，德国共产党总的说来是做得对的。

试图恶意诋毁统一战线策略的“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是完全不正确的。“左派”同志们有时责备德国共产党的多数派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过于把重点放在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较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上。这种责备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质是使最落

后的中间和后进的工人阶层逐渐摆脱反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要顺利地完成任务，不能不在宣传鼓动方式上考虑到这些落后阶层的情绪和心理。在1921年下半年、1922年全年和1923年上半年的时期里，德国共产党顺利地实行了统一战线策略。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策略的优点。

最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同样清楚地表明，与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危险性又是多么巨大。

我们记得，共产国际在最初阐述统一战线策略时，曾坚定不移地向各个党指出与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那些危险性。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1年底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初提纲中，我们写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提出预定的计划的同时，向所有兄弟党指出这个计划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遇到的危险。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已完全成熟和巩固，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已同中派和半中派的思想完全决裂。因此，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现象，也可能产生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的党派溶化在暧昧不明的统一联盟中的倾向。为了成功地实行上述策略以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必须使执行这一策略的共产党本身坚强有力，团结一致，必须使领导人思想明确。”

“在共产国际内部多少有些理由可以算是右派或者甚至半中派的集团中，无疑也存在着两种倾向：(1)一些人确实没有抛弃第二国际的思想和方法，没有摆脱对第二国际过去的组织力量的崇拜，而半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同第二国际，因而也是同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上妥协的道路。(2)另一些人则反对形式上的激进主义，反对假左派的错误等等，竭力使年轻共产党的策略更加灵活机动，以保证它们有可能更迅速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各国共产党迅速发展的进程有时在表面

上把这两种倾向纳入一个阵营，似乎成为一个集团。采用上述办法是揭露共产党内部的真正改良主义倾向的最好办法，其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群众联合行动中给予共产主义的鼓动以支持，如果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就可以根据经验改造那些偏激的或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左派分子，并把改良主义的赘瘤从党内清除出去，从而大大有助于共产党内部的革命团结。”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也着重强调了这一思想。在决议中这样写着：

“工人政府的口号尽管有其巨大的优点，但也象整个统一战线策略一样有其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性，为了克服似乎‘民主联合政府’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那种幻想，共产党必须记住以下一点：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政府，但不是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

现在，当作为共产国际优秀政党之一的德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中犯了极大错误时，提醒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这个警告是非常及时的。

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的最大的错误是她在萨克森的行为。

共产国际对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理解为（而且只能理解为）一项特殊的军事政治任务，其目的在于使革命先锋队便于为以后的战斗夺取基地，发动德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斗争。

即使公开的军事任务被直接推迟（因为事变的速度减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森共产党人也可以和应当做许多工作，首先是以下的工作：

(1) 直截了当地提出武装工人的问题；共产党人在参加工人政府的最初时刻，除了武装无产阶级的问题以外，不应把其他任何问题作为主要课题。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同德国同志一起开会解决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问题时提出的主要条件。

(2) 共产党人务须同样有力地立即提出关于大工业国有化，关于征用资产阶级住宅和富人别墅给无住房的工人及其子女，关于救济失业者的紧急革命措施，关于立即逮捕参与怠工的工厂主等等

问题。

(3) 共产党人务须最坚决地使建立工人代表政治苏维埃的思想活跃起来。

(4) 共产党人务须在参加所谓工人政府的最初时刻公开地批评以策伊格涅尔为首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毫无气节和反革命性，并将其钉上耻辱柱。

(5) 共产党人一旦弄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不采取任何坚决革命措施，就务须提出与他们决裂的问题。

但是没有做任何一件事。做的许多事情正好相反。共产党人部长们以极其关切的态度说，他们是站在“宪法基础”上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重复说，他们只“对地方自治代表会议负责”。这使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完全失去它应有的性质。结果得到的不是战斗的共产主义，而是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相当恭顺和忠诚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结果不是战斗的插曲，不是革命的战略，而是同“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庸俗的议会合作。有些时候，党或者至少可以说它在“工人”政府里的代表变成为“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俘虏。

以策伊格涅尔为首的萨克森“左派”社会党人同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听命于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右派社会民主党听命于施特莱泽曼，施特莱泽曼听命于塞克特将军，而塞克特又听命于明目张胆的法西斯分子。这就是

循环圈。

“萨克森”的整个视角是错误的。党夸大了萨克森事件的政治意义，而没有充分估计象柏林这样中心城市的决定性意义。

在萨克森本身，德国共产党不善于及时地把自己的基地移到工厂委员会上来，即不善于从下面通过联合工厂委员会以对抗准备背叛的整个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办法来组织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看到，在萨克森，我们只有在最好的情况下准备同共产党人一起实行议会合作的“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而没有准备同共产党人携手进行反资产阶级武装斗争的“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由于这一切错误，开姆尼斯代表会议产生了出其不意的结果。

德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萨克森试点经验时期所犯的那些错误。否则，党的正确策略今后也将成为不可能。萨克森的试点经验使“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威信扫地。它表明，这些可悲的英雄们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奴仆。但它也表明，在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和不善于以革命的方式运用这一策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现在无非是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派别。这不是夸大，这是事实。法西斯主义是最凶恶的反革命势力和不顾一切的社会蛊惑宣传的混合物。黄色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是这个“合成品”的一部分。已逐渐蜕化变质的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客观上正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即反革命集团之一，这一点并不妨碍社会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阶层真诚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难道现在还有谁会怀疑，以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为首的意大利社会党目前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派别吗？难道还有谁会怀疑，以扬科·萨根佐夫为首的、参加了法西斯分子章科夫的内阁并承担了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职务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就是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派别

吗？

在现时发展阶段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是这样。与法西斯分子没有多大区别的塞克特将军根本用不着来击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本身造就了塞克特将军，把他提到现在的职位上并实际上成为他的同盟者。从1918年10月起，5年来，当第一次德国革命后政权落到所谓“人民代表”（三个社会民主党人和三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手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党人（现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是逐步地、有所节制地滚到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营垒里去，把政权让给了法西斯分子。现在，这个过程已接近完成。谢德曼-哈阿兹第一个“革命”政府的合法继任人正是法西斯分子塞克特将军。十一月共和国哺育了法西斯主义。

在与德国目前形势有某些类似特点的情况下，在两次革命交替的时期里，列宁同志曾说：

俄国可以分为三个营垒：

(1) 黑帮，右派（地主和大资本家）；

(2) 动摇不定的中派，中间派（小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和其他“民主派”）；

(3) 左派（工人、部分农民）。

布尔什维克党十分清楚，就是在第一营垒内也有一些小派，如十月党人中的商人同“俄罗斯人民同盟”（现在可以称为法西斯分子）中的赤裸裸的反动地主是有所区别的，在第一营垒和第二营垒中间也有一些中间的派别，等等。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知道，这些细微差别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党教育人民，首先教育工人阶级全国划分为三个营垒。

德国共产党人目前也应该这样做。如果说的是广大居民群众，说的是千千万万的人，那么现时德国可分为三个营垒：

(1)黑帮营垒,联合着全部大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最富裕部分——实际上是法西斯营垒;

(2)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报酬优厚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

(3)意识到必须进行革命斗争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

毫无疑问,德国的黑帮营垒现在试图依靠下层人士,而且不无成功。由此产生了共产党人的一项极重要任务: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争取使业已破产的和正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是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因为法西斯分子现在不仅靠剥削工人,而且靠剥削相当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拯救资本主义。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么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1923年9月底以前,我们曾看到第一营垒和第三营垒两极。中间的动摇不定的分子(即第二营垒)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不经任何震荡来拯救资本主义。

既然问题涉及到广大群众,那么中间的第二营垒就是现在也还是存在着的。但是从10月起,在党的领导层中发生了分化:第二营垒的领导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转向了第一营垒。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现在成为黑帮营垒的遮羞物。

当然,艾伯特和塞克特之间的阶级差别是有的,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是艾伯特客观上是塞克特的奴仆和俘虏。艾伯特和泽韦林格之流不愿意也不可能挣脱法西斯主义的紧箍圈。

艾伯特和塞克特的政治目的的统一在目前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说的是上层,是政治领导集团,那么第一营垒和第二营垒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当然,在希特勒—鲁登道夫—卡尔—克尼林格—塞克特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泽韦林格和艾伯特之间是有差别的;在以谢德曼为一方和以塞克特为另一方之间也是

有差别和局部分歧的。艾伯特和泽韦林格之流还企图依靠居民中的民主阶层,其中包括一部分报酬优厚的工人。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细微差别而已。在主要方面,他们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扼杀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当然,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忘记敌人营垒中的细微差别,但是最重要的是使人民、使工人阶级了解问题的实质。而实质就在于:塞克特将军也是法西斯分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层已经成为彻头彻尾法西斯的党,它实际上已同塞克特将军这个德国的高尔察克联合起来,为反对工人革命而进行殊死斗争。

正因为如此,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态度必须重新审查。最近时期发生的事件更加充分地表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将彻底变为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将为反对无产阶级而从街垒的另一面斗争到最后一刻。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记住,推翻了威廉和确立了“民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德国1918年十一月资产阶级革命是违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意志而爆发的。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整个策略直到最后一刻都是为了维护威廉的王冠。因此,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维尔斯和弥勒之流将为反对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到底。

现时“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要比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的政策更危险。在现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所谓的“左派”社会民主党。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们的最后幻想,这是最后一场历史的化妆舞会。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记住,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有一些宽宏地同意跟共产党人一起在“议会”范围内进行合作的策伊格涅尔式的英雄,但是根本不存在同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手执武器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公开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就连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工人也已经不相信诺斯克和艾伯特式的公开叛徒了。但是相

当一部分工人还相信“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相信这些实际上只充当右派社会民主党卑鄙反革命政策的遮羞物的罗森贝尔格、克里斯平、策伊格涅尔和列维之流。

现在是德国共产党人应该向全国声明拒绝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进行任何谈判和协商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同占居在该党中央里的公开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或者是法西斯资产阶级在德国取得胜利，这时卖身求荣的德国社会党领袖们就会去替法西斯效劳并继续镇压工人；或者是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无论如何是违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意志的。

现在是德国共产党人应该公开声明拒绝同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中派进行任何谈判和协商的时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英雄们至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同占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反革命匪帮断绝关系。

有些同志虽然接受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上层谈判的建议，但是企图以下述一点来说明拒绝谈判的理由，他们说什么法西斯分子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失去了满足部分要求的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同社会民主党上层协商的基础。问题的这种提法是非常错误的。事情恰恰相反。假如我们真的在街垒的一面看到的是取得胜利的法西斯反动派，而在街垒的另一面看到的是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失败的社会民主党，那么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人应该同社会民主党更加接近以便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但是问题在于事情并非如此。问题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本身已经成为法西斯分子。

当然，如果说的是社会民主党白纸黑字所写的纲领，那么塞克特将军已经将其践踏。不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本身也已经践踏了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纲领。而如果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

真正理想来说,那么他们目前离塞克特将军的制度已相去不远。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的隐秘目的就是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的不仅是塞克特将军,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现在塞克特的所作所为是同艾伯特之流完全一致的。

1923年8—10月的事件要比1918—1919年的事件更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胆颤心惊。社会革命的“红色幽灵”使他们急剧地向右转。

正如俄国1905年10—12月的事件将“民主自由主义”的所有领导人(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彻底倒向沙皇专制政府一样,德国1923年8—10月的事件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艾伯特、谢德曼)前去支持塞克特将军的独裁政府。

来自下面的统一——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使我们在德国得出的结论。

早在共产国际的最初提纲(1921年12月)中,我们在提醒各兄弟党注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时写道:

“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对抗孟什维克领袖们的政客手腕而提出了‘来自下面的统一’的口号,即建立工人群众本身在反对资本家和争取实现工人的革命要求的实际斗争中的统一。实践表明,这是唯一正确的回答。由于采取了这种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的策略,很大一部分优秀的工人孟什维克逐渐被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了。”

现在是德国共产党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应该善于贯彻**来自下面的统一**的口号的时候了。在还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当中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动。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正在寻求新的出路,他们看到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破产。我们在坚决拒绝同反革命的上层进行任何谈判的同时,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同我们在各

地都可以碰到的、真诚地在寻求正确道路并准备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的忠诚无产者、社会民主党工人们进行局部的谈判和协商。

德国社会民主党现时的内部状况是有助于真正贯彻来自下面的统一的因素之一。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实际上是彼此很少联系的采取截然不同政治方针的地方组织的堆积物。议会党团实际上起着该党真正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但正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议会党团在普通党员的眼里威信扫地。为了贯彻始终，我们本来也应当作为先决条件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断绝关系。然而，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如果社会民主党某个地方组织参加同共产党的协作并着手同她一起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那么这一事实实际上就意味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上层断绝关系。

但是为了贯彻局部协商和来自下面的统一的策略，必须使德国共产党意识到所犯的错误。不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就有可能使在整个时期内始终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威信扫地。

来自下面的统一，这个口号决不应过于机械地加以理解。来自下面的统一也要求有组织和有计划地进行。不仅应当善于在工人大会上，不仅应当善于向群众捍卫这一口号，而且应当善于在代表会议上，在个别工会里、在工厂委员会里、在个别地区和城市的工人中心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加以贯彻。所谓从“下面”着手，就应当善于有步骤地发展这一事业，一环扣一环地加以扩大，以便最终达到足以保证胜利的工人群众的统一。

在贯彻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一系列国家里发现了这些错误。1922年初，在法国，大部分党员不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并真诚地担心这一策略意味着对社会民主党实行思想上的让步。在英国，一部分同志开始时不理解统一战

线策略,从这一策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似乎共产党人不应当在议会中批评机会主义的工党。在芬兰,也得出了类似的错误结论。在罗马尼亚,一部分同志认为,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议会合作。意大利共产党长期来则犯了性质相反的错误,不善于(在某种程度上说至今还不善于)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来揭露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其他许多党开始时把这一策略理解得过于机械,认为只要每月给社会民主党人写一封千篇一律的公开信,然后抛置脑后,不善于进行与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认真的政治斗争,等等。

然而我们认为,执行得不好还不等于这一主张本身是错误的。在一系列国家中,错误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特别是在初期,不等于这一策略本身是错误的。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例如革命议会制的主张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吗?革命地利用议会的策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策略。而实际执行这一策略曾经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使我们)遇到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那些原则上反对革命议会制的同志是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是而且更是这样。

只是需要使所有共产党人都明确什么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它应当是什么样的策略。必须彻底弄明白,在共产国际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还相信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工人中以及在革命工人中(包括无党派工人在内)进行鼓动宣传的方法,是适应当前时代的方法。必须彻底抛弃这样的想法,似乎统一战线的策略预定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实行或多或少的长期联盟,实行可以在民主范围内在整个过渡时期内实现“工人政府”的联盟,等等。必须彻底抛弃上述这种幻想,尽管目前它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

当我们谈到革命鼓动宣传的时候,我们自然不是把它跟革命

组织和斗争任务对立起来。两者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自然包括共产党人真诚地愿意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共同行动，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即使在最起码的问题上以实际行动为反对资产阶级而斗争。我们永远准备分开走，一起打。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过渡性的鼓动宣传口号。它比其他任何口号都更适合于用来不仅把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把站在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等工人阶层，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把无产阶级的后进部队动员到共产主义的周围。但是，假如我们勾起工人阶级的幻想，似乎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可以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通过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协商来达到，那么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在欧洲各主要国家里，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即使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决不能指望于他们的）全体都想要转到工人一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地摆脱危机的出路也是不可能的。多少年来，正是这个社会民主党竭尽全力来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目前这个专政已经相当巩固，以致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和平“民主”的感召下让出政权。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仅不想转到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一边，而且相反，年复一年地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越来越坚决的拥护者，以致最后堕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翼。

法西斯专政应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工人的东西。共产国际必须有步骤地、坚定不移地利用每一个适当的事例、每一个大的国内战争中的插曲，特别是象在德国发生的那样的大事件，来向最广泛的工人阶层说明，要想在民主范围内向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任何和平过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们解释，一切无产者的统一战线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斗争并能保证它取得胜利的，但是决不能以平稳的、和平的、民主的、无痛苦的演变来代替斗争。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革命

的策略，而不是演变的策略。这个策略好就好在它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而决不在于它用和平演变来代替革命。

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为在广大工人阶层中进行鼓动宣传的一种方法，自然只适合于一定的时代，即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的一切主要国家里还处于少数、直接革命战争暂时还没有发生的时代。随着形势的变化，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也必将有所变化。就是现在，在不同的国家里实际贯彻这一策略也应当有所不同。举一个例子来说，以上规定的德国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方式目前就不适合于波兰。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学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统一监督下，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

1923年9—11月在保加利亚、波兰和德国发生的事件无疑是国际革命史上新的一章的开端。随着斗争的发展和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将不止一次地来改变个别一些国家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方式。将来有个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远），我们会看到目前还很强大的许多社会民主党将彻底破产，阿姆斯特丹工会将完全转到我们一边，或者顽固地坚持变节，那就像肥皂泡一样在我们眼前破灭，而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工人将大批地转到我们一边。统一战线的策略将加速这个时刻的到来。而当这个时刻来临时，我们自然会从中得出策略的结论。

“左派”共产党人羞答答地试图利用象在德国那样的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支部里发生的错误来取消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对这种企图应予坚决的回击。统一战线策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策略，尽管有象德国所犯的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不能容许，在倒掉洗澡水时也把孩子一起倒掉。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这些错误学会将来不犯错误，而决不是在这些错误上再增加新的更大的错误。

共产国际执委会深深相信，日益积累了巨大政治经验的德国共产党一定会迅速克服错误并走上正确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

认为，在评价德国事件时没有任何理由持悲观的态度。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困难所吓倒的，是不会一遇到失败就动摇的。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正是她应当领导1500万—2000万德国无产阶级投入战斗。不久将来在德国进行的战斗不仅决定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命运。全世界共产党人正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德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她目前正在白色恐怖下，在枪林弹雨中，在社会民主党叛徒们不断从角落里发出的各种攻击下进行着自己的斗争。德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得到整个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的兄弟般的支持。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1期
第499—524页。

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

——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

(根据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五周年在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次演说整理)

(1924年3月)

共产国际成立五周年适逢第一国际成立60周年。世界历史60年并不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但是在这60年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整整3个时期。这3个时期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是同三个国际,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相适应的。

第一个时期是准备时期,这时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个时期的顶峰是巴黎公社。

随后是第二国际于80年代开始出现,它存在了1/4个世纪。与此同时,在第二国际的范围内,第三国际渐趋成熟,最后终于出现第三个时期——共产国际的时期。

必须追溯这三个时期发展的总路线,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和根本意义。

共产国际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与列宁同志的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因此,阐述列宁参与国际运动的活动象一条红线似的贯串着共产国际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下面将来扼要地叙述这一过程。

第一国际的时期

第一国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在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几个国家之后建立起来的。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848年时已经结束了第一轮。然而事情常常是这样，在巨大运动，尤其是国际范围内的巨大运动之后，这些运动的影响还会在几年内，有时甚至几十年内扩展起来。1848年结束的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

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为代表的最初觉醒的工人阶级，到1848年时，无论在法国，也无无论在德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在数量上已经大大增加。

英国的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作为后盾。顺便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提到，宪章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运动之一。

汇入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行列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唤醒了工人阶级。到六十年代初，整个欧洲刚刚形成的年轻的工人阶级经历了自己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风暴时期。于是在这一浪潮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浪潮，而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浪潮将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支队伍推到了自己的浪峰上。

运动相当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从第一国际成立后不到十年，巴黎爆发了巴黎公社的起义，我们看到了马克思领导的这个第一国际的浪潮的最高峰。

巴黎公社被镇压了。它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国工人阶级那时候没有共产党，它被分裂成一些团体和派别。巴黎公社是

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各种派别、团体、小集团的非正式的联盟。巴黎工人虽然表现得相当英勇，但是巴黎公社战士们缺少一样东西，即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组织。他们缺少共产主义的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缺少由一块铁板铸成的政党。

1871年实际上是第一国际巨大革命活动的最后一年。巴黎公社以后，第一国际又存在了几年，但这已经是日落西山，几乎奄奄一息了。最高潮已经过去，国际工人组织已经不是在走上坡，而是在走下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各国政府，首先是欧洲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相互间订立了“神圣同盟”，实际上这是反对第一国际成员和拥护者的最反革命的同盟。那时的公社战士被诬蔑为豺狼。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了一项专门的条约，用火和剑来残酷地迫害任何一个属于马克思国际的人。它们设置国际警察、国际间谍的专门机关，以便在萌芽状态中就根除作为第一国际基础的组织。

大家知道，列宁同志没有直接参加第一国际的工作，因为第一国际的活动在70年代初就结束了。然而，从他对第一国际活动的评价中，从他对待这一活动的重要篇章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对待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这个第一个时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孜孜不倦地研究了巴黎公社史的一切细节。列宁同志对有关巴黎公社的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本书籍都无不贪婪地阅读，并把它看作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我们流亡国外的共同生活的时期里，在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里，在反革命的年代里，弗·伊·往往十分不乐意在各种会议上向当时的国外侨民，即大多数对列宁主义持敌视态度的人发表演说。但每年一次——巴黎公社纪念日——，弗·伊·从不放过机会在会上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从而也谈及第一国际的活动。而每年列宁的这一演说越来越令人鼓舞，越来越深刻。他教导每一个听他讲话的

人(那时听他讲话的不是千百万人,而只是人数不多的小组),要十分尊重第一国际的工作,特别是尊重巴黎公社战士们完成的业绩。

第三国际的史前时期就是由此开始的。在列宁同志每年所做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中(很可惜,这些报告只保留了一些片断和个别一些文章以及保留在当时听众的记忆中,那时没有做速记记录),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第三国际的纲领,指出了我们第三国际活动家们从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中所应借鉴和已经借鉴的东西。

向第二个时期过渡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长达几乎20年的反动时期来到了。在1871—1889年期间,国际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国际联系。它被分裂成为个别分散的队伍。法国工人们将近15年不得不为结局如此悲惨的第一次起义付出代价:没有一个法国工人家庭,特别是巴黎的工人家庭不遭受这样或那样的牺牲的。法国资产阶级枪杀了几万工人,还有几万工人被送去服苦役。以巴黎为中心的黑色反动势力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的其余部分。

只是到了80年代末,法国工人阶级才开始从这些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时德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工人们才和它一起开始行动起来。这就是19世纪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列宁同志没有十分积极地和直接地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列宁同志在从事广泛的政治活动的最初年代里是非常尊重第二国际的工作的。他把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理想化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怎么办?》一书和其他著作中,你们可以看到充分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伟大作用的篇页。这种态度历史地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

国际的主要政党，它对于第二国际起了近乎我们俄国共产党对第三国际所起的那种作用。它将千百万党员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会，创办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报刊，把工人群众从人类的尘埃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变成工人政党。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优点。这里也包含着整个第二国际在其活动的第一个时期里的优点。列宁同志以其革命家的热情和对机会主义者的不调和态度，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不久前第三国际已经成立的年代里，也非常客观地强调指出第二国际在当年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列宁同志即使在反对第二国际从1914年起粗暴地背叛工人事业的一些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中也常常指出，第二国际在头20年的时期里起了积极的作用，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工会、合作社、教育团体，扶植社会主义的报刊，对工人进行启蒙，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

我们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必须清楚地看到第二国际的这一不朽功绩。从1889—1914年这25年——现在已经完全清楚，这是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结束(1848年)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工人阶级除了它实际已经做的工作以外历史地不可能做出别的事情来。十分清楚，世界历史赋予被压迫阶级这样一个时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逐渐积聚自己的力量，形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取得初步的组织经验和政治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代并没有虚度，第二国际的时期对于国际工人阶级来说是漫长的、和平的有机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只可能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和积聚工人阶级的可靠队伍，我们看到这些队伍在数量上和在上政治上已经成长。正因为如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事活动的最初年代里，他十分注意第二国际的工作，并对这项工作怀着极大的敬意。只是在斗争过程中，他才逐渐酝酿这样的想法：必须在第二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左派，最后终于形

成这样一个信念：不建立第三国际，就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列宁在第二国际

我们党(当时还是统一政党)的布尔什维克派第一次同第二国际活动家们的实际接触是在1904—1905年，那时正是我们第一次同孟什维克派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剧烈分歧甚至分裂的时期。

那时候，领导第二国际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具体地说，第二国际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后来形成了某种三头政治，完全统治着第二国际，领导着它的全部工作。这就是：倍倍尔、维克多·阿德勒，稍后还有饶勒斯，他是法国党的代表，而实际上是第二国际所有拉丁语系国家的代表。

在这三人当中，最杰出的是倍倍尔；他的声音是最权威的。列宁同志与已故倍倍尔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03—1904年，那时倍倍尔试图干预我们党内的论争，以便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实行和解，而倍倍尔当时是明显地袒护孟什维克的。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侨居国外，与第二国际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列宁同志对于第二国际来说是个新人，因为他当时刚刚在国际舞台上露面。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般喜欢听取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呼声。在1903—1904年的转折关头，当情况表明列宁同志在俄国并非孤家寡人，布尔什维主义在成长壮大，尽管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享有巨大威望，而列宁同志把一半的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并眼看将把大多数党员团结起来，这时第二国际决定来支援孟什维主义。倍倍尔通过列宁同志致函布尔什维克，建议我们诉诸仲裁法庭。当时我们布尔什维克中央难于拒绝这一建议，因

为我们是个小数，而第二国际当时正声威极盛，而倍倍尔在整个第二国际中又享有独一无二的极高威望。因此，他的建议使我们，尤其是使列宁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列宁同志当时已负责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因此一切打击都落到他的头上。然而，尽管对第二国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对倍倍尔本人满怀敬意，列宁同志以及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还是决定婉转地、但坚定不移地断然拒绝这一调停。

第二国际并不是象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象我们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个自由的、松散的各党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集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来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利用了这一点，并表示我们拒绝倍倍尔的干预。

列宁同志走了自己的路，并沿着这条路领导了我们党。这是第一次，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们几乎一致地反对刚刚开始形成的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然而，此后将近10年，无论是列宁同志还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对第二国际怀着极大的敬意。

1904年，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那时我们党已经分裂。孟什维克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去阿姆斯特丹，布尔什维克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列宁同志拒绝参加这个代表团。这是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情绪造成的。第二国际的所有领袖当时都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

第二国际当时的右派和左派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交了锋。当时议程上讨论的是关于内阁主义，即社会党人、第二国际的成员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重要问题。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采取否定态度：饶勒斯同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同意所谓米勒兰主义的新策略，倍倍尔则反对，大多数代表站在倍倍

尔一边。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可以说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作了最后一次振翼飞翔，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革命派多少取得了巩固的胜利。

从1904年起，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日益巩固，而到现在这个机会主义已经十分巩固，以致关于米勒兰主义，关于社会党人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在第二国际中已经没有人再去考虑，再去争论了。现在可以说，第二国际的每个领袖只要得到允准都准备欢欣鼓舞地去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从麦克唐纳的例子中，从英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去年在汉堡他们通过一项决议：第二国际的某个领袖一旦得到内阁席位，他必须退出第二国际执委会，但只是临时的。不久前，在第二国际国际执行局会议上决定把韩德逊先生参加英国资产阶级内阁看作是一段时期的休假。决议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人先生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看作是一种打临工。韩德逊去为英国资产阶级工作就是去休假。一旦假期结束（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假期很快就会结束），这位韩德逊就又回到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交椅上来。

1904年时，大家可以看到，情况有所不同：那时这是个争论的问题。1904年，左派在阿姆斯特丹取得了胜利。然而，在使用“左派”这个定义时，我们必须申明，倍倍尔领导的这个左派后来实际上非常接近于我们现在所称的中派。但是，当时在第二国际内的分野还没有这样明确。

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当时我们党走上了广阔的斗争舞台，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深信，俄国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前途。在1905年的影响下，第二国际各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6年召开了著名的耶拿党代会，罗莎·卢森堡挺身而出，反对右派和中派。

列宁同志亲自参加了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是在我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们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中央的微弱多数。我们必须派代表团去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而且竭力派出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代表团。

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开始初步形成了后来发展成为第三国际的派别。领导这个派别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已故的罗莎·卢森堡。列宁同志在报告和谈话中，向我们讲述了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他和罗莎·卢森堡如何试图召开拥护列宁同志和罗莎·卢森堡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非法会议（所谓非法不是指躲避警察而言，而是指躲避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在第二国际内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第二国际内建立左派的初步尝试，建立这样一个派别的初步基础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奠定了。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殖民地问题；这里我们几乎已经接触到了战争的问题，而当时的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再一次地看到第二国际大多数人不久将堕落为明目张胆的改良主义者；只是以极微弱的多数才在斯图加特通过了一项决议，而决议内容实际上是有利于明目张胆的社会叛徒策略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抱怨说，他们之所以在斯图加特遭到失败是由于象俄国和其他一些农业国家这样一些落后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多数票，从而使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陷于少数的地位。

在斯图加特，还明确了这样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一次暴露出来的，因为代表大会是在德国召开的，德国的工会派了几百人的代表团，而德国工会的所有领导人都以明目张胆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姿态出现。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国际急剧地滑向泥潭，而列宁同志对第二国际就采取了极端怀疑的态度。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动摇了他对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的信心。虽然他仍把第二国际

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组织,但是他已看到,在这个组织内部,右派正在日益壮大,它在决定性的时刻将会背弃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再次尝试建立左派;他试图召开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会议,但是事情进行得又缓慢又不顺利:只召集了大约10个人,其中一半又害怕参加这样的会议。人们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列宁同志,对他很不理解,而第二国际的一些最杰出的代表——曾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代表则反对他。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试图在第二国际内建立左派的尝试失败了。代表大会讨论了一些次要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处处都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同我们报纸上说的情况相反,列宁同志没有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没有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党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是加米涅夫同志。我和列宁同志当时住在克拉科夫——为的是离国境线更近些,因为我们那时正开始在出版自己的合法报纸《真理报》和《明星报》。巴塞尔宣言是类似第二国际汉尼拔誓言的东西。列宁收到宣言后说:“给我们开了一张重要的支票,但怎样来兑现呢?”大家知道,这张支票后来没有兑现。这时,后继者已经开始统治第二国际。接替倍倍尔和维·阿德勒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一代,即谢德曼之辈。当时,曾经站在左派一边的考茨基开始蜕化,转到了右派一边。第二国际的领袖不是日甚一日地,而是时甚一时地变坏了。如果说倍倍尔主观上是忠于工人阶级的,如果说这是个出身于工人群众、经常感觉到工人群众脉搏的人,那么现在出现在舞台上的后继者则是些另一种气质的人。这是些工人贵族的典型领袖,这是注定要对国际工人阶级实行最卑鄙背叛的一代。

1914年,我们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们又有了密切的接触。列宁同志当时是第二国际国际执行局的委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

布鲁塞尔的执行局会议，回来时几乎病倒。根据他的叙述，使人感觉到，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些可耻的场面，亲眼目睹了一个拥有2千万工人的庞大的国际组织怎样开始在腐败。我决不会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谈到，在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以罗莎·卢森堡为一方和以倍倍尔为另一方之间的剧烈冲突。当罗莎·卢森堡试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掀起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时，她遭到右派和以倍倍尔为首的中派的反对。我曾有机会作为我党中央的代表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0—1911年召开的第二次耶拿代表大会，我们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整个代表大会对已故罗莎·卢森堡进行恶毒攻击的空前场面。而领导这场攻击的是已故的倍倍尔。当罗莎·卢森堡起来反对倍倍尔并得到革命德国工人的响应时，人们把她拖进了国际局，送上了国际法庭，在那里对她进行了严父般的训斥和开除出党的威胁，采取了最精巧的嘲弄方式。列宁不能忍受这一切，他试图起来捍卫她，于是风暴和雷霆也落到了他的头上。列宁同志试图诉诸于普列汉诺夫，当时后者正处于复兴时期，同取消派进行斗争并跟我们携手并进，但是当列宁同志指出不能容忍对待罗莎·卢森堡的做法时，普列汉诺夫却用以下的名言来回答他，说什么：耳朵总不能高过额角，我们应当缄口不语；当我们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有了100万党员时，人们就会重视我们，而现在我们只是个“穷亲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门砰然一摔，退出了会场。

此后，列宁同志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同聚集在罗莎·卢森堡周围的一些人接近。而象胡斯曼那样的先生们在起领导作用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越来越堕落了。自由派律师胡斯曼放肆地拍拍列宁的肩膀，“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准备教训他说，应当怎样组织工人政党和怎样领导工人阶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参加这样一些律师和未来内阁部长的会议总是很不满意，他把参加会议

看作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1913—1914年，第二国际不得不再一次来关照布尔什维克并支持孟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星辰又在俄国升起了；我们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而阿克雪里罗得一伙赶紧来支援这些先生们。我记得在耶拿，现时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当时党的主席弗里茨·艾伯特傲慢已极地谈到俄国的“派别”，说这些派别妨碍他艾伯特从事国务活动，出了这么一个列宁，不得不与之周旋，等等。他们给我们（主要是给孟什维克）拨了选举经费等等，把我们当作穷亲戚，因此以为我们必定得巴结他们。克拉拉·蔡特金曾经谈到，当她在耶拿碰到我的时候，有人事先警告她：瞧，这是列宁的代理人，要提防他，同这样的人见面是危险的。那个时候，对布尔什维克不是伸出两个指头而是伸出一只手来是要有莫大勇气的。

1913年，或者我没有记错的话，1914年初，王德威尔得到彼得格勒来。当时他有两个使命：首先，他受比利时和法国政府的委托，同沙皇政府一起准备战争，其次，他顺便试图帮助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他来到《光线报》编辑部 and 我们的《真理报》编辑部收集材料，打算以第二国际的名义命令我们关闭《真理报》并与孟什维克合并。王德威尔得回到比利时后，向当时我党的所有派别和团体发出呼吁，要他们到布鲁塞尔去。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决定让我们大家和解。总共召集了十四个派别，其中只有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派。这样，我们只占十四分之一，当然，根据这些人的意见，我们必须服从其余的人。列宁同志拒绝出席这样的会议。结果落到已故的印涅萨·阿尔曼德身上，由她代表我党去参加这些先生们的会议。这是战争即将爆发时的事情。第二国际起草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有力宣言，迫使我们服从取消派，但是这时候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而第二国际也经受了极大的危机。

那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国际身上的异物。早在哥本

哈根时,我们就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派别,只是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做出点事情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第二国际的态度开始是赞许,然后是等待,以后又是怀疑,现在则到了第四阶段——同第二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并成为未来第三国际的组织者之一。

向第三个时期过渡

1914年,第二国际的时期结束了,新的时期开始了。这是个什么时期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再过五——十年每个人都将看到),这是共产国际的时期。

这一点同以下的事实丝毫不相矛盾:到目前为止,第二国际依然活着,仍在苟延残喘,有时也取得局部的胜利。两个组织的暂时共存无非证明,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把这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一刀切开来。在社会生活中,新时期常常是在旧时期的残余还存在的时候就开始的,这些残余会象楔子一样打进正在产生的新组织的机体之中。现在我们在工人阶级国际斗争中看到的情形正是这样。

从战争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头3年是向新时期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时期里,列宁同志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此同时,也为第三国际的建立进行了坚定不移的宣传鼓动。为此目的,他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了预备性的组织措施。他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奠定了基础。

列宁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依然是第二国际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实际上还是原来第二国际里的那些派别,只

是比例有所不同。会上有右派、左派和中派。第二国际的右派充满了沙文主义情绪，它对国际代表大会连听都不愿听，因此它出席的人数很少，这就造成了某种视错觉。结果似乎是右派力量最弱，中派最强，左派处于上升的少数，但是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无论在齐美尔瓦尔德，还是在昆塔尔都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派别，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利用这个暂时的联盟来为未来的第三国际奠定基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有现时的意大利社会法西斯分子，即现时充当墨索里尼忠实奴仆的莫迪利扬尼及其同伙的先生们。目前在我们队伍里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当时曾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口沫飞溅地谩骂每一个主张建立第三国际的人。不仅在第二国际内，而且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谁都不愿听一听关于建立第三国际的话。我们从人们的脸上，除了茫然若失的、怀疑的或困惑的苦笑以外，看不到任何反应。当列宁同志说到必须建立第三国际时，当他谈到第二国际已经破产时，不仅右派和中派的代表们，而且就连目前在我们队伍里，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余支部里的同志们也报以讥讽的嘲笑。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人们把列宁同志说成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可怕的怪物：瞧，列宁竟建议成立第三国际，大家知道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第二国际很快就会复兴，等等。除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口号以外，谁也不肯多走一步。这场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右派，不如说是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列宁本人，累德堡和所有意大利社会党人都攻击他，法国人也起来反对他，只有波兰、拉脱维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个别人在筹建第三国际的事情上支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有甚者，在二月革命后，当我们党在弗·伊·回国后第一次公开召开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时，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对于是否成立第三国际还是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圈子里仍有很大争论。列宁同志要求同齐美尔瓦尔德彻底决裂。我们则主张等待。四月代表会议通

过了一项妥协方案：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以便互通情报。

当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斯巴达克派把联盟改名为共产党，并决定成立第三国际。然而，就是在第三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巴达克派的代表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未来的德国共产党人认为成立新的第三国际为时尚早，但是问题终于不顾他们的反对而解决了。

第 三 国 际

就这样，随着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第三共产国际的星辰升起了。总结第三国际的工作，不能不为共产国际头一年所取得的令人目眩的胜利而感到惊讶。诚然，我们有时也感觉到我们前进得还过于缓慢。共产国际已经存在了整整5年，而我们还没有赢得整个欧洲，在最近3年当中没有爆发一次革命。

革命的急不可待是革命时代的征兆和表现之一。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革命的时代，我们现时的一代人表现得急不可待，而这5年似乎是空前漫长的时期。的确，在目前的时期里，5年就是整整一个时代。但是应当明白，这5年实际上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时代。从1914年或1917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将不是延续10年。在几十年的范围内将有单独的篇章，单独的过渡时期。头5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中的第一章，第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应当懂得这一点，并教育我们的革命青年、新兴的工人阶级和优秀的农民使正在完成的事件赋有历史的规模，不时记住第一国际发展的进程。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在1847年写成的。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这个主要文献诞生之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7年过程中致力于为第一国际奠定基础的工作。从1847年到1864年这17年为起草第一国际的纲领

作了细小的、日常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家，他的心燃烧着圣洁的革命的急不可待之火。但他不顾这一点，善于花17年时间来从事小组的工作。随后，优秀的有识之士、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们在20年过程中致力于第二国际的建立。革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象我们中间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会迅速到来。如果我们把现时发展的进程拿来同工人运动前几个时期的发展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在我们这第三个时期，即共产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历史的火车头是前进得无比迅速的。

诚然在5年前，工人阶级的自发性高潮要比现在强大。那时，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整个欧洲变成一片废墟，每个工人从心底里发出愤怒和绝望的呼声，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张惶失措。我们似乎觉得，在一两年内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里眼看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而如若没有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我们或许能够成功。国际社会民主党救了资产阶级。

然而，现在在评价这一时期时，我们应当说，工人群众的自发性高潮有其优点，也有其弱点。革命中的自发势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们从一切革命，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也知道，只靠自发势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自发势力就象大海一样，今天涨潮，明天就会退潮。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只有当它建立在钢铁般的基础上，建立在真正的牢固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上时才是巩固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着手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并在头5年当中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空前迅速地行进。为建立我们俄国共产党曾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在头5年当中就使共产党遍及全欧洲和其他各洲的部分地区。

当列宁同志发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的演说时，无论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还很软弱。我

们当时只有一些初具规模、仓促组成的团体，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胜利满怀信心。他不是那种喜欢吹牛夸大、唱高调的演说家。但是他的演说不能不称之为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赞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共产国际存在本身，它作为国际组织而进行活动本身，它在许多国家里拥有政党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极大的胜利。

在列宁同志的影响下，在5年当中，共产国际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宣传员的国际组织，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变成为强大的、枝叶繁茂的无产阶级组织^①。当然，今天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统一的国际共产党。这样说是自我吹嘘，但是我们可以毫不自我吹嘘地说，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莫斯科庆祝50寿辰时，曾发表简短的演说，他说：同志们，我们正处在极盛时期，我们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我们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成为骄傲自大的政党。没有再比骄傲自大的人更无耻的了，没有再比骄傲自大的党更可耻的了。

共产国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成为统一的国际共产党。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一些国家里，我们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群众，并接近于取得多数。在另一些国家里，我们的党陷入了中派主义的思想立场，那里我们遇到了一系列危机和旧病复发。在许多国家里，我们有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党。而在东方，规模宏大的解放运动正在兴起。

有些天真的人统计了一下第二国际各党党员的人数，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三国际丝毫不比第二国际强大。然而，问题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它是否同历史的发展步调一致，是否违背历

^① 不久前出版了季维尔同志编的小册子《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我向你们推荐谈一谈这本绝妙的好书，它用数字和语言说明了这一过程。

史的发展。例如，大家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吧！它在俄国曾拥有几百万党员，而我们党在二月革命后全国只有4万党员，有个时候我们甚至只有几百个党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未来工作，未来将使我们成为人数众多的世界性政党，而社会革命党将一无所有。现在，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的一些国家里具有相当的势力，但是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因此第二国际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了。

对待农民的态度

我们从第一国际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从它那里获得两件东西：我们对农民的看法和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看法，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第一国际尚未面临这两个问题。

农民国际的成立可以认为是去年1923年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只有现在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现在已进入没落的阶段，正如列宁说的，我们面临的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当它正发展和繁荣的时候，它有可能建立并已经建立了富裕农民的阶层，它依靠这个阶层并把自己丰盛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抛给它。但是，从资本主义进入没落时期起，特别是从1914—1918年的大战以后，除了新的战争和新的苦难以外，它不能给予农民任何东西。象法国这样富裕的农民国家就是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小部分法国农民发了横财，积蓄了大量纸币，但是现在，这笔财产落空了，因为货币贬值了：法国法郎遭到了与德国马克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大部分法国农民在战争期间学会了仇视资产阶级，你们在法国农村中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农民怀着同情的态度对待苏维埃俄国。

第一国际未能作为战斗任务提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问题。诚然，马克思曾发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农民战争结合的预言，但这只是英明预言家的一点闪光的星火。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全世界农民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农民国际成为政治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列宁同志对1923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农民国际代表会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求别人给他念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我没有机会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但是我深信，他和我党中央的所有委员一样，对于使第三国际成为不可战胜的这一事件赋予重大的意义。

我们奠定了农民国际联合的基础，农民国际代表会议在一系列国家里受到热烈欢迎。共产国际将尽一切努力使农民国际得到顺利的发展。

民族殖民地问题

同第一国际相比较使我们得以丰富的第二个成果是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表明，民族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得到解决。马克思曾教导英国工人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因此英国工人必须支持爱尔兰工农的解放斗争。但是，马克思在当时历史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的那样完整的民族问题理论。我们生活在作为腐朽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正在腐朽，它的星辰即将陨落，它不得不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冒险。因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列强掠夺、瓜分殖民地的千百万居民。因此，骚动精神在殖民地发扬光大。于是，在马克思那

里天才闪光的东西在列宁那里就变成了现实。大家知道，象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或远东各民族莫斯科代表大会这样一些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东方燃起了革命的烽火。在埃及，工人们夺取了一些工厂；在印度，运动在高涨；在中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逝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亲眼看到，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在日本日益发展，它将成为近年来的巨大因素。用不着成为预言家就可以预言，东方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是完全可能爆发的。

共产国际正始终如一地和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自己在纲领和章程中提出的基本任务而奋斗。而这些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团结和联合全世界各种肤色的工人和农民。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这个任务。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I

我们看到，历史正在奇妙地发展。首先掌握政权的不是工业国的无产阶级，而是象我们这样的农业国的无产阶级。随后我们又看到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两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又在农业国。当然，它们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但是，篝火从我们这里升起也不是偶然的。

现在应当准备好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革命将通过德国深入到欧洲。另一种可能性是，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燃烧起来，然后运动从这里蔓延到欧洲资产阶级各国。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界线是以拥护议会制还是反对议会制来划分的。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使人感到似乎过了不是60年，而是6个世纪。现在，在共产国际时期，界线是以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来划分的。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个拉丁词，共产国际已把它译成了全世界各民族的方言。目前我们还只是在世界 1/6 的土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相信，到共产国际的未来 10 年时，那将不是 1/6，而是半个地球。

把未来的这一前景同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一番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 5 年中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够的。现在白色恐怖、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猖獗。甚至可以确定这样一个规律：某个国家的共产党越强大，它越接近于转入地下。当它变得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就一定要把它赶入地下。

然而我们知道，在地下状态下可以锻炼出真正的共产党来。只有资产阶级的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懂得，我们强大的俄国共产党就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形成和受到锻炼的。而现在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法西斯监狱中遭到资产阶级刽子手迫害的工人们将会成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们将满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对镀金的社会民主党的强烈仇恨和钢铁般意志；从他们的队伍中将造就共产国际的优秀建设者。

5 年来，我们俄国共产党领导了共产国际，而我们可以不加谦虚地说，我们有权为业已完成的工作而感到自豪。列宁同志说过：将来有个时候我们会变成落后的国家，那时领导权将转到更发达的工业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在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我们希望这个时刻尽快到来，以便使我们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移到目前还飘扬着黄黑旗的某个国家去，以便使今后的 5 年发展得比头 5 年更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我国度过了最困难的关头，最困难的时期。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目前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最主要的一切。他象一盏巨大的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邓尼金打到奥廖尔近郊的困难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腾出时间同来自遥远国家的工人们进行长达几小时的谈话。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患重病，却不顾朋友们的劝阻作了报告。因此说共产国际体现了列宁的精神，这是毫不奇怪的。整个共产国际可以骄傲地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而我相信，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和每个成员将一往直前地沿着列宁同志指示的道路前进，去做他们所应做的一切，并准备在争取共产国际具有列宁同志所教导我们的那种精神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 1924 年第 2 期
第 249—278 页。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活动和策略(摘录)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4年6月19日)

同志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需要确定未来的道路。但是首先我想检查一下过去的道路，第一，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没有列宁同志的领导和直接影响下进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其次，因为我们碰到的是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国际形势；最后，是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次代表大会看作是一次纪念大会。

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共产国际成立5周年。我们过去的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构成了革命运动史上的4个阶段。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想从两方面来分析共产国际的历史。

第一，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我们的力量有多大，最近几年我们的力量增长了多少。

第二，在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各流派概况。

首先说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数量上的力量。我认为现在已非常清楚，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里，共产国际在许多国家里其实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团体，尽管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并不很清楚。起先我们认为我们很有力量，尽管当时我们在许多国家

里还不是共产党，而只是些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团体。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原因在于当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群众中自发的不满很强烈，而我们把它当成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我们错了。仅从兄弟的德国党的历史中举一个例子。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斯巴达克联盟一月起义时，我们以为我们的德国党是很强大的。群众的不满很强烈，对资产阶级，包括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是自发的，而我们共产党人却觉得自己是领导这数百万群众运动的先锋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事件的过程，那就很清楚，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我们绝不会为它感到羞愧）是工人阶级斗争中最光辉的一幕。

但是，那时我们党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它还很小，它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宣传团体，在掌握群众的道路上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我们在其他国家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因此，为了获得估计当前局势的准确尺度，不应忽略这一情况。尽管有许多缺点，尽管我们的各支部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我们现在在许多国家里已不再是宣传团体，而已发展成为共产党，有些甚至已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队伍。

现在谈谈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问题。为了正确的理解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很难避免的不同派别的斗争，有些东西需要解释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方面，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它的出席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话。我估计大家都看过这个文件了。它在很多方面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因而将使我们易于作出要在这里通过的那些决议。

德国共产党在我们5年的活动中找到了6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钢铁库。

这就是列宁同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专政和民主

的提纲；接着是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提纲；第二十一条；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的决议（“在甚么条件下可以组织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共产国际通过所有这些提纲都是经过斗争的。但是更多的争论是围绕着纯粹策略性的决议展开的。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派分子的斗争中诞生的，这是众所周知而无需证明的。要知道共产党人很多是来自第二国际的。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感觉到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两个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来自第二国际即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第二部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的工人一代。这两部分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策略主要是在反对右翼和中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非常清楚，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首先与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进行斗争，这种残余在共产国际内部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应当同另外一种，常常叫作“极左”的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一点人们都不大了解。当然，实际上他们远不是左派，因为没有比列宁主义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更左的东西了，但是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称呼这种倾向了。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布尔什维主义已对这种“左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内其创始人和导师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同这些所谓“极左”倾向进行斗争，同样，我们当前也面临着这一斗争。

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俄国革命尚未出现强大的胜利轰鸣，德国斯巴达克起义失败的程度和影响还不十分清楚。第一次成立大会没有出现尖锐的斗争。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我们只出现一次

引起意见分歧的表决，而这恰恰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表决，这就是，对关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否应该成立共产国际问题的表决。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当时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明显地形成了各种小集团，而我们首先开始了反对右倾的斗争。你们清楚地记得应成为反中派主义支柱的二十一条。但是，就在那时，列宁同志以及支持他的观点的其他同志已不得不就例如议会制问题开展反对左倾的斗争。一部分同志，顺便说一下，包括博尔迪加同志，表示反对利用议会。

然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工会问题展开了斗争。一些美国同志（已故的约翰·里德），还有一些德国同志坚持退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但是列宁同志同这一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还在党的作用问题上进行了反对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反对“极左派”（工团主义者）的斗争。一些“极左派”发言并声明：我们根本不需要党，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不需要。

总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进行了列宁同志领导的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同时，也对所谓的“极左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英国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加入“工党”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大家记得，不仅英国同志，而且许多同志都反对这样做。例如：在座的荷兰同志怀恩科普当时就激烈反对英国同志加入“工党”，他认为这是机会主义。但时代在变，人也在变。现在大家已不是指责怀恩科普同志左倾，而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倾向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些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尖锐的性质。

第三阶段，这就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你们记得同德国三月起义以后出现的所谓进攻理论的斗争。这一斗争也被说成反对革命倾向的斗争。事实上，这一斗争根本不是反对左翼的斗争，而

仅仅是反对左倾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它构成了共产国际编年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与此同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展开了反对列维——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了——，反对当时意大利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激烈斗争，但同时也展开了反对特拉契尼、博尔迪加以及一些直到现在还站在所谓“极左”立场上的同志的激烈斗争。可以说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预先驳斥了博尔迪加同志现在的政治立场。

最后，是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大家对这次大会还记忆犹新，因此我也没有必要详细讲述它的工作了。通过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赞同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此同时，意大利人的罗马左倾提纲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并被大会否决，关于这一提纲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我们由此看到，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对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同时也对“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并且也不能不进行斗争。

有一些同志，还是不坏的革命者，常常指责我们说，执行委员会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这是没有原则性；应当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时候的路线，而不是今天反“右”，明天反“左”。当然，必须指出，通过对真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失算进行斗争来反对所谓“极左倾”会更有效一些。（掌声）

但是，同志们，反过来也常常是正确的。因此，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极左”倾，就说我们无原则。应该懂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有人声明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过要把马克思所写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的东西除外，要知道该流派也想表现得很“左”，想成为比马克思还左的流派，你们会怎么说呢？但是，除去反蒲鲁东主义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同志们，对列宁主义来说也同样如此。我知道一些优秀的同志，他们说，列宁所写的全部文章都是卓越的著作，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不完全正确，列宁在这里也许有一些向右倾；他们说在共产国际里并不存在“幼稚病”。如果我们是孩子，那么想必已是不生任何病疾的“神童”。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清这种思想后面隐藏着什么。除去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列宁主义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了。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那些支持除去《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的列宁主义的同志们使我想起了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法国农民，据说这个农民高喊：“皇上万岁，但要废除盐税”！（笑声）不，同志们，我们需要完全的列宁主义，完整的、收“税”（即对“极左倾”进行尖锐批评）的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走的是一条老路，是列宁教导我们走的路，这条路决不是“无原则的”路。不能用市侩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如果你今天反右，明天又反所谓“极左”，那么你就成了无原则的人。

试想你驾驶一艘军舰，你应当把它开向一定的目标。在你面前是一个水雷区。你手头没有布雷图，水雷有时在右边，有时又在左边。你必须把军舰开过这些水雷区。而你就因为执行这一任务的船长把舵一会儿转向右边一会儿转向左边而说他是“无原则的人”。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有些很好的“左派”同志例如象博尔迪加同志，完全真诚地提出这类指责，说共产国际“无原则”，因为它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中反对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断言的。

我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以便使我们大家了解列宁主义不仅在纯系俄国现象的时候，并且当它在共产国际内成为国际现象的时候，都自然地一直把主要打击指向“右派”、“中派”以及我们自己队伍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但是，为

了使这一反右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象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一样，总是同所谓“极左”派进行斗争的，这一流派照我们的看法实际上是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因此，我们将继续走这一条道路，不要说，也不要嚷嚷纯属于虚乌有的我们的“无原则性”。这是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

我在这里从列宁同志的著名的光辉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引一段，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列宁的最重要的革命论文之一。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①

我本想把这些话指给博尔迪加同志，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无论如何我希望同他观点一致的罗西能把这些话每天读上两遍，起码当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能做到这一点。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掌声）

你们看到，列宁同志甚至允许“改良主义”行动。他有意用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一字眼，显然是想特别有力地强调自己的思想。当然，事实上这里说的自然不是“改良主义”行动体系，不是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这里使用“改良主义”这个词恰恰是为了强调其反对“极左”的基本思想。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开始了反对法国弗罗萨尔的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现在此事已经了结。现在我们可以代表法国党和国际向弗罗萨尔表示感谢。他的作用好比是一贴膏药，把法国共产党内一切坏的和不健康的東西都拔除了，因而使它的机体变得健康了。

接着，我们又不得不同所谓挪威工人党进行斗争。这是个明显的半改良主义、半右翼工团主义的政党。党和工会运动领导人李安是最庸俗的社会叛徒，非常清楚，我想现在甚至连霍格伦同志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右翼社会党领导人的斗争。

在瑞典，执行委员会需要纠正瑞典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右倾错误。现在还不能说它取得了多大成就。

然后是保加利亚事件，它也同样暴露了右倾。

我应当强调一下，世界范围内这些右的倾向是一种性质各异的现象，它们与该国的运动的传统和文化水平有关。保加利亚的情况和瑞典的不一样，英国的情况和挪威不同，苏联（党内反对派）的情况又与法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等等。但是，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概括为右倾。你们都知道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保加利亚问题的决议。保加利亚党的优秀领导者们后来也认为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保加利亚党已经做了许多纠正工作。

下面谈谈德国党。这里也进行了反右斗争。一些人例如捷克的报刊断言，执行委员会砍掉了德国党的整个老的上层。我必须完全公开地声明：执行委员会不能把这一功劳只记在自己头上。恰

恰相反，我们对这些老的上层支持得太久了，其原因下面我们还将谈到。总之，德国开展的斗争是反对右倾错误的。

下面谈谈俄国党内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代表大会还要详细研究，它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俄国党把争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倾向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这些倾向在许多地方带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质。它们具有国际意义。我手头有一份谢德曼的《前进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在谈到我们的党的代表大会时写道：“半年前人们议论纷纷并到处都寄以巨大希望的那个反对派现在在哪里呢？”

是谁对它寄以巨大希望呢？原来是德国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这些希望没有实现，并且我们但愿它们永远也得不到实现。（掌声）事情竟然发展到在该《前进报》的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谈拉狄克同志的文章，其中说拉狄克与共产国际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对事物具有清醒的明确的观点（请听！请听！）。我不断言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值得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赞许，但是有一部分他毕竟是值得他们赞许的。

如果拉狄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清整个局势的话，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拉狄克现在该考虑一下这篇文章了。他要问问自己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前进报》称他为清醒的和彻底的政治家。

很遗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不得不同法国运动中新的右倾派别作斗争。我已经说过，佛罗萨尔的作用好比是一张贴在身上的膏药，把党的机体内的一切不健康的東西都拔除了。谨慎一些，应该说，“几乎”一切。

这些右倾派别中有一些是很危险的。我们不久前听到列别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说：“英国的工人政府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掀开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一页，他们将给人类带来和平”等等。

换言之，我们这里碰到的是现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群众中也在冒头的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幻想的表现。如果列别这么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罗斯梅尔在法国代表他的党就成立英国工人政府一事写出类似的东西来，那么很遗憾，这同样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幻想的表现，他就成了这些幻想的传声筒。

这样，法国党内形成了右倾集团。幸而它的人数不多。我想它也不会长久。我觉得它存在的时间也只有马尔萨尔政府那么长，大家都知道，马尔萨尔政府，是很短暂而且很不巩固的。执行委员会将尽自己的努力去阻止以苏瓦林和罗斯梅尔同志为代表的右派的增长，苏瓦林在这里说得越多，自我否定的也越多，对罗斯梅尔同志我们抱的希望要大一些。总的说来，法国党对这一派别进行了激烈的，也是完全正确的斗争。

下面我们还应当同美国运动中因所谓第三党——拉弗列特党而暴露出来的某种右倾作斗争，例如反对我们的同志在选举中和这个小资产阶级组织结盟的倾向。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些动摇，因为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太少了，那里的运动还不够发展，甚至独立的工人党这一起码思想都嫌太新鲜了。中层工人在美国依然投资产阶级政党的票，他们还在希望成为独立的业主。当时不容易作出决定。然而执行委员会还是决定反对这种策略，并且正如事态所证实的，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党内也存在右倾。有一封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或者3个月写的信，在信里我们要该党注意它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中犯了重大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德国同志给它的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那些观点。

你们看到，执行委员会同各种各样的右倾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同“极左”进行斗争。

至于兄弟的德国党，我们也曾经有过非常悲观失望的时刻。你

们知道执行委员会的两封信和我的文章。我们曾经担心德国同志在工会问题上会屈服于“新策略”。这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相当有成效地对这些“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我们做对了。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还有中派集团，甚至某些右派都声明说，退出工会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右派，这一点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对于中派集团我绝对肯定这一点。这个集团中两个有影响的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恳求我们绝口不提反“极左”，因为据说所有的德国工人都主张退出工会。用他们的话说，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现象。

如果德国党和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坚定，这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现在德国工会又得到了巩固。这已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处在地下状态和半地下状态的党，如果允许共产党员退出工会，它就会灭亡或者变成一个宗派，而不成其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因而我们也必须进行反对“极左”的斗争。就算这个派别人数不多，但是，小小溪流也能变成滔滔大河。如果我们想站在牢固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空话，我们就应当牢记我引用的列宁的思想。我们不让“极左”派发展，同样也不让成为国际现象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发展。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把他还是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时所写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旧文章重印成书，那么此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中间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如果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作出同样的事，我们也是不会容忍的。

我这里有鲁达什同志的一封信，他是卢卡奇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宣布打算反对卢卡奇的修正主义，但是该派禁止他这样作，于是他退出了该派，因为他不能容许冲淡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高呼：“鲁达什，好样的！”

在德国党内也存在着这样的派别（科尔什教授！）格拉齐亚德伊同志也是教授。（喊声：卢卡奇也是教授！）如果再出现一些这样

的教授,并且开始散布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事情将很糟糕。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部,我们不能容许这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国际》在最近一期刊载了自称是“极左派”的某波里斯的文章。(路特·费舍:“不是教授!”)。作为例外,确实不是教授,但也不是共产党人,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把他留给布哈林同志去处理,布哈林同志将在其纲领问题的讲话中批判他。同志们!德国工人不能容许在他们的理论刊物上发表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章。例如这个波里斯断言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要知道这是第二国际的“散文”。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都可以从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这一事实得到解释。该杂志的编辑科尔什同志保护列宁同志避免偏离列宁主义。我觉得有必要给科尔什提一个友好的建议:首先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我听说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波里斯的文章。这样做很好,但还不够。如果我希望《国际》杂志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尚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我觉得,我对德国党的要求并不太高。

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是一个坚定的修正主义者,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惋惜,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好同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修正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不能容许我们的同志在这类问题上擅自行事。我们大家有时全被政治吞没了,不能去阅读所有的小册子、书籍和文章。有些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所有一切”。但是这不是列宁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要知道,有整整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他们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阅读这些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全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同志们,再重复一次,今年我们的斗争90%应是反对“右”倾。

我想，这次代表大会也将如此。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兄弟党的文件研究得越多，也就越加相信“对右倾危险性”不能低估，这个危险比我们任何时候想像的都要大，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同志都是坏人，而是世界历史目前所处的时期使然。

我们现在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必然出现右的危险是完全自然的。我们阵营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我们应当根除这些右的倾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但是，只有我们对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作任何让步，只有在自觉的“极左”倾即将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刻迅速地挫败它，我们的斗争才会取得成效。

我们召开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时的形势如何？

许多人认为，事态发展得还不够迅速。对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大家都不满意，我们都认为形势发展得太慢。我们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没有发生，困难是很大的。

有时觉得我们挪动得太慢，简直慢得可怜。主观上讲这是对的。当然，从我们主观感觉上来说，是很缓慢，因为我们还必须等待结束英国的麦克唐纳时期、法国的左翼联盟和德国的目前事件。

如果我们的进展能够快一些，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幸事。但是从客观上看，我觉得事态的进程并不那么慢。

据说，停在转动很快的大磨盘上的苍蝇觉得磨盘是不动的。我们也一样，虽然世界历史的车轮实际上转得相当快。

最近五年来的总结如下：

1、有半打君主国倒台，其中包括俄国君主制在内，而这是有点意义的。（喊声：“完全正确！”）俄国沙皇制度的覆灭对世界革命具有不小的意义。

2、我们夺得了地球表面的1/6，尽管还有5/6，但是这1/6夺

得了并且得到了巩固。

3、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及其他边远国家的革命运动。

4、在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并且部分地陷于紊乱状态。

5、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但是客观地讲这是前进了一步，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瓦解的征兆。

6、各国共产党成长了。我们已经不只是宣传团体了，我们成了世界共产党了。这样的总结当然有些枯燥，我们期望更多一些，但是，同我们一般想像的比起来，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最近这一年里在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都爆发了运动，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我们正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

总之，无论是在世界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最近一年都是充满着事变的一年：英国的工人政府，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丹麦的工人政府，美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迅速发展，挪威的持续半年的罢工斗争，第二国际的解体，运输工人国际代表会议，英国的罢工风潮，中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印度15万纺织工人的罢工等等。总之，事变是相当大量的。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事情在向前发展。

.....

我现在来谈谈统一战线策略问题。这是我们队伍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自己的代表团的委托书所说的，现在不应就作为“自在之物”的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争论。我完全同意这一点。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是正确的。在各个国家里应根据全部条件极其具体地提出这一问题。然而我不能不就这一题目谈一些一般的看法。

如果按时间顺序看一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所走过的道路，这对我们将是清清楚楚的。统一战线策略起初（即1921—1922年）是我们的下述认识的表现：第一，我们在工人阶级中间还不拥有多数；第二，社会民主党还很强大；第三，我们处于守势，而敌人在进攻（顺便说说，去年的罢工，例如英国的罢工，就多数而言乃是防御性罢工，在其他国家中也是这样）；第四，决定性战斗尚未直接提上日程。因此我们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其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志们，我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曾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那时它实质上仅仅是一个宣传团体，虽然它本身并未觉察到这一点。经过第一批战斗，查明了真正的力量对比，认识到我们处于少数，社会民主党还强大，我们暂时只处于守势。所有这些看法也就成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

同志们，历史和这个口号开了一个很坏的玩笑，不过，这种情况是口号常常碰到的。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革命发展速度缓慢时期的革命策略。但是，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些人把这个口号变成进化的策略，变成机会主义反对革命策略的策略。这是逐渐暴露出来的。起初看来似乎只有细微的差别，几乎只是修辞上的问题。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准备革命的策略，而我们中间有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用和平进化的方法代替革命的策略。我们把这一策略看作战略手腕，而另一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与社会民主党联盟，与“所有工人政党”联合的策略。

有一个共产党不久以前曾通过了一项“不得公布”的决议，在决议中该党声明说，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就算它是一个战略手腕吧，但是不应这么经常和这么公开地谈论，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声明的。决议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统一战线下）我们应当注意没有必要向

我们的阶级敌人揭示我们革命战略的意图”。

同志们,我认为这是幼稚行为,甚至是改良主义,勿宁说是后者,因为那些这样提问题的人并不是小孩子。

我们党的最大不幸在于,当向他们提出反对敌人、反对比他们狡猾得多的敌人,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革命战略时,他们立即试图“加深”这一战略,“马克思主义”地解释它,并从中引出一整套非共产主义的理论。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的过程中实行了许多战略手腕。列宁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种革命战略的艺术上。对我们党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每一个机动手段要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能运用这些机动手段。“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要斗争到底。我们知道,我们力求胜利,力求在政治上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我们机动的政治目的。共产国际中我们那许多年轻的支部,并且不只是年轻的支部的不幸在于:第一,有时他们认为根本不容许作战略机动,第二,一旦他们接受了这种机动,他们就立即赋以“严肃性”,把它变成完整的办法,变成完整的“深刻的”体系。我们的失败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最狡猾的敌人就是社会民主党。

发现某些党、某些同志不善于也不愿意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共产国际来说只是一种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

应当承认,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过多的让步。

请允许我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在1922年6月11日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我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报告,其中说:“统一战线决不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问题不是要减少我们党的独立性,问题只在于各独立的共产党恰当地提出我们的口号。工人

政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别名。”德国的右翼代表们立即向我发起了攻击，应当说我没有马上了解他们为什么攻击我，例如恩斯特·迈耶尔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还就这一问题反对我，拉狄克同志打算起调停作用，但他自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做的时候却一步一步地脱离了我的表述。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理解问题不在修辞上，而在于把正确的口号作机会主义的解释，起初我只觉得我那个尖锐的表述也许实际上会为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宣传这一口号造成困难。简而言之，我没有立即弄懂，为什么我的说法本身引起了这样的争论。

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谈谈工农政府。“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样被企图解释成所有工人政党加上一些农民政党的政府。这一口号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现在有时出现一种企图，说它是整个时期所特有的口号，它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所有”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的联盟，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

真见鬼，要知道事实上这个口号是和俄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这一历史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如此而已。1917年七月事件以后，我们看到事情在发展，工人和士兵都拥护我们，我们也能争取一部分农民，这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更好、更简单、更明确、更有吸引力地表述斗争目标。当时广大群众还不那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不识字的庄稼汉和俄国士兵怎么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拉丁字呢？当时我们把这些字可以说翻译成俄语：“农民、工人、士兵，你们看到了统治我们的匪帮，我们有力量，我们有武器，愿意建立工农政府吗？”我们替他们把拉丁字翻译成简单易懂的革命斗争的语言。农民、工人、士兵不一定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懂得“工农政府”是什么。

我们有些同志把“工农政府”这一口号理解成“所有”工人政党

和某些农民政党的政府，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完全和自己对立的東西。

对此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统一战线等等問題引起了许多争论。我认为可以提出如下的说法：

一般说来，下层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也许在非常稀有的时刻，当公开进行内战的时候才有例外，那时人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有时还要反对具有反革命情绪的那些工人（虽然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我们知道，甚至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还是贯彻了下层的统一战线。当克伦斯基进攻彼得堡时，我们动员了部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下层的统一战线永远或几乎永远是适当的，因为，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以外，它能动员一切真正的革命工人。

下层的统一战线，加上上层的统一战线，这已经是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也不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但是在我们还处于少数的那些国家里它是相当经常地被采用的。我认为即使是“最左”的那些人也不会反对例如在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我们暂时还处于极少数地位的国家里，实行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当然，在这样做时要保证不把它作机会主义的歪曲，要把它作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和社会民主党实行政治联合的方法。

第三种形式是上层的统一战线。我认为，这里应当说，永远不行。

很遗憾，我们这里在实践中最常用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方法：给社会民主党人写公开信，就制定“共同纲领”与上层人物进行长期无聊的谈判，当然，这是阻力最小的路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下层的统一战线几乎适用

于任何时候，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相当经常地采用，但必须具有**一切必要的保证**，使这一策略有利于对群众实行革命的动员，单纯上层的统一战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拉狄克从座位上喊：“对！”）。

甚至拉狄克也喊“对”。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这里我还得再次承认——革命者永远应当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起草这一决议时我犯了某些错误，作了过多的让步，这些让步看起来似乎是文字上的让步，而事实上却变成了对右翼的政治让步。我指的是由我起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的下述论点：

“为对抗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盟，共产党人提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全体劳动者的统一战线和所有工人政党的联合，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推翻它。全体工人联合反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整个国家机构应转入工人政府之手，从而应当巩固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地位。”

我清楚地记得委员会的工作。我决不想说，所有正确的论点都是我提的，而不正确的都是别人提的。我的错误在于我作了后来被解释成政治让步的那些文字上的让步。从政治鼓动、战略机动的观点来看，不能说这一论点是不正确的。它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1917年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谈到可以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由他们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问题达成妥协：

“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诚然，不是向资产阶级，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

维克建议。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总共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政府会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最好的机会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

而在另一个地方写道：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论妥协》，1917年9月3日）^①

什麦拉里同志，这是战略机动。表示“真诚的取消”。在鼓动中此类说法是允许的。那时候我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列宁是否曾经打算同孟什维克和解，参加“所有”工人政党的政府，或者工人和农民政党的政府呢？根本没有！这是战略手腕。一旦开始“深化”这一论点，把它变成一种体系，一种“理论”，开始认真地设想，可以同“所有工人政党”一起参加和平民主联盟（这些政党只是自称工人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300页。——译者注

政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那么,这种态度只会导向机会主义。自然,其实这些所谓“工人”政党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这些名义上的“工人”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就其成份而言,而且就其政治性质而言都是真正的工人政党,如果它们哪怕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同我们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就已成为欧洲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口头上的工人政党,因此“所有”工人政党的联盟,既包括真正的工人政党,又包括名义上的工人政党,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样的联盟是无稽之谈,是一种犯罪,是反革命的空想,是机会主义。

然而,原来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一种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目的的党的方法。一开始我对这一点没有真正理解,没有预见到会把战略手腕变成机会主义的圣经,虽然我应当说明,在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提纲中我曾详细谈到作机会主义解释的危险。结果正是作了这样的解释。

在萨克森这种机会主义错误达到了顶点。对我们来说很快就完全清楚了,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实在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俄国的全体布尔什维克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看它的,我认为,德国的全体革命工人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看的。正是在这种关头必须划清界线。

不能用我们过高估计了革命可能性来为萨克森所发生的一切辩护。这完全是廉价的论据。什么时候也不能指望革命一定能成功。我要说:如果重视1923年10月形成的革命形势,我们还是要坚决主张大声宣布,革命在敲门。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10月份最大的几个共产党的代表曾在这里集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执委会对问题的提法。大家一致同意,应当指望革命。但是主要责任应由执委会和兄弟的德国党和俄国党承担。我再说一遍,

如果重视这种局势，我们自然将更好地核对数字，更准确地计算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会把一切都押在革命这张牌上。

过高估计形势，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是像萨克森的例子所表明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拉狄克问：你们是不是象他那样读过所有德国报纸，我们是否了解萨克森“经验”的全部细节？而我们全体工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回答他说：是的，我们不懂德语，我们不能读德国报纸，但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干过三次革命，一次在1905年，另两次在1917年。我们有健全的思想，懂得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萨克森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真正面貌，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右翼那里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是怎么回事。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工人政府问题通过的决议总的说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很精采的。许多预言得到了证实。应当把所说的论点看作是经全面考虑的争取群众的战略计划，但是由此创造一系列民主理论，说我们面临在民主框框内的由共产党和“所有”工人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府执政的完整的时代，这已经是机会主义的开端了。

事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共产国际的右翼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转入了进攻。召开了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说，德国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必须以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幻想和偏见为出发点。也许这不过是不成功的说法？但如果这样，那怎么理解对工人政府所作的下述解释：“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从议会制度向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工人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工人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开始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代表大会。你们在布拉格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可以读到：

“可以把工人政府看作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

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资产阶级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你们看到：一字不差的重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产生的，还是有“计划”的？当然是后一种。

一字不差地提出了同样“可贵的”，实际上机会主义的原理。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地还是按一定计划产生的（拉狄克：是克莱因的！）你们知道，拉狄克同志在另一领域是“计划”的拥护者。（布兰德勒喊道：“拉狄克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过错的。”）布兰德勒同志，您错了，在这件事上以及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上，拉狄克的过错比您的要大。布哈林和我反对过莱比锡决议的这一论点，但是我应当承认，由于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里涉及的是完整的机会主义体系问题，出于让步的考虑，我们没有公开地正式反对，我们做得不够坚决，没有投入执委会的全部力量。

拉狄克同志那时说：“你们要求布兰德勒干些什么，他提不出委婉的说法，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当他要表述什么的时候，他投出的是砖头。”这是拉狄克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好吧，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但是要知道什麦拉里不是建筑工人，而他论证时也没有扔出砖头。（笑声）不过应当说，什麦拉里（布拉格）决议的结论部分要比布兰德勒巧妙一些，但是他也重复了机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所以同志们，谁要坚持这一论点，他就会同共产主义，同列宁主义发生冲突，他就会把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某种特殊和平过渡时期看作似乎可以不经过革命，在民主范围内就能实现的。

讲完莱比锡和布拉格，特别是萨克森之后，且言归正传！这里

已经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词句，而在于两种政策体系。我们长期认为，德国左派常常夸大其词（在某些场合他们也确实夸大其词），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唯一在莫斯科预言萨克森实验结局的人。这促使我们思考并对左翼另眼相看。

萨克森实验造成了新的局势。这有开始取消共产国际的革命策略的危险。而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作出抉择并清楚地说明问题何在。

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工人政府，什么是工农政府？没有必要恐吓我们，象拉狄克同志有时所做的那样，说似乎我们要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几乎共产国际的所有过去的决议。干吗说吓人的话？我们只不过想修改拉狄克塞进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夸大其词的、不慎重的和错误的说法。我们想使得目前不能歪曲地利用这些说法。我们想提供一种不管是建筑工人还是教授人人都能明白应当如何理解的说法。我们主张为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完全有效。我们依然主张“工农政府”的口号。德国党在决议中说得完全正确，对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来说，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完全合适的，我认为，这一口号对法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合适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一口号的理解象俄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那样，那么真正的左派是不会反对这一口号的。

这一口号是怎么产生的？有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是拉狄克“想出来”的，是他臆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口号是俄国革命产生的。拉狄克所做的只不过是予以歪曲。我们想利用这一口号，就象当年我们的革命利用这一口号一样。我们对运用工人政府的口号作了说明。（拉狄克喊道：“我们在俄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联盟”。）我们在欧洲也不拒绝吸收社会民主党的某一部分参加苏维埃政府，只要它脱离社会民主党并暂时倾向于支持我们。过

去对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这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得到一部分农民支持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让他们给予协助。而当他们重操社会革命党的语言时，我们就摆脱了他们。这是正确的战略。而在十月以后，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协议的计划就是错误的了。在十月革命的时刻就是这样，那时一批同志认为可能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我本人有一个时刻属于持这种观点的集团。但这是巨大的错误。我们很快就懂得并改正了这一错误。然后，总共才过了几天，列宁写文章说，争论已经过去，我们继续一起斗争。而你们想把这一错误政策用于其他共产党？决不能这样做。

俄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可以从其他革命不重犯这些错误得到某种补偿。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也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修改、修正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必要这样做。问题不在于发明“新的”策略；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说，不管执行中错误如何，总的说来统一战线策略会给我们的平衡表带来加号的。全部问题在于使共产国际防止对它作机会主义的解释。

拿任何一个国家，例如英国来说。英国在这一领域，即在运用统一战线领域犯了巨大的错误。

路特·费舍同志在《共产国际》的文章中谈了自己对英国考察的见闻。她谈到弗格森在竞选运动中没有公开以共产党人身份活动，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如果掩饰自己的共产党人面貌，那么我们干吗要这整个选举运动？前英国议员纽博尔德同志整整一个晚上认真地以下列问题来折磨我和布哈林同志，是否允许他，譬如说在特殊情况下，在议会发言反对工党党团？我们回答他说，可以，要知道，你就是为此而到议会去的，尽管英国党犯了各种错误，但是统一战线策略在英国毕竟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地方工会里工人共产党人在许多场合干得完全正确，并且取得了胜利。捷克党在

地方范围，在工厂等地也正确地执行了策略。德国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好现象。错误主要是在议会、工会上层、地方自治机关等方面。那里卷起了机会主义的九级巨浪。至于在地方、工厂范围的工作，那么尽管领袖们对统一战线策略有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在来自下层实行这种策略的意义上在这些地方还是做了许多好事。

那么，同志们，现在情况如何？我已经粗略谈了国际形势。由于这种形势，就产生了在贯彻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在某些地方改变一下我们的做法的必要性。首先必须确定，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方法，就象在俄国革命中那样。对社会民主党人、对改良主义者来说，“工人政府”可以构成整整一个时代。例如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在1924年6月于维也纳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人代表大会上就说过：“避免新的战争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尽可能多的工人政府。”

由此可见，对露骨的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来说，这种工人政府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它甚至有可能避免战争，等等。对我们来说，事情决非如此。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同拉狄克不同，我们说了许多正确的东西……（拉狄克：“不成功的论点的作者是您季诺维也夫同志！”）模棱两可的论点的作者是您，而整个决议的作者是我。但是我决不想推卸自己对所引部分的责任，当然，我本来应当在第四次，而不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批驳它的。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显出有更大的远见。这丝毫没有减轻我的过错。

重要的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下列部分：

“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都是资本家的政府，但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工具。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列各种可能。

1、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产生；

2、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3、工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4、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5、只有共产党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

是的，有自由派的工人政府，例如目前执政的工党政府。对达拉贡纳来说，任何工人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全都是好的。我担心拉狄克、布兰德勒、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中的什么人大体上也这么看，尽管他们也懂得，这并非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现在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宣传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我们当然也应当利用自由派工人政府（例如麦克唐纳的）所造成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工人政府”口号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群众的最有吸引力的、人人能懂的、最大众化的公式。工人、农民和士兵先干自己的革命事业，然后会弄清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选用人民最能理解的公式，就象我们在俄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不是修辞学上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我们是否确实是个善于把工农兵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党，知道他们最敏感的地方的党，不是个宗派，而是个群众性政党，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党。我知道，某些“左派”同志仍然对统一战线策略极为反感。为安慰他们我只能说：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策略不过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具。你们不喜欢这种工具。好吧，我同你们“妥协”，一旦你们把本国大多数劳动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我们立即免

除你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笑声)当无产阶级最主要阶层中的多数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对他们少讲点客气了。但是在最主要的几个国家里情况是多数还没有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应当善于接近目前这样的群众,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把他们纳入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到这里以后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所有的党都要一刀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完全可以根据局势具体地提问题。俄罗斯谚语并不劝人用一匙焦油弄臭一桶蜜。

我曾经读到过,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拉及其他同志很为下列情况担忧:似乎我们说过,你们要到处都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似乎要你们不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采用这一策略。

纽拉特同志在一篇反对古拉同志的文章中说得完全正确,他,纽拉特同志,在文中说,执委会从来没有提出过古拉归咎于它的那种东西。执委会从未提出过这种东西。我们说过,在德国形势业已成熟,应当提出下层的统一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说过,例如在波兰也许是另一种情况,在奥地利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是另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全部艺术在于根据千差万别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条件具体运用策略。我们从来没有断言,所有的党都要一刀切。什麦拉里同志,请把这一点转告古拉同志。

末了还要再说一遍,工农政府不过是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如我在1922年已经说过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当时反对这一点的只有恩斯特·迈耶尔,部分地还有拉狄克,并且说得非常含糊、非常犹豫。在我们俄国党内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清楚的。我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我们没有立即懂得,拉狄克一伙同我们争论的不是文字表述问题,而是把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改良主义的策略。

你们大概记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是我。是什么引起我这样做的呢？是因为意识到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开始临近（并且相当迅速地临近）提出夺取政权问题了。我决不想自夸说，我那时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形势正在成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点意识到，在某些国家夺取政权问题开始成为迫切问题。我们早就力图向各党说明：请注意农民！其原因就在于此，甚至连想也没想一下夺取政权前景的党自然无需这样做，它仍然是半行会的——纯“工人”党。但是当党成为有份量的党，群众性的党，当它有了夺取政权的前景时，它就会寻思如何率领农民跟自己走，农村对工人政党的发展采取什么态度。“工农政府”口号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在不太远的将来要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标志，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口号体现了革命领导权应属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应由党来领导。对我们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转向革命行动的过渡阶段。

应当把鼓动和宣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说得最清楚，那时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宣传是把一套思想传给一小批人；鼓动是把一种基本思想传给广大群众。我认为，这个定义能使我们满意。它是正确的。所以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原因，是在一些党内我们已应从一般的共产主义宣传转向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群众性的鼓动，转向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既然提出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找出攻击性的口号，它应是受欢迎的，具有吸引力的，在正确的革命解释下应是吸引下列所有阶层的吸铁石，这些阶层中有一部分我们应使之中立，另一部分则应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

总之，“工农政府”的口号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的体现，它是争取政权的表现，是力求成立能管理国家和善于巧妙对待农民的自己的政府的愿望的表现。然而有

人却企图用机会主义的解释来扼杀这活的列宁主义思想，这列宁主义创造和群众性鼓动的活的源泉。

建议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德国党的同志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德国党的同志们经历了萨克森的实验和错误之后，只要一听到统一战线的言论就本能地用棉花塞上耳朵。

例如左派布里安同志(小布里安)在捷克斯洛伐克写道，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主要根源”。这是不对的。谁是修正主义者，谁就总是能给自己找到这种或那种“根源”。(笑声。喊声：“对”。)他在议会以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影子并且硬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根源，那我们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策略应该要有，而机会主义污垢则应予清除。

经常可能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口号是“修正主义的根源”。我们应当从统一战线中取得所有列宁主义的好东西，我们应当通过工人政府——最受欢迎的政府的口号，不仅取得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取得所有被压迫阶级群众的信任。我们共产国际队伍中的真正左派应当把这项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真正右的错误，说服那些可以说服的右翼，并同那些无法说服的右翼作斗争。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不是宣布统一战线不正确，而是应当采取一系列步骤去制订防止歪曲这一策略的措施，象接种牛痘预防天花那样预防机会主义。

在德国脓疮已经破裂。那里事情已经到了尽头。我们在萨克森看到了右倾的逻辑结局。我认为，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脓疮破裂的程度，如果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种政治崩溃程度，那只不过是因为那里的事变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立场，古拉同志的文章发出了这方面的信号。我们在捷克党中央那里看到的是那么漠不关心，路线那么不明确，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德国那样的形势，那我们就会遭受第

二次薩克森式的失敗。

.....

译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25年俄文版第1册第45—56、67—80
页。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摘 录)

(1924年6月26日)

.....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一谈策略问题。这里有人说——这是拉狄克同志第一次反对我们的话——，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修正、取消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现象。继拉狄克之后，其他一些同志也这样说。很遗憾，其中有蔡特金同志，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同志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还要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而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还要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等等——这是显然的。

同样明显的是，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另一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加以修订和改变，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再召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可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一劳永逸地决定一切。如果建议修改或补充这项或那项决议的某一部分，那绝不意味着建议修正、取消以前的策略的基本原则。

同志们，你们清楚地知道，正是现在，在第一次不得不在列宁同志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在某些党内经受了一系列严重危机之后进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责备具有何等特殊的味道。当有人对你们说，这里提出的建议是对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

的修正，你们是会感觉到这种特殊的味道的。同志们，我认为我可以断言并证明，修正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不是我们，而是拉狄克和其他右派。全部问题在于，右派现在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们不能跟执委会一起步调一致地前进，因此他们竭力嫁祸于人。

拉狄克同志在这里说，似乎我曾说过，我是被拉狄克所“勾引”的。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而蔡特金同志一字不差地重复他的话，对此我再次表示遗憾，因为我们期待于她的是比简单重复拉狄克的话更多的东西。

关于谁是“被勾引的”问题具有某种政治意义。蔡特金同志说：为什么四五年来执委会一直是同拉狄克一起走的，而现在突然认为他是右派呢？她甚至没有想到，关系可能有些不同，即不是五年来执委会一直同拉狄克一起走，而是拉狄克一直同执委会一起走。（掌声。）同志们，问题正是这样：不是执委会跟拉狄克一起走，而是拉狄克部分地，至少在一段时期里（从他这方面说是很值得赞许的）跟执委会一起走。我觉得，这绝不是难以理解的。

同志们，请允许我举几个具有政治传记意义的事实。这很有必要，因为究竟谁真正是“被勾引的”和究竟谁跟着谁走的问题具有政治意义。同志们，通常有这样的事：分歧逐渐积累起来，最终从量变到质变，那时“突然”暴露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这不是在一夜之间或者一小时之内发生的，而有时持续很长时间。

在我同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共事的几年当中，我粗略地可以列出十个分歧来。

我同拉狄克的第一个相当重大的和尖锐的分歧是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同志们，是在什么问题上的呢？是在关于保尔·列维的问题上，以及对右派和左派的态度问题上。这还是第二次代表

大会期间的事。有些同志可能还记得我在执委会上的讲话，我说，是的，我们将同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当时指的是克里斯平、迪特曼等人，他们央求我们，竭力企图加入共产国际。当时我就说，我们将同这些人进行斗争，就象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一样。至于左派工团主义者、“极左派”，那么当时他们还相当盛行。但是在左派中间有一些忠诚的革命的工人。他们有一些糊涂观念，但我认为他们是我们斗争中的同志，他们不是阶级敌人。列维认为，参加共产国际的只应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不应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那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特别尖锐地摆着。我主张，我们把它作为同情党接受。这一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列维和他影响下右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拉狄克反对这个意见。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分歧；总之，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很少），我们之间就在列维的问题上、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上以及对右派和“左派”（当时甚至不是对共产党人而是对工团主义者）的态度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专门涉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已经说过。我们曾多次碰到这个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在由拉狄克起草的德国中央委员会给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封公开信问题上；有些同志——包括我和布哈林在内——曾反对这封信，因为担心列维和处在他的影响下的人会从这一策略中得出不是革命的战略，而他们也确实从中得出了这种战略。因此在开始时我们是反对这封公开信的。

列宁同志的干预使事情走上了正轨。而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列维。后来表明，在列维的问题上我们是正确的。列宁同志承认了这一点。

第四个分歧发生在关于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问题上。你们想必记得，拉狄克的立场受到了两篇文章的谴责，一篇是列宁同志的

文章，另一篇是我的文章。拉狄克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超过了可以容忍的限度。他也犯了象现在这样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克拉拉同志，是执委会当时跟着拉狄克走，是列宁当时跟着拉狄克走，还是拉狄克跟着执委会走？拉狄克当时承认了错误，作了让步——这样对他来说更好。

第五个分歧是在挪威问题上。当我们派拉狄克到挪威去时，他立即同特拉梅尔签定了糟糕的“一致的”协议。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对拉狄克加以公开否认。

第六个分歧是关于拉狄克对德国左派的态度问题。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和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一场虽然不是公开的斗争。拉狄克总的说来是跟布兰德勒走的，并支持（只是个例外）他对左派的组织威胁。我不是始终支持左派的——我们还不认识新的领袖，我们想拉狄克或许对某些同志更了解。

我不是始终清楚地了解情况，不过有一种倾向使我毫不怀疑：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寻求同左派达成协议的基础。

第七个分歧是：“工人政府”是否就是专政的同义语。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来谈。

第八个分歧是关于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争论的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工人政府”的提纲。我和布哈林持批评态度，拉狄克则维护它。

第九个分歧是关于税收纲领，没收 51% 等问题。我们反对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笼统地否认局部要求，而是因为我们主张只提出可能使群众感兴趣的局部要求，而不是提出人为的、具有凭空想象性质的要求。

第十个分歧很重要。在德国 1923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我们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我已经在报刊上说过，拉狄克反对组织反法西斯日。但这还不是那么重要。他在和德国同志一起

在莫斯科召开的九月（1923年）会议上的立场更重要。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是不是到了在德国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口号的时候了？拉狄克反对这样做，遗憾的是德国左派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他的意见。（台尔曼在席位上说：“不是所有代表！”）

当时左派也说：工厂委员会就够了，这也是苏维埃（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还不需要苏维埃，这要求做许多平行的工作，等等。当我们看到左派在作让步时，我们也应当作让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整个事态发展进程，我们应当认为，所有这些分歧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当然，代表大会不会幼稚到如此地步，以致相信执委会五年来一直跟着拉狄克走，而现在突然看到他的错误。事情恰恰相反，但是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拉狄克身上，而且出现在蔡特金同志身上。

我很遗憾，但不得不在这里说出这一点。蔡特金同志离开了执委会的立场。过去有个时候，甚至在目前对她来说最有争议的问题上，即关于萨克森的“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问题上，她也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

拉狄克同志还不高兴我把萨克森发生的事情称为“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跟他的论断相反，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在《德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就参加政府的问题所说的话：

“德国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即参加政府将有可靠的保证使国家政权机关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将把千百万工人武装起来去同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将资产阶级官吏（其中一部分还是从威廉时期留下来的）从国家政权机关中大批赶走；立即采取革命式的经济措施，坚决打击资产阶级。

如果现时的萨克森政府能够真正地把萨克森变成为哪怕在一

定程度上作为国内一切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集中地，那么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将理解和支持萨克森的试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共产党人就必须利用整个萨克森事件，以便再一次地向工人群众表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毫无气节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革命劣根性。我们摒弃那种抹煞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德国革命问题》第三章。）

我在萨克森“试验”的最初时刻就是这样说的。没过几天，我就清楚地看到，德国共产党的右派把我们的策略变成了机会主义的滑稽喜剧。

1923年11月5日，我建议向德国党发去一封信，信中指出，萨克森的试验已变成为议会的滑稽喜剧。同志们，对于这封信我们不用感到惭愧。这是一个不坏的文献。信是我起草的，修改信件的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柯拉罗夫、蔡特金、季诺维也夫、库西宁等。克拉拉·蔡特金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作了许多政治上和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信被一致通过。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是执委会跟着蔡特金走呢，还是相反蔡特金同志当时跟着执委会走呢？是后者，而这也是很好的。糟糕的是现在，当情况比11月间明朗得多时，蔡特金同志不愿跟着执委会走了。糟糕的是，她不再跟我们一起走了，出于友谊和同志般的团结感她不愿跟那些现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决裂。遗憾的是，她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对列维的问题上也采取了这种立场——“不能离开他们”。对蔡特金同志的这种友谊可以表示赞赏，但是她的性格上的这种优点辩证地变成了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大家都很爱戴和珍重的这种热情和善良，辩证地变成了政治上的错误。

拉狄克同志在这里说得很活跃，带着许多玩笑和幽默。我很羡慕他：这确实是他的英勇义举。

但是，同志们，如果认真地对待问题，那么共产国际五年来

——这是极其重要的五年——的工作表明，内部出现的斗争没有进行到底，这是由于拉狄克同志当时服从共产国际和俄国中央，而没有成立“反对派”。我们大家都说，我们了解拉狄克同志，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优点是：他是个优秀的记者。他的缺点是：他都是通过报纸来观察整个政治生活的。他是个记者，他的文章都是在认真考虑以前就写好了的。有人说，不这样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好象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文章，他谈到记者的本性：记者的明显特点是当事情还没有冷却下来时立即作出反映；他是立即作出反映并在写好文章以后再开始考虑的。这就是拉狄克的优点和缺点所在。他常常对我们说，你们怎能比我更好地判断萨克森的情况呢！要知道，我每天读几十份萨克森的报纸。他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谈论过列宁：老头子当然很英明，但他不读所有报纸和小册子，又怎么能弄清世界政治形势呢！这一点我不理解。当然我不反对读报纸和小册子，但只是根据所读的东西就得出最终的结论是轻率的。拉狄克常常说：您怎么能否认呢，要知道报上是这样登着的。拉狄克似乎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是怎样“办”的。（笑声。掌声。）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所谓我们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成功，以致引起了某些误解。我援引了关于一切工人政党联合的话。克雷比赫同志抓住了这一点：您不是自己说了吗：“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这是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策略。我的错误在于，我没有向大家念以下这段话，那里说：

“工人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对生产实行监督，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有产阶级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

现在，我更详细地来引用一下这个决议。既然有人企图制造

许多神话,说我们修正和取消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策略,那么这是必要的。虽然有些枯燥,但是必要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意味着,共产主义先锋队站在广大群众为维护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的前列。为了开展这种斗争,共产党人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叛徒领袖们进行谈判。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这自然应当加以断然拒绝。第二国际企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较左的工人组织拉过去(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合并”),这无非是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有可能将更多的工人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

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和它们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充分行动自由是无产阶级极重要的历史成果,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只有共产党才是维护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也绝不意味着追求这样或那样的议会目的的所谓上层的‘竞选运动’。

统一战线的策略无非是共产党人提出的与属于其他政党和团体的所有工人以及所有无党派工人为维护工人阶级的起码的切身利益,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为争取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行动都是革命启蒙和革命教育的泉源,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将使劳动者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共产主义的意义。

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不仅是取得鼓动宣传上的成果,而且是取得组织上的成果。要注意:只是鼓动宣传和组织上的成果,不是任何其他的成果。必须利用每个时机直接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组织支点(工厂委员会、由各政党和无党派工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

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真正实现统一战线的策略只能‘从下层’，即直接从工人群众的最深处。同时，共产党人在某种情况下不能拒绝同敌对的工人政党的领袖们进行谈判。但应当使群众经常了解这些谈判的进程。然而，即使在同领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共产党及其鼓动宣传工作的独立性不能受到限制。

不言而喻，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业已成熟，而反革命领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企图分裂工人阶级时，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整个时代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有这些就是在目前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我们可以读到：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作为一般的鼓动口号来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采用。但是，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来说，工人政府在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实践上必须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则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作为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而产生的。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各党宣传并实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企图挽救这些国际的危局。

不久以前，第二国际的一些政党(例如在德国)一方面不打算公开参加这种联合政府，但同时又以隐蔽的方式促其实现，这无非是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而采取的一种手腕，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更狡猾的欺骗。共产党人反对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主张实现全体劳动者统一战线和一切工人政党为了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为了最终推翻资产阶级而在经济和政治方

面的联合。由于所有工人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整个国家机器就会转到工人政府手里，从而加强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地位。

工人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对生产实行监督，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有产阶级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

这种工人政府，只有当它产生于群众斗争本身并依靠受奴役的工人群众最下层所创立的富有战斗力的工人机关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那种由于议会团体的力量而出现的工人政府，即纯粹来源于议会的政府，也可能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例如，即使现在的麦克唐纳政府）。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在革命政策的基础上把它继续保持下来，就必然会导致同资产阶级的残酷斗争，甚至国内战争。无产阶级只要试图建立这种工人政府，那么从一开始就会遇到资产阶级最强烈的反抗，因此，‘工人政府’的口号能够团结无产者和发动革命斗争。

在某些场合下，共产党人应当表示决心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够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可能这样做。在这里，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

- (1) 只有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才允许参加工人政府；
- (2)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严格监督之下；
- (3)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 (4) 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的本来面貌和进行鼓动宣传的充分独立性。

工人政府的口号虽然具有种种巨大的优点，然而，它象统一战线的整个策略一样，也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性，共

产党必须记住：

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都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但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工具。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列各种可能：

(1) 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

(2)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3) 工农政府。在巴尔干、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4) 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5) 只有共产党才能名副其实地实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

前两种类型实际上还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而是伪装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工人领袖的联合政府。这些‘工人政府’在紧急关头会被力量削弱的资产阶级所容忍，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对国家的真正阶级性质看不清楚，甚至在被收买的工人领袖的帮助下击退无产阶级的革命攻击并赢得时间。共产党人不能参加这样的政府。相反地，他们应当向群众无情地揭露这些伪工人政府的真正性质。在资本主义衰落的目前时期，当最重要的任务是吸引无产阶级大多数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行列里来时，这些政府也可能在客观上加速资产阶级政权的解体。

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人、无党派工人、工团主义的工人等携手并进。因此，共产党人也就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有一定的保证下支持非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应向工人公开宣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共产党人可以参加的以下两种类型的工

人政府(即第3种和第4种),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们甚至也不是向专政过渡的历史必然的形式,但它们可能成为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出发点。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真正的工人政府(即第5种)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要问:世界上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哪个工人政党能够解决这个最基本的任务: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把赋税的重担加在富人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做到这一切。上述所引的话的实质在哪儿呢?我们要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

你们主张联合政府,你们还相信联合政府,你们以为共产党人反对统一。不,我们不反对统一,为了同你们联合,我们甚至主张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那就是它们必须履行一些最基本的要求: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实质上并非工人政党的“工人”政党联合。但是,由于你们还不明白这一点,由于你们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而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使你们打开眼界的公式。是的,我们主张贯彻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并武装工人等纲领的联合政府。

每个共产党人都清楚,这就是说:我反对不可能贯彻这一纲领的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

为什么我们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呢?有些同志批评我,说我建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从拉丁文译成俄文。结果似乎我只是扮演了一个普通翻译的角色。不,我指的是从拉丁文译成人民的、大家都懂得的革命语言,也就是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宗派。请读一读,列宁在《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在谈到1918年德国事件时是怎样说的。弗·伊·列宁说:“现在已无需来谈论这一点,现在事变本身已经表明,拉丁词‘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译成了革命的语言。”

这里谈到的不仅是普及口号的问题，而且是我们作为群众性的政党应该要求我们的整个鼓动宣传富有血肉，——这就是拉丁文译成为革命语言的含义。否则，我们只是1847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1924年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人是大多数，大家都谴责我们分裂工人运动；因此，我们的整个战略就是要清楚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表明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们主张同你们实行统一，我们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成立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只是希望他们同意象你们社会民主党工人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他们不愿这样做吗？你们看到这一点了吗？那就是说，过错不在我们，而在社会民主党。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那就让我们不顾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来实现从下面的统一吧！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我们反对同其他“工人”政党联合，因为它们的领袖是反革命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说：我们准备实行联合，如果你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接受这些基本条件（显然这些条件是这些先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今天早晨，我不得不做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重新审查一下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未必能找到比这更枯燥的工作了。或许重新来听我那时的讲话也会使你们感到枯燥。但我还是应当来引用一些冗长的引文，以便消除关于修正我们的策略的神话。

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

“工人政府的口号还没有很好弄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几乎世界各国都应当实行的。很难找得到一个拥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不适合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国家。这个策略同样地适用于美国、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在目前各地形成的条件下，它几

乎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人政府的口号就不能这样说了。这个口号无论如何没有普遍的性质。它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它只能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采用:政权问题、政府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已经居于首位。毫无疑问,目前在美国可以利用工人政府的口号进行很好的宣传工作,向美国工人说: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解放,那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在美国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工人政府的口号就象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就象在德国可能的那样,就象在意大利曾经和可能重复的那样引起如此强烈的鼓动兴趣。工人政府的口号不象统一战线策略那样是到处通用的口号。工人政府的口号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条件下的某种具体的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陷入谬误。同志们,我觉得,我们应当反对企图把工人政府说成是绝对必要的那种想法,似乎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通过‘工人政府’。相反,我认为,如果在这方面可以预言的话,那么工人政府(即过渡性质的‘工人政府’,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只有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十分特殊的具体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工人政府’(过渡性质的)只是一种例外。此外,决不能认为,由于‘工人政府’将会使我们摆脱斗争的重担,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多半是和平发展的时期。如果工人政府只是建立在毫无价值的议会的阵地上,那么它只不过是斗争的一个插曲,不可能防止内战的爆发。这不是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能采用的。

当然,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性,执委会在十二月提纲中已经指出。但是,最大的危险是在它采取工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因为在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里,如法国,这个问题被解释为,似乎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指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只是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即使在成立工人政府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避免国内战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使它更具有尖锐的性质。”

同志们，看来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再从我的结束语中引几段话：

“我还不十分明白，在我们中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正有重大的意见分歧，还是问题本身可能没有解释清楚，我们在这里是否只是一种术语上的争论。这应当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弄清，而首先在讨论俄国革命问题以后将要制定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弄清。对于我来说，问题决不是在这里人们引用的‘同义语’一词。在关于词句的争论中，我愿意作出让步，因为这里问题不在于词句，而在于理解。我认为，如果我先说出以下一点，即对于我们来说清楚的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政府，那么问题就好解释清楚了。未必可以设想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竟不同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但遗憾的是，不能反过来说。

不是任何工人政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不是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社会主义的政府。这种对立现象具有很深刻的意义。我们面前有这样一种事实，资产阶级在我们的阶级内部有自己的前哨，但不是相反。不管我们多么愿意，我们不能把前哨派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我担心，为了追求严格科学的定义，我们会忽视问题的政治方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科学定义的细微之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问题的革命方面。有些同志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如果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走，那么我们就有工人政府了。他们忘记了一点，即首先应当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会自愿地让出阵地的：它将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重要的是预见到世界革命和国内战争发展的一切可能性……

不应忘记，除了‘工人政党’以外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执掌着政权并竭力保持这个政权。

总之,为了成立具有革命意义的工人政府,首先应当推翻资产阶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应忘记,这里应当区别两种东西:首先是我們进行鼓动宣传的方法,问题是怎样最好地同普通工人交谈,怎样最好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状况。我认为,在这方面工人政府的口号是很成功的。但还存在着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事变的历史发展怎样、革命发生的具体形式怎样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口号之争就会丧失任何意义。让我们在这里掀开一角历史的帷幕吧!

革命发展的进程是怎样的呢?有些人说,它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联合政府然后国内战争的阶段。试图预言未来革命进程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这里可以预言的只是:我们的一切预言都将是错误的。很可能,革命的发生不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它将经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在俄国革命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5年前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我们会屈服于封锁、饥荒等等。认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只是不是新经济政策的可能以及革命胜利的可能。

各国的情况不同。很可能,德国的革命完全不同于英国的革命。然而,这不是说我们无权作为自觉的革命者来掀开未来的帷幕,我们希望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我们是有思想的人。我们应当竭力全面地来解释事物的现状。但是在这里要作出某种预见确实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从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角度来看待工人政府的口号,那么大可怀疑的是,世界革命必定要经过工人政府的道路。昨天,我们的朋友拉狄克说,工人政府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我想说:是的,这是可能性之一,但更正确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极小的可能性。当然,我不想说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正确的。不,这是正确的口号。在力量对比有利的地方,这个口号会给我们带来鼓动宣传方面的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我

们研究一下关于革命途径的问题，即革命是否会真的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的问题，那么我要说：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解决。工人政府很可能是一条可能性最小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国家里，我们只能通过国内战争来夺取政权，而如果我们通过国内战争的途径消灭资产阶级，那么我们未必需要有一段较长时期的中间阶段。这是可能的，但不必对此进行争论：这里只需要预先估计到。唯一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对革命道路上的一切可能性加以清楚地区别。”

“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工人政府，它不是别的，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地是可能的。这种工人政府对工人阶级来说也可能客观上是有利的。争取工人政府的鼓动宣传工作是正确的。我们在鼓动宣传中可以通过这个口号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革命的前景。”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我读了捷克外交部长贝奈什对共产党人说的一些好话，他说：“不能拒绝共产党人的发明创造。他们善于向工人们奉献不同形式的同样的东西。例如，共产党人曾经宣传成立苏维埃。当这种宣传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时，他们就停止了。经过半年之后又以宣传成立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形式恢复了这种宣传。”当时我说：好啊，贝奈什！看来您比捷克斯洛伐克有些机会主义的工人领袖更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所在。

或许人们会责备我，说我又在披露公开的秘密。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早在1922年，贝奈什就很懂得问题的实质。克雷比赫和什麦拉里同志怎么能忘记早在1922年贝奈什就已经知道的“秘密”呢。这个秘密就是：这个口号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对待群众的一种公式。这一点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说得十分明确：

“我认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争论，特别是经过委员会的工作以后，不会导致我们放弃工人政府的口号。如果把这个口号看

作是接近群众的一种手段，那么口号依然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用不着争论了。只是我们应当正确地运用它。它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样也包含着同样的危险性。当人们开始谈论政府的时候，很自然会出现议会计谋、分配内阁席位等的念头。在这里还有比统一战线的策略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应象我们法国同志们那样从这里得出结论：由于实现这一口号的困难而放弃它。”

拉狄克同志，难道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

此外，同志们，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中说：

“同志们，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安心地奉行工人政府的口号，不过要清楚地理解问题的所在。可悲的是，如果我们在我们宣传工作中哪怕是一分钟去支持这样的意见：实现工人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的，工人政府的实现将意味着可能代替国内战争的半有机发展时期的到来，等等。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类观点（或许有些地方有），那么我们应当坚决同这些观点进行斗争，教育工人阶级认识到，成立工人政府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推翻和战胜资产阶级。

这就是这个口号的实质所在。你们想要工人政府吗？好极了！为此我们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协议。虽然我们也说，他们会出卖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拥护工人政府，虽然有他们参加，但是只要这个政府准备和我们一起携手并肩地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将投入斗争，而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诞生了工人政府，那么它将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开端。我不坚持‘同义语’这个词，我乐意把这个词奉送给迈尔同志。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某种路线。工人政府决不是旨在用计谋胜过上帝和资产阶级并防止国内战争的一种军事计谋。国际应当成为优秀的战略家，但是自然界并不存在可以避免国内战争和可以象在光滑的地板上那样走向工人政府的战略。决定性的因素是

斗争，是战胜资产阶级；当我们战胜它的时候，我们就能走向各种形式的工人政府。

英国的工人政府在目前情况下可能客观上起着革命因素的作用，而我们将支持那里的甚至是有局限性的孟什维克-自由派的工人政府。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孟什维克-自由派的工人政府可能甚至比资产阶级政府还要嗜血成性得多地反对我们。诺斯克以及我国的孟什维克已经绝妙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政府决不是一种避免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我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作为鼓动宣传的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善于革命地利用它……

我们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我们应当说：同志们，工人政府是个好东西，但是为了成立工人政府，首先需要推翻资产阶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武器，需要组织起来，需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首先需要清楚地懂得，事情必定会弄到发生巨大战斗的地步，否则胜利就不可能。同志们，我认为，我可以就此结束我的结束语的这一部分了。”

我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那时我说，人们这样来谈论工人政府，似乎政权是*res nullius*（无主物），即不属于任何人。为了成立工人政府，首先需要战胜现在执政的资产阶级。难道你们以为一切都会那样顺利吗？难道资产阶级会说：好极了，你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公式，因此我们准备把政权让给你们？不，同志们，为了成立工人政府，首先需要战胜资产阶级。这件“小事”不应忘记。

至于我们德国党同社会民主党上层组织的谈判，我在那次讲话中曾指出以下一点：

“我们从远处似乎觉得，我们的党（德国党）在异己组织的上层面前过于谄媚了。在德国，我们不是穷亲戚，而是胜利在望的独立的政党。当社会民主党人千方百计想要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最

好不要当穷亲戚。”

请原谅我从我自己的讲话中引了很多引文。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揭露拉狄克和整个右派的“发明”：似乎我们现在要取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策略。

如果你们读一读我的讲话，我想你们现在也会说，这个讲话是正确的。那里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想法：工人政府的口号只是一个鼓动宣传性的口号。这只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是争取群众来实现专政思想的途径。现在怎么能说是修正呢？不，同志们，这只是拉狄克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种“鼓动宣传口号”，仅此而已。

人们说，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而每个口号也有它自己的命运。许多经过考验的革命家可能会在这里碰钉子。

今天早晨我又做了一件事，我重新读了一遍 1923 年 6 月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有关“工农政府”口号的讲话和决议。我在讲话中是这样提出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的（我不得不又来引用自己的话）：

“什么是统一战线？这仅仅是战略手腕，还是说统一战线真正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们要用下面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请问，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初年代，即在 1919—1920 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愿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真诚地接近或友好呢？我认为当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的人都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接近。

现在我要接着问：那我们在 1919 年和 1920 年是否实行过统一战线策略呢？没有，没有实行过。这就是说，如果你们指的是共产国际存在初期，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这段时期，那么你们就会看到，情况是这样：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和友好是有的，而统一战线的策略则没有。

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真诚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我们一向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现在希望，将来也永远希望，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希望和将来也希望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和团结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胜利的唯一重要的前提。”

“那么，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大约从1921年开始作准备，1922年最后提出，而现在，即在1923年则在大力贯彻，这里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增加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这里新增加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战略手腕的东西。这里首先应该谈谈群众与领袖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我们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们中间或许有的同志会提出疑问：既然我们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是不是因而就放弃了我们的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否仍旧是工人的政党，还是变成为工农的政党？

谁要是对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有所了解，谁要是开始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战略，那他就应该明白：‘工农政府’的口号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绝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当我们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一步也不能离开这后一点的。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道路。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及其政党可能明智地行事，也可能愚蠢地行事。如果我们的阶级能够明智地行事，那我们就能够很快地达到目的，付出的牺牲也会少一些。我们要善于部分地使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保持中立，部分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行事，如果我们是从行会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伟

大的阶级解放使命，那我们自己就将推迟胜利的时刻。”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是普遍推行工农政府的口号的时候了……”

“‘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包含的危险在于，我们某些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的支部会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口号。大家都记得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什么样子。这个党说，它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

“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在于我们一些不够坚强的党可能会使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模糊起来。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们必须善于向一切与资本的统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阶层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道路。”

总之，我们丝毫不应隐讳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既然怕狼，就不要到森林里去。我们多少已经学会了对付灵活策略的困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为崇高的任务：唤起我们党夺取政权的意向，使之变成为在每一个工作步骤上都意识到自己是要在明天战胜资产阶级的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自己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并用这一意向来感染广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层。当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满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时，胜利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拉狄克、蔡特金和克雷比赫同志硬说，工人政府就是“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政府是否就是“一切工人和农民政党”的联合政府呢？

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明白，这是多么荒谬和多么非马克思主义啊！既然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农民政党，那怎么能说工农政府是建筑在同工人和农民政党联合的基础上的呢？

拉狄克和其他同志们，这种问题的提法毫无疑问说明你们至少是处在错误的道路上。请你们哪怕读一读我所起草的和我所维护的关于工农政府的决议^①吧！

那里这样写着：

“‘工农政府’的口号和曾经出现过的‘工人政府’的口号一样，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关于无产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策略的一切原则的基础的宣传，也不能把它排挤到次要地位。相反，‘工农政府’的口号为执行现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基础，它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对‘工农政府’口号的正确解释，使共产党人不仅能够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能够在农村中为自己建立巩固的据点，在那里奠定夺取政权的根基。

‘工农政府’的口号就是在将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能为共产党很好地服务。因为这个口号会提醒无产阶级：必须使自己的前进步伐与本国农民的情绪相适应，必须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协调关系，必须遵守按部就班地逐步实现无产阶级经济措施的原则，如同俄国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做过的那样。

不言而喻，宣传‘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具体化，使之适应每个国家的情况，例如，在美国就应该涉及到从事劳动的农场主。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阐述的纲领的精神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应是我们对工农政府整个宣传的出发点。”

我认为，这几段引文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夺取政权以后“工农政府”的口号还有用，就象它对苏联来说还继续有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明智的专政，是实行农民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工农政府”口号的决议。——译者

可以接受的政策专政。否则，整个专政就会见鬼去。而这一点应当善于向农民说清，“工农政府”的口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由此可见，这个口号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也具有宣传意义。而在夺取政权以前则更不用说了。这个口号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切工人和农民政党联合”的口号。

允许我再请你们注意一下该决议中的几段引文：

“只要共产党在国际范围内掌握住‘工农政府’的口号并着手为这一口号进行宣传，就能初步做到使农民的中间阶层保持中立并把小农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确认，共产国际的绝大多数支部迄今对农村工作表现了无比消极、极为有害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首先反映了第二国际的阴郁晦涩的传统，因为共产国际的一些最主要的政党是从第二国际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其次也反映了对农民问题所持的错误理论，即企图把问题说成似乎是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工人政党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再次，也反映了一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狭隘的行会观点。各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彻底放弃这种行会观点。共产党不应该象第二国际极盛时期那样，只把自己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一个极端反对派的无产阶级政党。各国共产党目前必须作好精神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引导劳动群众去向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展开决战，推翻资产阶级并在管理国家的事业上取而代之。狭隘的行会心理应该代之以具有夺取政权的意向和体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党的心理。共产党应该准备在明天就战胜资产阶级，因此，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提出全民的目标，并且努力争取一切按其社会地位能够在紧要关头给无产阶级革命以某种支持的居民阶层对无产阶级的支持。”

“‘工农政府’的口号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使我们有可能用算术

公式来表现迄今一直由代数公式来表现的东西，因而这个口号就能具有普遍的包罗万象的意义。而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口号，‘工农政府’这个字眼首先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巴尔干各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等这样一些国家里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不论在哪里，如果没有农民的一定形式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巩固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政府’的口号应该是各国共产党的总口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全力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的同时，建议各国共产党不要忘记由于错误地执行这一口号所带来的危险。无论是统一战线的策略，还是‘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我们党不善于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加以实现的情况下，无疑会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危险。与‘工农政府’口号相联系的最明显的危险首先是：

(1) 在没有经历过足够坚实的马克思主义锻炼的党内，会产生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口号的危险；这种观点把全体农民看作是一个整体，对农民中存在的不同阶层视而不见。

(2) 第二种危险在于，有些在政治上不够坚强的共产党人可能打算用同所谓农民‘代表’和所谓农民政党的领袖（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结成无原则的议会联盟的方式来代替在广大劳动农民阶层中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工作。各国共产党既要充分考虑到由于执行‘工农政府’口号而产生的上述危险和类似危险，但也不应否认采取灵活策略的优点，必须学会把深入到最广大劳动阶层中去的策略同坚决彻底、决不调和地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行动结合起来。

不言而喻，深入到农民中去和‘工农政府’的口号一样，决不是要求我们的党从工人政党变成‘劳动’政党或‘工农’政党。我们的

党应该始终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引导一切劳动阶层跟随自己前进并带领他们投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工人阶级政党。”

我觉得，这几段引文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但是许多不坚定的同志，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不理解问题的实质。结果是：就连蔡特金同志这样一位无疑是共产国际的最可靠和最先进的战士，由于某些情况而不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引一段蔡特金同志昨天发言中的话。她说：

“应当承认，我决不能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认为工农政府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同义词’，或者另外什么‘词’。

对于俄国来说或许是这样，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发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合适的。在那里，工农政府是某种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现，即资产阶级已经无力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期的表现。”

同志们，我觉得，由于这句话拉狄克同志也是不会感谢蔡特金同志的。这太过分了，甚至比右派更甚。“对俄国来说或许是正确的，对进步的西欧国家来说则不合适”——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志们，这无非是列维的某些思想的复活。要知道，列维建立了一套彻底的理论。他说：“光荣和荣誉归于俄国革命，它战胜了沙皇制度，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在我们西欧国家里，我们必须遵循根本不同的策略。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我们就一事无成。我们应该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

一切工人政党联合的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我不想说，蔡特金同志是列维的拥护者。但是在她的话语里毕竟可以听到某些旧观点的复活。

如果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想说，在欧洲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以前不可避免地将出现麦克唐纳式或谢德曼式的“工人”政府，那么这是正确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是我们在口号中提出的那种工人政府吗？这些“工人”政府只不过是从工人阶级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派生出来的。客观上麦克唐纳式的“工人”政府也是一种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比较是一种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民主同黑帮君主制度比较是一种历史过程。但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另一种真正的工人政府。通过“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无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采取的做法必须与在俄国有所不同。不能把鼓动宣传的形式机械地搬到别的国家去。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上，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作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和手段的工农政府的口号问题上，在德国和俄国或者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德国和俄国一样都有农民，德国和俄国一样都有工人。为了找到通向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以便对革命进程真正起到作用，我们利用“工农政府”这个术语。

在我们俄国，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里处于多数时，我们提出了战斗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当时，这个公式是最好的磁石。大概在德国在某个时候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然而也可能提出另一种公式。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过渡时期，“工农政府”的公式在我们看来是最合适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们说：我们甚至准备参加接受我们最起码的要求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的政府。这是所有参加斗争的工人必须理解的，因为否则他们就会遭到枪杀。正确对待群众的艺术也就表现在这里。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胜利，我们就应该掌握和领导群众。

拉狄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克雷比赫试图这样来解释，似乎我们在为西欧国家创造与我国革命的策略不同的策略。拉狄克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微妙的，因此问道：“好啊，那就是说，你们永远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个政府里？请季诺维也夫回答这个问题吧！”在拉狄克看来，这个微妙的问题甚至是无法回答的。或许有人会说，熊还没有打死，用不着来分皮。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正处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因此提出这些问题毕竟是合适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同我们坐在一个政府里，而是这里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国革命的经验。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喜爱我们的革命——我们大家都喜爱它——，而是因为它是经验的最丰富的泉源。当德国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无疑将会提供更有教益的东西，但目前在这方面俄国革命还没有被超越。布哈林已经指出，在俄国，当时代表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参加过政府。同志们，是否有可能例如在德国在共产党的政府中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呢？我觉得有可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是脱离了核心并在一定时刻在革命事件的压力下给我们以某些支持的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他们当时在表面上比共产党人“更左”，对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影响。我们拖着他们走，考验他们，后来其中的优秀分子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掌握了革命的课程；另一些人则转到反革命营垒，就象“狂热的小资产者”应有的那样。

在去年德国十月事件期间，有人对我说，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人可能会跟我们一起走。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人叫奥弗海泽尔。（德国代表团提出抗议。）我不知道这个人，因此提到这个人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有人对我说，在决定性时刻，这个人可能会离开社会民主党而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这里问题不在于名字。我只是想

举个例子。我再说一遍，我既不知道奥弗海泽尔，也不知道他的姑妈。但我知道，在决定性时刻会有一些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的，在这样的时刻或许会有一些反映这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情绪的领袖们浮到上面来的。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把同腐朽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代表部分斗争工人的这部分人吸收到政府里来。当然，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

同志们，这是一种政策。另一种政策是下面这样的。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这种经验。当克伦斯基遭到破产时，即1917年9月，孟什维克看到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完了，他们就抛出一个口号：“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们是指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劳动党人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农民团体和布尔什维克混合的政府。这种政府决不是“清一色”的。这里有争取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有反对革命的孟什维克，也有同样反对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维护“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口号下的这种大拼盘。他们把根本不是清一色的和社会主义的东西称为“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同志们，我觉得这里恰当地说是，我们的敌人在这个时刻在寻求接近群众的适当的公式，在寻求自己政策的“代名词”。对于孟什维克来说，“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的口号是他们的民主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政策的代名词。为什么他们恰恰选择了这个口号呢？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享有很大的声誉，因为大家几乎都普遍地向往社会主义。

我向你们举了历史上的例子；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寻找“代名词”，以便更易于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部分无党派工人。过去，孟什维克也是在寻找而且找到了上述响亮的公式作为代名词。一个普通的工人会对自己说：“怎么，清一色社会

主义的，这是多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不投票赞成呢？特别是可以不经国内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记得，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强堡垒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派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代表团对我们说：同志们，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自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为反对这种政府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但是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清一色社会主义的内阁呢？

那时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代名词。

同志们，总之你们看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存在着两种政策体系。如果拉狄克问我：“那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能同我们坐在一个政府里？”那么我要回答说：在我们的政府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社会革命党这只破船的碎片。社会民主党破船的碎片，即代表一部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碎片现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政府。但是，拉狄克同志，您所希望的东西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即“清一色”内阁或“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孟什维克想要欺骗群众，而拉狄克同志希望比我们大家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但是问题不在于主观愿望，而在于某种观点的客观后果。

拉狄克同志，为什么您以这种真正记者式的耸人听闻的口气问：“这样难道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吗？”

您可是常常猜得不对啊！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参加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呢？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到我说过关于基督教社会党人的话。是的，我曾持这样的观点，即应该告诉工人阶级说：我们准备同所有工人，甚至同“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起携手前

进,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等等。拉狄克觉得,他援引我说过的同意和“基督教社会党人”达成协议的话,是对我的一个重大打击。这里用一句法国谚语是很恰当的:谁证明的过多,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我同意跟“基督教社会党”工人联合是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这无非是接近群众的一种办法,一种鼓动宣传的口号,而不是同一切所谓工人政党联合的政策。拉狄克以此证明,他的观点的基础正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东西。

同志们,关于工农政府和所谓修正我们策略的问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拉狄克说,我错误地把情况描绘成这样,似乎我们在开始时只是一些宣传团体,只是在后来才开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我不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这样说的。不,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和我们的策略来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拉狄克说:我们不仅仅是宣传团体。难道斯巴达克联盟没有经受过巨大的战斗吗?难道巴伐利亚、匈牙利没有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吗?拉狄克现在有一种可以说是失败主义的情绪。凡是证明我们倒退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

布兰德勒的拥护者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还能得到600万张选票这一点归咎于现时的左派党中央。左派领导党已经整整六个星期了,而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被击败。不过,对不起,我们可没有因为布兰德勒没有取胜而责备他。不,我们知道,在斗争中有时候可能会遭到失败。我们责备他的是另外一点。我们没有说,为什么你没有取胜,而是为什么你没有进行斗争,为什么你没有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我觉得,不要再诉怨在这次或那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还占居优势了。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还没

有夺取政权?为什么左派中央还没有战胜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等一等,我们会取得胜利的。拉狄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幅阴暗的图画。在法国一切都很糟糕,在德国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当然,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弱点视而不见。不过,拉狄克对它的看法是失败主义思想的表现。请看,过去我们可是强有力的党,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取得了政权,可现在呢?对,在战争快结束时,群众的自发情绪是很革命的,时刻等待着资本主义垮台。但是,无论在德国,无论在匈牙利还是在巴伐利亚,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拉狄克同志,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拉狄克看不到这一点。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群众的自发的激昂情绪很大,而党却很弱小,只是些宣传团体。

在这方面,意大利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是反战的愤慨和仇恨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是根本没有相应的政党。诚然,我们在意大利有一个拥有20万党员的社会党。当时的社会党加入了第三国际。尽管群众运动的规模宏大,但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拥有一个宣传员小组,庞大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一个小派别。

在同拉狄克同志分手前,我还想提醒一点。拉狄克说:“如果我们那样的坏人,如果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那就把我们开除吧!”

如果这话是另一个人说的,那我们会认真地对待,但是拉狄克有时说话前不想一想,正如他有时写作前不考虑一下一样。我们并没有说,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是改良主义者,但是他和他们有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倾向是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应当加以纠正的。

我们希望拉狄克自己会来纠正的。在代表大会上无疑会表现出某种改良主义的倾向,虽然不是所有同志都象德国右派分子那样公开地说。德国右派的代表们说得很多。他们说话的时间是同

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成反比的。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右翼当中有些同志显然是按以下这句格言行事的：说话是白银，沉默是黄金。显然他们认为：我们再稍为等一等，现在这里极端革命的情绪还占着上风。

右翼分子把“工农政府”的口号理解为“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同志们，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必须停下来。我想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于右派同志们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

译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25年俄文版第一分册第448—474页。

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1925年1月)

最近将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还只有半年时间，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程上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要求加以权威性的解决。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扩大全会所要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列的，首先是关于工会的国际统一问题，关于从世界反动新时期迅速代替“民主—和平主义”时期中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关于俄共党内的争论问题，等等。然而，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

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和许多国家革命自发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那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明白政党在革命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可能取得迅速胜利，尽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里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Sturm und Drang Period（狂飙时期）。在交战国经济极度耗竭的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仇恨在蓬勃的自发运动中以如此强大的势头迸发出来，以至大海眼看就要冲决两岸的堤坝并淹没资本主义的地基。

共产国际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大约是1921—1924年。事情已经清楚，胜利取之不易，首先需要花几年时间来建立共产党。这项工作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已经多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现在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可以从第四次世界代表大

会算起。共产党大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宣布了这个口号。执委会二月扩大全会应当把这一口号具体化,应当使它充实起来。

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口号现在正在成为吓唬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几乎是徘徊在欧洲的现代幽灵。得到第二国际走卒们支持的世界资产阶级无疑会制定一个非常法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国际各党。世界帝国主义希望制定一个反共产党人的非常法,并向布尔什维克化宣布大致象第一国际时代那种类型的圣战,自然手段更加残酷,更加恶毒。

不过,先生们,为时已晚!

即使你们能够把这个或那个共产党打入地下,用镇压手段使其暂时削弱,但是这不能阻止该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加速这一过程。难道你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有些政党正是通过监狱,通过非常法,通过非法时期的锻炼才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吗?

经历疯狂迫害的时期,经历非法时期,这往往是党布尔什维克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欧洲资产阶级从“民主—和平主义”时期迅速转向资产阶级疯狂的反动时期是导致广大工人群众真正革命化,从而也导致工人政党真正革命化的前提之一。资产阶级正竭尽一切努力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和平道路是不可能的,表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爱好和平计划是空想的,从而促使工人群众走向布尔什维主义。总之,资产阶级正在从自己这方面汗流浹背地竭力为共产国际各年轻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我们也必须从自己这方面特别努力,使国际帝国主义所上的实物教学课卓有成效。

什么是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

首先说一下什么不是布尔什维克化呢?

使党布尔什维克化无论如何绝不意味着走上建立“纯粹”布尔什维克的小规模组织，建立“优秀人物”组织等等的道路。布尔什维克首先是群众工作者，即首先是宗派的反对者。

布尔什维克化不是庸俗化。布尔什维克首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忠实拥护者。布尔什维克应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领袖，同时也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水平上，真正洞悉无产阶级革命代数学的水平上。

布尔什维克化不是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机械地搬到其他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来。布尔什维克应当首先竭力分析具体的情况。布尔什维克不是一般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是要运用到空间和时间的具体条件，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的具体条件中来。

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次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其他优秀支部的经验）运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来。

有许多任务是共产国际各党共同的，例如：

1、共产主义先锋队忠实地对待无党派工人群众。在欧洲，这首先就是正确地解决对工会的态度问题，即共产党人在工会中进行长期工作的策略。

2、忠实地对待农民。在全世界的农业居民中有三个阶层，他们是可而且应当被我们所争取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另外有一个农民阶层至少应当被我们所中立（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极重要文献之一）。

3、正确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是同正确解决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因为居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各民族绝大多数是农民。

4、布尔什维克式的，即不屈不挠地争取胜利的意志和使一切策略细节服从于这个基本目标。因此容许象列宁同志在《左派幼稚病》中教导我们那样的妥协。

但是，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决所有这些任务。谁只会简单地机械地重复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所了解到的东西，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谁懂得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首先在于善于把列宁主义运用到每个国家的具体特殊条件中来，谁才是布尔什维克。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组织原则被认为是全部布尔什维主义。按工厂支部原则建党，无疑是共产国际一些年轻政党当前的极重要任务之一。按旧的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党（不是按生产原则建立的支部，而是按地区-选举原则建立的支部），不可能成为郑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极其重要组织原则毕竟还不是全部布尔什维主义。这只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部分。当我们得以根据生产支部的原则重新建立某个党以后，我们就会面临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如何用实际生活来充实这个生产支部？党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在目前时期，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善于在每个国家里集中注意于有可能使该党（1）成为群众性政党，（2）成为战斗列宁主义政党的那些具体的中心任务。

例如在英国，这就是说现在要把（1）工会问题和（2）殖民地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在这里，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使大批工会会员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解释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因为不仅英国工会的许多普通会员，而且英国工会的一些善意地犯错误的左派和半左派领袖都真诚地相信，工党及其麦克唐纳辈和韩德逊辈无非是工会的奴仆和走卒。这些工会运动的活动家们没有想到，

实际上相互关系应当恰恰相反。

英国的上层工人充满着一种独特的工人帝国主义的精神。英国党如果不把殖民地问题连同工会问题和正确对待工党的问题一起摆在自己工作的中心位置,就不能成为布尔什维主义政党。

在法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目前首先是在这个国家里创造群众性革命工人政党的传统。法国没有这个传统。共产党现在完全顶住这项任务不办。要发展更多的党员!几乎全体巴黎无产阶级都同情法国共产党,而参加我们巴黎组织的只有几千工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要进行反对在左派集团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当党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不要张皇失措,不要罔然若失。不要落到使事变超越党的地步。

要正确解决与统一劳工联合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萌芽状态中消灭在这方面还存在的一切摩擦。无论如何要争取同革命工会的真正团结。

要前去争取外省中心城市的工人。

要以应有的规模从事农民和殖民地的工作。

要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着眼,根据工厂支部的原则来从事改组党的工作。

在德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目前阶段首先是正确解决工会的问题。德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一年中给我们树立了这样的范例:衷心希望成为布尔什维主义政党的党,仍然可能犯非布尔什维主义式的错误。德国共产党在法兰克福党代会前在工会问题上所犯的 error 就是这种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应当在理论上、在决议中、在报纸和标语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日常工作中,在她的整个实际政策中加以纠正。

德国共产党在正确反对几乎使德国党葬送的布兰德勒机会主义的同时，还应当反对使党脱离工人群众的左倾抽象概念。她不应对于以下事实估计不足：在最后选举阶段我们毕竟失去了将近一百万张选票，而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现在必须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鼓动宣传，以便使这项工作紧紧抓住日常事务，抓住当前人们注意的问题，抓住德国工人的现时生活。德国同志们在目前时期里必须特别注意反对以下倾向：给自己创造“宁静小天地”，把贫困当作美德和满足于“纯粹”布尔什维克的小规模组织，而不去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便千方百计地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并引导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在苏联，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目前就是要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思想斗争，消灭作为俄共党内的一个完整派别的托洛茨基主义。

在波兰，布尔什维克化现在就要掌握列宁主义对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观点。波兰同志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二十年前去，因为那时他们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同列宁同志分道扬镳了。而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主义反对卢森堡主义是完全正确的。（顺便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克服卢森堡主义的错误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诸如此类等等。

我们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清楚地知道，上述列举的几点是不完全的。这无非说明这样一个思想，布尔什维克化首先意味着具体化，意味着区别对待。布尔什维克化绝不意味着一般齐，布尔什维克化绝不意味着清一色。相反，布尔什维克化首先意味着了解某个党直接活动的具体社会环境。布尔什维克化，这就是要象了解自己的五个手指那样了解本国的整个经济、全部政治特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细微差别。布尔什维克化，这就是要把列宁

的学说运用到本国的具体环境中来。

在我国革命中被我们击败的俄国白卫资产阶级领袖们要比还没有被工人阶级击败的外国资产阶级领袖们具有一个优点，即他们吸取了十月革命的某些教训。正因为如此，被击败的俄国资产阶级有时倒更清楚地懂得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化。举一个例子。俄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著名领袖巴·米留可夫在巴黎出版的《最近新闻报》上在题为《布尔什维克化》的社论中写了以下一段话：

“11月23日举行了饶勒斯的骨灰移往先贤祠的仪式。法国共产党人选择这一天来检阅自己的力量。在将整个共产党议会党团几乎都派到议会去的首都，自然不难发动十万共产主义拥护者上街。这个举着旗帜、打着不比莫斯科逊色的共产主义标语、唱着令人不无感动的歌曲和喊着令人不无感动的口号的人数众多的队伍与稀稀落落、纪律比较严明、声势比较低落的官方参加者及其随行人员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不能不给人留下布尔什维克范例的追随者们取得彻底胜利的印象。‘巴黎把饶勒斯从资产阶级和社会叛徒们手里夺回并还给了它的无产阶级’，这就是共产党的评论，自然整个这次街头示威游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米留可夫把10万（了解内情的人们说，不是10万而至少是20万）巴黎工人打着“不比莫斯科逊色的标语”上街这件事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化”，这是公正的。

是的，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这首先是引导工人群众、它的先锋队、它的优秀分子、欧洲各大城市的千百万工人跟随着我们党的旗帜。其余一切都是附带的。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5年第1期第3—9页。

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
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1925年3月25日)

一、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

当前的策略问题就是世界革命 的期限和道路问题

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出发，我们得出了世界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已阐述得相当清楚，可以作为共产国际整个工作的指导路线。但是在这个理论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就问题的实质来说，这两个问题只有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这里说的是当前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心点的问题。这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问题，它的发展的迅速程度，即它的期限问题。其次是它的行进路线，它的政治地理问题。

同志们，我觉得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不久前、目前以及不久将来的策略问题。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期限问题，那么不仅共产国际的经验，而且还有第一国际以及象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一些人物的全部工作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在这方面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根据我们本身现有的经验深信，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世界革命的期限问题，不然由于革命家的可以理解的迫切心情，常常容易犯错

误，过于匆忙地确定事变的期限。不仅列宁而且马克思正是在这方面犯过错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来谈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特殊困难。就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吧：要知道，恰恰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当时，甚至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左翼拥护者中也很少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俄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下一次将轮到德国了，革命将从俄国转移到德国，然后波及整个欧洲。只是在现在，即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10年和这次战争结束后6年，以及俄国革命后8年和我们在这些年代里在欧洲看到的所有战斗以后，才坚定不移地提出一个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行进路线的这种看法，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地理扩展的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革命是否必定通过德国移向欧洲？在这里，在估计行进路线方面，我们是否可能犯错误？同志们，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墨守以前的观点，以便不再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犯布兰德勒在较小的范围内所犯的错误，布兰德勒希望无论如何从萨克森开始实行德国革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未来的行进路线不一定首先通过德国革命。应当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对国际形势以及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联系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当我们开始国际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许多客观情况造成的。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

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短的间歇，以便使我们的策略与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①

由此可见，首先，列宁早在1921年就谈到，欧洲正在确立某种均势，历史过程正在曲折地前进，而不象我们大家在开始时由于天真或者多半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相信的那样直线式地发展，其次，“间歇”将比可能预料的更长些。

同志们，总之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革命的期限和行进路线问题要比我们大家曾经设想的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给我们提供许许多多东西，但是即使它们也不能代替只有革命本身的历史经验才能取得的東西。

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只过去了9个月。在这段短短的时期里，总的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许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比过去更加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任务就是总结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清楚的一些事件的教训。

首先我们必须哪怕扼要地来重新评述一下现时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我们应当这样做，以便检验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正确，并决定：如果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我们就继续贯彻，如果它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当加以纠正或者甚至完全重新制订。我要明确地说，依我看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已被光辉地证明是正确的。

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最重要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67—468页。

几点：现在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进程和结局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其次是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再其次是关于工会的国际统一问题，农民问题，对法西斯的评价，等等。难道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没有被经验所证实吗？

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所有这些领域内发生的事件光辉地证实了共产国际的观点。那些有勇气作为老实人的我们的“批评者们”应当承认，犯错误的正是他们，而决不是第五次代表大会。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稳定

现在来谈谈世界经济形势。在过去的八九个月中，形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共产党人队伍里以及他们的周围常常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一派的代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随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灾变的某种预言家；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现资本主义“立即”崩溃的新的征兆，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于是陷入相反的极端，并开始叫嚷整个行动路线是错误的。另一派的代表则宿命论地相信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百分之百地稳定；照他们看来，这种稳定几乎是乘特别快车前进的，他们简直被这种使他们高兴的稳定的某些表面现象弄得眼花缭乱了。共产国际既不需要这样的极端，也不需要那样的极端。无论是即刻灾变的预言家们，还是资本主义稳定的宿命论者，都是不正确的。真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边，它的路线依然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资产阶级得到了喘息时期。现在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喘息时期要比我们预料的长一些，尽管从历史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两三年或五——十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确，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某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稳定了。德国目前在这方面没有出现我们在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所看到的情形。不过，常规当中总是有许多例外的。就拿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日本来说吧，那里通货问题至今还具有紧迫的性质。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平衡刚刚恢复。当然，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稳定狂者”马上就说：瞧，资产阶级手里又有坚挺的货币了，通货已经稳定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路线错了，因此，资本主义多少比较永久地复兴了。而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会问一问，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方式稳定通货的，是靠牺牲哪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才稳定通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看到，比方说，在德国和法国，2/3的赋税负担完全落在劳动者的身上，因此，通货稳定是通过直接压榨工人阶级的血汗达到的。

但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应当估计到通货稳定的事实和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某种暂时稳固的结论。

我们也看到国际信贷的某些复兴。只要提一下，去年单是美国一个国家就向欧洲、亚洲和南美发放了为数12.5亿美元的贷款。可以看到国际信贷复兴的趋势，世界价格确立以及所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统一恢复的趋势，等等。美国摆脱了金融自我孤立的状态。在某些国家里出现了工业行情好转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不是瓦尔加的过错^①。欧洲已有几年不处在战争状态了。在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已局部地恢复了元气。正如瓦尔加正确地指出的，1924年秋，多年来第一次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形势同时有所好转。而与此同

^① 瓦尔加同志是从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工作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某些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现象。

时，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如波兰、匈牙利等，经济危机则仍在继续。

但是，从最近几周来发生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我们又一次看到资产阶级的状况在局部恶化。在美国又出现行情开始下降的最初征兆。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又出现萧条。英国的经济报刊纷纷指出中欧的稳定是极不稳固的，注定不会长久的。在法国，最近10年来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在其他国家里，也可以看到失业现象比去年有所增长。德国遭受煤炭工业的严重危机。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危机仍在继续。总之，有一系列的征兆说明稳定包含着许多巨大的动荡。

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在这个“荣幸的”稳定时期里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究竟怎样的问题。失业现象在增长。在英国，失业人数几乎达到二百万，在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在德国失业人数已接近一百万。严重的失业现象也笼罩着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国家，我已说过，这在法国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实际工资的降低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知道，战争及其后果几乎在所有国家里引起了一切日用品的涨价。这种物价上涨对工人是个打击，因为无产者的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英国，1924年7月的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170%，而在同年12月则是181%。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加以缩小的所有官方资料都证明，英国工人的工资在这段时期（1924年7月—11月）里降低了。

在1924年1月至6月的时期里，在英国每周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为560900英镑，而在1924年7月至12月的时期里，总数降到518350英镑。由此可见，企业主的口袋里除了先前的利润以外每周又增加了42000英镑。而在这个时期，一切食品的价格又上涨

了。

在法国巴黎，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360%，而在11月份则是396%，同时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提高。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533%，而在11月份则是583%。在这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在美国，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国家里，在6月份，最低生活指数相当于战前的171%，而在同年11月份则为181%。在1925年1月份，据最新的统计，大约为185%。在美国，在最近半年来工资没有提高，只有铁路员工的工资稍有增加，而在许多部门（特别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资降低了10—15%。在欧洲各地，甚至在美国，实际工资降低了。只有俄国例外，那里在有些工业部门中，工资已开始超过战前水平。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德国，目前最明显地表现出所谓的稳定。道威斯计划在这里暂时表现出它的正面作用。但毫无疑问，在德国矛盾很快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阶级斗争将重新沸腾。

世界信贷在恢复，货币在坚挺，贸易在发展。但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不可避免的过程：为争夺销售市场而斗争。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用不着多久我们就会看到矛盾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我们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某种稳定保持沉默和加以掩盖。我们不需要幻想。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真相。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喘息时期，这是事实。而我们面前依旧摆着一个问题：世界大战和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对资本主义是否是个致命的打击，是沉重的打击，还是只是一点轻伤？我们仍坚持以前的观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它之“恢复健康”只不过是暂时现象，表面现象。但资本主义

经济暂时“恢复健康”这一情况，我们毕竟必须加以正视。

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因素

在世界政治形势方面，可以确认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近九个月来。即使从纯粹表面上看，形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和平民主主义“时期”的光辉还充分地照耀着。但是，我们就是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着重强调，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一个插曲，只是历史发展曲折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世界政治前景。关于这一点，我想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在世界范围内，总的情景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可分十二点：

- 1、美国——英国。
- 2、日本。
- 3、东方问题。
- 4、苏联。
- 5、英国。
- 6、英国——法国。
- 7、德国。
- 8、巴尔干地区。
- 9、波兰。
- 10、意大利。
- 11、捷克斯洛伐克。
- 12、斯堪的纳维亚。

英美合作和对它的评价

我稍微详细地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英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讨论的中心点。你们想必记得，几个月以前，国际的右翼代表们试图对英美之间的接近作出极其夸大的解释并得出结论，一旦他们是正确的，就将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整个策略。很久以来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它看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而看自己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黑色的。这一点在评价英美相互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美国重新面向欧洲这一事实无疑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谁也不怀疑。它们之间的接近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尽管这种接近具有暂时的、临时的性质。象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硬说欧洲正在变成美国的自治领，那是严重夸大了事实。说美国只可能给整个欧洲以有限的一份，那是对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欧洲本身内部的矛盾估计不足。法国和英国之间无疑存在着矛盾。如果估计不到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那就可能犯错误，就会把我们的整个政治策略头足倒置。

近来，我们亲眼看到佩佩尔和拉狄克之间就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是佩佩尔同志，而决不是拉狄克。我们决不否认，美英之间的接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一点，即在帝国主义的美和帝国主义的英国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并正在激化。

目前，在英国和美国有着社会亲缘关系的政府，在英国的保守派政府和美国的现时政府之间存在着社会亲缘关系。如果从正确评价帝国主义矛盾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导致什么后果呢？

两国政府之间的社会亲缘关系与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是

不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呢？决不是。在战争初期，在1914年，在欧洲各国，政权掌握在那些在社会关系上也彼此相当亲近的政府手中。然而，这种亲缘关系并没有妨碍它们发动战争。美英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斗争、竞争仍在继续。这类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激化，尽管两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社会亲缘关系。

的确，美英合作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种合作在德国经济的巨大的实际后果上暂时地反映了出来。不过，英美之间的矛盾毕竟在增长。这些矛盾大致可以归结为十点，而其中每一点都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美英之间的接近不应加以夸大。这十点就是：

(1) 直接为争取世界霸权而斗争。世界债主现在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它们之间在这方面的斗争现在已经很激烈，将来还会更激烈。

(2) 加拿大。

(3) 澳大利亚。

(4) 墨西哥。

(5) 石油。

(6) 销售市场。

(7) 军备问题，军备方面的公开竞赛，目的是争夺海上霸权。

(8) 债务。

(9) 原料的进出口。

(10) 就是在道威斯计划的问题上也正反映了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存在着根本矛盾。

上面我已说过，这十点当中的每一点都足以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接近过程的同时也出现矛盾增长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看不到这个“细节”。我只举一个说明美

英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例子。我指的是加拿大。1913年，英国向加拿大投放的资本超过美国投放的资本的两倍。1923年，在这方面情况完全变了：美国在加拿大的资本至少和英国的资本相等，即25亿美元。这里应当指出，美国向加拿大投资的方式与英国投资的方式不同：美国把自己的资本直接投向加拿大的企业。这样一来，加拿大从英国的手中滑掉了。加拿大的美国化正在成为事实。加拿大的整个文化是美国式的。在加拿大，用来计算的不是英镑，而是美元。在加拿大，报刊、电影、戏剧、铁路、服饰等一切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美国式的。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加拿大可能逐渐变成北美中的一个州。目前，英国在竭力设法依靠在加拿大居住的二——三百万法国人，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所有英国人都早已美国化了。不久前，《泰晤士报》公开谈到即将失去加拿大的可能性。

不列颠帝国崩溃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伦敦《泰晤士报》今年2月2—6日期间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自治领和对外政策》。不列颠帝国的领导机构第一次公开地谈论威胁着统一的不列颠帝国存在的日益增长的危险。这里《泰晤士报》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未能召开一次帝国代表会议来弄清帝国各成员对日内瓦议定书的看法；这是由于自治领一般对任何代表会议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会议的结果可能会使他们承担对与爆发另一场战争有关的新的义务。《泰晤士报》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兴趣，整整几个星期来所有英国报纸都加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几段摘录：

“战后时期，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构成帝国全部威力的英国六个自治领怎样才能对敌视英国的列强采取统一的政策。这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因为它是同帝国本身存在的结局问题联系着的。如果不列颠帝国的这六个自治单位不能在自己的

对外政策上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单位之变为彼此独立的国家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们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而只能回答说：我们不得不同意统一的对外政策，不然帝国将注定瓦解。”

接着又说：

“在目前形势下，任何一场战争或者甚至一次战争的冒险都将是对帝国统一的极大危险。如果帝国一些单位的议会同意对国际形势的威胁采取统一态度，那么一切就好办了。而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取得一致呢？如果大不列颠帝国或者其中的某个自治领同某个大国发生冲突，那么帝国其他单位对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脱离帝国联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战争或者战争的冒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比我们一般预料的临近得多。”

下面是另一篇文章中的摘录：

“由此可见，帝国目前面临着长期的危险。一方面有可能，帝国由于缺乏统一将倾向于采取动摇不定的对外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将危及它的安全，同时也会增加爆发战争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可能，一旦帝国的成员面临抉择，或者参与它们也并不认为是正确的战争，或者破坏帝国的统一以避免战争中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会瓦解。”

英国资产阶级感到，自治领会从它的手中滑掉。在所有这十点当中，单是加拿大问题就足以表明，英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自治领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尖锐的、迫切的意义。

由此可见，确认英美之间的接近只是描绘了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矛盾在同时增长，逐渐具有越来越尖锐的性质。

此外，美国还企图利用欧洲某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目前无疑都是存在的，正确估计这些特征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

日本的现实孕育着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到东方问题来看，这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本正在兴起的运动有些方面很象俄国1905年的时期。示威游行、农民运动的普遍高涨、恐怖运动的高涨——你们想必记得有个日本的年轻大学生不久前因谋刺皇太子米遂而被枪决——这一切是日本运动的典型特点。但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比1905年时俄国的工人阶级要软弱一些。虽然它在数量上或许不比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少，但是在政治上比较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毕竟正在敲日本的大门。而这类革命在目前时代无疑会加速东方的解放运动，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临近。

第三，**东方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东方问题正在以我们过去所不能设想的速度成熟。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九个月当中，东方的事变发展得特别迅速。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和中国有着共同的战线。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的后果还难以估计。国民党，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我们的孙逸仙党的发展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埃及、荷属印度，运动到处在发展。

今天，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埃及白扎高尔巴沙议会解散的消息，这将给英埃关系带来新的麻烦。同志们，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临死前关于东方所说的话。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在晚年特别倾注于东方。他清楚地看到，东方有一支巨大的革命后备军，革命或许会改变自己的行进路线，将通过其他的门户到来。我在序言中指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西方无产

阶级,东方本身是无力的。只有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它还没有引导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使东方各民族的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分量。

我还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早在战前就谈到过东方问题。早在1911年,在中国爆发革命以后,列宁写了关于**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文章。当时许多人对这种对比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看到,这是富有预见性的。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确实是**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不应忘记,东方有着9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不应忘记以下这个事实的全部重大意义,这个为数众多的群众正开始投入运动。

我们回想一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俄国革命对东方的发展起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世界形势的总的图景,那么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不仅放在欧洲,而且放在东方。

说明当前政治形势的另一个因素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经济复兴问题。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苏联强大了,它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巩固了。首先是经济状况好转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大家记得,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荣幸地告诉我说: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金卢布,这样,我们可以用来恢复五金工业。现在,1000万对我们来说远远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你们记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反对派的朋友中有人多少比较坦率地说:等一等,到秋天“他们”(即指苏联政府)就会出现四亿赤字的,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中央就会受到怎样的夹攻。但结果怎么样呢?我不想泄露国家机密,说我们不仅没有4亿赤字,而相反,有相当一笔储备。(掌声)如果说1923年对外贸易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金卢布,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那么我认为,我提到的储备就更加明显地说明苏联的巩固了。

其次,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工人的工资近3个月来在

一系列部门中超过了战前的工资。这又一次证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逐渐好转。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目前是农民问题。这里说的是同农民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盟，当然是在我们政府保持它的社会内容的条件下。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敌人逐渐地对现状和解了，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协议、承认，等等。我不想因此说，我们已经不再受到任何威胁。在经济领域中将会有激烈的竞争。苏维埃共和国越巩固，世界资产阶级想要公然进攻我们的企图就越是不可避免。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的日益强大迫使资产阶级制定反对我们的进攻计划。

总之，如果我们注视一下世界政治形势，那么我们不应当被英美之间出现接近这一事实弄糊涂；我们不应当低估东方和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形势，我们共和国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向东方的桥梁。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个因素——英国的情况。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变化。我要事先指出，第二国际正在逐渐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德国转向英国。这是事实。随着第一个所谓工人政府即麦克唐纳政府的成立，第二国际的重心就转到了英国。同志们，我觉得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初期，即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心也可能逐渐地开始转向英国。

机会主义者们会问：照您看来，难道强大的、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害怕革命吗？表面看问题的人会被英国资本主义的活力所蒙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不可能不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的实力在三点上正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一点是自治领。每个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现在都知道，自治领正逐渐地在从英国的手中滑掉。第二点是工人运动革命化，最后第三点是东方。

保守派政府已经不可能为自由派政府所取代。目前，英国只

存在两派巨大的势力：保守党和工党。如果保守党不得不让位给另一政党，那么取代它的将不是自由党，而是工党。因此，英国工党的状况具有巨大的意义。工党之逐渐变化是个明显的事实。它的左翼的增长也同样是明显的。这些因素表明，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正处在火山口上。英国的情况并不显示出日益稳定的征兆，而相反，在不断地革命化。

第六点，英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也存在着矛盾。正在为争夺欧洲的霸权而斗争。两国目前都处于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某种依附地位，后者企图利用它们来互相对付，从而引起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同时也引起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冲突。在法国，形势丝毫不稳定。赫里欧政府在政治上已经日暮途穷。顺便说一下，我们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已经强调指出，民主和平主义的政府一方面将被资产阶级所推翻，另一方面本身将具有法西斯性质。赫里欧政府在我们看来是把法西斯因素注入由社会党人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典型例子。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它抛弃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内容。法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了。它的党成长了。在殖民地和农民中的工作刚刚开始。

其次是巴尔干地区。在一些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照我看来存在着三种革命因素：(1)农民运动；(2)民族运动；(3)工人运动。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在这里存在着。有时人们会反驳我们说，在这些国家里，斗争过于软弱了，反革命势力加强了。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教导我们，有时候，正是在反革命势力看来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革命就临近了；正是在这种时候，反革命可能会被革命所代替。至于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具有群众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南斯拉夫政府可能废除60—80个农民代表证，而这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

些事情不会不留下印迹，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只会加深。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在估计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时，不应被表面看到的東西所迷惑。表面上看来，反动派似乎强大得很。乍看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收拾了拉吉契运动。如果深入地看，那么必须承认，巴尔干国家的形势是动荡不定的，而决不象是稳定。

现在来谈谈德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党对道威斯计划的策略是正确的。国际赞同这一策略——尽管从一开始就清楚，即使有正确的策略，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要采取怎样的路线，以便向无产阶级表明，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目前，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这样的境地，即它还看不到道威斯计划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表现在工业的振兴、资本的流入、通货的稳定上。然而，协约国对德国的剥削仍在继续。将来矛盾势必会在新的基础上加剧。我们在报刊上公开地说过——看来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现在 1925 年，在德国不存在象 1923 年那样的直接革命形势。同志们，我担心这一论断会带来特别巨大的误解。毫无疑问，有些同志会说：“那就是说，没有明显的革命形势。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明确，不过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和德国党的整个策略是错误的。”

应当坦率地说出实际情况。幻想从来不会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既然德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就要指出和分析这一事实。但这自然决不等于说德国的阶级斗争停止了。德国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也决不会停止。最近的事变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在哈雷发生的警察袭击工人的事件就够了。请读一读《红旗报》是怎样报道由于哈雷事件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吧！我们看到，阶级斗争已上街头，经济罢工又快来到。可见，德国的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这已经不是战前时期爆发的阶级斗争，而是战后时期

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始终地和必然地带着内战的种子。另一方面，这已经不是 1923 年的那种斗争，而是 1925 年的、带着这一年的各种特点的斗争。

德国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惹人注目的。道威斯计划再过一段时期所产生的后果将是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而不是削弱，尽管斗争可能会延续整整几年。它将在新的基础上越来越尖锐化。

波兰的形势也象巴尔干地区一样。强大的农民运动，强大的少数民族运动（这部分地说也是农民运动），以及强大的工人运动。由此可见，在波兰，这三种因素也都在起作用。从表面上看，这里也可以认为是波兰资产阶级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不应忽视上述三个因素。

我还要就意大利的情况说两句。在那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受到抑止。几个星期前似乎墨索里尼已临末日。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但意大利的局势是动荡不定的，内部蕴藏着的决不是什么协调。

现在来谈谈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资产阶级的情况是这样：它找不到摆脱已经形成的困难的合法出路。联合政府正在四分五裂，越往后将越明显。这里也象在波兰和巴尔干地区一样，同样的那三种因素在相互起作用。诚然，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的运动在这里比在上述国家更软弱。然而，三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人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大得多。

至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幸福之邦”，那里的政权至今还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手里，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那里阶级斗争也在激化。安闲的田园生活已经结束。近来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挪威，不久前又在瑞典和丹麦看到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证明在斯堪的纳维亚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志们，我认为总的形势就是这样。与此同时，苏联的吸引力

在不断增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某个时期里，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里，这种吸引力曾经有所下降。目前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向苏联派遣人数众多的工会代表团的运动刚刚开始并无疑将会发展。是什么吸引着外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代表们到我们这里来的呢？是苏联开始在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能感觉。这些代表们大致是这样议论的：我们走的是与俄国不同的道路，我们是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我们落到了什么结果呢？在经济方面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诚然，俄国无产阶级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是流血和内战的道路，但是俄国工人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这种意识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现在开始觉醒，并将越来越加强。

总之，我们不应当把德国从全局中分离出来，在那里我们长期来似乎觉得革命很快就要爆发。我们应当分析整个世界的形势并作出切合实际的估计。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党，而不仅仅是俄国革命或德国革命的党。因此，我们的估计应当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形势。

因此，在总结时我们应当说：在某些战场上，斗争已不象 1923 年那样蓬勃了。如果说不存在停战，那么无论如何，同 1923 年相比，在某些战场上（德国）斗争暂时地减弱了。无论在西欧，无论在中欧，都不存在尖锐的革命形势。至于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它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东方向前推进得要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迅速得多。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增长，世界革命的思想在东方越来越普及。英国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认为的动荡不定得多。马克思曾经认为，没有英国参加的革命将是杯水风浪。如果把英国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作一对比并估计到拥有九亿人口的东方的逐渐觉醒，那么可以认为，阻止革命的因素和推动革命的因素大致上是相互平衡的。

同志们，由此可见，总的形势是这样：我们必须仍象过去一样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我们应当把我们未来的策略建筑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方针上，并根据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需

要加以区别,即估计到阶级斗争缓慢拖延的可能性,又估计到阶级斗争发展比较迅速的可能性。从我们的基本目标的观点来看,没有丝毫理由得出任何的悲观主义。

同志们,那些从错误地评价英美接近的事实中得出悲观结论的同志们,直接面临着开始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危险。他们常常投票赞成任何决议并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愿意了解,应当如何运用列宁主义,他们常常走上修正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的道路。

谁企图证明美英接近必然导致使欧洲变为美国的自治领并消除欧洲的内部矛盾,谁就是在重复早在1915年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问题所说的话。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引用引文,介绍你们读一读列宁在《反潮流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和他在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一书中与考茨基的论战。列宁仿佛事先预见到并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右翼拥护者们现在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只想引用上述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

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磨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①

同志们，现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反驳那些对英美接近估计过高的“预言家”，照他们看来，这种接近几乎必定会消除革命。

拉狄克硬说，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现在还没有过去。诚然，麦克唐纳已经下台，但是照拉狄克的意见，和平主义依然存在。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836—838页。

狄克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要没有直接的战争，拉狄克都认为是和平主义。然而，帝国主义需要战争之间的喘息；在喘息时期就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如果说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是没有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只是准备新战争的一种伪装。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非常明确。早在1922年12月，列宁就说过：

“拿目前的冲突（即使是极小的冲突）作例子来说明：由于英国两国在对土和约的某些细节上的争执，由于美日对任何太平洋问题的细小分歧，由于列强在殖民地问题、关税政策或一般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争执，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①

早在1922年底以前，当形势整个说来已经十分明朗的时候，列宁就是这样估计的。他认为，新的战争可能爆发，不仅由于英美之间的巨大矛盾，而且由于象关税问题或贸易政策这样的问题。整个“和平主义”帝国主义的性质正是这样。新的战争可能由于最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坚决驳斥想要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理论的哪怕最小心谨慎和改头换面的企图。

我再重复说一遍：总的形势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尽管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德国，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形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以前的策略至今仍然有效。

四、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近来在共产国际队伍里出现的一切重大分歧归根到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4页。

底是围绕着对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象纽博尔德、菲利浦斯、普莱斯、霍格伦、罗斯梅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民主主义“时期”的晚期牺牲品。

他们是怎样描绘形势的呢？他们的意见很简单，革命已经过去，世界形势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了。他们说：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五—六年内未能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做出许多成绩，那么也应当给麦克唐纳同样多的时间。听，这竟是共产党人说出来的话！霍格伦则把纽博尔德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这一事实看作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正确地对待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态度是最近九个月来我们全部策略的中心轴。有些同志克服了疑虑，而这些疑虑是他们曾经害怕公开说出来的；他们说，总的说来他们是同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但实际上一直把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看作是真正的时代，看作是漫长的时期，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们曾认为，由此可以得出或多或少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策略的必要性。纽博尔德和霍格伦成了这种幻想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更谨慎、更狡猾一些，他们暂时只向门内伸进一只手指。但是这只手指被狠狠夹住了，以致不敢再伸出其他的手指。

事实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是在这个著名的“时期”的长期性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无非是我们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预言的一个插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就等于是小资产阶级暂时掌权。事实上政权没有全部转到小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顶多只能称为民主和平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独立地掌握政权的。正因为如此，它不得不扮演大资产阶级手中的傀儡的角色。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的最出色的历史见证，在那里清楚地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作为

独立的力量管理国家的。

事实还教导我们什么呢？事实教导我们麦克唐纳违背自己的愿望替我们做了工作。在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执掌真正政权的意向在增长。人们常常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麦克唐纳政府实质上说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战后时期危机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新的和平主义“时期”的最初阶段呢？这样提出问题看来似乎是高度“辩证的”。我认为，麦克唐纳政府既是前者，又是后者。民主和平主义是早在1914年，即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那个不可分割的事变链条中的一环。

1924年的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插曲。我们不需要从哲学上来下定义。我们只要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这个时期是短暂的；（2）甚至以工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起独立的作用；（3）目前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最后（4）麦克唐纳政府及其“建设性社会主义”是替我们共产党人，替共产国际工作的。

对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与民主和平主义的性质问题联系着的。同志们，你们记得在我们队伍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是互相联系的。请看一看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选举吧！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在德国，广大选民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在英国，投了工党的票，在美国投了拉福列特党的票。无论是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都投了作为民主和平主义代表的那些党派的票，即使当时民主和平主义的星辰已经陨落了。“时期”虽然已经过去，而抱着各种幻想的落后居民阶层仍继续拥护民主和平主义的政策。我们不希望在共产党内笼罩着民主的幻想。但是在落后的群众中，这种幻想依旧存在。自然，我们过去应当、现在也应当同这些幻想作斗争。

在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里，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国家：一类是这个“时期”的主体，另一类是这个“时期”的客体。英国和法国是主体，德国是客体。顺便指出，一方面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党取得了成就，而另一方面我们德国党的处境困难，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的。在德国，也和在英国一样笼罩着和平主义的幻想。但是，培养这种和平主义的基础在德国和在英国不一样。当一个又饿又渴的垂死者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而有人激起了他的希望：他可以站起来并给他一口水或一片面包或一点牛奶，那么显然在这个人身上会产生希望和幻想。德国就处于这种状况。那时社会民主党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在作为“时期”主体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不可能向群众提出任何重大的建议和允诺，不可能向他们答应改善他们的状况，这样我们的共产党就能比较容易地取得成就。

回过头来谈谈法西斯主义。1924年，拉狄克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战胜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这里的“战胜”一词如何理解呢？例如，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战胜”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资产阶级把他杀害了，它在斗争中胜利了。这是一种战胜。在俄国80年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另一种战胜。我指的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家列夫·吉霍米罗夫。他也是“被战胜的”，他是怎么被战胜的呢？他自己转到了敌人方面，自己转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营垒里。李卜克内西是被德国资产阶级“战胜”的，吉霍米罗夫则是被俄国沙皇政府“战胜”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战胜”。社会民主党被资产阶级所“战胜”也正是这样，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自己成了叛徒，走上了吉霍米罗夫的道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拉狄克忽视了这件小事。他决定，由于社会民主党已被“战胜”，因此必须同它在政治上联合起来。这就是拉狄克所理解的“统一战线”理论。他忽略了一点，即社会民

主党是在自己成为资产阶级一翼的意义上被资产阶级“战胜”的。因此，包含着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资产阶级“第三”党的说法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是完全正确的。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两种倾向的综合体，社会民主党则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翼。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提纲和决议是正确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加强。广大群众的落后和阶级冲突发展速度的延缓今后将产生的结果仍是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加强。右派同志们中间有人认为，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加强，我们应该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价！我们的看法不同，并相信，既然资产阶级将在一段时期内得到加强，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会利用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一对孪生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痛斥过英国工人运动的卖身求荣的领袖。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么无情地批评和揭露英国工人的领袖。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应当这样做。

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四点：(1)巴尔马托夫丑闻、艾伯特审判案等等；(2)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霍尔蒂之间的协议；(3)第二国际执行局最后一次会议；(4)艾伯特、布兰亭和龚帕斯的葬礼。不久前，我读了胡斯曼写的悼念布兰亭的悼文。胡斯曼把以下一点算作是布兰亭的功绩：认为他尽管具有共和思想，但他是瑞典国王的老朋友和老同学。这不是说得太过了吗？胡斯曼又一次“埋葬”了布兰亭。

总之，拉狄克同志，社会民主党确实被资产阶级“战胜”了，被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信徒不同，社会民主党不是在斗争中倒下的，而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被战胜的：它通过自己的领袖们弃绝作为工人政党的身份，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翼。资产阶级的暂时加强也就等

于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加强。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灭亡。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阶级斗争证明这一点，内战的插曲教育我们这一点，实际生活和群众运动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五、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和英国工人运动

同志们！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之前，我想就工会运动说几句。

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否认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路线的正确性。诚然，共产国际右翼中的我们的反对者认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工会问题上的决议实质上说是同它的其他决议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是“偶然的”。共产国际是“偶然地”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立场。事变表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会决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总的策略。总之，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为某些兄弟党作出切实的指示。

同志们，流行最广的口号，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共产国际因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应当确认，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正确路线在实际贯彻中也包含着象统一战线的策略所包含的同样的两种危险性。这一点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看得特别明显，在其他国家则不大明显。

第一个危险是把这种策略当作一种小小的手法，似乎这里的全部问题归结为给社会民主党写封公开信，而其余的一切应当照常进行。另一个危险是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匆忙地、无条

件地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甚至在革命工会同样强大或者更为强大的地方也这样做。这是另一个极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听说有些同志居然认为，我们红色的革命工会越弱小，工会的统一就越容易达成。我们对策略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就应当为争取每个工人而斗争。与此同时，还应当继续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如果在同改良主义工会相比较我们的红色工会组织还是一股巨大力量的地方解散我们的工会，那就大错特错了。

英俄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最近关于它的筹备情况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看来，右翼阿姆斯特丹分子对英国人决定同俄国工会一起召开正式的代表会议一事感到有些激动。我们坚持以往的路线，今后将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我们不会陷入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极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将进行斗争，即使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也将进行斗争。

我们的整个工会运动是同英国工人运动中形成的环境相联系而历史地产生的。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新情况首先是在英国产生的。促使这些新思潮产生的原因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英国在世界市场上丧失了自己的垄断地位；（2）英国的殖民威力开始在动摇。这两个因素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趋势，尽管只是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但已经影响到英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3）阶级斗争在加剧；（4）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在下降。

由此可见，英国工会代表团不久前到俄国来并对我国革命表示好感，这一情况决不是偶然的。这决不能以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些代表们的个人品质，以他们是些好小伙子这一点来解释，这是同上述四个因素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流。我认为，麦克斯·贝尔说得对，他在总结最近一

段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时说，影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方面是“旧的古典的工联策略的破产，另一方面是工党的以往的斗争方式的破产”。的确，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旧的工联策略的破产也不是偶然的。问题不仅在于领袖们的缺点和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且在于英国丧失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它在自己的殖民地的影响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也促进了阶级斗争节奏的加剧并唤起英国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新生活。

因此也出现了工会少数派的运动，这个运动将具有巨大的前途。正是这个已经把60万工人团结在共产主义思想周围的运动（以及正式工会左翼的团结）最有力地促进了英俄合作的建立。

英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症结。目前这种样子的工党是难以为继的。但是，在今后几年当中，它是有前途的。它在农村也有希望。目前它只是一个城市的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它在城市工业地区得到了193个代表资格中的52个，在农村地区则只得到230个中的38个。我认为，今后我们将会看到工党内出现两种现象：一方面，它的因循守旧的上层在城市中的威望和影响会逐渐下降，并且很可能从少数派中，甚至从共产党中（多数是在工人中心和工业地区）涌现出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工党在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影响会有所增长。

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工党在上述地区的地位的加强客观上是进步的。不久前，奥托·鲍威尔在奥地利提出口号：“到农村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到农村去，他们不反对尝点“列宁主义”的甜头。他们说，列宁坚持同农民结成联盟是对的。当然，列宁对这个联盟的理解是跟奥托·鲍威尔有所不同的。我们知道鲍威尔式的“列宁主义”的价值。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假如它面向农村并开始给那里的保守派以打击，在农村居民中扎根，那么这在客观上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我们的工会运动是富有生气的运动，它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前途，正是因为它同英国工人运动内部发生的过程，同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发展的进步倾向有着活生生的有机联系。

多年来，恩格斯一直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通向英国工人运动广大群众的大门，因为当时客观形势对解决这个问题不利。列宁也曾寻求过这个钥匙。大家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加入工党的争论。这不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是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英国工人运动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即第一国际的时代是个谜，而且在第二国际的时代也是个谜。我觉得，第三国际有赖列宁而找到了这个钥匙。我们看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出现新的形势，那里使我们共产党变为群众性政党的前提很快就会形成。我们英国同志刚刚开始出版的星期日报纸的发行量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年轻的英国共产主义在向前迈进。它在前进，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客观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将通过这条道路争取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

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根据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估计，应当认为，这场运动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六、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我们党开始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形势就是这样。我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提纲拟定得相当详细，因此我只对它进行一些补充。

首先我想谈一谈“组织和政策”的问题。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

提纲公布后，许多同志把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解释为只是要求以生产支部为基础从组织上改组党。现在向大家提出的提纲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思想：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任务在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不能把组织和政策相互对立起来。没有正确的组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正如没有正确的政策，好的组织也一文不值一样。我再说一遍，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之点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对待诸如工会问题、农民问题、殖民地问题、在青年和妇女中的工作问题，等等。然而，不应忽视组织的意义，忽视以生产支部为基础进行改组的意义。对此我要向大家提出警告，**因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必须有正确的组织。**

不久前召开的组织问题代表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交给了我一些材料，其中令我注目的是2月15日《人民权利报》上的一篇短评，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角度来看，从组织上改组的意义来说是有巨大实践意义的。我指的是捷克中部一家糖厂的工人、生产支部成员的来信。这位工人写道：

“当决定着手组织生产支部时，我召集了3个同志并在午间休息时跟他们讨论了支部的大致任务。然后我们决定，在最近3天内我们每人都应吸收一个新同志加入支部。这样我们就有8个人了。

在我们工厂里工作的共有160人，其中32人已经加入支部。但这还是不多。于是我们决定，在1月底以前的这段时期里，每个党支部成员必须再吸收一名他可以担保的人。我们选举了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支部全体大会的建议。6位同志受托在加入其他党和工会的党员和会员中散发我们党和工会的报纸，以便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报纸是怎样撒谎的。四个同志受托到月底前制定愿意订阅我们报纸的人员名单。目前，我们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出版第一期墙报。

生产支部的工作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因为同志们已经习惯于旧的组织形式了，但是生产支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把所有人都吸引到工作中来，还因为支部本身始终都在工作，而且每个成员都对在支部监督下完成的某项党的工作负责。”

同志们，你们看，这里说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捷克中部的这位工人所告诉我们的毕竟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应当这样来进行活动。问题不在于起草冗长的提纲，而在于从最简单的事物着手——按这位工人的作法——，开始时吸收四位同志，然后再吸收四位，然后再在他们中间分配工作。这就是实际组织工作中的列宁主义。

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1902年写的一封信，当时我们的运动还很年轻。在这封信里包含着组织大纲。20多年前，当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刚刚开始时，列宁向俄国工人推荐的正是这一点。但现在工人们根据自己的首倡精神，在工人运动已经存在多年的其他国家里，在更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在另一种形势下进行着工作。在组织问题上我们正应当这样做，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应当对工人们说，我们不需要只能适应隆重场合的共产党员，不需要为节日游行用的共产党员。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当竭力把新的同志、普通工人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改组工作不可能机械地进行。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会遇到一系列障碍，一方面是以工人们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纯客观性质的障碍。在贯彻和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我们应当把工作重心移到生产支部上去。最好的提纲也是一文不值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组织把这些提纲带到群众中去并使这些提纲明白易懂的话。除了贯彻正确的政策以外，我们还应当学会建立正确的组织。

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什么呢？首要的一件事是永远不要忘记一句明智的谚语：“活到老，学到老。”在运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上，这就意味着：“活到老，布尔什维克化到老，学习列宁主义到老。”以为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可以规定一定的期限来达到它，那是自我欺骗。有才智的人们、党、工人运动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不应忽视，机械地把俄国经验搬到其他国家去之所以不可能，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也在按自己的方式吸取“十月的教训”。这一点不应忘记。在俄国革命后，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将象我国的革命一样地来进行。现在我们大家都已明白，它们进行革命将跟俄国有所不同。不要忘记，资产阶级也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了教训。比方说，过去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也将有自己的克伦斯基时期。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他国家未必有这种形式的克伦斯基时期。回想一下不久前汉堡或烈韦里发生的内战插曲吧。它们证明，这些国家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我国的克伦斯基时期。

布尔什维克化就在于学会从俄国的经验中，同样地，也从其他国家的斗争经验中吸取最本质的教训，把它们同某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要求结合起来。首先我们应当估计到该国家的社会构成和阶级划分。日前找到了一份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同志的手稿，这份手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初稿。其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它规定了以下的一项区别原则：在确定不同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时，首先必须估计到这些国家社会构成的特点。应当知道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百分比，在小资产阶级内部还分哪些阶层，等等。列宁举例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51%，小资产阶级占40%，而资本家占9%；在另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20%，小资产阶级占75%，而资本家占

5%。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再注意一下，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中阶层划分的情况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在上述第二个例子中，30%是贫农，30%是中农，15%是富农，那就还必须更加确切地明确这种或那种形势的特点。如果说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社会构成大致跟俄国革命发展的基础相适应，那么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则是无产阶级占明显优势的国家，比方说象德国那样。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首先必须进行起码的社会分析。迄今为止，我们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学会了做这项准备工作。例如，我们曾以为，美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条件相同。永远不应忘记，正确政策的前提是学会区别和估计这个或那个环境的特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性质。

我应当惭愧地说，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领袖”，当有人问他：你们国家有多少农民，他困惑地回答：我不能确切地告诉您这一点。我说的这位同志还是出生于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从工会反对派中加入党的。瞧，对于这样一个起码的同时也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竟不能加以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任何提纲在这里都无济于事。这样的人不配称为布尔什维克。让他们先学一学自己国家的社会统计，不然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百思不解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社会构成和力量对比的数字，那你们就不要装成布尔什维克。你们顶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勇敢的战士，但是根本谈不上领导革命，谈不上争取农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地说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目前时期，即世界革命速度延缓时期的具体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在今年1月通过的我们兄弟的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有一个精辟的地方，我给大家念一下。那里说：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里,每个共产党人应当意识到对每个行动、每个言论所负的全部责任。对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批判分析要有具体性、正确性和尖锐性,要有大无畏精神、强烈的仇恨和明智的冷静;对一切具有不同思想的工人们要耐心和极大的耐心;要有组织才能,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收到工会中来,以便加强共产党人的影响;要善于简单明确地,符合实际地,书面地解释所发生的情况,克服各种行会庸俗习气——这就是党在这样的时期里向每个党员提出的要求。”

我认为这段表述是很好的。目前,所有这些品质确实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当列宁写《怎么办?》这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圣经”、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基础的书时,俄国工人运动正处在发展的幼年时期。当时列宁就包罗了全部任务的内容,指出我们既应当为争取增加每个戈比的工资而斗争,也应当为争取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斗争。除了细小的日常的工作以外,还要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它既包括为细小的改革而进行的斗争,也包括准备工作、选择时机和实行武装起义以及巩固工人阶级业已夺得的政权。

同志们,应当确认,目前我们的许多党正处在研究战前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在1917年后取得的经验仍旧是全世界各党的真正宝库。然而,我们有些党现在正进入这样的斗争和发展时期,即掌握1917年前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策略和组织原则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无论在工会领域里,还是在农民和殖民地工作领域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我觉得在农村中开始进行工作是特别重要的事。然而,应当把自发的农民运动同在农村中的有计划的工作、共产主义的首倡精神区别开来。自发的农民运动在各国都有,而且往往是不通过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工作而产生的。也有相

反的情形；有些国家已经有了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萌芽，但还没有自发的农民运动。共产国际对这些争取农民群众的初步尝试寄予很大的希望。应当说，坚冰终究会打碎的。我们正在从言论走向行动。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法国共产党的一些农民代表会议。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共产党也正在进行这类事先的准备工作。还应当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看到为在农民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尝试。

现在，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去访问农村。他们坐着载货车去郊区农村，在那里散发党的出版物，同农民一起开会，等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也这样做过。在1917年前，俄国共产党曾是“城市的”党。只有在1917年，她才深入到农村去。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工人们派代表团到农村去；他们到那里去的费用是通过在自己的企业中募捐的办法得到的。

既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概括这项工作的口号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理解和解释的“工农政府”就是这样的口号。在还没有实行这一口号的地方，现在就应当通过广泛宣传的办法提出来。只是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使这一口号威信扫地而加以拒绝，这是错误的。这一情况决不说明要反对这个口号，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企图使我们的所有口号都威信扫地。布兰德勒未曾把一个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却使这个口号威信扫地——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则除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外，要竭力使这一口号普及并用革命的精神来加以解释。

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策略不仅同布尔什维克化不矛盾，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策略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首先是群众工作者。但是要成为一个

群众工作者，必须持续不断地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其中也包括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保持联系。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正确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当英国发生巨大的社会变动时，当一个又一个的工会把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入讨论的议题时，在这样的时期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应当是毫不含糊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式的。

再简短地来谈一谈关于各党在对工人斗争实行日常领导时必然提出的局部要求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化范畴的。

不要以为似乎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时期；我们清楚地懂得，革命发展延缓的时期决不会促进改革的进行。以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速度延缓和阶级斗争不甚尖锐就等于改革的繁荣，那是根本错误的。

这样的时期不是有利于改革，而是有利于改良主义。我们这里现在开始出现“右倾病”。相反，我们不会看到什么重大的改革。

难道你们认为我们可以从现时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改革吗？我并不这样认为。但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应当根据这一点放弃提出局部的要求。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当斗争减弱时，改良主义的幻想就增长了，但决不是真正改革的繁荣。而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局部的要求。正是在目前这样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实行正确的、合理的、有计划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局部要求的策略，然而不离开革命斗争的格局，不是用改良主义的清水来稀释布尔什维克化。我们应当始终如一地把普通工人从日常的细小问题提高到时代的大问题的水平上来。我们应当清楚地向他们证明，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使他们相信：通过细小的要求是不可能摆脱贫困处境的。因此，正是在目前的时期里局部要求是我们策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七、共产国际内“右倾病”的危险性

我事先预料到，在我们公开承认德国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后，结果必然会出现对我们真正看法的各种曲解和歪曲。右的倾向将会增长。对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些“共产党人”曾经认为，革命必定会在两三年内发生；如果在最近时期内没有发生，那么最好还是到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去！这些英雄们现在会对我们说：瞧，我们是正确的。“极左派”就会转向右派，正象博尔迪加同志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

博尔迪加同志的情况是说明我上面所说的情形的极有教益的例子。同志们，请读一读博尔迪加现在写的东西，研究一下他的“世界观”，考虑一下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转变的。转变的根源是博尔迪加不能理解共产党在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时期里的作用，是他不能理解日常的、细小的、同时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在这个时期里的意义，是他不善于找到统一战线策略、局部要求等等在我们伟大的通向最终目标的整个活动中的联系。这就是他从极左派跳到右派的原因所在（但愿这毕竟是暂时的，但愿他还会回到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更危险的右派，他们现在建议我们急剧转弯并实行“新的”策略。上面我已引用了可以作为正确理解布尔什维克化的典范的一个文件。现在我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生活中引用一下完全另一种见解，以表明不应这样来理解布尔什维克化。我要申明一下，我引用这段引文决不是想事先确定将在这里向我们提出自己报告的捷克委员会的决议。我既不想涉及捷克共产党内在组织路线上进行的斗争，也不想涉及关于中央委员会人员问题以及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

值得称赞的是，布隆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了捷克共产党内意见分歧的刊印的提纲。那里有许多毫无意义的东西，有许多关于私人磨擦等的细枝末节，这一点将在另外的地方来谈。总之，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斗争的结局如何，我想向你们表明，迄今为止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布隆的同志们在备忘录的前言中指出，布隆在第二国际中还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不打算对布隆工人革命过去提出怀疑，但我只想说明一点，布隆的同志们应当把自己领导人中间的某些人送到列宁主义的学校去学习，然后再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当领导人。在这份提纲中有一章叫《革命方针》，那里把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同革命完全混淆起来。

那里这样说：

“例如，所谓的左派要求我们在布隆，在我们只能以二百名工人对抗大批警察队伍的地方也要投入冲突，并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不考虑这将会使我们付出血的代价。”

接着我们可以读到：

“在所谓的左派同志们中有人认为，我们应当不断地‘进行革命’。

我们则认为，共产党的任务不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发动革命，而仅仅在于正确地利用现有的革命运动并将它进行到底。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在我们这里远未贯彻，而十分重要的是，捷克共产党现在的中央对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迟迟未能清楚理解。派鼓动宣传员带着发动日新月异的革命的指令到工人们那里去，这种做法是属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幻想家政策领域的，其程度不亚于认为某个时代的革命性似乎可以根据饥饿者示威游行期间被打碎的窗玻璃多少来加以判断的幼稚观念。在反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期间，根据中央的命令去砸烂店铺是同饥饿群众根据上层领导的告诫去砸烂店铺截然不同的。前

者会由于浪漫行为而作出巨大牺牲，而后者则是革命时代的真实征兆。”

没有什么好说的，妙极啦！不过我不了解，砸碎玻璃竟是“富于牺牲的浪漫行为”。

同志们，这里应当坦率地说：社会民主党对每句话都是会竖起长长的驴耳朵来的。请考虑一下，人们竟要求可怜的布隆人日甚一日地“进行革命”，而且是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要去砸碎玻璃。这真是无法让我们对布隆工人们有这样一批聪明人而表示祝贺。在这些作品的前言中，我们还听到一种抱怨，强迫布隆工人们派只是由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说什么抱着“有意事先取消”理论家的隐秘愿望。那里还表示担心，被派去的工人能不能以必要的明确性和充足的理论根据向共产国际叙述必要的一切。根据这一点，我们有幸接到上述带有出色“理论”见解的备忘录。（笑声。）

老实说，我是坚定不移地宁愿同按照提纲作者的意见那些没有理论素养来同我们进行讨论的布隆工人们交谈，而不愿同撰写这些作品的“理论家们”交谈。假如他们对此有所耳闻，那么他们会对只是谈论浪漫行为而感到不满的，而他们想必会说，那就该转到社会民主党那里去吧！（笑声。）

同志们，我们应当事先预见到这种“转变”，并立即给予这些同志以反击。的确，在西欧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应当放弃布尔什维主义，向社会民主党作出让步，在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和革命之间划上等号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处于困难的时期，有人无法应付，有人疲惫不堪，而社会民主党正在抬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需要实行有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自己的路线，我们特别需要成为毫不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让布隆工人们牢牢记住这一点吧！

同志们，我们现在为各党制定的道路决不会导致延缓布尔什维克化的速度，相反，它意味着加速我们各兄弟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会从困难的、成效较少的形势下看到自己的真正性质。列宁同志曾经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一旦革命重新走向高潮，特别是取得胜利，一批又一批革命者队伍就会涌向我们。1920年，当德国出现革命形势时，我们在这个大厅里见到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先生。一旦革命取得胜利，会有许多人，甚至资产阶级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资产阶级军官加入红军，等等。当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时情况常常是这样。正是在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目前比较沉寂的时期，重要的是使它们具有列宁主义的精神。

我还想简短地谈一谈党的领导人问题。诚然，在党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提出挑选领导人的问题，有时是很微妙的事情。但事情不在于问题的主观方面，不在于对个人的评价上，而在于客观地对待问题的态度上，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上的整整一章。

在布隆的创作成果中，有这样一个地方：

“为了取得胜利，或许不仅需要将军的斗争意志，而且首先需要群众的斗争意志。”

这是伟大的发明，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理！遗憾的倒是，我们无幸在这里见到这些布隆的“理论家”，我们因此受到莫大损失。

不过现在不要开玩笑。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有两篇在一定意义上说很有意思的文章，可惜至今还没有刊登出来。一篇是塔尔海默写的，另一篇是克雷比赫写的。说实在的，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两篇文章都是否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其中一位作者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说他绝对同意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同时他忘记了一件真正的小事：上面所说的他的文章则是直

接反对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我不来全面地谈论这些文章，我只想对其中讲到领导问题的那部分来谈一谈。

两篇文章的作者把挑选领袖象挑选“没有写满字的白纸”一样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归咎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用他们的话说，许多旧的领导人被解除了党组织的领导，由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没有写满字的白纸”的新手来代替。新手们只会听莫斯科的意见行事，只会照他们的命令办事，准备在他们提示的所有文件上签字。同志们，你们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十分恶毒的攻击。这种论战毫无原则性，但它毒化了政治空气。

我们应当在这里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请问，上层领导不更新，不经常地从新的阶层中吸收新鲜的力量来加以更新，这种情况难道能够想象吗？我要回答说，不能想象。那些硬说我们不善于重视富有政治经验的旧领袖的人究竟对不对呢？丝毫不能认为他们是对的。丝毫不能！我们所有的政党几乎都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俄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918年它一直叫社会民主工党。我们也曾加入第二国际。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民主党人一夜之间是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领袖都经过或多或少长期发展的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社会民主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同志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他们的长处往往在于他们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会说，必须抛弃旧的领袖。相反，每个持客观态度的观察者都应当承认，我们对旧的领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例如，在法国党内，我们力所能及地来使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每当我们得以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始终感到高兴。我们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是否应该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比较老的工作人员——我也把自己列在其中——就应当十分挑剔，以致一切都亲自去做，让青年人等待着。决不是。但也不应对年轻领袖阿谀奉承。我们坦率地

说，他们在政治上有许多缺点，他们需要自我完善和进行学习。我们始终对他们说：“要使自己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自我修养。”年轻人是理解我们的。我们需要某种合金，即老一辈的优秀代表同战后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辈的有才华的代表的有机结合。我们无论如何需要这种结合。但是，不是任何一块锈铁都可以用来合金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会同意。列宁同志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人一过五十岁，就必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超过50岁的领袖，就得归档了。我们有时同意他的看法，但要求对他本人例外。然而，很可能在许多场合还要例外。但愿事情如此。如若有人停滞不前，以致视而不见新时代的清新气流，那就让他靠边站吧！但是党的上层领导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以便实现新老两辈代表的党的领导。

“白纸”论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在我们这里挑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取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情绪和专横。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更换领袖的原因要深邃得多。这还是在共产国际诞生之时就出现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这一情况造成了本身的后果。即使从许多同志不得不同过去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进行斗争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让那些教训我们要怜惜旧领袖的人，自己去领受这些教训吧！决不能责备我们对老的工作人员缺乏耐心。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党、法国党、德国党、意大利党以及所有我们的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极其广泛地表现了耐心。如果说我们应当受到某种责备，那么决不是轻率地抛弃老的党员同志。正如责备我们把领导权交给那些准备在交给他们的任何文件上签字的人一样，都是不公正的和完全不应该的。

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工人群众面前提出领导干部的问题。列宁同志是从来不怕公开提出问题的。同时他还教

导我们，没有自觉地奔向一定的目标、充满坚定不移的意志、遵守纪律的领导干部，就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直到1917年，在第二国际各国，人们都谴责列宁的独裁者心理。这是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相当一部分人谴责列宁的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大家都向他叫嚷：“你是独裁者，你想要有忠顺的臣民，你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组织的意志之上。”那时候，列宁还没有被公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也参与了这些叫嚣。而我们知道，没有集中制的、有纪律的领导，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

在目前时期——革命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这一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适用。同志们，因此我们丝毫也不担心提出这个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问题从来不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犯了罪，因此把你打入七层地狱。我们这样说：如果你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将同你进行斗争，直到你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常常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我们希望同志们受屈辱，要求他们悔过：“我犯了罪”。我们从不这样要求。克雷比赫在自己的文章中问道：要求犯了错误的人自我侮辱，这是什么习俗啊？他的责备实在是荒谬已极。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根本谈不上自我侮辱。谁也不曾这样提出过问题。

在我们关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中，有些地方强调了党内民主的必要性。然而，我们需要这种党内民主不是为了机会主义者，不是为了那些要求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批评自由”的人。我们将把这些人当作公然的敌人而与之进行斗争。我们要求批评自由是为了同我们一起在探索革命真理的事业上共同前进的所有同志。

在我为青年而写的文章中，如果我没有记错，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认为其中有新的理论。人们认为我们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借用领导人。看来，旧的领袖中有人会自问：“难道我也要

加入共青团吗？”(笑声。)我们对共青团给以充分的重视。它作出了巨大的功绩，某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党教育青年，而不是相反。党应该帮助青年布尔什维克化。总之，请那些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为党“挑选”领袖的人放心吧！

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是把布尔什维克化的整个问题放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哪些新的结论，这一点我们已在我们的提纲中说得非常详细了。

我不得不认为，不是所有同志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手头有一份法国同志的声明，他常常开玩笑地把自己称为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沙尔·拉波波特。这里说的是他在最近召开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1月19日的《人道报》是这样报道这段话的：

“拉波波特同志说，许多同志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所在。”报纸补充说：“他表示遗憾：现在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拉波波特表示遗憾的是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总之，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想用列宁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不久前，我们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嘴里也听到同样的话。阿德勒说，在共产国际内，越来越少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而越来越多地谈论列宁主义的倾向正在加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这证明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当阿德勒讲述这类故事时，我们并不激动。但当我们自己的同志也这样做时，那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然而，应当公开承认，在我们俄国也有个别一

些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与沙尔·拉波波特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意见。

我认为,对于扩大全会来说,问题在哪里是清楚的。全会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强调列宁的意义。没有马克思,不能设想有列宁。列宁是马克思的学生。列宁主义也就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不受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并开始玷污它的旗帜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活着,因此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应当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说了。今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我们都将贯彻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算抛弃第一国际的光荣传统,甚至第二国际的许多确实宝贵的传统。决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法国共产党人不知道比方说盖得和拉法格,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只知道普列汉诺夫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列宁的学生,或者说,一个德国共产党人忘记了社会民主党在其活动的早期、革命时期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决不认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比现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逊色。我们也十分珍惜老的波兰民主党革命传统中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把它看作是极宝贵的历史遗产。关于“斯巴达克”联盟也应当这样说。但是,如果认为所有斯巴达克派都是现成的领袖,连问一问他们对“萨克森”政策或1923年十月事件怎么看都是不应该的,那就根本错了。同志们,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根据旧的执照给所有斯巴达克派提供分类卡。但无论任何人也都不应该夸耀说:“谢天谢地,我们不是斯巴达克派。”我们会对德国左派独立党人为我们办的好事作出评价的。左派独立党人把群众送到我们党里来。(座位上发出喊声:“完全正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通过一系列危机才能办到。我们应当学习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把“斯巴达克”联盟和左派

独立党人曾经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东西结合起来。

每一个年轻的工人应当明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成长壮大的，这些前辈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共产国际不是突然出世的。它是站立在以前几代革命家所建筑的地基上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学生列宁仔细地研究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并教育新的一代要尊重为共产国际奠定基础的那些人的历史功绩。列宁始终不渝地向我们指出我们前辈人进行斗争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共产主义不是从1919年，不是从共产国际成立时才开始，它有一段较早的、光荣的和内容丰富的历史。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研究它，而我们这里往往忽视这种了解和研究。在这方面，革命发展速度延缓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历史赐给我们的喘息时期。喘息时期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深入的学习，尽管目前监狱成了我们的大学。但是，通过短训班、党校、小组等等进行的有计划的学习目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不仅是为了更加完善地建立我们的组织，而且是为了学习，进行自我修养，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来使自己造就成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列宁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之一。

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同志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系列令人不很愉快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我们应当承认，关于革命期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重新审查。我们过去有时以月来计算，现在我们不得不以年来计算了。

我们必须明确地说，在有些国家里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应当明白，我们正进入使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长期而顽强工作的阶段。对于我们各个党来说，列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面临着反对右倾危险的严重斗争。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也是在反右倾斗争中产生的。今后它仍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当然也反对极左派，反对有些地方开始威胁着我们的颓废现象。只要指出布隆的例子就够了。可能在其他国家里也会出现这类现象。这在目前由于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是应当预料得到的。在我们许多党内，多数群众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转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个情况及其后果现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73%的党员过去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我想，德国党内的百分比也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党内，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是，我们正在击败社会民主党，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我们今后还要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过来。但单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还是不够的。应当对这些工人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速度延缓了。但是不应当从这一事实中为我们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为我们思想上的惰性寻找辩护或解释的理由，为还没有根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寻找辩护的理由。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工人们是些优秀的无产者。而布隆的工人们大概99%是忠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但那些实际上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把砸窗玻璃和革命混为一谈的人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应当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砸烂”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两块窗玻璃”，那我们是很乐于这样做的。

同志们，最后我还应当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总的说来仍像过去一样是忠于我们的事业的，我们自己也仍像过去一样，适应新的形势，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这远不是机会主义。通向胜利的道路还很遥远。世界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过去我们曾以为，再过五年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但我们一上路，就很快明白，这条路要比

我们原来想象的坎坷和艰难得多。我们必须排除乱石、铲除树桩，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有时需要退却，以便作新的跳跃。我们相信，我们面前还有更大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好吧，那就去克服吧！而道路的方向仍象过去一样，我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也象我们的伟大目标不可动摇一样。我们一定能够排除横在我们道路上的乱石和树桩，我们一定能够为自己扫清道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使我们的整个斗争充满深刻涵义和美好内容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4月6日）速记记录》，1925年俄文版第33—80页。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 和俄共(布)的任务(摘录)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总结*

(1925年4月)

一、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

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的平行现象

同志们!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你们就会相信,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几乎每次都是与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同时出现的。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存在着某种平行现象。大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前夕写的文章。他当时谈到共产国际正在凯歌行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而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我国革命也迅速取得成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遇上我们向华沙进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召开的,而我们党制定的策略给它的决议留下了深刻烙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总结时召开的,我们的国际政策又

* 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苏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总结的报告全文,并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原编者注

同俄国共产党的政策结合了起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内的争论进行了一定的总结。而我们的党内危机每一次又都是与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某种危机或半危机同时出现。

目前,我们又看到类似的平行现象。不久前结束的、按实质说具有代表大会意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形势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回想一下共产国际正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最初胜利的进程中诞生和壮大的,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只占地球的1/6,那么在共产国际中俄国革命的比重无疑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需加以说明。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不仅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对于领导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国际和它的基地

在第二国际和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类平行现象。资产阶级上升时,第二国际也上升。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时,第二国际也稳定。很难说,第二国际现在同哪个国家联系最密切,而哪个国家最能体现它的政策。在麦克唐纳执政的时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而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中心。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并导致工联与苏联工会接近的急剧向左转,无疑标志着第二国际在英国的作用的削弱。现在已经不能说,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代表,英国工人运动是它的基地。

如果这里需要证明的话,那么最近一些日子提供的证据是很多很多的。在不久前召开的独立工党代表会议,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党左翼的麦克唐纳党的代表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使麦克唐纳简直要垮台的地步。单就强加于共产国际的伪造的所谓“季诺

维也夫的信”这一轰动事件所进行的投票表决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表征意义。作为该党领袖和领导人的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少数，261票赞成，286票反对。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英国最大的报纸《晨邮报》最近几天来预言将由麦克唐纳和托马斯来成立不要共产党人的新的工党。报纸这样嘲弄他们，说工党受独立工党的控制，而独立工党实际上受一批公开或非公开加入该党的共产党人控制，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只有一条出路：成立新党。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会弄到象《晨邮报》预言的那样成立新党的地步，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在谈论这件事，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前，在复活节时，麦克唐纳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来对抗英苏工会的接近。他提出英德接近的思想，理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毕竟还在德国。

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执委会今后应在哪里开会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争论。这场争论充满着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最后投票表决，只以两票的多数赞成德国。诚然，在这里表述方式也是温和的：在通过的决议中只是说第二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地点迁往“说德语的”国家。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迁往德国。单是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英国现在不是第二国际的主要国家，伦敦已不象莫斯科代表第三国际那样代表第二国际了。很可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不得不重新认为德国是第二国际的国家。

敌人怎样改变我们的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路线。同志们，大家知道，执委会上次全会相当清楚地确认自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921年以来已经多少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来的形势。就是说，全会表述了我们对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态度并指出资本主义处于局部稳定的状况。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决议和说法即

使不是出乎意料的，也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决议和说法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必须这样说，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从幻想和自我欺骗中得到过好处。在1923年，当德国革命形势尖锐化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影响孤注一掷，那时是正确的；随后，它等待了一年——一年半，正如我们1905年时在俄国等待一样，指望直接革命的形势迅速恢复起来，那时也是正确的。

当1925年，在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运动得出结论说，1923年时德国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而目前则不具备这样的形势，那也同样是正确的。我不打算重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作的报告。我也不打算引用关于世界经济的一些数字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分析，以便弄清某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结合的程度。我想一些基本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只说一点，不出所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赞同，并被“广义地”解释为：世界革命已从日程上取消，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消失。敌人营垒进行了一点“小小的”伪造。我们说的是局部稳定，他们把“局部”一词省略了。我们说的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他们把“直接”一词勾掉了。这样一来，结果是没有任何革命形势，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结合，全面稳定。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

经济稳定的限界。法国的例子

自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来还只有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然而已经有几件重要事实，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具体地来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思想，有可能来说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限界和程度。只过了两三个星期，法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我将简略地谈一谈这些事件。

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限界，我们最好拿法国来作实例。而要

判断政治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根据最近几天来保加利亚和德国向我们提供的例子。

近日来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危机的结局对于左翼集团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赫里欧和本列韦只是调换了职位。我们知道，法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传统的国家，因此这类危机在那里是非常之多的。但是，目前政府危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杯水中的风浪，不是通常的议会计谋引起的，而具有深刻的经济内幕。它与其他危机不同，是由于经济中枢、经济裂痕而出现的。左翼集团的矛盾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来详细地谈论了。在现时的法国，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直接发生议会政府危机的呢？是由于金融政策问题。法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失业现象，近年来大工业有所发展。然而，目前她也陷于严重的经济绝境。情况已经到了所谓通货膨胀的地步，必须靠滥发纸币的办法来挽救局面。这对资产阶级的安宁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立即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力量的重新配置。为什么呢？因为一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法国资产阶级就想到1923年德国的情景，在它的脑海中就浮现出1923年德国的具有许多明显革命特征的危机的幽灵。要知道，德国1923年的情况是：金融崩溃、经济萧条、大量发行纸币、失业、通货膨胀，等等。我们看到，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战胜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而且恰恰是由于经济裂痕而引起的，使全国笼罩着金融危机的阴影。

目前法国的局势虽已有了出路。但是不应忘记，法国现在有240亿赤字。诚然，她目前还勉强能够“摆脱”，她试图以发行40亿法郎的纸币来弥补这一亏空（这也是引起政府危机的缘由），但是毕竟还留下200亿赤字。如果说每40亿就要发生政府危机，那么这笔赤字足够发生五次这样的危机，而且每次危机无疑会越来越

加剧,越来越尖锐。我再重复说一遍,法国发生的情况是很具有表征意义的。而法国是战胜国,是富裕国家,并不受协约国的制约,并不是凡尔赛和约的客体,而是它的主体。因此在法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里只有某种“稳定”,但是你们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经济方面这种稳定的限界。当然,形势不会在几个星期内,也不会几个月内最终弄清,但是稳定的限界由于目前日趋成熟的经济危机而十分明显。

政治稳定的限界。保加利亚和德国的例子

现在来谈一谈政治方面的稳定。我觉得,保加利亚、特别是德国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目前政治稳定的限界的明确观念。

我们不知道,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最后怎样结束,但是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保加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企图掐住“本国”工农的喉咙,而且有可能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关于这一点,国际舆论界已有所议论。诚然,武装冲突没有发生,但已经接近于此。记得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形势的人都知道,巴尔干是充满能够引起世界大战的武装冲突的极大可能性的地区。而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形势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是安宁的。

现在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企图(诚然,这些企图最近几天来有所减弱)把索菲亚发生的事件归咎于我们,归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这迫使谴责者不得不步步退却。在最初的日子里,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方向盘》打破了记录,硬说“他们”即布尔什维克故意地在共产国际扩大会议上制造稳定,为的是转移视线,安抚国际资产阶级,而本身却在这时准备在索菲亚制造爆炸。不言而喻,这种谎言

是没有人相信的。爆炸事件是保加利亚，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全部问题在于，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不可能违背绝大多数工农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结束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在政治方面，巴尔干地区的形势表明，那里发生的斗争几乎直接提出了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眼下正在酝酿可能引起全世界反响的事件。目前发生的事件可能导致象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导致这个国家里内战的加剧。

德国和兴登堡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选举兴登堡当德国的总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要先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党内的情况。德国的第二轮选举正是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时进行的。我们非常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何等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们一致决定，必须让党亲自就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劝告德国共产党公开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在复选中支持它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撤销自己的候选人的话。在初选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撤销了布劳恩的候选资格，尽管他们得到了800万张选票，而天主教中央党的候选人马克斯只拥有3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决定动员整个德国来投马克斯的票，以此为布劳恩取得普鲁士首相的职位。这样一来，在复选时只留下3个候选人（台尔曼、马克斯和兴登堡）。右翼集团玩弄了非常高明的计巧，他们不是在初选时，而是在复选时提出兴登堡为候选人，这样就把全部牌都弄乱了。

初选的结果是这样的：“黑帮危险”（象我们以往所说的那样）已不存在，因为情况表明，即使在共产党人提出自己单独候选人的

情况下,右翼集团也只是少数。但是,右翼集团提出了兴登堡,动员了 300 万新的选民,其中多数是妇女,从而出现了新的局面。

我们担心,共产党人的选票会在复选中被溶化,我们得到的将不是 180 万,而是 100 万。看来,这些选票没有被溶化;据选举结果统计表明,在萨克森,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投了台尔曼的票,以抗议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马克思作为候选人一事。应当补充一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这说明不仅共产党的工人,而且社会党的工人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投马克思的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就投我们党的选票数目问题说几句。有些同志不无理由地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国会选举时得到 260 万张选票,而现在只得到 180 万张选票。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由于,工人群众在选举总统时的心理状态与选举代表时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在市政选举时工人们的反应与议会选举时不同,而工厂委员会选举又不同于总统选举。例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或象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以下的情形:工人们事先知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不会被选上,因此参加这种选举的人数要比参加议会选举的人数更少,因为在议会选举时他们指望能通过一两个候选人。选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

昨天,我接到关于目前在德国进行的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报告;这项选举目前正处在高潮。统计表明,在一系列地区的企业中,投共产党员的选票有所增加。根据这些初步的材料来判断,可以预言,在德国在选举工厂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将大大超过 180 万。精确的统计是困难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候选人名单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合在一起的。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显然在

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只会增长，不会降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同志们，现在来谈一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已说过，选举兴登堡也是对我们关于稳定的论点的重要历史说明。这个论点完全成立，不可能被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个别一些事件所动摇。局部稳定是事实，它将延续一段时间，或许几年；然而，对于这种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出判断，即使根据象德国的总统选举这样的事件也行。

由于德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目前出现了世界性的孟什维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用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叫嚷说，兴登堡当选的过错完全在于共产党人。我想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以便说明社会党人在类似场合下是怎么干的。1913年在法国进行了总统选举；有两个候选人进行竞争：一个是彭加勒，当时任内阁总理，另一个是巴姆斯，他当时任彭加勒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巴姆斯被认为比彭加勒更左，更激进。在彭加勒和巴姆斯之间的政治色彩的差异大致象兴登堡和马克斯之间的差异一样。当时法国的竞选斗争异常激烈。与德国的选举不同，法国的选举不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方式，而是根据法国的宪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投票结果如下：彭加勒和巴姆斯得票几乎相等。彭加勒总共只多得13票。那时社会党党团共有70票。社会党的候选人是瓦扬。社会党人也投了瓦扬的票，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对彭加勒当选有利的。当时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怀疑，没有进行秘密投票，而且过去通常采用的预选投票，这一次也取消了。而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法国社会党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是由饶勒斯、瓦扬、盖得这样的人领导的，他们一致决定：我们既不投彭加勒的票，也不投巴姆斯的票，而是投自己候选人的票。那时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象现在那样的公开的亲密关

系。那时还不可能有象我们不久前看到的那种勾结：你给布劳恩一个部长的职位，我就把 800 万工人的选票投给你的基督教党的候选人；说什么我甚至不想让自己接近这个政治堡垒，说什么我只有一个选择——在资产阶级的这一翼或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之间选择。龚帕斯的政策现在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政策。现在当人们非难我们的时候，提醒一下这件事并不为过。

兴登堡当选的政治意义

兴登堡当选这件事的意义是巨大的。对它不应估计过高。但是事实毕竟存在，即德国经过几年的内战之后几乎有 150 万人投了兴登堡的票。这是德国选民的半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不应应对这种征兆估计不足。德国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报复，对我们所不理解的那种屈辱（因为我国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短短时期以外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的报复，这种屈辱在德国引起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很可能，极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反对协约国，反对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里又出现某种历史的类似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 1875 年法国也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

在议会中确立共和制（1875 年）是多数一致同意的，而麦克马洪是在“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的口号下当选总统的。现在德国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人们选举这样一个共和国总统，他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因为兴登堡的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当然，在 1875 年法国的情况与 1925 年德国的情况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遭到摧残，被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中（那里没有一户工人家庭

不遭受牺牲的),因此工人运动完全陷于沉寂。而德国现在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战斗中已弄得精疲力竭,经受了数次巨大的失败,但还没有投入最终的战斗;1500万德国工人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在德国周围,在德国境外都是一些工人运动规模巨大的国家,我们看到不仅在德国阶级斗争在日益增长。共产国际各党越来越深入人心地赢得了工人阶级。差别就在于此,但是类似之处也是完全确实的:德国现在就象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情况一样,事情在沿着通向“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口号的轨道上滑行。

兴登堡当选的直接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还很难完全预见,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这将在德国内部加剧和加深政治矛盾的发展。目前正在大肆宣传反对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很快就会同兴登堡妥协。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把他捧在手中,他们是最后一批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威尔斯辈和谢德曼辈很快会同兴登堡妥协。但是并不等于说,德国工人阶级也会同兴登堡妥协。这是不会的。德国内部的矛盾将会增长;德国将会出现比可能预料的不稳定得多的局面。

那么,兴登堡当选的国际政治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将是严重的。兴登堡,这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德法之间关系的稳定,而相反,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兴登堡,这也并不意味着德波之间关系的稳定,而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因此,从德国—法国和德国—波兰这方面说,这就造成了动荡不定的、不安宁的局面,充满着危险和孕育着意外事件的局面。

对于我们苏维埃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复杂得多。这里将会出现长期的较量。首先,协约国会试图在一定的时期内把事情弄成这样,以便把兴登堡的德国来同苏联进行对抗。这里还涉及到兴登堡的当选。兴登堡的当选使英国人有可能进行这种较量,尽管是比较长时期的,然而是比较“有分量的”。

昨天听到消息说，似乎美国将以拒绝给德国贷款来对兴登堡的当选作出反应，也就是说美国将“把手插在口袋里”。今天又听到另一种消息，说兴登堡的当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加强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而这一情况用财政部长梅隆的话来说可以保证那些向德国投资的人的利益。同志们，显然在美国和在整個资产阶级世界将会有人把赌注押在德国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上，在他们看来，这些力量还有可能使国家摆脱布尔什维主义。

从世界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期待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十月革命初期，我们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月内发生。德国革命爆发得要晚得多，而且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推翻了威廉的革命。我们可以附有一定保留条件地说，由于我国和德国的社会状况不同，德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德国革命的经验教导我们什么

德国的例子对我们过去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他们曾经硬说，似乎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自我限制”，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决不能“自我限制”，掌握政权后它就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全国布满了苏维埃，苏维埃实际上是局势的主宰者。第一届德国政府由6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3名右翼分子，3名独立党人。工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压力下，苏维埃在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了，以魏玛时期的资产阶级宪法将自己“自我限制”了。我们看到了最文明的德国工人阶级怎样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自己“自我限制”的例子。目前德国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类型的君主制的某种倒退。在我国，从

2月到10月的9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迅速的转变，而在德国我们现在在短期内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在1921年和1923年，我们曾以为，我们在德国有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兴登堡君主制的相反方向发展的某种抽搐和痉挛。同志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只是一种痉挛，但毕竟是极富典型意义的痉挛，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兴登堡和考茨基

总之，兴登堡的胜利应当促使我们深入考虑象德国这样一个经过激烈内战的国家里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分子变化过程；兴登堡的胜利还应当促使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稳定的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事实开始时可能使政治稳定向右转，但是这种痉挛性的向右转可能会被同样的向左转所取代。所有这一切提出了在崭新条件下进行工人革命的问题，并使我们面临新的危险。

因此，德国共产党转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暂时协议的可能性也十分困难，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整个第二国际一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有一个例子可以向我们说明问题。我们听说，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考茨基提出一个俄国问题的提纲，提纲被否决了，甚至在孟什维克们看来也过于右倾了。

我们对这个提纲找了很久，现在才侥幸地找到了。看一看这个提纲是很有意思的，以便了解为什么在德国谈论关于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某种协议如此困难，尽管这种协议是绝对容许的和绝对必要的。

大家知道，考茨基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相当稳健的人；

兴登堡现在 78 岁，考茨基的年岁与此相仿，无论如何两人加在一起足有 150 岁。大家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当问题涉及到资产阶级时，就温顺得象绵羊，软得象蜡。他反对起义，反对内战，等等。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我们苏维埃国家，涉及到我国革命时，让我们听听这位希望安宁地度过晚年的老头子的话吧！提纲称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迄今为止，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就在于这样或那样的支持。他的提纲开头说：“正如当时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样，现在同压制和压迫俄国各民族并占据一些地区的暴虐政权作斗争是各国社会党人的极重要职责之一。革命的剥削者（利用者）成了革命的掘墓人，而如今他们在仅仅履行反革命职能的时候，代表了俄国的波拿巴主义变种。”

“反抗野蛮暴力的最简便的手段就是武力。依靠军事武力的暴虐政权迄今为止几乎总是被人民起义或者其拥护者的叛离所推翻。”

接着是需要用外交辞令来掩饰事情的一些小小的附带声明。请听，他谴责不会达到目的的起义。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同意局部发动的。他竭力企图摆脱起义，等等。考茨基的这种立场甚至对于俄国孟什维克们来说也“有点儿过分”了，而他们拒绝这种立场。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当德国共产党知道考茨基这位学者以及和他一起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何看待苏联时，德国共产党人应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立场呢？这再一次地证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道路确实是离得太远了。

我认为，兴登堡和考茨基这两个人象征性地代表着德国和整个欧洲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暂时使兴登堡，从而使考茨基健壮的某种抽搐和痉挛。他们两人明天就会成为朋友。但是未来毕竟不属于这两个老头子的。

稳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热

现时的形势说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请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与不久前发生的情景比较一下吧！一年前是麦克唐纳、赫里欧、艾伯特；在南斯拉夫是达维多维奇；而现在张伯伦、兴登堡取代了他们；在法国是白里安，因为实际上他是政府的首脑；在南斯拉夫，是沙皇时代的老相识帕什契。欧洲目前明显出现一团乌云。这是向右转，但它必然会引起向左转的。

几天前，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追加军费预算。他对议员们说，难道你们相信，1914—1918年的战争真的象许多人说的那样是最后一次战争吗？议员们众口一词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在意大利议会中也有象兴登堡那样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坦率而明确地回答说：当然战争还会发生。他们是说得对的。

今天有消息说，瑞典提出了军备的问题。大家想一想，瑞典是个安宁的国家，没有参加战争，似乎远离革命的大道，但是现在那里掀起了一阵狂热，似乎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瑞典就要遭到攻击。保守派在那里进行疯狂的宣传鼓动，反对裁减军备。请愿的代表团从各地前来国会和陆军部，反对裁减军备。昨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群众大会。除了其他演说者以外，还有契切林同志的“老相识”斯文·海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东欧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军事纠纷。海登举了烈韦里和索菲亚的爆炸事件为例作为证据。讲话的还有利德尔将军，他以“俄国的危险”来吓唬人，说什么“苏联的进攻将首先指向芬兰和瑞典都无力加以防卫的中立的奥兰群岛。”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特别强调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必要性，似乎这项保卫工作根据裁减军备的草案来看是非常薄弱的。

请想一想，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而且是在1925年稳定的时候。看来是有这样的人，但斯德哥尔摩是可以放心的。它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不过，尊敬的议员们的行为几乎象共青团员们那样激昂。瞧，需要预先保卫斯德哥尔摩，需要武装加强斯德哥尔摩。

劳合-乔治不久前也说，他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英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那么据他看来，“即使不出现激烈的局面，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墨索里尼、瑞典人和劳合-乔治的号召。这里还要加上不久前在里加召开的参谋总部会议，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索菲亚的爆炸事件而在1914年燃起战火的巴尔干地区的一角直接发出的火药味。如果把这一切加以对照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应当承认稳定并从中得出结论，但是必须估计到局势，估计到这种稳定的规模和性质。我们应当明白，资本主义就是现在，在相对稳定的时期里，也不会象睡在摇篮里那样安稳。这是一种与左右摇摆并不矛盾的稳定。而我们在评价这种局部稳定时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经受的痉挛现象。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来提出稳定的问题，以便接近现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5年写道：“革命可能是并且很可能将是由多年的战斗，由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几个冲击时期所构成的。”

现在我们看到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的世界历史性形势。的确，革命正是由(1)一系列战斗；(2)多年的战斗；(3)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战斗所构成的。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反革命痉挛。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反革命浪峰上摇荡。它可能持续几年并孕育着对我们来说巨大的危险。但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种痉挛。

二、总的革命形势

革命形势的三种形式

在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我们的提纲中，我们试图稍稍超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分析，即更加明确地和完备地阐述国际局势。我认为，应当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很遗憾，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区别这一点，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不久前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5年写的评论阿克雪里罗得的德文小册子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才第一次发表，因为当时在国外谁也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它提供了解决革命形势、直接革命形势和革命三者之间的差别问题的钥匙。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中大致这样说，假如事实表明，我们在欧洲有象1901年在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那么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奇怪口号或许多多少少是正确的。弗·伊·抓住这一说法写道：

“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没有很好地揭露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肯定地断言’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呢？谁也不能这样断言，谁也没有这样断言。那时谁也不可能知道，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四年以后（1905年12月）到来；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1915—1916年‘到来’，也可能更晚一些。”

这里，最妙的是，弗·伊·在时间上几乎丝毫不差。他在1915年写道，1916年可能会有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而结果是在1917年发生了。他接着写道：

“虽然1901年谁也没有断言（不仅没有肯定地断言，也没有一

般地断言)决定性的战役‘马上’就要到来;虽然我们当时断言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关于战役‘就要到来’的‘歇斯底里的’叫嚣是不严肃的,但是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却肯定地断言了另一件事情:我们当时曾经断言,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在1901年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直接援助1901年的革命游行示威,鼓励、扩大这些游行示威,并宣传这些游行示威的最坚决的革命口号。尽管决定性的战役没有‘马上’到来,尽管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只是在四年以后才发生,而且也还不是最后一次的,即还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历史谴责了机会主义者,把他们长久地抛到工人运动外面去了。

现在欧洲的情况与俄国当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毫无疑问,1915年的欧洲具有象俄国1901年那样的革命形势。我们不能知道,那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要经过4年,或2年、10年或更多的时间才会发生,‘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还要再过10年才会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并‘肯定地’断言,我们目前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已经开始了的不满情绪和游行示威。在德国,群众用嘘声款待谢德曼,在许多国家中,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物价高涨。”^①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他所列举的事实当时也是象1901年俄国的学生游行示威那样说明革命形势的证据。现在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1916年,这是说明存在着革命形势的证据之一。他还说,这个形势将转变为革命。

^① 列宁:《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列宁全集》第21卷第377—378页。

俄国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变化的

现在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地理解并向全世界工人们解释这些简单的事物——一般革命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如果拿我国1902年的例子来说,那么很清楚:当时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学生罢课使得象经济学家克里切夫斯基那样的右翼代表人物张皇失措并叫嚷说:“成立突击队吧!战斗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们的脑袋上泼了冷水,并说:“这还不是历史性的转折,而只是克里切夫斯基的‘歇斯底里的’转折。”但是在1902年,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弗·伊·比谁都看得更清楚。而在1905年,我们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号召:“成立突击队。”以后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怎样转变成1905年的革命,虽然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1906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坚持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大家记得,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讥笑列宁,他们说什么,列宁规定农民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举行起义。的确,列宁曾经写道,农民们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尽快地加入(他把这个预测同新兵的招募联系起来)工人的行列。孟什维克对此嘲笑说,田间作业倒是做完了,但您说的起义却没有看见。到1907年,布尔什维克认为,第二次革命将在短期内爆发,并继续因此得出结论:存在着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只是在1908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承认,已经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革命形势还是存在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到来。而我们把自己的全部策略正是建筑在对未来革命的预见上。

作为革命者,作为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有责任在最终确信已经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前,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全部投到革命的秤盘上。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当反革命力量在天平的一

端显得分量较重的时候，我们才应当说，是的，新的时期确实来到了，资产阶级得到了几年的喘息时期，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的“反革命痉挛”。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已经不存在。但是，估计到当时的经济和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局面，估计到沙皇政府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总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说：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让我们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吧，准备1年、2年、5年，需要多少年就多少年，直到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

德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于类似的局面，虽然形式更为复杂。例如象1917年到1923年在欧洲曾经存在的那种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正在消失。至少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在1923年时，准备转向直接革命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存在的，而现在，以往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已经消失。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来说，从另一种，即最终结果的观点来说，正在起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当时在俄国所起的那种作用。在这里，自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作某种类比是可以的。正如1906—1908年，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暂时地加强了这个世界局面，缓和了整个形势，现在，道威斯计划以及德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联合措施暂时地缓和了德国的直接革命形势。

但是，叩诊一下德国的肌体，仔细研究一下德国内部的病态发展过程，掂量一下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些基本因素——工人阶级的状况、农民的状况、凡尔赛和约的压迫、德国对协约国的依附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的客观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会到来。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革命到来的日期和时刻。革命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列宁，有时

在试图指出日期上犯过错误。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同志们，在对一系列国家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并大声地宣布，在有些国家里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对我们的革命弟兄来说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我们事先就知道，并通过事实深信这一点，我们的这一说法会引起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妖魔狂欢，他们会夸大和歪曲我们的每一句话，会胡说什么“共产国际的末日”和“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已经说过：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幻想从来没有使革命者得到好处。是的，在1923年，我们应当竭力使天平的一端向革命地解决危机的方向下垂。1923年德国的尖锐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变成直接革命。1923年以后，我们应当等待一两年，试探和研究局势以便弄清，尖锐的革命形势是否很快就会出现。

大部分德国革命工人至今还抱着这样的思想，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出现1923年的形势。不久前哈雷的枪声又促使某些工人认为：明天就会“开始”，既然资产阶级采取了象在和平的工人集会场所开枪这样的措施，那么工人们一定会对此义愤填膺，1923年又会再次出现。当然，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会对工人们的这种情绪进行嘲笑，都会感谢自己的上帝，他不是按那些相信革命临近的罪人和纳税人的模样造就成的。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孟什维克只相信资产阶级的星辰。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始终是：他感到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一切都是玫瑰色的，而在工人阶级阵营里则都是黑色的。

我们知道了革命人民内心的活动，了解了什么是革命的涨潮和退潮，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一部分德国工人在1925年春相信直接起义，正如一部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跟列宁同志一起在1906年时期待着在田间作业结束后进行直接革命发动。不过，在

仔细研究了德国客观形成的局势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不得不在几年当中经历我们在俄国从1908到1914—1915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形势要比战前尖锐得多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革命将会形成一系列交织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战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时期。一切郑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清楚地看到形势，应当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反光镜来阐明这个形势，应当善于保护和积聚革命力量并期待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

我记得，1918年时列宁曾抓住考茨基的一句话并说：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考茨基在1909年《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对于欧洲的社会革命来说，客观前提已经成熟，而工人阶级过早掌握政权的危险已不存在。曾经有个时候，例如在这30年前，恩格斯曾谈到无产阶级过早夺取政权的危险性。从20世纪初起，甚至考茨基也认为，这种危险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过早地夺取政权，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即经济前提已完全成熟。1911年，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抓住考茨基的话，说你和你的营垒中的许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都承认欧洲的形势客观上是革命的。那么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这样说，因为欧洲的形势现在要比过去尖锐得多。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我们不是处在这个时代的“末端”，而是处在这个时代的“开端”。说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不是指资本主义一般说必然产生革命的形势，

而是指：（1）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被在战前更多的矛盾所分裂；（2）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3）东方的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问题都比过去更加尖锐得多。

单是东方问题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巨大浪潮正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事实上这将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1920—1921年，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一个崭新的口号，列宁同志对此在一次会议上说：

“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作《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问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①

在1920—1921年，我们还在争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本身究竟对不对。这听起来很新鲜，很不习惯。那时东方的运动还处在初始阶段。同志们，难道现在这个口号还仅仅是口号吗？我们亲眼看到，它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革命因素。我们大家看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日益成熟的力量怎样在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而在德国，直接革命形势被一般革命形势所取代了。但是目前，过去处于静止状态的巨大的汽锤开始动起来了，英国开始出现革命骚动。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世界革命如若没有英国参加，只不过是杯水风浪。现在我们看到，英国的形势开始在革命化。当然，那里离直接革命还很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

遥远,但是一般革命形势已开始在英国形成。如果估计到:(1)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2)英国的革命力量在成长;(3)资本主义稳定的经济和政治限界是非常有限的,那就很清楚,也用不着怀疑,革命的道路只是延缓,但不是中断,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敌人营垒中的欢欣狂舞和胜利奏乐证明我们关于资产阶级统治不稳固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们从我们嘴里听到,他们的命运将得到短暂的延缓,于是他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只有无可救药的病人才会对这种诊断感到高兴。

关于革命的可能的行进路线

同志们,我们说,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和期限,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即道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用理论推论的办法来加以扩大。这两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加以解决。

至于速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世界革命的进程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缓慢些。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基础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宽阔得多和牢固得多。在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喘息时间要比过去我们当中任何人所想象的长得多,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和从内部巩固自己的力量。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那么在这里明显地有所变化。我们大家过去都习惯于认为,例如革命的行进路线将会是这样:从俄国到德国,再从德国到西欧,然后以西欧为半径再到其他国家。曾经有极大的理由作这样的路线构想。现在事情开始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条行进路线将是可能的。这条路线是:(1)经过英国;(2)经过东方;第三条路线是经过东南欧,即巴尔干国家,那里的形势依

然是革命的，那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即产生革命的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两个稳定

为了确切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议的内容，应当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我们苏联自身的稳定。

有位同志，显然是个学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国经济的稳定乃是统一的整个世界经济一部分的稳定，因为我们是世界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组成环节。因此，我们经济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按比例解体。要知道，这只能用来作为宣传。”

他是纯“学院式地”来表述这个思想的：我们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按比例解体。“按比例”，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从我国有对外贸易部，它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经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

至于说我们是世界关系中的组成环节，那么这一事实正好证明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是按自己的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设了不是一年，我们有正确的前景规划，以便今后把它建成，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挖资本主义制度的墙脚。

世界革命的问题是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那个国家的革命的。这个问题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因此，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局部稳定时，这一点怎样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

答案是清楚的。假如我国的经济不加强，我们就会出现某种“剪刀差”，我们就会发生严重的“断路”，我们就会看到我国的经济

怎样在爬行,我们就会削弱,而世界资产阶级就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沿下降线倒退,而他们则会按上升线前进。列宁同志曾特别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大家记得,他是多么欢欣鼓舞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货币体制的最初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乐观的前景规划。他赋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加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在确认敌人营垒的局部稳定的同时,有权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沿着上升线前进,迅速地前进,这不但是从生产发展的意义上,而且是从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意义上说的。

三、国际革命的延缓和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的任务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就是我们必须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的原因。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何同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负的使命联系起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正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已由列宁同志在理论上解决了。因此在提纲中,为了事先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反驳意见、避免某种误解并从各个角度来最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尽量主要用列宁同志本人的一些评价来加以回答。

1915年,列宁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在著名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①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有一个绝对规律,即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同志起先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对帝国主义所发展起来的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客观环境的研究者的身份确定这个规律的。但是，列宁同志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从经济规律中得出了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那么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可能首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不必等待一系列国家同时发动。我们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这样说：当然啰，如果大家“立即”、“一起”发动，那么我们或许是赞成的。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不仅在起义问题上，而且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问题上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德国人说：我们或许同意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不过只是在法国人也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况下才行，如果法国人准备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那么对不起，我们也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就连第二国际的杰出活动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这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和腐朽的对问题的提法：什么“首先是”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都准备发动，然后才谈得上革命战斗。列宁同志回答说：谁以为“首先”必须所有国家都一起谈妥，然后才能大家“一起”行动，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总有一个必须首先发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特点使有可能：对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某些情况的结合，使它（或它们）第一个（或第一批）起来进行发动。这就是列宁同志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第一个冲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列宁同志在1923年，即在逝世前不久，在著名的关于苏汉诺夫的札记中特别详细地发挥了这个思想。同时，列宁同志补充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列宁同志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一个国家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发展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

一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

俄国第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1917年爆发了我国的革命。对于列宁同志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来说，首先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917年3月，列宁在从瑞士回到俄国的前夕，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告别信。那时他已经拟定了关于我国革命的著名提纲。列宁在这封信上说：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

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领袖的纲领中，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时他已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俄国无产阶级单独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但是它能推动其他国家，使其易于进行革命。”

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整个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经过几个星期之后，直接向我们提出了国际问题。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提出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思潮。关于国际革命的时期、速度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同国际革命整个进程的“联系”问题。

列宁同志当时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呢？1918年3月7日，他说：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81页。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

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赌注。”^①

列宁最后说，因此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面这些话，我引自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国际问题是中心问题。

德国革命和我国革命

总之，列宁同志也象我们全党一样，那时相信再过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会胜利。的确，当德国和奥地利爆发罢工时，我们以为革命指日可待，以为再过几天革命就会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胜利。正是这时，列宁说，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尽管发生任何事变，我们就会灭亡。

大家知道，德国革命后来爆发得要晚得多，在1919年，而不是过了几天。而主要是爆发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革命。在德国爆发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痛苦的转变。而现在的特点则是象兴登堡上台这样的“倒退”，这样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462、463页。

痉挛。这一点我在报告的开头已经谈到了。

有理由扪心自问：假如1919年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也不爆发，我们苏维埃国家会是什么样呢？那时我们能否保持得住呢？当然，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假如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威廉，假如没有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大家知道我们靠这个冲突维持了很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会被唆使来进攻我们，我们就难以保全。大家记得，德国军队当时已到了普斯科夫，已到了列宁格勒附近。

也许情况会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知道，大约从1919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即使不是我们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半盟国，或者至少可以说是1/4盟国。一个被协约国打败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客观上被推到了充当我们半盟国角色的地步。只要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就足以使我们有可能继续进行或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如果现在德国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到1918年底，德国革命还是没有爆发。后来爆发的革命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失算和犯错误，我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理论的方法来解决的，而只能根据实践的经验才能解决。

在“最初”阶段

现在我们有了八年积累的经验，这是国际革命的第一轮。我们现在更好地懂得了什么是时间。

后来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清醒得多了。1919年，弗·伊·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而且生活在一系列国家内，而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时期地并存是不可设想的。最终，不是这个取得胜利，就是那个取得胜利。”^①

列宁同志在1919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最终，不是这种制度取得胜利，就是那种制度取得胜利。同志们，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应当理解“最终”这两个字。

列宁同志接着解释说，不要把“最终”和“最初”混淆起来。在我国革命的初期，我们曾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将以星期和月来计算，我们曾以为，革命不是在1918年3月，就是在1918年9月“最终”一定会到来。现在经过第一轮革命以后，经过革命爆发至今八年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只是“最初”的阶段。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我们经历的年代无非是“最初”阶段。但这是一种抉择（“要么是我们的制度，要么是敌人的制度，但是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列宁在1923年以前的一系列声明中，直到在关于东方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挥着这个思想，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和延长我们的“喘息时间”，以便联合东方各民族，并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资产阶级的冲突中赢得胜利。

同志们，假如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我们已不受内部和外部危险的威胁，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说“喘息”，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呼吸”了。而列宁说的毕竟是喘息。不过，喘息是相当特殊的，开始时说的是几个月和几个星期，而后来在1920年列宁同志说，正在经历的时期不仅是喘息，它也向我们提供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机会。

俄国革命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 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为了弄清列宁提出的关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其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102页。

他国家所负的任务的关系这个目前特别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列宁主义的全部过程，即从1915年他的言论起到关于合作制和东方问题的言论止。这个问题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是最终胜利）无疑是可能的。列宁同志在同托洛茨基同志就世界联邦问题进行论战时，在1915年就写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另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会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复辟的经济威胁。因此，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保证，即防止复辟的保证，是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在经济技术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语），在象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断言“只有在欧洲一些最重要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托洛茨基语，1922年），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目前陷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境地。列宁同志在反对这类“理论”时写道：

“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①

列宁同志在其著名的《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谈到有名的“鸡雏”。他说：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的一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②

我要提醒大家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的小册子中说的话。当时他写道：

“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他回答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由于一项巨大的科学工作已告完成，现在我们对这个条件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个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能够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乡村，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末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了。我们深深知道，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10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②

大家看到这里是从纯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着地图说，瞧，在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奥连堡等东南，瞧，那里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奥勃洛摩夫精神，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发达。但在他看来，我们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的这个国家也可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的，这个条件就是全国电气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一刻也不脱离国际的范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他知道，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他知道，要完成防止资产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② 同上，第524—525页。

关系的复辟只有随着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才有可能达到。但同时，他在文章中维护和贯彻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这个带着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半野蛮性的国家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讲话中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训：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必须记住列宁同志在最后一篇关于合作制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这个意见对于现时条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都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国家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无比强有力的杠杆和支柱；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一切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信这种建设可能和必将取得胜利，只要能使国家防止复辟的任何尝试。换句话说，俄共必须通过对国内的农民以及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确政策来克服由于世界革命速度的延缓而出现的一切困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

不能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回答说：当然应该、能够、善于而且必须。我们现在拥有可能性，并且应该利用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内创造最大限度的必要条件来支持各国的革命。正如列宁同志说的，我们不仅有喘息时间，而且有比喘息时间更多的东西。我们有广阔的基础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荒野上，我们不应有那种情绪，认为现在只能种植树木，而建设大厦得到遥远的将来。不，我们应当现在就建设大厦，而不是种植树木。我们不应有那种“荒野的”气氛，我们不是在荒野上，而是在自己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决不是国际革命天平上的小小砝码。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积极工作、我们的成就，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现在实现列宁同志的遗言：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直到其他国家革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要为国际革命尽一切努力，从支援某个国家的工人起义到为本国居民生产廉价的印花布。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就是发展、扩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同农民保持 10—20 年的 正确关系，胜利就有保障”

在不久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上发表了列宁同志的《论粮食税》初稿。列宁同志的草稿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列宁同志说的这样几句话：“同农民保持 10—20 年的正确关系，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就有保障（即使在正在兴起的无产阶

级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否则就要遭受20—40年的苦难和白卫分子的恐怖。”^①

大家看到，在1918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全党一起认为，事情在几星期内、几个月内就能解决，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在1921年，估计到前个时期的巨大历史经验，他就说：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建设，即使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障的。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我们遵循国际主义的义务，必须在我们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其次，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我们懂得，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我们单独来解决。过去对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难道法国大革命没有进行一系列战争吗？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这些战争的呢？它清楚地懂得，如果法国周围都是封建国家，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巩固的。它必须竭力做到使一系列邻国也按照它的模式和类型来建立，也就是说在那里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进行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尤其应当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如果它没有在一个主要的国家内赢得胜利。当它的周围还是一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的胜利即使很重大，很巨大，但也不是最终的。如果它有20—10—5年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它就应当利用每一天、每一分钟，竭尽一切努力，竭尽最大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

现在，这个遗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欧

^① 《布尔什维克》第7期，第76页。

洲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问题在我党有些党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意识中出现扭曲的折射，使他们离开正确的立场。我们作为政党必须对列宁主义的以下论点做些解释工作：即使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我们贫穷的国家里也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大家都承认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大家都承认，世界革命的进程比较缓慢。这对俄国来说是否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我国革命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呢？应当说，这种解释作为一种业已形成的思潮是不存在的，这种情绪只是在某些地方在流传，而在革命运动的目前阶段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必须坚决克服。

四、当前布尔什维主义的任务

关于评价现时形势中的两种可能的危险

在现时形势下存在着两种危险，其表现如下，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地方可能出现这样的情绪：既然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世界革命在长久地推迟下去，既然我们得不到外部的有力援助，那么在俄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是否会落到这种地步——正如有位同志明确地表述并嘲笑这些情绪时说的，——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赶快溜走啊”。或许现时的形势意味着，我们（俄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目前有些地方在流传的，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绪是：我们在提纲中称为民族局限性的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以下说法：国际革命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孤居独室，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我们有政权，我们可以最终巩固自己的胜利，总之我们可以不必重视国际舞台上发生

的事情。这类思潮还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这种情绪已开始流传。如果说还不能认为已经成型，那么应当估计到产生这种情绪的危险性。我们之所以是列宁同志创建的党，就要向前看，就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性。我们应当制止这种情绪，防止这种情绪。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志，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期待的只是国际范围内的最终胜利，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尽最大的可能来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防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上述这两种可能的危险，其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特别靠近共产国际，给它以特别热情的支持，帮助它从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我国的实际经验、我国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从1907—1914年期间积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帮助它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一切沟壑，克服现时形势的一切困难。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唱高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号召他们直接参加冲击、战斗等等是比较容易的事。要制止一个国际组织不采取考虑不周的步骤，克制它的革命激情，向它指出形势的种种困难，以便达到必要的结果，就困难得多。但是现在，这是使共产国际依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完全必要的药剂。

.....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5年
第5期第5—39页。

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

——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

(1925年9月)

今天是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10周年纪念日。这10年是国际范围内有组织的列宁主义的10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基本上走上列宁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当然，列宁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早在齐美尔瓦尔德以前就已形成。列宁在20世纪初的言论，特别是他反对孟什维主义的言论早已具有国际意义。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的列宁主义策略无疑也具有国际意义。列宁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上的讲话无疑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但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则是第一个通过了列宁主义纲领的有组织的和定型的国际支部，而且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里，是在列宁的学说已为新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丰富的时期里。共产国际就是从这个组织中衍生出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共产国际的胚胎。

总的说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从第二国际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首先是第二国际的“中派”，然后是一小部分右派，最后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大约于1907年形成的左派。齐美尔瓦尔德中的多数派是依靠右派、反对左派的右翼中派分子。左派只是偶尔赋予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以较为激进的色彩。

现在，当我们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时，我们就看得特别清楚，

第二国际当时是多么腐朽。如果说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多数派是第二国际中的优秀分子(左派除外),那么可以想象整个第二国际当年是个什么样子。

和列宁一起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的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累德堡和阿克雪里罗得、莫迪利扬尼和格里姆。这就是当时第二国际中的“优秀”人物!

我这里保存了一本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的笔记本。这里我只引用一下其中关于法国“国际主义者”布里宗的发言的一小段记录。

“布里宗:调子变了。一直拖延自己的发言。提出一个条件,以便在他之后没有人再讲话。终于经过一番可怕的工作之后开始发言。”

“我不能忘记我是一个法国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法国人,我看到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法国是革命的导师。我不会写出有损于法国的一行字,不会做出有损于法国的一个举动。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反对战争。应由德国人来采取决定性步骤。我是属于法国少数派的最左的派别。我决定在6月不投票赞成拨款(掌声),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军事形势允许的话。要是军事形势对法国来说比现在更糟糕,我将不承担义务。”

我想起了一个德国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哈阿兹、霍夫曼派的人)疯狂反对代表会议责成国际派代表们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景。我想起了象累德堡这样真诚的革命者几乎伸出两只拳头向列宁扑来,责备他(列宁)呆在国外要求别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自然是很轻松的。

我的笔记本上还有另外一段记载:

“莫迪利扬尼(意大利改良派的著名领袖,说:列宁,您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你们(他对着中派一边)是我的朋友!……非洲、印度到

这里来，就会使左派成为多数。”

还有一段记载。

拉芬·杜然(法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对拨款投了票；我们是做得对的。我们准备原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但希望他们也不要来责备我们。”这就是相互赦免的全部“理论”。

我再说一遍，而这就是第二国际中最优秀的人物！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各派的杂烩，从玫瑰色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到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有。自然，这个杂烩是不巩固的。

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向后“发展了”，另一部分则逐渐地发展到列宁主义一边。莫迪利扬尼和莫尔加利倒退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总书记罗伯特·格里姆则堕落为平庸的改良主义小市民。切尔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的演变是众所周知的。而象拉狄克、塞拉蒂，象恩斯特·迈尔、保尔·弗勒利希、普拉廷、拉品斯基（他们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等人则向共产主义方面发展了。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我记得，列宁主义的中央曾多么困难地动员了自己的资金，收集了100法郎(37卢布)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基金。在白色恐怖、戒严状态、战时书报检查制度、苦役迫害的情况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来建立列宁主义的国际组织。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们进行了第一次国际性的交往。卡尔·李卜克内西起先从前线然后从监狱里写信表示响应，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发表了演说。同奥地利、德国、法国的最初的单独联系出现了。侨居在国外的列宁的学生们纷纷到各国去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义务。

制定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磨擦的。列宁主义的同盟者(例如波兰同志)给列宁主义的纲领添了几勺焦油。

只需说一下以下这一事实就够了：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领袖的“国际”派就采取了我和俄国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上述派别的代表迈尔同志代表德国国际主义者宣读了给……杜马党团齐赫泽的贺电。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以多么顽强的毅力、多么高昂的激情和忘我的精神工作的，他挺起胸膛为彻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开辟道路！难道这只不过是10年前的事吗？那时，列宁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只有一小批拥护者，难道这只是10年前的事吗？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布里宗傲慢不逊地对列宁说：“世界上有几打对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感兴趣的学究，而我们应当面对每日每时都在劳动的 braves gens (优秀人物) (摘自我在昆塔尔记的笔记)”，难道这只是10年前的事吗？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10年前的事。国际列宁主义已经从一小批人成长为强大的国际大军，夺取了拥有地球1/6土地的伟大国家。列宁播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茁壮的幼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已经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高大橡树。

国际改良主义尽管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历史所赋予的短暂喘息而得到了短暂喘息，但现在已经连根腐烂。而“几打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在世界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的领导下，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把沙皇的俄国变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把小小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国际支部变成了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变成了给资本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带来无数不眠之夜的共产国际。

在世界范围内继承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事业的共产国际目前正在经历着最困难的发展阶段。1919—1920年取得的最初的令人目

眩的成就是同群众对帝国主义屠杀的自发不满达到极点相联系着的，这些成就后来被争取工人大多数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困难的斗争年代所取代，而这种争取工作带着危机和间歇，比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曾经有个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也经历了这样的困难时期。这大约是在1908—1912年，那是一方面为争取建立政党而斗争的年代，另一方面是取消主义流行的年代。难道现在霍格伦（霍格伦不仅是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而且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成员）和罗斯梅退出共产国际竟会使记得1908—1912年历史的布尔什维克感到惊讶吗？取消派、逃兵、动摇分子是不可胜数的。列宁会对那些在1909或1910年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困难处境而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出路”应当寻找其他道路的人怎样回答呢？不难想象，列宁是会痛斥这样的明智者的。读过那个时期的列宁著作的人不难想象，列宁会对这样的明智者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来。

目前，在1925年，对于动摇分子，对于信念不坚的人，对于那些看不到自己鼻子尖以外的东西和不理解目前国际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共产国际所经历的困难阶段的真正意义的人，也可以这样说。

共产国际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履行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它还没有走完自己所要走的一半路程。不言而喻，当事情还只是做了一半的时候，那些信念不坚的人和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者”是难以理解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它将保证把大多数劳动者牢固地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旗帜下来，使国际无产阶级摆脱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影响。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指导下制定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4年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初的巨大成就只是现在才开始展现出来。

英国工会和苏联工会的协议，争取全世界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的日益扩大的斗争，第一批有影响的工人代表团到苏联来访问，年轻的英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增长，法国共产党在反对摩洛哥战争中的值得尊敬的立场（这一立场使法国共产党人赢得日益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同情，东方（中国）的共产主义政策——这一切说明，尽管共产国际处境十分困难，尽管由于处境的复杂性而引起各国党内的危机，但共产国际毕竟找到了通向群众的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当前的任务是越来越广泛地、有步骤地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越来越加强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宣传。当前的任务是要竭尽全力深入到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群众中去，竭力与他们找出共同语言，来反对日益转向资产阶级一边的叛徒领袖。

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立到现在已经 10 年了。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米留可夫是否早就把“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看作是可怕的怪物并以“齐美尔瓦尔德派”来诱惑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呢？而在那时以来，分化是多么厉害啊！“齐美尔瓦尔德派”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同米留可夫一起现在正坐在白俄侨民的诺亚方舟上。他们都受到英国保守党内的帝国主义顽固分子的鼓舞，正在疯狂地反对共产国际。

目前，在反共分子中特别“时髦的”话题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罪过是它采取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方针。这些先生们“为了防备万一”，准备容忍苏联日益巩固和发展的现实。但是只希望俄国革命成为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只希望它抛弃国际革命的幻想，只希望俄国革命弃绝共产国际！

列宁主义的回答则是简单明了的。你们不是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缓慢地发展吗？是的！但是对于苏联来说更合理的是采取面向缓慢地（暂时是缓慢地）走上坡路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方针，而

不是面向缓慢地(但确实是)走下坡路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方针。

最近召开的我党第十四次全苏代表会议的决议坚持认为必须反对由于在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民族局限性”。列宁主义的党是能够克服这种“民族局限性”的,这难道可以有丝毫的怀疑吗?

我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地球 1 / 6 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迎接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 10 年的。在下一个 10 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地球的哪一部分取得胜利呢? 让我们等着瞧吧! 而我们忠于列宁遗嘱的人将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帮助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取得胜利。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目前还只拥有少数劳动者的共产国际将变成拥有全世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共产国际!

资产阶级的欧洲将变成无产阶级的欧洲!

译自《真理报》1925 年 9 月 6 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

(提 纲)

(1926年2月)

一、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策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1925年3月)确认资本主义的某种局部稳定。同时也指出,这种稳定是完全相对的、不巩固的。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所作的这一分析。

共产国际任何时候都不把“稳定”理解为: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腐朽和没落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治愈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创伤,它已经克服了在这场战争中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和空前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仍在继续。但是在这个时期中,暂时的、局部的好转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在1925年时确认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好转,这种“稳定”。这种“稳定”乃是事实。但绝不能把这种“稳定”理解为资本主义不断巩固的过程,理解为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繁荣的新时代的巩固过程,而只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目前达到了比战后头几年具有某种相对巩固性的阶段。目前,这种“稳定”的相对性和不巩固性表现得特别明显。

到1926年初,资本主义欧洲又重新经受了一系列新的危机性的严重困难:英国出现了主要是工业危机的现象,法国出现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危机,德国开始出现道威斯计划的危机,波兰几乎濒临经济崩溃,奥地利则出现了危机,等等。过去的一年特别明显地

证实了在欧洲一系列主要国家里“稳定”是不巩固的。

为了明确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不妨把它目前的情况同(1)1913年(战前水平)和(2)1918—1921年(战争结束时和资本主义经济极度衰落时)的情况作一比较。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简单地把目前的情况同1913年或其他任何一年相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在世界经济内部就出现了一系列“质”的飞跃。

如果拿战前水平来说,那么几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资本主义(美国除外)总的说来不仅没有超过这个水平,而且还都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如果拿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初期最不景气的情况来说,那么目前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然而,仅仅采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是不够的。为了判断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稳定的程度,不仅应当用绝对生产数字这个尺度,而且还应当研究一下重要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发展的内在趋势问题。

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1)对欧洲各国人民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榨(增加捐税、降低工资、降低群众生活水平);(2)对殖民地的压榨;(3)美国的“援助”(美国贷款),这种“援助”正在奴役欧洲,即迫使欧洲工人也为美国资本家干活。

换句话说,世界资产阶级竭力企图把“稳定费用”转嫁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这在不同的国家里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在任何地方都不外乎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

1、德国的方法是加强工业托拉斯化的过程,使美国得以奴役民营和国营的经济,引起破产和失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德国失业人数的增加是“健全”过程的后果,这种过程应导致“更廉

价和更经济的生产”。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都把这种现象称为“生产合理化”。

2、英国的方法是实行通货膨胀,其明显的意图是迫使工人同意降低工资,从而有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即提高利润。

3、法国工业目前较为有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膨胀取得的。通货膨胀等于降低法国工人的实际工资。

另一方面,对削弱资本主义“稳定”起重大作用的因素是苏联的巩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运动的发展。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脱离“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许多大国中接连不断出现的政府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的分崩离析、各树一帜等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稳定”的相对性的征兆。

美国。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事实。美国的领土只占世界土地面积的5%,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2%,而美国生产的煤占全世界产量的43%,铜占52%,棉花占52%,生铁占60%,纸张占57%,石油占71%,汽车占82%。美国的世界商船队从战前的4%提高到20%。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即使在1925年也在继续增长。美国的资本输出在1925年达到15亿美元(1/3输往加拿大,其余1/3输往南美、澳大利亚、日本,另外1/3输往欧洲,其中输往德国2.5亿美元,输往意大利将近1亿美元,输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约1.5亿美元)。由此可见,几乎整个欧洲日益成为美国的债务国。在美国的120亿美元的军事借款中,有74亿美元已“得到偿还”,还没有偿还的有47亿美元(其中法国欠美国33.4亿美元)。美国的外债和在国外的资本投资为180亿美元。

1925年纽约交易所的有价证券的总发行量达到45亿美元。这些资本的1/3输往国外，2/3的有价证券留在国内。美国通过自己的资本为侵入世界各地铺设了道路，其中也包括欧洲，欧洲正日益陷入依附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位。

美国的国际贸易在增长(1925年已增加了35%)，与此同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了47%，英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了5.5%，比利时的国际贸易减少了34%，等等。加拿大80%的贸易是同美国进行的。

美国所攫取的超额利润正在不断增加。美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已经无庸争议了。近年来所有重要的国际“协议”——华盛顿公约，道威斯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罗迦诺公约，都打上了美国资本霸权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国家机关和托拉斯的“长合”已经不成其为秘密了。美国资本在这方面已经不需要任何掩饰了。

美国资本吸吮欧洲的脂膏客观上促进着欧洲的革命化。

同时，不仅世界市场上的王位，而且还有工人运动的反动“王位”(美国劳联)都已经从英国转到了美国。

英国。工业危机和周期性的失业依然给英国的整个经济生活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英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不断增长(1922年逆差为1.8亿英镑；1924年为3.44亿英镑；1925年为3.955亿英镑)。1924年煤的产量为战前水平的92.2%，1925年则降到88.2%。1924年，钢铁生产为战前水平的86.7%，1925年则降到76.2%。1924年的物价指数与1914年比较为174.7%，1925年则上升到175.6%。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实际上降低了。曾经不止一次地使英国整个工业活动发生问题的煤炭工业危机目前已大有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之势。

英国不得不：(1)在太平洋跟美国和日本进行斗争；(2)在欧洲跟法国(法国在战争期间在发展重工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和德国(德国工业正打算而且不得不打算同英国竞争)进行斗争，并且反对苏联(在东方问题上)。英国的自治领正在不断摆脱伦敦的影响。中国的事件使英国在东方的影响受到极沉重的打击。

尽管最近几个月来在某些方面有了局部的和暂时的好转，然而可以大胆地说，英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基本上是不下降的，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在不断削弱；霸权地位已被美帝国主义从它手中夺走，英帝国主义的威力正缓慢地、然而是不停地在走向没落。

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自由党正处在瓦解过程中。在保守党内部，正围绕着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在进行斗争：(1)保护关税政策问题；(2)摩苏尔问题；(3)对待工人阶级的策略问题。

英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引起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深刻变化。工人贵族的影响削弱了。工人群众正在向左转并寻求新的出路。英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变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 * *

法国。在过去的一年中，法国进入了遭受周期性危机的国家之列，这是一个新的事实。在1925年一年中，法郎又贬值了55%。赋税负担在增加。战前税收占国民收入的13.3%，在1923—1924年提高到21%，在1925—1926年则提高到25%。法国遭受的严重金融危机(尽管贸易出超，尽管法国的大工业在最近10年来有所发展，尽管没有失业现象)说明：在这个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里，资本主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如果要想在保存私有制的范围内不采取一些对大资本实行局部剥夺的措施而摆脱上述困境，即使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府来说也是越来越困难了。摩洛哥和叙利亚的事件表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还受到来自殖民地方面的打击。执掌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集团)，以其上层人

士为代表，在每次内阁改组时实际上都把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让给大资本家。但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必然变得更加激进、更加革命，虽然他们目前在政治上仍然显得软弱无力。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正日益丧失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摆脱日益错综复杂的危机的出路。

由此可见，法国紧跟着英国之后也走上了长期危机和衰落的道路。不仅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而且连最大的战胜国（英国、法国）也都陷入了周期性的危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全克服这种危机。

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新纲领是：（1）限制议会活动；（2）建立殖民地军队，即除了建立一般的军队以外，还要建立专门适合于进行殖民地战争的军队；（3）由国家把税收系统租让给资产阶级用来稳定“国内预算”（即斯汀尼斯化）；（4）扶植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中等阶层革命人士的力量。

这个纲领有可能使法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成为广大劳动阶层的突击队，组织群众起来反对“民族集团”并抨击“左派集团”的动摇。

. . .

德国。一年前，由于实行道威斯计划，德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最显著的。同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相比较，1925年初德帝国主义的地位是最巩固的。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预见到，这种稳定实际上是不巩固的和不能持久的，而社会民主党则不同，它和资本家一起欢庆胜利，并硬要使工人们相信，德国已经一劳永逸地战胜了主要困难。

过去的一年十分清楚地说明共产党的分析对德国也是正确的。道威斯计划的缺点刚刚开始表现出来。危机已经导致大量的失业（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人），导致资本主义企业的纷纷倒

闭,引起新的慢性危机,尽管德国工业具有充分适应性,尽管德国资本家富于灵活性。今后,道威斯计划的结果将使德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使危机尖锐化。

1925年,德国支付的军事赔款只有2.24亿马克,而1926年,它必须支付10亿金马克的赔款(根据道威斯计划)。而“赔款问题也就是降低工资的问题”(凯因斯语)。1924年赋税负担为44亿马克(1914年为19亿马克);1925年赋税负担为71亿马克,而1926年由于实行道威斯计划的结果还将不断加重。

道威斯计划对德国的“代价”就是这样。它也为战胜国本身带来巨大困难。它靠刺激德国的出口,以牺牲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降低德国商品的生产费用,人为地提高战败国的竞争能力,这势必使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本身遭到不幸。从英国领地——南非、印度等等——传来关于德国工业打入这些帝国市场的消息。而英国的煤炭工业受到道威斯计划的巨大制约,这是众所周知的。

1926年,不能排除德国经济危机的局部缓和,然而整个德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不断出现的政府危机和议会危机;德国三个群众性政党的危机(中派、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制度的破产(现时的政府是左右着反对派的少数人的政府);工人群众的左倾;小资产阶级倒向工人一边——所有这一切都为共产党人争取群众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

波兰。波兰的濒于崩溃的经济状况可以从下面这封由工厂、银行、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等行业的代表们于1925年11月17日联名写给波兰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得到最好的说明。

“波兰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每时每刻在消沉下去。工业中的

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 213000 人,即占在业工人人数的 30%。这样的比例数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工作的人,也往往每周只工作 5 小时、4 小时,甚至 3 小时。因此,在每 6 个工人中有 4 个人没有工作…… 这种情况正在日益恶化。不久就会看到,少数人将不得不养活多数人…… 工业停滞不前,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小土地占有者本来是工业品市场容量的极重要因素,但他们没有钱买东西。至于大土地占有者,在短期债款的高利重压下,也不能在工业品消费方面起什么作用。工人在目前工业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也不再是消费者。职员也无力购买商品。手工业作坊跟工业的遭遇相同,正在日益减少。商业…… 从来没有遇到过象现在这样困难的局面。总统先生,波兰整个生产活动正在江河日下。许多企业已经彻底倒闭。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了。”

财政部长在议会宣布“国库空虚”,并指出国内外都出现“信任危机”。官僚机构陷于空前的分崩离析状态。贪污受贿的现象比比皆是。与上述现象同时发生的是白色恐怖和对工人实行暴力统治的制度,在饥饿的失业者中出现绝望情绪,等等。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实行的民族压迫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愤怒。对群众的剥削在不断加强。同时,捐税日益加重,物价不断上涨。不仅工人,而且小职员和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也都看到,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东方。过去的一年还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对东方事态发展所作的列宁主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过去的一年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的地方甚至比我们预料的发展得还要快。在东方开始出现工业振兴的背景下,这些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运动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令人十分信服地证明,帝国主义的统治正从根基上发

生裂痕，它还证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具有无比巨大的潜力。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在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已经增长。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些思想正缓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渗入印度，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叙利亚和摩洛哥发生的事件证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会发展，从而削弱帝国主义，加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队的力量。

拉丁美洲也可能和应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据点。在目前情况下，生活在拉丁美洲的民族大部分是被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迟早要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苏联。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带，即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无产阶级业已战胜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联盟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实行长期孤立和包围的政策，尽管苏联在内战期间受到严重破坏，苏联还是很快地把自己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在日益扩大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苏联在国内建设方面还必须克服种种困难，然而苏联无产阶级所开始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目前已经引起全世界日益壮大的、广泛的劳动者阶层的深切注意和热烈同情。甚至多年来对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进行疯狂攻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现在在工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正在巩固，正在克服它前进道路上的极严重的困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现在越来越成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成就。苏联正在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核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目前,在整个世界局势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两个体系、两个世界之间的主要矛盾。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暂时还保持着相当不稳定的均势;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美帝国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国际政策方面,美国在必要时拉拢英国作为盟友(美英集团)。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集团内部没有矛盾。只要列举一下美国 and 英国在中国、摩苏尔、墨西哥等这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样这也并不等于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英集团施加影响的对象),也没有内部矛盾了。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在1925年有了新的发展。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中国、日本、土耳其和南美等问题上所存在的矛盾,是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矛盾。英国本身是美国的债务人,而拥有最发达的生产力和积累了庞大资本的美国目前几乎成为整个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债权国。美国目前不仅为其商品寻找销售市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为其资本输出寻找市场。而英国则遇到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和失业问题。英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试图孤立苏联,阻挠它参加世界贸易和取得国外贷款,同时还对它采取包围的政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进攻。

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真面目,为了掩盖从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重重矛盾,去年制造了一付假面具,目的是欺骗劳动群众。这付假面具就是罗迦诺公约。

罗迦诺公约的客观作用可以归结如下:

(1)美国资本主义利用这个公约来巩固自身的利益,以对付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的“和平局面”给美国提供了这样的保证,即保证债务人从事“正业”,并不折不扣地偿付给美国利息。同时,

美国也怀着不满的心情看到,欧洲的“债务国”正在作初步的但软弱无力的尝试,试图联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跟美国对抗);(2)英帝国主义通过这个公约来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以反对法国(英国是“保证人”和仲裁者);(3)法国资产阶级正在巩固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反对德国(拉拢英国作为盟国);(4)英帝国主义在法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通过罗迦诺公约来建立一条反对孤立无援的苏联的战线,为此便把德国也拉过去。

通过国联来“巩固和平”的方法(特别是罗迦诺公约之类的条约)越来越暴露出实际上是为了准备新战争而采取的。由于国联的活动,特别是由于罗迦诺公约的签订而引起的和平主义幻想,无疑在工人群众中还起着一定的影响,原因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都赞许国联所进行的欺骗,而国联把整个第二国际变为其本身机构的一个环节。然而,整个事态发展要求破除这些和平主义幻想,向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与该阶层最接近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彻底揭穿国联的虚伪性。在全世界广大劳动者阶层中日益形成这样的思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苏联的巩固是反对新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共产国际才是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强盗战争的唯一领导者。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话来作一个总结:

(1)在美国和大洋彼岸的其他一些国家中,资本的力量已经加强了。

(2)在1925年下半年,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尖锐化了。

(3)生产资料大量地集中在有银行资本作后盾的托拉斯和卡特尔手¹。无论在美国和英国,还是在法国和德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托拉¹化程度的提高。

(4)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对抗尖锐化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是主要的对抗,而现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对抗则日益发展(同时,我们也不应对其他一些重大对抗,如美日对抗、英法对抗等等估计不足。)

(5) 道威斯计划开始破产。

(6) 500 万人失业(如果把家属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

(7) 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中等阶层趋于贫困化。

另一方面:

(1) 在占世界 1/6 的土地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这方面还有严重的困难(苏联)。

(2) 在占世界人口几乎 1/4 的土地上,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工人革命运动正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中国)。

(3) 在摩洛哥和叙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变为直接的战争。在印度和埃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缓慢地、然而不断地成熟起来。

(4)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共产党正在得到锻炼,工人运动正在发展,虽然有高潮也有低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工业的形势有关。

共产国际反对匆忙地作出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有任何“稳定”了,但共产国际也一如既往地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将重新巩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一再证明共产国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持的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是不可动摇的。在资本主义局部和暂时稳定的时期里,由于没有出现直接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可以而且应当相应地改变某些工作方法,但是共产国际的目的和活动基础则仍然不变。

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现象和 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最近这个时期里，各国广大工人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表现得极为强烈，同时近年来跟着改良主义走的广大工人阶层，对改良主义的估价有所改变，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也产生某种失望情绪。在目前条件下，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要求统一的愿望。

这些新现象是由以下一系列原因引起的：

1、一系列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重新导致广大工人群众状况的恶化(有时甚至是绝对的恶化)。

在英国。失业现象的规模越来越大。第一个“工人”政府——麦克唐纳政府的试验给改良主义幻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资本的进攻引起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矿工)，使广大工人群众懂得，工人阶级必须采取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

在德国，失业人数大量增长。广大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同时，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准备赔偿给已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朝 20 亿马克。政府危机层出不穷。赋税负担日益加重，物价不断上涨。

在法国，金融危机的后果大有完全压在劳动群众头上之势。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件在工人们看来不能不是未来“大规模”的帝国主义冲突的小小演习。毫无出路的议会危机和政府危机向广大劳动群众清楚地表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病入膏肓。

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巴尔干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2、在欧洲许多大国，联合政策（即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

联合政府的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办法来赐给群众以恩惠)显然已经破产。在法国、德国、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内,恰恰在是否可以继续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斗争。反对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继续参加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人物无疑也反映了(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社会民主党普通工人的不满情绪。这些普通工人根据联合的实践消除了(或正在消除)改良主义的幻想,确信这种幻想是不可实现的。但这绝不等于说,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层已经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老毛病是可能复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复发。但是在我们采取正确策略的情况下,感染改良主义幻想的周期会不断缩短,直到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争取过来为止。

3、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群众起着巨大的影响。即使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暴力、对内战抱有特别深刻偏见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阶层,目前通过活生生的事例认识到,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苏联是工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唯一国家,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逐步提高的唯一国家,这个国家不能不对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起吸引作用。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苏联进行的老一套诽谤,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到苏联来的工人代表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起了并且还将起巨大的作用。

4、最近这个时期,一系列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本能地感觉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又逐渐临近。全世界都在扩张军备,把战争赔款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帝国主义者对日益高涨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实行镇压,不断签订新的秘密条约——这一切促使社会民主党工人意识到一场新的世界规模的大屠杀的危險,而要避免这场屠杀,只有依靠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巩固的团

结。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有无党派工人）产生了新的情绪，首先引起他们要求工人阶级队伍统一的真诚的、普遍的和自发的愿望。这一切使得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象英国、比利时、瑞典等这样一些国家里取得了初步的巨大的成就。

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这种要求统一的真诚愿望，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应当坚决地和衷心地表示欢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才为真正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导致英苏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导致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胜利，导致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斗争（要求无偿地没收霍亨索伦王朝的财产的运动），导致瑞典的工会运动战线上工人团结的初步成就，导致挪威工人党思想的发展，等等。

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开始（至少在口头上）改变自己的策略。在第二国际中，除了公开主张对苏联实行自卫策略的考茨基“派别”以外，还出现了主张跟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左”派（奥托·鲍威尔是最令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它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圆滑的改良主义外交家。因此，奥托·鲍威尔及其同伙（如法国的孔佩尔—莫雷尔）的转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群众的情绪起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同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们继续对共产国际进行诽谤，对它进行最阴险和最恶毒的攻击。正是这个奥托·鲍威尔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马赛代表大会上，在一份对苏联和东方各民族表示“友好”的决议案上加了这样一段话：“共产国际在散布幻

想,似乎红军的刺刀会给工人带来解放。共产国际认为,为了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共产国际之所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是指望依靠这种运动,通过战争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们清楚地知道,事实上不是苏联在准备新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政府在准备新战争来反对苏联,他们故意利用社会民主党工人对战争的正当的厌恶情绪,在伪善的面具的掩盖下,以上述种种伪善的言词来离间工人们同苏联的关系,从而打消社会民主党工人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反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另一种惯用手法,就是企图把“自己的”共产党人(即本国的共产党人)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坏分子,似乎这些共产党人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同,是无法跟他们合作共事的。他们就是采取对本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加倍污蔑来达到上述目的的。

最后,为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策略,某些社会民主党领袖还采取以下办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比共产党人还坚决得多的“统一的拥护者”,同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在共产党人放弃其独立政党的思想并同意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才能够建立真正的统一。

不言而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根本谈不到什么合并的问题。不然就是直接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完全否定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而存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工人阶级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尽管有种种巨大的困难,但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为,公开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准备进行这种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全体无产阶级才可能而且无疑一定会联合起来。

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声明,共产国际将以空前

未有的努力来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建议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人可能达成协议的一切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共同斗争和采取共同行动反对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坚决要求各支部必须坚决、大胆和真诚地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工人要求对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斗争的愿望，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起来以便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行动（即使在最低口号的基础上），必须对社会民主党工人抱同志式的、关怀的、端正的态度，以便使他们有可能跟我们一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领袖们（包括“左派”领袖们）的客观作用的评价。这种评价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中都已提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坚决驳斥那种认为必须“修正”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取消派见解（例如法国右翼反对派和其他一些抱有取消派情绪的“共产党人”的意见）。

共产国际并不怀疑，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将仍然跟过去一样破坏工人的统一战线，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甚至在一般的共和主义者也会支持工人的问题上也要进行破坏。然而，业已变化的局势使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群众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首先必须估计到这一点。

共产国际仍然坚持认为，统一战线的策略绝不是跟社会民主党上层结成议会联盟的策略，更不是共产党跟社会民主党上层合并的策略，也不是共产党放弃自己在宣传鼓动工作上的独立性的政策。共产国际仍然认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无非是在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的一种方法，是有组织地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是把大多数

工人争取到共产国际方面来的一种方法。在当前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策略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国际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的精神经常地重新教育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反对统一战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常常说什么共产党人实际上不希望有统一战线。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统一战线”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为了实现工人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对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阶级动员的口号。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鼓动触犯了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话，那么正是因为这些领袖们阻碍工人们联合起来为实现其切身要求而进行的斗争。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倾向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图从他们那里寻求出路，同样，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企图从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队伍中的典型代理人）那里得到鼓舞。

在获得高超额利润的基础上，美国资本寡头通过收买和腐蚀美国工人运动的整个上层，来大力促进工人贵族的形成。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最卖身求荣的“工人”贵族领袖们的手里。美国的美帕斯工会通过建立大量的“工会”银行，在工人当中推销工业企业股票等办法，实际上直接跟资本主义企业“长合”。工会会员在不断减少；工会正在变为几乎只是工人贵族的排外性组织。泛美联盟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不让“他国”工人进入美国，以免影响工人贵族的特权。这些“工会”的领袖们对苏联进行最恶毒的诽谤。

正是这种“杰作”使欧洲许多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羡慕不已。在德国，在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里，这些领袖们都在鼓吹工人运动

“美国化”。开始仿效美国，建立起与企业主勾结一起的“工人”银行。工人贵族上层人士购买股票被说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阿姆斯特丹的左派领袖们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看作是摆脱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救星。他们用“美国化”来对抗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同苏联无产阶级接近的自发要求。除了道威斯计划以外，美国“恩赐”给欧洲的还有龚帕斯的工人运动“美国化”。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世界工人揭露这一政策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实质。

三、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危机和 反对“左”右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各年轻支部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整个时代的过渡性质，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党内往往有一大批从社会民主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成员，党内没有公认的领导骨干，社会民主党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我们，等等。共产国际的任务整个说来是帮助各支部尽快地和顺利地度过危机，并使党处于这样的状况，即危机现象成为罕见的例外。欧洲的客观形势对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有利的。而主观因素，即共产党为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进行准备的程度，则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过去的一年里，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危机已完全消除。如果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1925年3月）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状况还十分紧张，那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本届会议召开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团结起来，纠正了路线，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意大利共产党内多年存在的极左的危机（博尔迪加）通过不久

前召开的代表大会已顺利结束。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党内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脱离共产主义基本路线的倾向。意大利共产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使她在群众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不久的将来无疑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事态发展是说明应当如何克服右倾的一个例子。而意大利党内的事态发展则是说明如何克服极左倾的例子。

德国共产党所经受的危机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1923年事件失败和布兰德勒中央垮台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同意把领导权交给“左派”，虽然它知道，马斯洛夫、费舍、肖列姆会犯最严重的极左错误。在法兰克福（左派）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坚决同上述集团的错误进行斗争（在工会问题和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上）。从领导权一落入上述集团手中时起，共产国际就提醒党要防止该集团的错误。当看到该集团不可能摆脱极左倾向，而且从极左分子当中已经分化出一批能够把事业担当起来的优秀工人时，共产国际便支持解除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领导职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致德国共产党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1925年8月）中所阐述的路线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已经有可能接近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党在实行统一战线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横在我们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之间的墙已开始倒塌。为了彻底消除1923年事件引起的危机，德国共产党必须彻底克服极左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肖列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正在使党倒退。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在纠正这些“领袖们”的错误时，不要因此失去还跟着这些“领袖们”走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不要重犯海德堡的错误（即把左派工人群众开除出党），不要对德国共产党内尚未完全肃清的右派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法国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观形

势使得法国共产党在不久后将起极巨大的政治作用。客观形势对法国共产党的工作是极其有利的。这里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法国的右翼反对派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彻底反共反革命分子(苏瓦林)之外,除了公然从共产主义倒退到工团主义的集团(罗斯梅、莫纳特)之外,除了不理解新的任务只知重弹社会民主党老调的颓废分子(洛里欧)之外,在法国的反对派中无疑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或者由于对工人党内部的某些不正常现象表示正当不满而倒向反对派的。法国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1)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并使全党生活民主化,以便造成一种使目前的右翼反对派瓦解并使优秀分子回到党内来的局面;(2)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恢复党的纪律,不惜将不愿同苏瓦林及其同伙决裂的人开除出党。

波兰共产党已度过了严重危机的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极左错误几乎断送了党。不久前结束的波兰共产党代表会议就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等所作出的决议是共产国际赞同的,并对党走上正确道路极其有利。最近半年来,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故态复萌——表现在德国、意大利、波兰。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倾向可能会带来特别巨大的危害。这种倾向的主要危害就是不善于争取群众,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甚至不能明确地提出把工人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问题。

在德国反对“极左”倾向,在法国反对右翼反对派——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当前反“左”右倾的路线。同时,在个别一些党内,共产国际仍象过去一样既要反对极左倾,也要反对右倾。共产国际活动的基本路线仍然不变——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根据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既善于反对左倾,又善于反对右倾。

不言而喻,反对极左倾的斗争,只有在不给右派任何机会把这种斗争说成是他们的胜利的情况下,才是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

过来说也是一样。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无论对于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都是适用的。

四、共产国际的任务

1、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主观因素，即工人阶级团结的程度如何，共产党已壮大到何种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历史形势是否能应付裕如，这些问题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共产党虽然预见到（通过对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可能相当缓慢，但必须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对革命形势比较迅速的发展作好准备。共产国际最近几年内的极重要任务就是：殷切关怀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使它们受到政治教育和实际锻炼，使它们在组织上团结一致，具有坚定不移的思想和革命信心，善于接近群众。

2、目前，欧洲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经济上走入死胡同，尽管资本主义有了局部的“稳定”；资本主义欧洲的生产力不是下降就是停滞不前；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美帝国主义日益把欧洲变为自己的附庸；广大工人群众，包括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内，日益坚决地寻求摆脱目前局势的出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相信，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联合”政策不会给日益深重的危机带来任何解决办法——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坚决、更有力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自己拯救欧洲的纲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个口号早在1923年就为共产国际所通过）以及实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在宣传建立欧洲联邦作为西欧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摆脱民族

资本和美国资本的双重压迫的途径这一思想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把欧洲联邦的口号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欧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关系的政治表现；第二、同实现欧洲联邦口号密切相关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应当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而应当理解为整个革命震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欧洲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然后在所有国家里取得胜利；第三、欧洲联邦的口号意味着，获得解放的欧洲各民族只有在完全自愿和充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才能结成联邦；第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一口号意味着宣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并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跟上述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宣传“社会主义欧洲联邦”或“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口号，如果循着正轨道路进行（批判和讽刺用庸俗和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联邦”口号的作法，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那么一定能收到巨大的效果。

同时，在欧洲许多国家（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还必须特别有力地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

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同苏联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同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核心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股使美帝国主义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

3、针对国际联盟召开的国际会议（经济会议和裁军会议），各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的总的纲领性观点，向广大劳动群众解释如何沿着反资本主义的政策的道路来拯救欧洲的具体纲领，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4、除了开展这种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外，各国共产党还必须善于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一系列具体的、局部的要求，最近时期的行

动纲领,以及适应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时间的最低要求,在这方面,应当把旨在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和促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并能得到(而且已经部分地得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支持的那些要求提到首要地位。

5、要求统一的愿望——这是说明几乎全世界工人的现时情绪的一个基本特点。要求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坚定;人们意识到,不恢复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形势就会越来越恶化;统一的口号,特别是工会统一的口号,在工人阶级当中越来越流行——这些就是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

6、在这个基础上,目前必须特别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广泛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策略的基本要点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几次扩大全会不断加以具体化。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整整一个时期内(直到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为止)的策略,因此它必须适应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具体化。

目前特别应当提醒一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后来由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发展和补充的策略决议。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策略观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正确的,因此无需作任何“修正”。

7、目前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心是工会运动。目前各国工人运动中所形成的“左翼”,其特点就是它们的工会性质。因此,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工作便越来越重要。帮助工会中的左派分子,支持他们要求工人阶级力量团结的愿望,为恢复每个国家里工会统一的斗争,争取建立统一的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这就是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杠杆。共产国际认为,为了有利于统一,一切

共产党人都将同意工会国际不再独立地存在，在召开两个工会国际的统一世界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合并，但各自保持宣传的自由。当前，在这种合并还不可能实行之前，每个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尽力协助工会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完全同意联共(布)中央关于作为工会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苏联工会根本谈不到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声明，因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目前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工具，它不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对工人的统一消极怠工，等等。

共产国际坚持认为，法国共产党(当然必须取得统一劳工联合会的同意)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然必须取得红色工会中央的完全同意)必须百倍努力地执行共产国际在工会统一问题上的策略。共产国际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会给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共产国际认为，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克服这种保守主义，那么在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成功地争取群众方面就无法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从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出发，特别是从争取建立统一的具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出发，共产国际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英苏工会团结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这方面的其他任何真诚的尝试。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相信，即使在英苏委员会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日益广泛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思想必将胜利。从这个角度出发，共产国际将全力支持已经在苏联展开的、并对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斗争具有越来越重大意义的工人代表团的运动。

8、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常常出现以下两种错误：

(1)在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方面，我们党曾经提出一些为具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所显然不能接受的要求，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例如，法国共产党在向法国社会党人建议成立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共同阵线时，提出要求对方接受撤退法国军队和同里弗人

联欢这一口号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

(2)为了争取跟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我们的党组织有时竟承担义务不说一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话，即放弃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自由（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组织不久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无论前一种情况或者后一种情况，都是不能容许的。宣传法国军队从摩洛哥撤回和法国军队同里弗军队联欢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要求改良主义者工人支持这些口号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则是完全错误的。尽一切努力争取跟社会民主党工人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是绝对正确的；但放弃独立性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充分地宣传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争取跟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达成协议的主动权，即使这种协议是建立在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阶层所能接受的最低口号的基础上，只要这些口号符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路线。这些要求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接受并符合他们的愿望的，而却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难以接受的（或是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加以接受的）。围绕着没收德国旧时统治人物财产问题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了解共产党人在现有的和将来可能成立的工人政党（象英国工党那种类型）中的作用，就会给统一战线的策略带来重大损失。

不了解共产党人不能仅仅给社会民主党人写一封或几封“公开信”就算了事；不了解不能仅仅在形式上点缀一下“统一战线”；不了解共产党人在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到宣传上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到组织上的巩固——这些错误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中还普遍存在。

共产党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牢牢地记住，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有其危险的方面。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是出于不得已（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跟我们达成协议的，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力图使共产党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尾巴，即取消共产党人的党性，并在紧要关头，他们不是把整个运动出卖掉，就是使运动朝着资产阶级的方向改变性质。

在采取一切共同行动和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情绪作种种让步的情况下，共产党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应当完整地宣传自己的纲领，应当把运动日益推向前进，并跟群众保持联系。

9、同时，当然谈不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的问题（这个建议是不久前英国独立工党提出的）。有时候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提出这类建议，他们的目的是：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来破坏可能实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企图提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建议（两党合并），来破坏共产党工人跟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当前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上，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行动中达成协议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恢复完全的工人阶级的国际统一，建立一个包括工人阶级所有力量的统一的国际是共产国际将来要实现的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正是为了实现这项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严重的斗争中和通过重重的困难缔造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这些党彻底对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动摇抱誓不两立的态度。建立唯一能够始终不渝地捍卫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独立的共产党，是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的一项成果。

10、至于英国独立工党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责成主席团以公开信形式答复英国无产阶级。

（1）解释为什么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不可能合并的原因；

(2) 建议英国独立工党和英国无产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立即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在英国矿工同矿主和政府的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支持矿工。鉴于英国矿工目前的斗争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也向整个第二国际建议成立支持矿工的统一战线。

11、当然，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在于指望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但统一战线策略的内容不限于此。在有利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提出一些能够吸引某些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局部要求。例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首先受害的是小资产者阶层。小资产阶级的直接危机不断出现。又如在目前法国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小资产者阶层可能而且必然会被吸收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行动。这也可以包括象没收旧时统治人物的财产的运动。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宣传鼓动中缺乏具体内容是我们党的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克服这个缺点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12、在许多国家中，农民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这种现象反映在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农民组织中。在这些组织内部形成了左翼，等等。日益有组织的争取农民的斗争开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草案、劳合一乔治草案等）。某些重视农民工作的共产党（意大利、法国）的努力已经收到巨大的效果。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跟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协调起来。

13、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崛起和那里工人运动逐渐加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使欧美工人关心这一事实，向他们说明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使欧美工人懂得支援东方并跟东方合作，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同时，共产国际应当尽最大努力来全面支持和关怀东方国家的工人组织，使它们日益跟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汇合在一起。

14、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主席团密切注意具有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一切前提的日本工人运动。这一点目前尤为必要，因为改

良主义者企图(今后在美国社会叛徒们的帮助下更企图)控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日本工人运动的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来对同样具有远大前途的中国工人运动施加资产阶级影响。

15、关于新的、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流血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如果工人革命不在战争爆发前胜利的话),正日益广泛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传播。全世界工人正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只有跟苏联密切联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反战的斗争。在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事业上,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共产党人应当注意把这方面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6、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正是在目前的革命斗争比较沉寂的时期里,要更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和生活中去,把大多数工人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使自己即使不成为本国唯一的工人政党,也要成为国内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工人政党。

17、在许多国家里,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处于非法状态,必须采取一系列艰巨的、顽强的、反复的尝试来摆脱地下状态和利用合法机会。应当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一切工人组织合法化、支持反对白色恐怖的斗争,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暴露自己的真面目。

18、共产国际认为,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共产党内还缺乏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党内民主。最近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党内危机就是由于缺乏党内民主而变得尖锐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常常被解释得过于机械。结果,来自下面的主动性就受到束缚,并给党的新生的领导干部的形成造成困难。中央委员会有时脱离党员群众。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或那样的倾向就容易形成派别,从而变得特别危险。

共产党只能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但是,在运用民主集中制时,不仅要自上而下地进行领导和下达指示,而且要使我们

党的全体党员群众的意见和意志能够真正自由地自下而上地得到反映。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纪律，而且是纪律加上领导机关真正地由选举产生，加上在党内对一切问题(除了问题已事先解决而采取直接行动时)进行自由讨论，加上普通党员的真正的首倡精神。

鉴于这一切，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再一次坚决要求那些还没有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共产国际支部，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

19、必须特别重视共产党在大工业中心和大工业企业中的工作。必须指出，在许多地方，共产党支部还是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支部，而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共产党人的影响还很小。各国共产党必须特别注意本国最大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企业，并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强有力的共产党支部。

20、鉴于在欧洲某些主要的国家里失业现象普遍存在，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特别重视失业者的运动。共产党应当承担把失业者组织起来并领导这一运动的事业，竭力使这一运动不脱离工会，不脱离在业工人的运动。然而，当工会在反动领袖们的影响下拒绝给失业者以应有的帮助时，共产党人必须建立失业者的组织，并通过一切措施支持他们的斗争。

21、在某些国家(保加利亚、波兰)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采取恐怖手段的危险。在保加利亚工人中，鉴于刽子手章可夫所建立的制度的缘故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迷恋于采取类似炸毁索菲亚教堂的行动，尽管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个人恐怖手段。在波兰，有一个时期也出现了采取恐怖手段的倾向。

共产国际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共产国际在反对这种斗争方式时，完全遵循正当的革命原则。共产国际反对小资产阶级一小市民式的对待革命暴力的问题。每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知道，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把世界从资本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力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耻辱。然而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反对个人恐怖，他们没有忘记，用个人的单独行动代替群众斗争的做法，只能败坏我们的运动，分散和瓦解我们自己的力量。

22、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右派或意大利极左派反对这一组织原则，只能证明这种反对意见是同他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倾向联系着的。同时，在按工厂支部的原则建党时，不能过分采取直线式的方法，而必须根据地方的情况作具体的修正，在必要的地方，允许按居民地区同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23、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提高党的基本骨干的思想水平的工作，不要忘记，在目前的喘息时期里，一分钟也不能虚度，要使共产党人做好未来战斗的准备。

24、非党组织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已为国际工人援助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农民国际、合作社支部等组织的经验所证明。应当比过去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把是否有可能广泛地建立欧洲工人的非党组织，其任务是进行反战斗争、经常地支援苏联的建设等等提上日程并进行探索，是十分及时的。

25、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组织工作应当加强和系统化。共产国际应当比过去更大力地吸收实力最强的支部参加对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见书记处拟定的草案）。这不仅是个组织问题，而且是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问题。尽可能更积极地让年轻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共产国际的各项工作，是使这些共产党更快地和更正常地成长的一个条件，是使这些党成为一支能够领导本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件的力量的前提。

• • •

广泛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策略实行的范围将年复一年地扩大。

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这个口号将成为共产国际今后全部活动的基本口号。要越来越多地注意通过在工会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来争取工会！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

要大力地吸引全世界工人注意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要使国际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工业化进行全面的援助！

要更多地注意东方！要使工人们懂得，东方的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具有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

要更多地注意新的大陆！注意拉丁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

争取农民！争取居民中的中间阶层！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阶层。为此目的，必须在适当场合下提出最低要求，以便不仅把怀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而且把其他劳动者阶层（小农、小职员等等）团结在自己周围。

反对新的战争危险！

支持派遣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的运动！

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实现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译自《真理报》1926年2月16日。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
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2月20日)

一、引 言

同志们!会上已经给大家发了执委会的书面工作报告,里面有许多与我的报告有关的具体材料。此外,还给大家发了经过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并基本同意的提纲。由于大家已经部分地了解了与我的报告的主题有关的大量材料,可以说,我的任务就轻松一些了。因此,我只引用少量的数字和事实。

大家都记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确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已经暂时到来。可以大胆地说,1924年就具有这个时期的标志。1925年初召开了上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这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1926年则是动荡的、较不巩固的稳定时期。我认为,清楚地说明目前时期的这一特点是这次全会的重要任务。尽管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完全相对的,但是我们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不夸大这种情况和不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想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以下一段话作为我的报告的基础: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

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①

我们不应忘记这些话，特别是现在，当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谈论资本主义稳定的被不巩固时更是这样。预计到这次全会的某些内容，我要说，它的主旨将是工人阶级统一的思想，工会统一的思想。这里我又要提醒大家列宁的一句有名的话，他指出“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②我认为，目前这个“环节”就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口号，首先是在工会领域内。

关于革命发展的两种前景

同志们，正如大家知道的，自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早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也还特别现实和有效，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还将谈到），这就是说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建立在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的基础上的。这怎么理解呢？这里指的是关于发展速度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上的两种前景，但决不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本身。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上历史的日程。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代还必将经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一个前景，不可动摇的前景。但是从速度、期限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② 同上，第577页。

的意义上说，——这对每个政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的意义上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可能性，这一点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得已经十分明确。

关于革命发展的速度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曾经指出，共产国际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上应该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1）革命冲突迅速成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一一四一五年内取得胜利；（2）世界革命缓慢成熟，延缓发展。

同志们，当然在我们的斗争和工作中存在两种可能的前景有其不便之处：有时候这被认为是折中主义，被说成是共产主义在极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坚定的路线。有时候被说成是——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情绪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我们愿宁以不甚可喜的前景作为出发点，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前景。两种前景的存在实际上不是由于我们的折中主义，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缺乏远见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共产国际目前所处的时期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情形。在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毫不怀疑；他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仍坚定不移地相信，第二次俄国革命必定会发生，因为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革命任务，革命的动力依然存在。但是在革命的速度和期限问题上——它是否过两年或者过十年一定会爆发——，在这个问题上，在1905年以后不得不长时间地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

那时候，也不乏想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说成是某种折中主义的企图。但是，那不是折中主义，那是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分析了整个情况，得出结论：从第二次革命发展速度的意义上说，不得不暂时估计到两种前景。而这种情况绝不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变成为机会主义的或者不够坚定的策略。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有点类似，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世界范围内情况要比在一国范围内复杂得多；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特别是许多国家的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情况非常复杂，现在要在世界范围内预先估计到速度和行进路线就困难得多了。

现在是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和平心静气地来分析德国1923年失败、保加利亚两次失败以及烈韦里最近一次失败的原则和教训的时候了；发生上述失败的这个时期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极其困难的时期。我们应当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事件。1905年的失败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是1906、1907、1908年和以后年代进行研究的对象。在革命刚刚失败以后，我们曾缺乏经验和清醒地、平心静气地分析这些事件的客观态度。

同志们，我们现在在评价德国也可以说整个欧洲中部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首先应当指出，这些教训把争取群众的必要性问题庄严地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不能在这个报告中专门来谈这些教训，这是进行独立研究的课题。我只想谈一点，我号召共产国际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事件上，并联系我们所面临的一方面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另一方面确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任务来加以考虑。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谈开始时提到的关于两种前景的问题。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应当抛弃这两种前景，并且鉴于资本主义稳定的不巩固而立足于一种前景，那么我要回答说：不！在关于

革命速度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而在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上更其如此),我将在进一步分析目前形势的过程中竭力说明这种必要性。

关于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

先谈一谈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开始时我们或许把自己的目光过分地局限在中欧了。这可以说是有些“迷恋于”德国的时期。当时我们觉得,继俄国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就轮到德国了。在1925年召开的上一届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英国上,把德国革命的前景稍稍推后一点,到1923年底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情况特别严重,而1924—1925年由于暂时稳定的结果发生的变化显得特别出奇。因此在1925年初,在我们的扩大全会上,我们对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问题稍稍持怀疑态度。现在德国和中欧又遭到了经济和政治困难。毫无疑问,在巴尔干地区资本主义比较稳定,但同时巴尔干地区现在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生巨大不测的策源地。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的运动,它也包含着许多意外的事件。同志们,大家可以看到,要总的评价形势并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地理路线是多么困难啊!我们要想概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我们就应当说,显然革命提上日程的首先在**欧洲**,其次在**东方**。但是我们看到,欧洲革命是同东方的民族革命高涨密切联系着的;两个过程是互相紧密交织和平行发展的。只能相对地来单独考察它们。然后是**美洲**。(1) **欧洲**; (2) **东方**; (3) **美洲**。同志们,无论在欧洲,无论在东方,还是在美洲,也都应当区别其明显表现出来的特点;特别是在美洲,我觉得南美国家将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对革命最近发展的可能行进路线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同志们,我认为这里也应当估计到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前

景。共产国际的成长和成熟必将表现在善于预见、善于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切可能的行进路线并从中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欧洲和东方

英国工党主席和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克烈姆普先生不久前写了一篇包含着“英明”计划的文章：国际为何要分裂，莫斯科为何要斗争？难道不能和平地进行谈判并在某些国际之间分配一下大陆吗？欧洲交给阿姆斯特丹国际，它在欧洲拥有多数；这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是莫斯科，莫斯科同亚洲各国相当接近，它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亚洲精神；为什么莫斯科不能成为莫斯科-亚洲国际的所在地呢？根据克烈姆普先生的意见，这种和睦的分工就可以解决莫斯科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纷争。“第三”国际就在美洲，它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克烈姆普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取得“辉煌成绩”，它已使墨西哥工会运动站立起来。克烈姆普在发挥自己的英明计划时说，这样来划分彼此之间的“势力范围”，我们就可以结束现时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这个相当天真的建议反映了英国改良派领袖的“聪明才智”。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无需来驳斥这个“英明的”计划。很明显，我们想要在莫斯科建立的不是莫斯科-亚洲的国际，而是世界性的国际，而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

直接以资产阶级名义说话的某些先生要比这位克烈姆普对事情了解得更好，设想得更清楚。

例如，美国政界的一位高级官员不久前曾这样评论我国苏联宪法的意义。

照他看来，“苏联新宪法因它的创立者而闻名，不是作为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作为实现一定政策的步骤。为了体现这一点，苏

联的国徽改变了,根据第70条规定,它是由放置在地球上的镰刀和锤子组成,同时有些国家染成红色,表示今后这个红色将普及各地”。

这真是新发现!

而这位达官贵人的结论是这样:“这里说的不是苏俄个别热心者反对美国机构的宣传,而是苏联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国际联盟的坚定决心,一切国家迟早都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事实上加入这个联盟。”

大家看到,这位资产者对事情的了解要比克烈姆普好一些。

我还要引用一下沙辛先生登在《大陆评论》杂志2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的动员》。

“布尔什维主义不能用袭击夺得欧洲堡垒,于是企图包围它,阴谋夺取它。它无耻地同西方的所有敌人勾结起来。在东方,没有比第三国际更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了。在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暂时相符合的借口下(1),它支持民族英雄和东方的资产阶级,而在俄国则对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农民让步。”

“欧亚两洲之间的‘不可摧毁的桥梁’——共产国际可以引为自豪的唯一产儿就是汪达尔人向欧洲文明进攻的道路。著名的‘农民梵蒂冈’就是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能得到反映的麦加。”

大家看到,沙辛先生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把我们的目光都放在东方。因此这个问题具有紧迫性。我们的所有敌人,包括英国的改良派领袖,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进行某些修改,把注意力忽而集中在中欧,忽而集中在西方,忽而集中在英国,忽而集中在东方,或者以相反的顺序进行。有一点是清楚的:共产国际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组织,尽管从运动速度的意义上说具有两种前景,但是在无产阶

级革命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则牢牢地站在以前的立场上。

.....

五、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和成就。极左派的基本错误

我在这里曾经谈到过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错误确实是严重的。哪些错误最重要呢？我们且来列述一下。这些错误如下：

最严重的错误是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一策略。在某些同志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写两三封公开信，而信写得好坏，这是次要的事。信写了，事情就算完了。不期待答复。

第二个错误是超揭露。人们希望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实际做的毋宁说是揭露自己的无能。鲁特同志领导下的德国党尤其表现出这样的事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选举兴登堡的事。

绍列姆：对，对！

季诺维也夫：既然绍列姆同志认为是“对”的，那就是说确实是对的。在选举兴登堡期间，我们正在开扩大全会。应当客观地说，曾经在这里开会的同志们，包括鲁特同志在内，很快同意我们对这一错误的警告。后来同志们回到了德国。兴登堡当选了。德国党中央在选举后的第二天给社会民主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建议如此如此，不过我们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工人阶级将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多么反动；换句话说，我们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并充分相信你们是恶棍。”这是超揭露的最典型方式。既然你们真的确信这一点——我也确信这一点——，那就在公开信上不要这么说了。如果你们骂他们，那么这样使他们更易于摆脱困境。

错误的第三种形式是不正确地理解工党的问题。这个毛病已

经有其老根了。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不得不反对主张退出工党的某些英国同志。这实质上是如何解释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场斗争。英国人曾经反对这一策略。我记得，各种各样的同志曾支持这种意见，好象有塞拉蒂和博尔迪加。假如英国的同志们不在工党内，我们在英国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吗？现在我们在哪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以致右派打算把我们开除出党。我们对他们是个威胁，围绕这个问题正在进行一场斗争。现在在挪威，这个问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谁不善于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谁就主张反对工党。

另一方面，我们也碰到这样一些倾向，有些同志认为，如果维护工党，那就应当取消共产党。我不知道这两种倾向中哪一种倾向更糟糕，大概是两种倾向都同样糟糕。如果共产党按照第二种观点行事，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成为工党的左的尾巴。两种错误我们都不应当犯，而应当同它们进行斗争。

还存在着老的错误的某些心理上的残余。例子就是：在开展没收邦君财产运动期间，有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建议一起行动，而共产党人回答说：“你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可不支持你。”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象在柏林那样同社会民主党人打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达成统一战线。不，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这里有人常常抽象地提出问题：怎样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同志们说：“来自下面——对，来自上面——不！”这都是极左派特意设想出来的，以便冲淡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使它化为乌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它作了明确的回答。那里说：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是永远必要的，除非当一部分被社会民主党愚弄的工人站在街垒的对面手执武器进行直接军事行动的时候。在其余场合下，永远是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完全允许既来自下面也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

但是应当牢牢记住，第五次代表大会摒弃的是只实行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即议会的联合。

极左的词句和妥协的行动

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左的错误就是如此。也有右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1923年萨克森的政策。这是把统一战线解释为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公开政治联盟的例子。德国共产党和全体德国工人阶级由于萨克森的试验而取得的惨痛教训使我们防止将来犯这类错误。我们不允许今后重复这种试验。

最近时期德国党生活中的又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策伊特茨。这个错误是由一个小的地方组织犯的。这虽是一个小的地方组织，但对于极左派来说是特别典型的。不能低估小的地方组织，有时它们最明显地暴露了弱点。当问题涉及到上层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要知道那里是一些锻炼有素的议会主义者。他们善于这样说话，以便使谁也不懂得事情的真正实质。但是，如果是小的地方集团说话，那么有时它最清楚地表明某些极左派的实质所在。我认为，策伊特茨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要比极左派前几个星期和前几天的一些长篇的声明更令人信服。我对这些声明评价不高；我希望实际上更快地结束极左的病症，那时就用不着声明了。共产国际断然不需要右的和极左的倾向。这种对称毫无用处。如果它确实没有了，那更好。但是目前在德国极左的危险还是很大的。我们要彻底地同它进行斗争。

总之，策伊特茨的例子要比许多声明更有意义。极左派领导的策伊特茨的组织决定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并签署协议，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必须完全停止相互斗争——言论上和行动上，或者其他任何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象1923年萨克森的方式。我觉得，必须确认这个病症并坚决消除它。是早就

应该研究和克服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极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时候了。

统一战线的成就

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是的，不但有，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认为，我们取得最大成就的首先是在英国。英国党所做的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

在德国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已在德国兴起和我们已经深入群众。

在比利时也取得了成就。比利时也象奥地利一样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比利时，我们之所以有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不是因为王德威尔得阁下在那里主宰，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党是小党，但是很团结，它在工会统一和政治统一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巨大成绩。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哥德堡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是无产阶级几个巨大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真正集中的序幕。造成我们瑞典党的病根的霍格伦脓疱破裂了，党清除了不健康分子，现在正在争取广大群众。霍格伦现在在哪儿呢？基尔博姆同志告诉我，霍格伦在编一部全集，你们知道是谁的全集吗？是布兰亭的！霍格伦是做这件事的非常合适的人物。而据基尔博姆说，施特列姆“大叔”（霍格伦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斗争的委员会。这些先生们的下场就是如此。

我想说，中国党的政策也是在加紧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过不是在工人中，而是在另一个社会阶层中。

最后，必须一再地指出的一个成就，这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到

苏联来的代表团和英俄委员会。

我认为，我们并不处在只热衷于无休止地批评错误的境地。我们也有巨大的成就。这说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应当看到障碍和困难并加以克服。道路是正确的。我们有一切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

为争取群众而斗争

提纲上说，正是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里，我们应当善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政党。这是不是有可能呢？我认为有可能。在这方面，捷克党的例子是很典型的。一年前，捷克党发生了危机。在它的压力下，一些捷克同志说，目前不可能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成为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党。有些同志这样提出问题：要么布尔什维克化，那时我们就变成小党，要么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那时就把布尔什维克化撇在一边。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化原则上是好的，但这颗果子现在还不到季节。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正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走向群众性的政党，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任何宗派主义格格不入的。我们说：正是由于巧妙的布尔什维克化，我们才能成为工人群众的政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正在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因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不再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保尔·弗勒利希同志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很有意思的材料^①。

^① 保尔·弗勒利希《德国社会党目前扮演的角色》，《国际》杂志第10—12册，1925年。

1925年3月，在844000名党员中有1200名党的领导官员，7000名工会官员，600名中央和地方议会议员，6500名城市管理机关人员，30000公共事业管理机关人员，1500名市长，2890名市政管理人员等等。调查表明，在政府机关和工人组织机关中总共有50000多名社会民主党党员。此外，在社会民主党内有100000名小商人和家庭主妇（非工人妻子），10000名啤酒酒店业主，70000名中下级官员和100000名技术和商业职员。总之，调查表明，在现时社会民主党内，有350000名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500000无产者。尽管无产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在党和工会机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

目前我接到瓦尔加同志关于不来梅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对不来梅社会民主党的详细调查，诚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组织，但这是最优秀的组织之一。那里情况也是这样。

统计资料只包括8643名党员中的7465名，也就是说有1178名列在“职业不详”栏内。主要分类如下：

1、独立从事手工业的人——大部分是手工业者

（例如面包师、理发师、制鞋师、裁缝等）；

饭馆主人——101274

2、独立从事商业的人（小商贩）.....65

3、职员、自由职业者

其中：

国家机关职员.....307

私人机关职员.....162

技师.....92

店员.....84

铁路员工.....83

工会和党组织职员.....71

工程技术人员·····	46
4、家庭主妇·····	1356
5、“其他职业”·····	37
6、熟练工人·····	3336
7、非熟练工人·····	1447
	总计：·····7465

如果把前五类算作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情况如下：

小资产阶级·····	2682 (35.8%)
熟练工人·····	3336 (44.6%)
非熟练工人·····	1447 (19.3%)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社会民主党正在成为工人贵族的政党，它被日益溶化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在美国，这一过程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在欧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胡作非为，甚至想赐给旧日的邦君10亿马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通过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不善于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是蠢货。社会民主党已经丧失了50%的工人，而在道义上丧失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当然，在选举时他们还会得到很多选票，但是我们有苏联作后盾，它正在成长壮大；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我们是衷心地希望把工人阶级而不是把工人贵族组织起来的唯一政党，我们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为此首先应当善于运用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久前，在一些重要的政党内，如德国，发生了一场关于柏林市议会选举中提出联合名单的争论。中央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失业现象的增长、工资的降低、工人群众总的物质状况的恶化、社会民主党的蜕化和变节为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就是蠢货和庸才，或者说就是犯了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

在没收邦君的财产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极左派说，这纯粹是议会的问题。现在谁相信这一点呢？谁都清楚，这是通向群众的道路，要知道这样的道路我们这里还不多，因为其中许多路被社会民主党设置了障碍，而能够走得通的、使我们有可能面向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的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六、反对极左的和右的倾向

德国的极左派

近年来，在某些党内，如在德国、波兰，部分地在意大利、法国、挪威，出现了极左倾向的某种复发。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和波兰，那里这个病症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当前的过渡时期里表现出极左的错误，我看远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就明显地可以看出，1925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过渡年，例如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在关于工人运动左翼发展的问题上，在关于改良主义幻想的曲线如何急剧下降的问题上。我们的影响在某些国家内开始增长，可以感觉到稳定不是那么有力的。这对极左病的复发正是合适的时期，因此它严重地表现出来。不能说，在极左派阵营中没有某种准备和组织性。无论如何，在波兰和德国的极左派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协调和串通。某些波兰同志常常“及时地”到柏林来，以便维护“波兰的”极左观点；我不以为极左派向共产国际路线的进攻是由于贞洁受孕而发生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波兰，那里极左的党中央同时反对法国党，反对德国党，反对保加利亚党，说实在的，反对整个共产国际。我们必须对

此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些各种极左派别的公认的代表，我们衷心地表示欢迎。这里有博尔迪加、路特-费舍、罗森贝尔格、绍列姆、多姆斯基——他们会说，我们将作出答复。我不想事先妄加评论。或许我们会听到新的论点。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了关于德国极左派的最新消息。从中可以看出，极左派开始在分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要知道，这是我们国际的一些同志。我们不想采取这样的政策，似乎跟我们打交道的是阶级敌人。我认为，那样诚恳地放弃错误的同志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如果他们愿意按照共产国际的行进路线和政治路线走的话。但需要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纸声明来证明这一点。而对于其余的人，则必须斗争到底。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明确起来。总之，极左病的这种复发是最近一年来共产国际生活中的极重要事件之一。我们应当对它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

同志们，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提纲上说，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右倾在法国，极左倾则在德国。现在，反对德国的极左倾和法国的右倾决定着共产国际的道路。不应忘记，正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就有时可能会增加右的危险。得到我们支持的德国党中央的现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时，必然会出现右的危险。右的危险已在一系列国家中表现出来。在法国，这是主要的危险。在意大利，在某些同志身上已有这种迹象；其中有些人甚至在党代会上维护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理论。右的危险在挪威、荷兰也有，那里象怀恩科普、拉文施坦这样的领导人也采取不能容忍的立场。拉文施坦转到资产阶级报纸方面，并从那里攻击荷兰共产党。我们在罗马尼亚也有右的错误，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克里斯廷斯库对错误负有责任。

我们也应当估计到这些危险。我们知道，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类情绪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同志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依然不变：既不向右派也不向极左派作任何让步。我们应当抓住个别一些支部并问问自己：哪种危险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最迫切的危险，并根据危险的程度首先给予打击和彻底加以揭露。

我认为，我们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所持的路线是正确的。显然，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我们列举了主要的东西：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法国的右的危险。有人会说：你们忘记了巴尔干；没有谈青年共产国际，没有谈妇女；对挪威注意得太少，等等。不过我们不可能来谈论所有这些详情细节，我们只能指出最重要的、对于当前形势来说最典型的东西，并制定总的路线。我认为，这个方针指出了法国的右的危险和德国的极左的危险。

最近几天传来一些新的消息。有人说，罗森贝尔格和绍列姆开始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听维贝尔和其他同志说，绍列姆已经不是极左派。我们暂时还不确信这一点。等全会开完后工作开展起来再看吧。不过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是这样，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目前看来这一点还是正确的。近来我觉得——我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过这一点——，德国甚至存在着一种出现平行的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我不知道，我是否夸大了这一危险。如果夸大了，那就更好。在目前情况下，极左派政党是历史地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它绝不能危害我们的事业。

德国党内还出现了另一种病症。大家想必还记得舍恩兰克的文章和开除他的事。有时人们说，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但是，正如在策伊特茨事件中一样，这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些同志说，舍恩兰克是个诚实的人，他没有被收买。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但他是个懂得问题之所在的人，也是道出了别人之所想的人。

中央把他开除了，而有一位同志，绍列姆同志在开除他时弃了权。（绍列姆喊道：“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不知道，从什么观点看可以对开除了一个坦率承认自己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的中央抱不信任态度。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绍列姆同志认为有必要对中央抱不信任态度。（绍列姆喊道：“那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发表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文献之一。（绍列姆喊道：“我不认为。”）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不久的将来未能使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是不可救药的人了。你们是否认为，没有这封信，德国党的未来的顺利发展是可能的吗？我不想说，信件创造了历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而信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法国的右倾危险

尽管右派大喊大叫法国党的破坏和灭亡，但是它的情况客观上是良好的。法国的右派叫嚷说，法国共产党“正在死亡”。他们一字不差地重复着1910年俄国取消派所说的话。我们的敌人是善于更好地估计形势的。

巴黎政界的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士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活动作了这样的评价：

“近来，共产主义在法国取得了显著的和无庸置疑的成就。

除了迄今为止存在的街头混乱以外，在我们军队和警察队伍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瓦解迹象。共产党人竭力利用国家遭受的一切不幸来进行有害于法国及其声誉的鼓动宣传。

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呢？

因为他们在国内找到了最适宜于激起人们愤怒的土壤。执政党个别集团之间的矛盾，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新的赋税引起的中小居民阶层的日益不满，而主要是，法国为了维护自己在非洲

和地中海的利益而进行数月之久的顽固的和血腥的摩洛哥冒险，为共产主义的反政府宣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利的环境。法国共产党人和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利用摩洛哥战争来在国内和军队里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庆祝摩洛哥及其领袖们的独立，街上不断发出‘乌拉’声。在军队里，逃兵现象，拒绝积极行动或拒绝调往前线的现象层出不穷。8月2日，规定了举行抗议战争的总罢工。逃兵现象达到了迄今为止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规模。甚至发生了整个队伍转向敌方的现象。此外，在布列斯特发生了一些舰只人员的罢工和暴动。布尔什维主义甚至渗入到社会公用事业机关和民政机关的队伍里，特别是邮政和银行工作人员中。”

这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有相当观察力的敌人说的话。怀疑他对我们同情是绝对不可设想的。而并非属于同类的右翼反对派对形势的估计则不同。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在右翼反对派的队伍中有三个派别：

第一个派别是过去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从共产主义“倒退”到了改良主义。这毫无办法。我记得，当罗斯梅说他将加入党时，我和一位同志（罗斯梅的朋友）打赌。我深信罗斯梅不会加入党。打赌我输了。罗斯梅加入了党。但过了一年半实际上退出了。他是个工团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在前进，而右派希望我们后退。

第二个派别是苏瓦林。按其性质来说，这一派渗透着反共主义和反动情绪，在许多方面很象布勃尼克主义。我不想说，苏瓦林的人品也象布勃尼克一样。布勃尼克被资产阶级公开收买。对于苏瓦林，我不这样说。但是，这一派的客观作用是同样的：瓦解共产党。

第三个派别（洛里欧）退回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有位同志告诉

我洛里欧对共产国际的看法，这是值得注意的。据洛里欧同志的意见，当俄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我们外国革命者就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它。那时，我们外国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承认这一切是因为俄国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俄国革命当时处在危急之中。然而，现在俄国革命巩固了，就该重新考虑这一切，就该享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了。

我没有文件来证明这些话。或许这是不真实的，而洛里欧同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据我对洛里欧的了解，他是完全可能有这种看法的。照洛里欧看来，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危险的时刻是正确的，而在危险过去的时候就不正确了。总之，这是退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洛里欧一派重新回到共产国际方面来，并竭力消除他们的不健康情绪。不过，如果不成功，那就毫无办法了。

在法国的右派当中也有一些好工人，他们不满党内的制度并起来反对中央。那里实行着过分机械的集中制，老实说，那里党内的民主太少了。有些工人支持反对派只是表示对这些情况的反抗。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法国党中央在1925年12月的代表会议上承认了这些错误。对于德国来说，先得从莫斯科写公开信。在法国，中央的同志们自己得出结论，自己写了信。当然，这样就好得多。中央明白了自己的错误，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党又会赢得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

右派的原则路线

现在我来谈一谈这个反对派的原则路线。右翼反对派首先反对在生产支部的基础上重建党。你们想必知道有250人签名的右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先从反对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说起。

他们在声明中说：“在法国，支部现在不可能成为党的基础。不然就等于不考虑国内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国的结构，不然就等于不相信使党迅速和彻底灭亡的社会力量的真正对比。但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说明党的新制度毫不中用。支部容易滋长循私行为，此外还会碰到能使它灭亡的内部困难。我们根据经验相信，支部的存在有赖于书记的才能和稳定性。

但是，在同一个地区内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活跃游手好闲的支部的政治生活的书记。正因为这样，同志们只限于应付日常事务，散发传单，审理他们的工厂所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偶儿听听区里代表的报告，并请他快点讲，因为每个人都急于回家，因为住所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最重要的问题讨论起来漫不经心。常常是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对党员的教育没有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增加宣传员也无济于事，因为结果反正都一样。支部将来会瓦解，因为谁也不去活跃它的工作。要拯救党，就必须抛弃一年来采取的方式。中央建议发展机构，此外还建立‘街道支部’和‘分区委’。这些设想都是见鬼！它们不会消除祸害，而只会增加祸害。

我们在这封信里不想详细地分析党组织的问题。我们只想说，必须立即回到地区支部作为党的组织基础，而绝不是撤销工厂支部甚至还要竭力扩大工厂支部网的做法……”

即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结束的组织会议的文件，你们也可以估计一下在我们国外支部中建立工厂支部的经验。我们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切实地提出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作表明，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们在实行这个体制时将作出某些必要的修改，但这种方式本身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意大利的极左派，如同法国的右派一样，反对这一体制。为什么呢？谁都清楚，工厂企业和工厂企业中的支部对于我

们来说是基础，而右派和极左派否认这一点。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右派的这份声明中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提法和解释，特别是关于摩洛哥战争。

他们写道：“中央希望无论如何把摩洛哥撤军和实行联欢的思想强加于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联欢是句空话，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确，为什么不谈从尼斯、萨瓦、科西嘉撤军呢？迄今为止，撤军的口号只是引起了即将实现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失败。”

请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上签字的同志们原谅我，我只能把这种观点叫作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而不能叫作别的。（喊声：“对！”）假如他们如此好心肠地谈论尼斯等等的割地，谈论应当怎样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所作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法律。这派人在这里露出了妥协派的耳朵。这使我尤为愤懑。

我们党尽管犯有各种错误，但勇敢地起来反对战争，而这类反对派竟在这样的时刻起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和写信反对共产国际，并以如此讥笑和蔑视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不要求从尼斯等地撤军呢？”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语言。

法国党中央可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从不作出让步。

反党的“250人”政策

在信的结尾处说：“党在喘吁，党在死亡，与此同时，社会党由于拥有10万党员而在复兴，在重新赢得图尔分裂后失去的影响。资本主义在巩固，在稳定，在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总之，我们党正在死亡，社会党正在成长，资本主义正在满怀

信心地迎接未来。应当说，我在上面曾经援引的那位有威望的人士对法国形势的理解要比洛里欧更好。

当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为党争取反对派中的好同志和无产者，但是必须同这个右派斗争到底。如果我们作出让步，那么共产国际除了一块招牌以外还剩什么东西呢？党必须善于进行实际的工作，领导广泛的辩论，同时跟右派进行斗争，提出纪律的问题。法国曾经有过党内的反抗。发出过反对 250 人签名者党的宣言、传单等等。他们没有服从中央机关的决议。一些反对派党员参加由被开除出党的罗斯梅、苏瓦林及其同伙出版的、具有鲜明反党倾向的杂志。有一位反对派中的工人在这里参加会议。我问他，怎么能维护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信件，怎么能同苏瓦林合伙呢？有人说：没有看就签了名。这是可能的，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你们现在看一看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把你们拖后到社会民主主义去了。他们似乎从左面来批评党，企图利用党的每一个错误并把党的整个生活纳入错误的轨道。正当党真正重新找到了通向工人群众的道路，日益紧密地与其保持联系并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情绪的唯一表达者时，他们却说，党正在死亡。不过这些乐曲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熟悉的。孟什维克一直这样说，结果是自己在政治上死亡了。现在在法国这样叫嚷的人是些政治僵尸，而我们党正在大踏步前进，尽管它也象我们德国党一样犯了许多错误。

我不想说，法国党内的情况都很好；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将详细地来谈论这个问题。这里我不说了。法国还存在着一些极左危险的表现。这特别反映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扩大中央全会上，对这些表现还要进行研究。情况特别糟糕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列入极左派而实际上犯有极左错误的派别。我指的主要是工会方面的工作。我们在提纲中说，法国没有尽力在工会领域中贯彻统一战线。这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种不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

必须消除组织制度上的缺点，必须同党内存在的一切坏事作斗争，必须剥夺极左派在工会领域中的基地。

不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首先同法国的右翼反对派进行斗争，因为假如我们党向它作出某些原则性的让步，那么我们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

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
1927年俄文版第10—15、41—52页。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

(1914年8月—1926年12月)

一九一四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革命原则,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一起,逆流而上,揭露第二国际的破产,公开宣传建立新的第三国际,并着手进行建立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

9月,季诺维也夫一家随列宁之后移居瑞士伯尔尼。

10月,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积极为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而做准备工作。

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复刊,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任编辑。在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33号上刊登了列宁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等文章,还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反潮流》一文。他在文中强调指出,目前,在整个国际中流行着一种沙文主义的通病。我们毫不掩饰,目前这股沙文主义潮流十分强烈,这种流行病已经广为蔓延。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使我们推卸自己的责任。相反,它却无条件地迫使我们逆流而上,实行反潮流。“反潮流”当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战斗口号。

12月5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步孟什维克的后尘》、《重要文件》等四篇文章。其中,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一文中,季诺维也夫具体阐发了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口号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我们应该举起国内战争的旗帜。真正无愧于自己名字的 国际,或者在这个口号下复兴,或者在这个口号下灭亡。”

12月12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和“保卫祖国”》一文,文中强调:“当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党内

取得胜利时，第二国际就停止生存了。代替第二国际的将是新的国际。”

一九一五年

1月9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非好汉》一文。在文章中，他热情赞扬了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李卜克内西，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其他人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叛徒。

2月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1905年1月9日到1915年1月9日》、《“魏尔事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坐在别人膝上的大学生》、《也谈马尔托夫的转变》等四篇文章。在《“魏尔事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季诺维也夫在指出魏尔是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的同时，强调说，诺斯克、哈阿兹、弗兰克之流要更坏些，从他们对魏尔的谩骂中可以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个“肮脏的马厩”。

2月12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俄国解放的命运》一文，文中批驳了希望俄国在战争中取胜的种种论调，阐发了列宁关于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思想。他指出，俄国军队在战争中失败对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最为有利。这样，俄国人民就能迅速推翻沙皇制度并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同时，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很快会波及到其他国家，转变成一场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

2月27日至3月4日，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在伯尔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3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抢劫者》一文，文中指出，把德国社会主义目前的危机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危机，是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不过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抢劫者的行径。

5月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资产阶级的“五·一”节》一文，文中谈到，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叛卖性地要求工人群众为战争而放弃自己的节日，使工人的“五·一”节变成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节日。

5月2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赦免”和它的预言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未来的国际》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揭露了考茨基之流企图通过相互“赦免”来恢复国际，掩盖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背叛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后

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在现时正式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实质上有两个政党、两种阶级意识形态、两种纲领在斗争着；民族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策。他认为，目前，德国左派的首要义务是同那些抛弃了旧的旗帜的过去的同志实行组织上的分裂，并迈出坚定的步伐去建立与机会主义者实行分裂的社会主义的国际。

7月11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由罗·格里姆在伯尔尼召开的研究筹备左派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他提出把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列入代表会议议程和只邀请真正的左派参加代表会议等建议，但被会议否决。

7~8月，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合写《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

7月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王德威尔得怎样同库达舍夫公爵拟定俄国社会党人的共同意见》一文。

8月2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和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陛下的“社会民主党人”》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无论是把和平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还是把和平主义当作战争结束前的鼓动口号都是错误的。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口号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9月5日前，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合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译成德文，并单独印刷成册。这本小册子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分发给会议代表。

9月6日至8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并同列宁一起组织起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上，他们同占多数地位的“中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会后，季诺维也夫同列宁、拉狄克被选进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并参加左派常务局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编辑部的工作。

9月11~12日，《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开始连载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政论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

9月25日后，季诺维也夫被指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10月1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和《战争和俄国革命危机》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

☆ 有星花的文章是收入本书的文章。下同。——编者注

中，季诺维也夫简要介绍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及其思想面貌。他指出，会议组织者的打算与其说是召开左派的代表会议，不如说是召开“中派”和左派某种混合的代表会议。他认为，尽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多数派代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声明，他们不希望建立第三国际。但是，事态发展的进程将导致这样的结局：与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愿望相反，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将成为新的第三国际的第一块基石。

11月2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我们的胜利》一文。

12月2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残酷监禁中受折磨》一文。

一九一六年

2月5~10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扩大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会议。

2月18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爬进合法状态》一文。

2月29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再论国内战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考茨基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这不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背叛了他自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

3月25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写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召集的二月国际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并决定公开地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这是在成立第三国际的道路上、在摆脱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状态方面前进了一步。不过，不要用幻想来欺骗自己。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有许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我们毕竟还不能最终地说，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究竟会走向何处。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季诺维也夫通过信件往来同列宁一起为迎接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召开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4月24~30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有了进一步增长。由于列宁、季诺维

也夫等左派的坚决斗争,会议的决议有了一定的进步,并扩大了对建立第三国际思想的宣传。会后,左派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形成了固定的小组,这些小组以后成为第三国际的核心。

6月1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4~55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一文,文中介绍了昆塔尔会议前的状况、会议成员的构成和会议的简况。季诺维也夫认为,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最重要、最富有战斗性的问题是对待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这项议程实质上解决的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的问题。他指出,谁对旧的国际局抱着某种希望,谁就是朝后看。应该大胆而公开地号召各国工人同叛徒们决裂并建立自己的第三国际。

8月4日,季诺维也夫完成了自己的长篇理论著作《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的第一部分。

10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前的失败和现在》一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2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二国际和战争问题》和《阿德列尔会晤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文章。季诺维也夫在《第二国际和战争问题》一文中谈到,“中派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总是帮助机会主义,而现在又在帮助社会沙文主义者。”他表示,当前首先要反对“中派马克思主义者”,并提出,“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为第三国际而奋斗!”⁷

11月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崩得的“国际主义”》一文。

一九一七年

3月,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等正在瑞士伯尔尼。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后,季诺维也夫立即同列宁一起起草了《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案》。在这个提纲草案中,提出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

4月7日,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参加了在伯尔尼文化馆召开的有法国、德国、瑞士和波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参加的会议。季诺维也夫后来指出,这次会议“事实上具有第三国际的第一次预备会议的意义。”

4月16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一批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瑞典返回俄国。

5月7~12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在参加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问题上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列宁认为,应该不参加或仅仅作观察员、为了解情况而参加会议。季诺维也夫在其向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则认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会上不仅要了解情况,而且要争取其他左派,达到全体左派共同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目的,并建立起第三国际。四月代表会议通过了季诺维也夫的决议草案,否决了列宁的提议。

10月23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为领导起义而设立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同加米涅夫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

10月29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坚持反对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立场。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他在其中一篇题为《迎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说:“和平消除危机的最后希望已经消失了。很遗憾,本文作者直到最后几天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和平的最后希望,但是这种希望被生活粉碎了。”

一九一八年

2—3月,布尔什维克党内由于布列斯特和约发生了重大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站在一起,对“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进行了斗争。

一九一九年

1月24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3月1日,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会上,德国共产党代表埃贝莱因根据德共和卢森堡生前的决定,不同意立即建立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协助列宁对埃贝莱因进行了说服工作,希望他能支持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的主张。然而,说服工作没有成功。

3月2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布)中央发表《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建议就在这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

第三国际。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次会议只应确认为一次代表会议，所以我们认为暂时同意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不过，今后我们仍将为尽快成立作为正式机构的第三国际而进行宣传。

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还代表俄共（布）作了工作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俄共（布）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回击了对所谓“红色恐怖”的攻击。

今天的《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3月4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会议辩论是否应该立即建立第三国际问题时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发言。他热烈支持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提案，并论证了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月5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也是他起草的。

3月6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巴黎—柏林—莫斯科》一文。

晚上，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3月20日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3月20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

3月3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署名为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的《来自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呼吁》一文，文中指出，匈牙利革命是一系列革命的开端，结束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时刻来临了。

4月20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文，此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上。文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再过一年我们将会忘记在欧洲曾进行过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因为再过一年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欧洲。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转移到美洲，或许转移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4月，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签发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书》。

5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出版。季

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杂志的主编。

5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签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由于对匈牙利的进攻而发出的呼吁书》。其中号召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士兵和工人不要充当扼杀革命匈牙利的刽子手。

5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发表的《致全世界劳动人民书》。

6月1日,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社会民主党是反动派的工具》一文,文中指出,“旧的正式社会民主党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工具。这不是论战性的词语,这不是夸大,这是客观的、可以说是科学的真理。”“应当从资产阶级手中把这个工具夺下来,把它粉碎、消灭。那时,对资产阶级堡垒的最后冲击将不会如此困难了……”

6月2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工人书》。文件号召西欧和美洲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制止英、法军队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

7月15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致全世界工人书》。文件针对第二国际预定在8月上半月召开卢塞恩代表大会一事,号召工人们在这一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以表示对第二国际的蔑视和愤怒。

7月24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致协约国工人书》。文件要求“协约国”工人们发动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治罢工。

9月1日,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议会和苏维埃问题的通报》。通报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强调说,绝不能混淆以议会政治作为理想的政权形式和利用议会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问题。

在今天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对第二国际的起诉书》一文。

9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书记巴拉巴诺娃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独裁工具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和建立红军——这就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几项任务。

10月1日,在《共产国际》杂志第6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的一个开端，俄国革命能够支持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预言，“共产国际很快就会发展成各个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世界国际。”

12月初，在《共产国际》杂志第7～8期合刊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一文。

12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全俄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分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针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一事指出，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建立的党，现在同他们断绝了关系，把考茨基之流看成是世界工人阶级的耻辱。这是共产国际道义上的伟大胜利。

12月13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发出的《致法国工人书》。文中赞扬法国工人把沙杜尔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表明法国工人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号召法国工人打碎锁链、掌握政权、变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专政。

12月13日前后，季诺维也夫在全俄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共产国际的讲话，说明共产国际在全世界都有了自己的支撑点。

一九二〇年

1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共产国际告全世界工人书》。呼吁书是专门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一周年而发的，它强调说，任何屠杀也无法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行进。

1月17日，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信》。公开信号召法国所有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建立单独的组织，并向无产阶级的叛徒公开宣战，将无产阶级队伍里依附第二国际的分子清除出去。

1月18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公布了《共产国际关于乌克兰各党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共产国际“一大”上有代表权的仅仅是乌克兰共产党(布)。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必须使乌克兰所有的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

1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信》。信中号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加入共产国际，并建议它联合一切能在紧要关头采取革命行动的工人和组织。

2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函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邀请他们派代表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在地,谈判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一文的前半部分。

3月,季诺维也夫向俄共(布)九大提出了创立新的工会国际的建议。

4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致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文章提到,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工会国际组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季诺维也夫认为,关于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的建议将受到全世界工人的欢迎。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建立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发出《给各国工会的信》。

5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五·一”节和共产国际》一文。

5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0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后半部分。文中分析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统一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组织的状况,论述了共产国际“二大”将要讨论的对待议会制和工会的问题。此外,文章提出了防止“中派”分子钻进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内部继续他们的旧政策的问题。

6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

6月16日,季诺维也夫同法国社会党代表弗罗萨尔和加香进行会谈。

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及委员塞拉蒂、博姆巴契、格腊齐亚德伊、列宁、布哈林、卡拉汉、巴拉巴诺娃、克林格尔等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信》。信中指出,只有开除右翼领袖,独立社会民主党才能加入共产国际。

7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签署的《对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被奴役的人民群众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于1920年8月15日在巴库召开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工农代表大会。

7月6日,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致电法国社会党中央。电文中谈到,弗罗萨尔和加香已接受共产国际的原则,将代表法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二大”。

7月上旬，季诺维也夫同列宁频繁地交换对召开共产国际“二大”的具体事宜的意见。

7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一文。文中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共产国际同第二国际激烈斗争的一年，是共产国际得到很大发展的一年。

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季诺维也夫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开幕，并致了开幕词。在选举主席团时，季诺维也夫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7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一文。文中指出，在共产国际“一大”时国际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趋势。在召开共产国际“二大”时，国际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有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由于这个组织的迅速发展，它已经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7月23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季诺维也夫批评了潘涅库克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的论点，指出，工人群众在革命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采取行动。那些以“左派”自居，否定党的作用的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几十年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机构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在大战中垮台的是旧政党，我们要建立起新的共产党。我们阶级的党越强大，取得胜利的道路就会越短、越容易。共产党应该是集中制的、军事化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党。

7月24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在第三次会议上，当讨论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参加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荷兰代表怀恩科普作了反对的发言后，季诺维也夫起来进行了驳斥。他表示，要继续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但是，当每一个群众性的党想同我们一起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时，我们就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谈判。

7月27日，在共产国际“二大”公报第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两条道路》一文，后又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上。

7月28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在辩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塞拉蒂发言后，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反驳发言。季诺维也夫

指出，塞拉蒂指责我们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党人有义务支持任何革命运动。

7月29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共同签署了《致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致法国全体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公开信。

7月30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八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对为什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没有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和能否现在接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问题作了解释性发言。

7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共产国际今昔》☆等文章。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指出，“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宣传和鼓动的机构。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必须直接领导各国运动的战斗组织。”

8月4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在对《共产国际章程草案》进行辩论时，季诺维也夫作了发言。在发言中，季诺维也夫反驳了美国代表团关于不应该把工会包括在共产国际里的意见，指出，革命工会应该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并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起来；他反驳了怀恩科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变成扩大的俄国委员会的说法，指出，5名委员从执委会驻在国来，其余10名委员从其他各党来，这不会使执委会变成一国的执委会，只会使执委会真正具有国际性；他还反驳了列维关于3个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的提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该是随时工作的机构，不能各党每隔三个月才派出自己的代表，开一次摆样子的会议。

8月5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可能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条件》的报告。报告指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建立苏维埃，不要建立人为的组织，否则会使苏维埃的思想威信扫地。

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工会问题时作了发言，指出，不应该摧毁数百万人的工会，而应该使工会革命化，并把它引上我们的道路。为此，必须深入到旧工会里去，“到群众中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世界工人运动的主流正沿着共产主义的河床滚

滚前进。我们已经看到一条共产主义的大河。但是，在这条大河旁边也还有许多溪流和小河，我们要使它们汇入共产国际的大河。

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8月27日，季诺维也夫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布哈林、列宁等共同签署了《致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致意大利革命的无产者》的公开信。信中认为，意大利已具备进行一场群众性革命的最重要条件，关键在于意大利社会党必须清除自己内部的改良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

8月31日，在巴库苏维埃和阿塞拜疆工会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向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代表致欢迎词。

9月1日，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在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强调要把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潮流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汇集在一起，发动一场反对英法资本家的真正圣战。

9月7日，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9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和罗斯梅共同发表的《致法国工人》的公开信。

9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两条道路》等文章。

10月上旬，季诺维也夫由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洛佐夫斯基陪同，前往德国。

10月12—17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哈雷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同法国社会党代表龙格和列诺得尔进行了会谈。他表示，如果龙格等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条件，就可以考虑接纳他们加入共产国际。

10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离开德国前发出了《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公开信。在此之前，他还写了一本题为《在德国的十二天》的小册子。

10月2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冲击》一文。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17~1920年的国际革命》

一文。

11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霍夫曼、列维联合发表的《致英国革命矿工战士》，季诺维也夫和罗斯梅共同发表的《致法国工人》，季诺维也夫的《致意大利无产阶级》、《致德国革命工人》、《我的告别信》、《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建立苏维埃》和《论哈雷代表大会》等信件和文章。

1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上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季诺维也夫、列宁等同工会国际委员会成员托姆斯基等联合签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委员会致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以及季诺维也夫的《孟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一文。

同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希望法国社会党成为一个清除了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分子的、强大而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

一九二一年

1月15日前，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强调，意大利社会党必须在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和共产国际之间进行选择。信中希望，意大利社会党能彻底清除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

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接纳加入共产国际一事提出的抗议时，季诺维也夫解释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真正革命的工人组成的，执委会的决定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决定，德共对该党在行动上要宽容一些。

2月22—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8日发出的《公开信》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表示，《公开信》过于造作。他还认为，“不能号召工人同其他工人政党达成协议，我不希望真正的工人卷入这种协议。”

2月底，季诺维也夫派遣贝拉·库恩去德国。在库恩离俄前，季诺维也夫多次与他会晤。库恩在德期间参与了所谓“三月发动”的领导工作。

3月22日，季诺维也夫向俄共(布)“十大”作了题为《共产国际状况》的报告。

8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6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致巴黎的茹奥公民、致阿姆斯特丹的非麦恩和乌坚格斯特先生》,及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发表的《致意大利社会党佛罗伦萨代表大会》等文章和信件。

4月29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除德国外的其余的执委会委员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声明强调,即使列维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的看法十分之九是正确的,但由于他破例地违反了纪律,在特殊的情况下从背后打击了党,仍应把他开除出党。

5月24日,在收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后,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一文。

5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通告》。

这个时期,季诺维也夫积极投入共产国际“三大”的筹备工作。但是,他同列宁在形势和策略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季诺维也夫看不到形势已经变化,应该使共产国际的策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问题上形成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派不同意见的对立。

6月10日前,季诺维也夫组织了共产国际“三大”的《策略问题提纲》草案的起草工作。

6月10日,列宁在看了最初的《策略问题提纲》草案后,向季诺维也夫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指出,“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逐步地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首先是旧工会内部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6月10—1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会议。会议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决定在“三大”期间增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同时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关于执委会活动的报告》,向大会建议选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6月17、18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法国问题的会议。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向大会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把共产国际“三大”前

的形势描绘得比“二大”时更有革命性。

6月25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6月28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八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时,季诺维也夫建议大会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规定一个期限,以便使它能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决定它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和纪律,是否赞成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而在这之后,再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开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6月29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九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会议议程、开除列维、意大利社会党的状况等问题多次发言。

6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斗争的一年》一文。

7月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时作了发言。他谈到,同中派和半中派相比,“左派”作为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左倾却对共产国际构成较大的危险,它使共产国际有变成脱离群众的小宗派的可能。在整个发言中,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共产国际的打击重点应放在中派上。

7月3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工会问题时作了发言。他认为,在工会问题上当务之急是组织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规定共产国际对红色工会国际、各国共产党对本国革命工会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红色工会国际已拥有1800万成员,但还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应采取一切手段争取工会的多数。当取得工会的多数时,我们就取得了一切。

7月9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布)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做了说明。决议草案强调,代表大会将把进一步分散德国统一共产党力量的行动和任何建立宗派的行为看成是对整个运动的最大危险,并要求以前的反对派放弃任何派别组织,完全和无条件地服从相应的党的机构的领导。

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又一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当选后,致大会闭幕词。

7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援助受灾者和共产国际》一

文。文章号召西方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的灾民伸出援助之手。

8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中具体阐述了共产国际“三大”的策略方针。他指出,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特点在于:到群众中去,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最深处去,参加无产阶级的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将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使工人群众系统地、顽强地准备临近的搏斗。

9月8日,季诺维也夫出席在斯堪的纳维亚某地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代表会议。

9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共产国际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情况。会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执行局。

9月14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提议决定,《共产国际》杂志以后将一直以每期160页的篇幅出版。会议还决定,季诺维也夫继续担任杂志主编并负责杂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栏目。会议还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提议决定,今后将执行局改称为主席团。

11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发生的事情》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中指出,尽管在里窝那代表大会到米兰代表大会期间,塞拉蒂和屠拉梯把从1912年以来被党开除的15000名改良主义者又拉回党里,但党的人数却从112000下降到65000。这一事实表明塞拉蒂同右派联合的政策将导致意大利社会党的彻底崩溃。

11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一文。他在文章中把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并指出,有人把共产国际业已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堡垒进行的正确的然而缓慢的围攻,把共产国际刚刚开始细小的然而表面上效果不很显著的困难复杂的工作,看作是共产国际影响的衰落和“黄昏”。实际上,任何悲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共产国际已进入成年,已进入工作更为困难、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11月底,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制定工人统一战线策略的工作。

11月底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9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旧的目标,新的道路(论工人统一战线)》一文。这是共产国际中第一篇全面论述工人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

12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加入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提纲)》☆(以下简称《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4日,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同日,《真理报》全文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署名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22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在讨论《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时,季诺维也夫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再论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文。

一九二二年

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开幕式并向到会代表致欢迎词。他在欢迎词中强调,共产国际不仅努力成为欧洲的组织,而且要成为世界的组织,并指出,建立起无产阶级和东方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等一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月22日,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摘要发表在1月24、25日《真理报》上。报告指出,亚洲成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要加强欧洲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

1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欧洲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但推翻帝国主义的群众重心即步兵是远东被压迫人民。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决定世界革命的两股革命力量联合起来。

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闭幕,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指出,东方劳动人民正负起完成欧美人民开始的事业的使命。

2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

2月24日，上午，季诺维也夫在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作了《关于执委会的活动》的报告。

晚上，季诺维也夫在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有关系的，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俄国的狭隘的自私的利益。他谈到，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使害怕我们的策略的人暴露自己的面目，挖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根基。他又谈到，统一战线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社会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胜利就有了保障。

2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在结束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辩论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着重批评了意共和法共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反对意见，认为，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政府”口号是治愈意、法两国共产党所害病症的良药。他还强调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的必要性。

3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在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等文件后闭幕。

3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合写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一文。

3月14日，季诺维也夫将其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出席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交给列宁。列宁对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如删去改变对孟什维克态度的部分，在议程问题上仅仅提出争论最少的问题，不要由于会议的人员组成而使会议破裂等等。草案按列宁意见修改后，于3月17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

3月29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做《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一文。文中谈到，“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结束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获悉这次会议的详情细节。但据我们所知，我认为列宁同志说作了过多的让步，这是对的。”“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小小的开端已经奠定了。局部性问题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基本的前景。”文章最后指出，统一

战线的策略就是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家就是反对社会妥协派领袖。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和叛徒领袖们，这就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

4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22年的“五·一”节》一文，并在这篇文章后面又重新转载了季诺维也夫1915年所写的《资产阶级的“五·一”节》一文。

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全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何时召开？》一文。季诺维也夫指出，在预定于1922年5月21日召开的三个国际“九人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国际将最坚决地要求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哪怕其他两个国际都拒绝，共产国际也要单独展开争取工人统一战线的运动。

5月21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反革命的辩护人——王德威尔得到来之前》的短评，并以季诺维也夫1915年7月26日所写的文章《王德威尔得怎样同库达舍夫公爵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意见》作为代“欢迎词”。

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

在今天的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共产国际和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的报告，他具体建议了共产国际方面在审判中充当公诉人和辩护人的人选。他还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我们从上层和下层都开始了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能期望在上层取得巨大的成果。

6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辩论法国党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作了发言。他强调说，法国党要避免派别斗争，并要加强在工会中的工作。

6月11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按季诺维也夫的建议，会议一致赞同共产国际参加柏林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和关于“九人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并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制定了相应的决议。此外，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的组成，季诺维也夫参加了纲领委员会。

在今天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意大利共产党的状况作了发言，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只在经济方面贯彻统一战线策略的作法是用一条腿走路。他还指出，“工人政府”口号适合于意大利的情况。

6月23日，在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对制定

一个共同的纲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7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意大利社会党是怎样被毁灭的》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列举了意大利社会党在共产国际“二大”后两年时间里遭受的重大损失,并论证说,中派分子的全部客观作用还在于,使无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推迟,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困难化。

7月2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的诞生》一文,文中指出,在1920—1921年间法共只能算是希望成为共产党的党,现在法共正在诞生过程中。

同日,季诺维也夫给意大利社会党的拉查理、马费等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希望他们不仅要在口头上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国际,而且要用自己的正确决议来证明这一点。

8月7日,季诺维也夫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9月5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主席团的报告,并以主席团的名义建议共产国际“四大”增加下列三项议程:(1)十月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2)资本的进攻;(3)情报问题。

9月20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国际“四大”的议程问题,并做出决定:在10月25日将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审查共产国际“四大”的全部准备工作。

9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信中,季诺维也夫请德国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公开建议,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季莫费也夫去交换被德国政府关在监狱中的麦克斯·赫尔茨同志。

9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四大”的议程和报告人、副报告人的决定。由季诺维也夫担任第一项议程《执委会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今后的策略》的报告人。

10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的胜利》一文,文中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开始改变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这是共产国际的胜利。

10月上旬,季诺维也夫派曼努伊尔斯基等参加预定在10月15日召开的法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11月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

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四大”的主席团主席。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季诺维也夫对大会议程的补充建议。

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大会选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按照季诺维也夫的建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了开幕词，他强调说，我们整个时代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在于战胜社会民主党，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国际反革命因素。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俄国革命中不朽的东西》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要最简洁地说明俄国革命中不朽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就是世界革命的开端。

11月9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法、意等国问题委员会。他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11月10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工人政府”口号作了解释：一方面说，工人政府口号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条件下的某种具体的运用，工人政府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说，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正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1月12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六次会议上，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和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辩论结束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提出，工人政府有四种类型：（1）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2）社会民主党政府；（3）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袖以及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4）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他认为，工人政府口号既是使我们能深入群众的口号，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口号，我们必须善于利用这个口号。

11月19日，工会国际“二大”召开。季诺维也夫为工会国际“二大”的召开发去了致敬电。

11月20日前后，在共产国际“四大”第十八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主席团的名义就共产国际纲领问题提出一个包含五点意见的决议案，要求大会把制定共产国际纲领问题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在下次代表大会能制定出共产国际纲领。决议案被会议通过。

11月30日，在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突出谈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问题。

12月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一文，文中

指出，共产国际“四大”在使共产国际由各国党的联盟变成真正统一的国际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四大”使以前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更加具体化，更适合各国的具体条件。文章还强调了在“四大”上提出工会运动统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当共产国际提出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工会的统一口号时，它再一次挽救了国际工人运动。”

12月3日前后，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三十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意大利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意大利先进工人要刻不容缓地联合起来，建立起工人统一战线。同时，他对意大利群众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并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

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再次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并发表了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认为，每次大罢工、任何局部起义、甚至任何重大的议会危机，在目前不稳固的均势的条件下都可能转变为重大的革命发动，甚至成为革命的起点。在几年之内我们将转入进攻。

12月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被确认为《共产国际》杂志主编。他在会上通告了共产国际同红色工会国际达成的一项协议：彼此不再交换代表，而是由两个执委会共同组成行动委员会。

在执委会扩大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建议让塞拉蒂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并享有发言权。他的建议被通过。

一九二三年

2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和意大利社会党》一文。文中指出，包括塞拉蒂在内的一些人已经是共产国际“四大”决议的拥护者，是共产党的同志和朋友了。这时，应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造成一个能够消除过去的斗争和分歧的新形势。

3月2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对福斯特的审判和美国工人运动》一文。

3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对“美索不达米亚人民代表”致共产国际书的复信。复信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解放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或国际联盟的帮助来实现。而只能通过伊拉克广大群众对占领者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来实现。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意大利社会党的状况》一文。

文章强调说，意大利工人应该学会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人阶级统一。如果上层领袖们准备统一，就同他们统一；如果他们暗中破坏统一，就建立没有他们的或反对他们的统一。

5月3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事物》一文。

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为解决德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而召开专门会议。季诺维也夫参加并主持了会议。会上，取消了德共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确立了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和图林吉亚邦政府的方针，表面上解决了德共的内部分歧。

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会议主席团主席，并作了长篇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他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战略手腕，指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始终主张对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工人群众，以及无党派工人群众接近和友好，以便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共产国际“二大”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满怀信心指望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我们有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立即诉诸群众，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从“三大”起，我们看到，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快，群众的革命情绪毕竟开始低落，资产阶级坐得更稳了，社会民主党所依靠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由于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放弃越过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愿望。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论述所谓战略手腕是否正当的问题时，他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承认，在反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斗争中存在着各种军事计谋，但是唯有这样的军事计谋不会败坏我们自己的军队。

6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第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辩论作总结发言。其中，他批评了保共对章可夫政变所持的中立态度，指出，保共应同农民联盟联合起来反对章可夫政府，促成工农政府的诞生。

6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主席团，并致闭幕词。

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保加利亚政变的教训》一文。

8月底，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布兰德勒等受季诺维也夫的邀请先后来到莫斯科，以便同俄共政治局成员共同研究德国革命问题。

9月2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国际青年日》一文。

9月2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德国未来的革命和俄共的任务》提纲。其中谈到,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马上就要到来。德共已经争取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施特莱泽曼政府没有掌握任何现实力量。

9月至10月上旬,共产国际召开讨论德国问题的特别会议。会上,路特·费舍、马斯洛夫等“左派”鼓吹直接夺取政权。季诺维也夫积极支持了“左派”的主张。

10月4日,在讨论德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作辩论总结时说,在德国目前阶段上工农政府口号是不够的,他支持立即展开直接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向会议通报了由他起草、经俄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德国未来的革命和俄共的任务》提纲。

10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保加利亚事件的意义》一文,文中对保加利亚九月起义的失败作了总结。

10月12日,季诺维也夫从今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真理报》上陆续发表《德国革命问题》一文。今天发表的第一部分的题目是《未来德国革命的典型无产阶级性质》。其中,季诺维也夫把1918—1923年的德国同1905—1917年的俄国作了类比,认为,“1923年秋季不仅是德国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二部分《关于所谓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联盟”的神话》。

10月19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三部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10月24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四部分《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

10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五部分《德国革命的内部困难》。

10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六部分《德国革命的外部困难》。

10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七部分《德国革命的临近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10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八部分

《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

10月31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九部分《德国革命和俄国的反革命》。

11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丢掉幻想》一文。文中指出,“在德国工人中还存在着一种幻想:指望社会民主党左派同战斗的无产阶级站在战壕的同一边来反对资产阶级。最近几周所经历的阶段的意义在于,这个幻想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11月1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挪威党的真理》一文。这篇文章是对挪威共产党领导人霍格伦在11月4日《政治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再次强调,宗教对共产党来说决不是个人的事情。

11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的霉菌》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揭露和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的反革命作用。

11月,《共产国际》杂志第28~29期合刊出版。在合刊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革命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季诺维也夫先前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的前言组成的。

12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革命的第二个浪潮》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认为,德国1923年十月革命和保加利亚1923年九月起义标志着战后国际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已经到来。

12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致美国共产党人》一文。

一九二四年

1月11~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德国十月革命失败问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德国事件的五份声明:季诺维也夫的声明、德国党中派集团的声明、季诺维也夫和中派集团草拟的另一份声明、拉狄克为布兰德勒提出的辩护以及德国党左派的声明。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季诺维也夫对德国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季诺维也夫则为自己进行辩护。

1月12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法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

1月16~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会上,季诺维也夫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报告》。在报告中季诺维也夫着重谈了德国十月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在德国问题上俄共整个中央委员会和整个政

治局都有责任。由于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要实行有节奏的退却政策。

1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执委会成员蔡特金等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号召书》。号召书指出，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不朽的领袖。他虽然逝世了，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要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

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第一次全苏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会议上做了报告。其中谈到，欧洲正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明显地走向激烈的内战。

2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月19日通过的《德国事件的教训》这一决议。季诺维也夫为决议的发表写了一个前言。前言指出，德国共产党由于十月革命的失败而经历着政治危机，发生了内部力量的重新组合问题。党的中派核心和左派必须团结起来，这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它面临的任務。

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1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等文章。

3月初，季诺维也夫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共产国际建立5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这些讲话中谈到，我们有时感到国际革命进展得太慢。5年过去了，而我们不仅没有夺取欧洲，甚至没有取得一次重大的革命胜利。要知道，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很短暂的。而且，革命的发展也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共产国际的成就首先在于，在5年间，共产国际由一个不大的组织发展成强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这两次讲话后来整理成《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2期上。

3月16日，季诺维也夫写了《德国共产党的状况》一文。此文发表在同年4月19日《真理报》上。

3月26日，季诺维也夫先后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一封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二封信》。

4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工农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当代国际形势的主要因素》的报告。

4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通告》。

5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24年的“五·一”运动》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1923年“五·一”节至1924年“五·一”节之间的一年,是国际工人运动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一年。在欧洲很快就要萌发出新的革命枝芽,这些枝芽会使第二国际的纸房子倒塌。工人阶级将挺胸去反对资产阶级,以阶级反对阶级。

5月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选举胜利和今后党的任务》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德国共产党人最近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数量对比而言,已经达到了俄国1917年的水平。德国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内部争论,并转入广泛的政治工作。

6月1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开幕式。

6月14日,《真理报》公布了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俄共(布)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名单。

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向大会致开幕词。

6月19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由他起草的《策略提纲》草案。

6月26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在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辩论结束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1)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将持续一段时间;(2)很快就会在某些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形势,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出现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6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县委书记训练班结业式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总结》的讲演。

7月7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在讨论工会问题时,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和工会运动》的讲话。

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季诺维也夫在闭幕式上第五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并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共产国际已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平主义阶段拟定了自己的方针,并以“各党的布

尔什维克化”和“到群众中去！”这两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

7月9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五大”的基本总结》的讲话。

7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列宁主义》一文。此文是为帝国主义大战爆发10周年而作的。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并论述了列宁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

8月31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给瑞典共产党人的信》。

9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和捷克斯洛伐克支部》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十项要求。

9月2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为第一国际建立六十周年而写的《第一国际及其继承者共产国际》一文。

10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英国共产党在1924年10月的英国大选中应如何展开工作的问题发表讲话。

10月23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汉堡起义一周年前夕》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汉堡起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起义，是激烈搏斗前的一次预演。这次起义被打垮了，但是，这次失败却比某些“胜利”更富有成效，它将对今后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产生巨大的作用。季诺维也夫最后强调，汉堡是无产阶级准备战斗的口号，是德国国内战争的明天，是共产国际的旗帜。

10月27日，季诺维也夫向一些外国报刊代表发表谈话，断然否认有所谓1924年9月15日的“季诺维也夫的信”。他指出，这封信是英国政府别有用心地捏造的，它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

10月28日，《真理报》在报道季诺维也夫接见外国报刊代表的消息后，全文刊登了所谓的“季诺维也夫的信”。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七年——第一个没有伊里奇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一文。

11月11日，在苏联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题为《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的统一》的讲演。在讲演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工会运动的统一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实现了工会运动的统一，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世界性胜利就有了最好的保证。

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英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专门召开会议。在会上，季诺维也夫指出，在将要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要提出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布尔什维克化不应理解为对什么国家都是一个样子。例如，在波兰，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回到列宁在1903~1905年在农民和民族问题上的观点。英国党布尔什维克化目前意味着要弄清无产阶级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相互关系，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会上，要解决好殖民政策问题。

一九二五年

1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文，文中谈到，共产国际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和许多国家革命自发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那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明白政党在革命中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可能取得迅速胜利，尽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里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来；共产国际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大约是1921—1924年。事情已经清楚，胜利取之不易，首先需要花几年时间来建立共产党。这项工作 在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期间已经多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现在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个时间可以从“四大”算起。共产党大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问题是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他强调说，“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次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其他优秀支部的经验）运用到每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中来。”

3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妇女中的工作》一文。

3月14日，季诺维也夫为孙中山逝世而发出《致国民党的唁电》。他表示，“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将为孙中山的逝世而悲痛。”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8月21日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前，季诺维也夫会见了美国共产党代表。他要求美共缓和内部派别斗争，并建议美共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福斯特派应占多数，鲁滕贝尔格派按比例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代表。

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并被选为全会的政治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的主席。他

向全会致了开幕词。他指出，世界革命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荆棘丛生和更加艰难，我们将用比起先预想的更缓慢得多的速度走完这条路。

3月2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工作着的共产国际》一文和他起草的《论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草案。

3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报告。

3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状况和共产国际》的发言。

3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的发言。

4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因为讨论兴登堡竞选总统问题召开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主张撤回德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改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奥托·布劳恩，以防止帝制派候选人兴登堡当选。但德共拒绝。

4月4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世界革命》☆的总结发言。

4月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全会的工作是在“反对极‘左派’的幻想，争取现实地估计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不要对右派让步”、“布尔什维克化”、特别是“进一步到群众中去！”等口号的标志下进行的。

4月9日，季诺维也夫应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执委会扩大全会的开幕式。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等代表共同签署的公开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体党员》。

4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由季诺维也夫为俄共（布）代表会议起草、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提纲草案。

4月29日，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题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又根据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整理成《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

杂志 1925 年第 5 期上。报告指出,应该根据法国的实例来判断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界限,根据保加利亚和德国的例子来判断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界限。他认为,应该善于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

6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状况》一文。

6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文。文中指出,“历史的辩证法是:正是对殖民地的压迫,加速着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熟,从而也加速着英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海事件的伟大世界性历史意义正在于:它十分清楚地、使人毫不怀疑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工人以要求最起码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开始,以喊出‘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滚出中国去!’的口号而结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国工人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因素。”

6月11日,季诺维也夫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题为《摩洛哥和上海是激烈搏斗的前奏》的讲演。

6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我是怎样在中国“激起骚动”的》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骚动”不是共产国际的什么人激起的,而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内部矛盾激化造成的。

6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一文。

7月2日前,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信。在信中,季诺维也夫要求德国党承认资本主义在德国取得暂时稳定的事实。指出,党要运用这种形势所要求的策略就必须根除“极左狂热”。

8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同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集中批评了德国党内的“极左”派在工会问题、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和对形势的估计等方面的严重错误。

9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一文。

10月1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我们的国际状况》一文。文中谈到,工人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人应该在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工会运动

统一的斗争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

10月10日,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状况》的讲话。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两个四年》一文。

11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全苏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国际形势的评价》的讲演。

12月18~31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二六年

1月初,季诺维也夫同德国共产党的“左派”路特·费舍多次会晤。在会晤时,季诺维也夫向路特·费舍透露,他们将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斯大林的反盟。以后,路特·费舍给德国国内的“左派”去信,要求他们支持托季联盟。

2月16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起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提纲)》草案。

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并致开幕词。

2月20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3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3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首先,他着重论述了在动摇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加强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重大意义。接着,他以列宁不断进行反倾向斗争为依据,论证了在共产国际内部加强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季诺维也夫还认为,现在正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因此要加快革命发展的速度。

3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六次扩大全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布哈林、台尔曼和塞马尔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主席。

3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上作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总结》的报告。

5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讨论托·贝尔关于英国罢工的报

告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季诺维也夫断言,英国的“头号敌人”是改良主义者左翼。这个论断被会议所否决。

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英国罢工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5月21日,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学为英国罢工工人和无产者大学生募捐大会上作了题为《英国的总罢工和它的世界意义》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有过一个时期,英国存在由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领袖领导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运动。但是在目前,英国的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越来越革命。

5月,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提纲,其中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退出国民党的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个建议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路线。

6月初,季诺维也夫帮助路特·费舍离开苏联返德。

6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总委员会的“8月4日”》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1914年8月4日对第二国际的多数领袖来说,意味着他们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1926年5月12日后,总委员会也变成了一具僵尸。在1914年8月4日后,列宁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直接分裂、建立共产党;第二国际的分裂、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但是,我们今天能否提出分裂英国工会的口号呢?当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做。应该记住,党和工会是有区别的。应该记住列宁关于必须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教导。

7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7月,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要求苏联工会立即退出英俄委员会的提纲,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谈到,坚决谴责那种有损于共产国际地位的批评,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支持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德国的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意大利的博尔迪加集团和其他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集团。这些集团与他们无关。

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决议:“鉴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体现联共(布)的路线,并且由于他本人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上进行派别活动而丧失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任(这些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了这一点),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

10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反对派集团这种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并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种宗派阴谋带到了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列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根据几个最重要支部的决议，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已不能留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位上继续工作。”

11月1日至11月3日之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在讨论斯大林所作的《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时，季诺维也夫作了辩护性发言。

11月3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会议完全赞同若干兄弟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作的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的决定。

11月21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根据共产国际几个最大支部领导机构的决议，我请求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及目前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全部工作。”

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议》。决议中指出：“考虑到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即苏联、德国、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并注意到季诺维也夫同志1926年11月21日的请求，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

12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长篇辩护发言。

12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共产国际主席一职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共产国际主席一职不宜保留；考虑到全会已经通过了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认为现在有必要取消这一职位。”